Annette Lareau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Second Edition



不平等的童年

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

第2版

[美]安妮特·拉鲁 著　　宋爽　张旭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nette Lareau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Second Edition

不平等的童年

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

第2版

[美] 安妮特·拉鲁 著　　宋爽　张旭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不平等的童年

[美]安妮特·拉鲁

出版信息
作者：[美]安妮特·拉鲁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
原作名：Unequal Childhoods：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译者：张旭
出版年：2009-12
页数：324
定价：30.00元
装帧：平装
丛书：日常生活批判系列
ISBN：9787301165294

目录

起始章
第一章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第二章 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
第一部分 组织日常生活
第三章 协作培养的忙碌节拍：加勒特·塔林格
第四章 孩子的节拍：泰雷克·泰勒
第五章 孩子的玩耍是孩子的事情：卡蒂·布林德尔
第二部分 语言的运用
第六章 发展孩子的能力：亚历山大·威廉斯
第七章 语言作为社交生活的渠道：哈罗德·麦卡利斯特
第三部分 家庭和教育机构
第八章 存在于团体机构范围内的协作培养：斯泰西·马歇尔
第九章 跑偏了的协作培养：梅勒妮·汉德隆
第十章 让教育工作者带路：温迪·德赖弗
第十一章 遭皮带毒打，又害怕“上学”：小比利·扬内利
第十二章 社会地位的力量和局限性
附录一 研究方法：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
附录二 理论：理解布迪厄的著作

第一章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一个晚春的下午，一个四年级的白人孩子一边笑着一边喊着在自家后院的游泳池里击水嬉戏。这个孩子名叫加勒特·塔林格（Garrett Tallinger），他的家坐落在市郊，是一座有四间卧室的小楼。和大多数傍晚一样，在快速吃过晚饭之后，他的父亲就开车带他去参加足球训练。踢足球只是加勒特参与的众多活动之一。他的弟弟在另一个场所还有一场棒球比赛。这两个男孩的父母还是有一些傍晚的时光，能够放松下来，慢慢去品味一杯葡萄酒的。但今晚却不是这样一个夜晚。当他们匆忙换下工作装并帮孩子准备好去训练的时候，塔林格先生和他的太太又紧张又忙乱。

距此只有十分钟之遥，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威廉斯（Alexander Williams）的黑人孩子也上四年级，他正从学校的家庭招待会 [1] 出来，坐在自家的轿车里，走在回家的半路。他的母亲正开着他家米黄色皮革装潢的丰田雷克萨斯。当时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9：00。威廉斯女士下班后已经很累了，而且第二天还有一个日程很满很忙的星期四在等待着她。她得在清晨4：45就起床出差到另一个城市去，一直到当晚9：00才能回来。星期六早上8：15她还要开车带亚历山大到他的钢琴老师家去上课，课后，他们还要去唱诗班排练，然后再去参加足球比赛。当他们在黑暗中开车前行时，亚历山大的母亲轻声地和儿子谈着话，问他问题，并引他讲出自己的观点。

家长和孩子之间讨论问题是中产阶级抚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像很多中产阶级的家长一样，威廉斯女士和她的丈夫认为他们自己是在“发展”亚历山大的能力，在以一种协作的方式培养他的才干。由母亲和父亲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支配着像加勒特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通过确保他们的孩子拥有这些和更多其他的体验经历，中产阶级家长参与了一个协作培养（concertedcultivat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中产阶级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种优越感在（教育）机构的场景里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中产阶级孩子在这个环境场景里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讲话。

从这里驱车仅二十分钟，在一个蓝领的工人居住区里，还有再稍远一点的一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住房区里，孩子的童年看起来很不相同。扬内利先生（Mr. Yanelli），一位白人父亲，开车到课后加时班去接他的儿子小比利（LittleBilly）。小比利也在上小学四年级。他们回到家后，小比利先看电视，然后再到街上骑车玩耍，与此同时扬内利先生则在喝啤酒。其他时候的晚上，小比利则和他爸爸坐在屋外的路边打牌。比利母亲的工作是帮人打扫房间，她下午5：30左右下班回家。她做好晚饭，然后全家都坐在一起共进晚餐。大家庭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扬内利女士每天都打电话和“整个一大家子”联络。有很多个晚上小比利的叔叔都会过来串门，有时还会把小比利最小的表弟带来一起玩。春天的时候，小比利在一个当地的棒球队打棒球。同每周至少参

加四次各种活动的加勒特和亚历山大不同，对于小比利来说，棒球是他整个学年中唯一的有组织的课外活动。这条街的下边，一个名叫温迪·德赖弗（Wendy Driver）的白人女孩也是工人出身，她也是和她的表姐妹们—起渡过傍晚的时光，一起挤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看录像。

更远一些地方，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一个名叫哈罗德·麦卡利斯特（HaroldMcAlister）的黑人男孩正在外面玩耍。他住在那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住房区里，也在上四年级。那个晚上，他的两个表兄弟也在那里，他们常常来找哈罗德玩。整整一个下午，他们都在找一个篮球，可是却没有找到，因此也没有办法打篮球。之后他们干脆就坐下来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现在，他们又跑出去在黄昏下用装满永的气球打闹。哈罗德试图把他的邻居拉蒂法小姐（Miss Latifa）给浇湿了。人们坐在这排单元房外的白色塑料草坪座椅上。音乐和电视的声音在敞开的门窗间飘来荡去。

比利、温迪和哈罗德身边的成年人都想给他们最好的生活。经济上的艰难困窘使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成为这些家长的主要生活任务，他们要挣钱糊口，要安排住房，克服住处附近的不安全环境，带孩子去看医生（常常要久久地等那些根本就不会来的公共汽车），给孩子洗衣服，还要催孩子按时睡觉并帮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准备好上学。但是，与中产阶级家长不同，这些家长并不认为协作发展孩子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有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而实现的协作培养）是教育好孩子的必要因素。与塔林格家和威廉斯家不同，这些母亲和父亲并不把焦点放在协作培养上。对他们来说，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要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想、观点和思想。相反，他们认为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些家长倾向于下达指令：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给出理由来说服他们去做事情。和与他们对等的中产阶级孩子不同，这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那些固定的由成年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他们对自己业余活动的特性有更多的控制权。大多数孩子都和自己的小朋友和亲戚住得很近，都能自由地外出并和这些亲戚朋友玩耍。他们的家长和监护人推动了他们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2]。然而，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仍然需要与像学校这样在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机构配合互动；而这些社会中心机构又都坚决果断地推崇以协作培养的方式教养孩子的策略。对于工人出身的家庭和贫困家庭来说，他们在家中教养孩子的逻辑和教育机构的标准是不同步的。其结果就是，如果家长采用了协作培养的策略，他们的孩子看起来就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而像比利·扬内利、温迪·德赖弗和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这样的孩子，他们看起来就在自己历经教育制度的体验中得到了一种形成中的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

美国也许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但是它也是片不平等的土地。父母的社会地位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而这本书就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译者按：在美国，“阶级”主要指以经济水平为基础的社会地位，而并没有太多政治上的含义；因此，这里延用原作者的措辞方式，即，“阶级”与“社会地位”大致可以对等互换。）通过对中产阶级

（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会谈，这本书展示了阶级间的不平等已经渗透到了组成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后面的几章里，我将汇报一些科研成果，这些成果是通过对十二个家庭在其子女处于9-10岁之间时进行的深入观察研究而得到的。我认为，家庭生活的各个关键要素紧密结合，整合成一套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 [3] 。换言之，各类不同家庭的不同之处看起来会聚合成各种有意义的模式。在人类历史的这一时刻，中产阶级的父母倾向于采用这样一种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他们注重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的父母则趋向于采取成就自然成长的文化逻辑。在成就自然成长的逻辑中，孩子体验到长时间的闲暇时光、自发的嬉戏、成人和孩子之间分明的界限和每天与亲戚之间的交往。尽管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却常常拥有更"像孩子"（该拥有）的生活，他们因没有成年人的干预而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对自己长长的闲暇时光也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虽然中产阶级的孩子漏失了与亲戚之间的联络以及自己的闲暇时间，但是他们看起来却（至少是在潜能上）获得了在（教育及其他）机构中重要的优势。从协作培养的经历中，他们学到了各种对将来进入工薪世界可能会大有好处的宝贵技能。在我的研究中，虽然中产阶级的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的确显示出了一些重大的不同之处，但是，最重要的差距并不是发生在同种社会地位内部，而是像我即将展示的那样，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之间。正是这种不同阶级地位之间的差别（和这些差别是如何以行动在家庭生活与抚养孩子中表现出来的），促成了／影响到孩子在与身外世界发生联系时对自己的看法。

文化技能库

工作对象为儿童的专业人士，例如教师、医生和咨询员，通常都能在如何抚养孩子上达成一致看法。当然了，他们有时也会就针对某个孩子或家庭在实地操作中该如何去实践教养孩子的标准而产生一些分歧。比如说，老师们也许会对家长是否要停下来纠正孩子在阅读时不正确的发音而产生分歧。心理咨询员们也许会对一位母亲是否给了她的孩子过多的保护而产生分歧。但是，对于通过正确地教育子女来促进孩子身心发展的主要原则，专业人士之间却极少会存在任何分歧 [4] 。这些原则标准包括与孩子交谈的重要性，发展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在他们的求学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与此相似，家庭教育的指导方针所强调的主要是同孩子讲道理的重要性，以及教他们要通过协商而不是武力来解决问题。由于这些指导方针早已深入人心，又由于这些方针都聚焦在一套家长应该如何养育孩子的行为规范上，它们就组成了一套关于怎样培养孩子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技能库（dominant set of cultural repertoires）。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渗透了这种在抚养孩子的主要原则上为专业人士普遍赞同的文化技能库。如此这般，一小部分专家就塑造了众多家长在教育孩子当中的行为方式。

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专业人员针对教养孩子的最佳方法

所给出的建议发生了颇为规律的变化——由从前强烈推崇的牛奶喂养、严厉管教和使用体罚（并对父母娇惯孩子作出了严重的警告），到现在同样强烈推崇建议的母乳喂养、对孩子表示爱和温暖，以及使用讲道理和交涉协商的管控机制来教育孩子。中产阶级家长的言行在方方面面都显得比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转变得要更快也更彻底 [5] 。当专业人员的建议从牛奶喂养转向母乳喂养，从严加管教转向温暖怜爱，从责打体罚转向冷静反省，正是中产阶级的家长们最及时地响应了这些建议 [6] 。而且，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的中产阶级孩子还不得不去面对“财富衰减”的前景 [7] 。中产阶级父母为孩子将来的安身立命感到焦虑，因此他们就越来越坚决地让孩子抓住机会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只要这些活动能为孩子今后事业发达带来好处。

那些遵从专业人士提出的标准并参与到协作培养模式中的中产阶级家长都会有意设法去激励孩子的发展，培养孩子的认知技能和社交技巧。在当前特定的经济挑战和养育孩子的艰辛重压下，工人阶级和经济贫困的家庭则需要不断地挣扎在承担孩子的衣食住行及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上。但是他们却在通过有组织的业余活动对孩子进行写作培养这方面大有欠缺。在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庭中，支持孩子的自然成长被看做一项成就 [8] 。

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养哲学和方法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简单来说，它们导致了父母向孩子传输差别优势（transmission of differential advantages）。在这项调研中，中产阶级家庭中的谈话交流要远远多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而也正是谈话交流导致中产阶级的孩子能更好地发展其敏捷的口头表达能力、拥有更大的词汇量、在有权威的人面前更安适自如及对抽象概念更加熟悉。重要的是，不同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在与学校等机构中和家里的权威人士的交流互动中，也养成发展了不同的技能。像加勒特·塔林格和亚历山大·威廉斯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当他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学会了和成年人握手并在互动中注视着成年人的眼睛。在有关工作面试的调研中，调研人员们发现，求职者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给雇主留下好印象。因此，研究人员都强调眼神对视交流、握手坚定稳健和在面试中表现出对雇主应答自如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像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这样的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在聊天时并不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而且，正如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所指出的，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附近，过久地注视别人的眼睛可能是很危险的 [9] 。麦卡利斯特家代代相传的社交能力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些躲避危险的能力（例如，在求职面试中）就有可能没有加勒特·塔林格和亚历山大·威廉斯学到的能力那么有价值。

在本项调研中，中产阶级白人和黑人孩子还都表现出了一种逐渐生成中的中产阶级所特有的优越感。他们的言行显然都透着自己有权追求自己的个人偏好，也有权积极主动地管控自己在各种公共机构场景中参与的互动。他们看起来在这些场合下都舒适自如；他们很坦率地分享信息并要求得到别人的关注。虽然总是会有比较外向的孩子也总是会有比较内向的孩子，但是，中产阶级孩子都会去做的事情，就是转化互动并使其对他们有利。亚历山大·威廉斯知道怎样让医生倾听他（对自己因使用了新除臭剂而在腋下长出了肿块）的担忧。他的母亲明确地训练并鼓

励他对医生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同样的，一位名叫斯泰西·马歇尔（Stacey Marshall）的中产阶级黑人女孩也是如此：她的母亲教她说，体操老师的教学应该配合她的个人学习风格。就这样，中产阶级的孩子在“（社会的）游戏规则”中得到了各种训练，而这些规则都是支配与公共机构的各种代表形式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法则。然而，这些孩子对其他很多重要的社会技巧都不熟悉，比如说，在长长的周末和暑假安排自己的业余时间，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发表长篇大论，或是以一种服从的、不过分炫耀的方式和成年人相处，等等。中产阶级的孩子还（在模仿中和直接的训练中）学会了如何让各种规章制度有利于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此，家里面大力强调的论证和商谈也对孩子将来在各类公共机构中的商谈提供了潜在的优势。除此之外，那些有权威的人对这样的互动也作出了正面的反响。甚至在四年级，中产阶级的孩子就俨然开始代表自己的利益来为自己取得优势。他们向老师和医生提出各种特殊要求，让对方调整措施来迎合他们的需求。

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各种公共机构的场合下与他人互动时则表现出了一种逐渐形成中的局促感（sense of contraint）。他们很少有可能去改变同他人的互动来为自己所用。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只是被动地去接受权威人士的举措（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在暗地里进行反抗）。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长有时候并不了解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状况（比如，他们有时不知道孩子没有完成家庭作业）。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还会因为觉得学校的规定毫无道理而对其置之不理。比如说，温迪·德赖弗的妈妈告诉她对纠缠她的男孩子要“拳脚相见”，比利·扬内利的父母为自己的儿子在操场上“殴打了”另一个男孩而感到骄傲，尽管比利因此而被学校停学，家长们还会在要求“校方”对他们的忧虑作出反响这类事上遇到各种困难。扬内利女士在发牢骚说她“恨”校方的时候，她也在无形中教育了儿子在面对一个重要的公共机构时只能表现出无能为力和失意挫败。像斯泰西·马歇尔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则学会了向专业人士提出各种要求，当他们成功地将各种规则为自己所用时，他们也就为自己的未来增长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即，个体继承下来的各种技能，这些技能可以在他们行走于各种公共机构之时被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价值）[10]。然而，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在面对公共机构时，通常则无法让各种规则为自己服务，也因而无法为成人后的生活获得资本。因为有这些合法化的模式，依照协作培养的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就能以一种逐渐生成的优越感的形式获得各种优势，而依照自然成长的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则倾向于发展出一种逐渐生成的局促感[11]。

社会阶层和个人主义

美国的公共舆论大都把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归因于这个人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品质。像“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了”（I Did it My Way）这样的歌曲、个人传记、电视节目和杂志上的文章都赞美个人的力量。最

具代表性的就是，个人取得的成果是与个人的努力和天赋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说，具有好强的“A型”人格、工作努力、或是有领导才能。这些在文化上的信念为美国人对不平等的看法提供了一个框架。

实际上，与承认社会地位的力量相比，美国人能更轻松地承认个人的积极主动性。研究表明，美国人大都相信他们的成就来自于他们个人的努力。只有少于五分之一的人看到“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或阶级地位对‘在生活中获得成功’是极其重要的”[12]。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相信他们能凭自己的力量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换言之，美国人相信这样的美国梦：“我们从小到大都相信的这个美国梦，虽然简单但却十分强大——如果你努力工作并遵循规则办事，你就应该会得到一个机会来实现自己，让上帝给你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13] 每一个个体都要对自己生活的结果负责——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表达了他们对这种美国式意识形态的信念，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如此。

然而，毋庸置疑，社会的确是有阶级和阶层之分的。就如同我在下一章里将要展示的，很多非常宝贵的资源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均匀地分配的，比如说，对财富的占有；拥有一份令人感兴趣、薪水丰厚又颇具复杂性的工作；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座家宅。而且，这些资源还是代代相传的；预测一个孩子是否有一天能从高校顺利毕业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一看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否有大学文凭。当然了，诸如此类的关联并不是绝对的：约有三分之二的社会成员会重现他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则会另谋他路。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分布极其不均的社会里，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里。然而，在下一章中我将向读者展示，很多通情达理的人都不能在如何从这样的社会模式中抽象出最好的理论上达成一致。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家庭是否“享有独特的、能界定其生活轨迹的经历”[14] 这一点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并没有一个清晰连贯且持续恒常的体验模式。在本书中我将证明，事实上存在这样一种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它确有因不同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特征的倾向。我把这些相互交错的各种实例看做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以一种杂乱但仍然可以辨认的方式集合在一起。与很多人不同，我的看法是，社会地位的确对塑造家庭生活的日常节奏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调研本身

带领孩子度过一天的学习和生活真的是件很繁重的劳作，尤其是对于孩子的父母来说更是如此。当我开始着手进行这项调研时，我就对了解这个劳作的过程十分感兴趣。我选择了观察整个家庭，而不是仅仅观察孩子或家长，这是因为我希望能捕捉到一些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我的研究方法也就意味着要走出家宅的四壁来了解父母和孩子是怎样与孩子生活中的其他成年人磋商行事的。

这本书基于密切透彻的“自然主义”观察法，对十二个有9-10岁孩子

的家庭（六个白人家庭，五个黑人家庭，一个混血家庭）进行了调研。这十二个家庭是一项更大的调研的一部分，整个大项目包括了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人群中取样的88个孩子 [15] 。（关于调研方法的细节，参见附录一，研究方法论。）我最初见到这些孩子们，还是在探访他们所在的几个三年级班的时候；我当时一共访问了两个小学，一个是市内的下里士满（Lower Richmond）小学，另一个是郊外的斯旺（Swan）小学（下一章将对这两座学校进行详细介绍）。在白人和黑人研究助理的帮助下，我首先访谈了所有孩子的母亲们，而后又和很多孩子的父亲们做了访谈。为了更好地了解专业人员对家长所持有的期望，我还访谈了孩子们的任课教师和学校里的其他工作人员。

从这群孩子里，我和我的研究助理们挑选了十二个家庭来作进一步的密切观察 [16] 。对于每一个家庭，我们通常是在一个月的期间内到他们的家中及附近地区进行二十次访察。在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履行每日例行的琐事时，在他们参加学校活动时，在他们参与教会仪式及活动、有组织的游戏和竞赛、亲戚来访、还有看医生的时候，我们都跟随着他们进行追踪观察。大多数访察都会持续三个小时，有时候，取决于活动本身的性质（例如，一个在外市的葬礼，一次所有亲戚都参加的特别活动，或者一次很长的购物旅行），我们也曾逗留过更长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在每个孩子家里都安排了一次过夜的访察。我们常常随身带着录音机，尤其是在这些家庭对我们都习以为常之后。

当我们把自己介绍给每个家庭时，我们告诉他们，就像一项著名的研究里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被当成“家里的宠物狗” [17] 。我们希望家长们能忽略我们的存在，但同时又允许我们跟着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存在还是有了些许更主动的特性。不过，在最初的一些纷扰之后，我们通常都会融入背景里，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定下自己的步调。在他们家里，我们和孩子一起坐在地上，出游时，我们也坚持坐在他们私家车的后排。在室外，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打球或者在他们和小伙伴玩耍时也跟他们在一起。中产阶级的孩子往往要花很长时间等待成年人来接他们去各种活动。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等待。正如我在附录一里面所说，凭经验所得的规则就是，如果小孩子没有在当下就面临危险，就不要批评或是干预。我们鼓励他们不要担心没有招待我们，我们告诉孩子们在我们面前要自然放松，如果他们通常会骂脏字，那么他们就还在我们面前也骂脏字；我们还要他们对我们放下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对待“客人”的规矩。

当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时，当我们坐在车的后排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足球比赛时，当我们看着孩子们换上睡衣或是和他们一起坐在教堂里时，我们的存在无疑改变了当时那个空间里的互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看到他们已经适应了我们的存在（例如，随着他们对我们变得习以为常，大声吼叫和脏话骂人开始增多）。尤其是在最初的适应期过后，很多家庭都报告说，如果非要说他们的行为有什么变化的话，这些变化也是很小的。

孩子们都觉得参加这个项目让他们感到很愉快。他们汇报说，这件事让他们感到很“特别”。每每看到实地调研的工作人员来到自己家中，他们看上去都显得非常高兴；有时候，他们还不愿意让工作人员离开。

有时候，有些家长也说他们“很开心”。这项调研明显给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欣喜，这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孩子很少和自己的大家庭、邻居及老师以外的成年人打交道。在中产阶级家庭里，孩子们则会定期和家庭成员及学校环境以外的成年人进行互动。

恒久的两难境地

一次我参加了这样一个研讨会，其间一位黑人人类学家驳斥另一位学者的论述说：“你说的没错，但是这是从一个白人的视角来看的。”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其结论就是一个人是否是某个种族或民族的成员塑造了这个人的知性轨迹。因而，有些人便相信，作为一个白人女性，我就不应该去研究黑人家庭。反之亦然，他们也反对黑人研究助理去访察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他们断言，让同性恋者去研究同性恋者、让女性去研究女性才是更理想的，甚至是必须如此的。有些人担心局外人会生出很多误解。还有人声称，让白人研究人员在黑人家庭里作研究是件不合理的事。

对于这些争议，实在是没有简单的应对之计。这项调研的设计是从当地的环境背景中产生出来的（参见附录一）。而更概括地说，我和那天晚上研讨会上的那位年轻女子之间存在着哲学观点上的不同。我质疑那个所谓的“白人的视角”是否存在 [18] 。按照她的批判逻辑，就意味着（占优势地位的）种族和民族不应该去研究任何涉及劣势群体的社会问题。这种逻辑并不能打动我，也无法让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了解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方法。（这种逻辑还会造成另一个不公正的后果，就是迫使每一位黑人社会学家都只去研究美国黑人，而不是有自由去研究他们感兴趣的任何人群。）再者说，眼前的“人群”总是纷繁多变的。那如果是同一个民族中不同性别的人群呢：阻挡我们去理解他们的壁垒是否同样高不可攀？在一系列重叠反射的镜子里，这样的张力是否意味着你唯一真正能“跨越障碍”去研究的人就是你自己呢？这本书的观点是，局外人有可能越过人群界限来研究其他群体。我们在本书中向读者报告了一项运用人种学方法研究身处各种社会场所的儿童的调研：其中既有男孩又有女孩，既有中产阶级的孩子，也有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既有白人孩子也有黑人孩子。此外，科研小组的成员也是由各种不同的种族和民族（以及不同的社会地位背景）组成的；这一点，就像附录一所示，也影响到了我们在访察中所获悉的东西。

有些审稿人担心，在当前美国紧张的种族关系下，这本书里所描述的行为模式会巩固人们对某些群体的负面形象所固有的偏见。他们担心调研结果会被人脱离原有的环境以滥用自肥，尤其是那些政治上的保守派。初期的一些看稿人还鼓励我不要报出那些有可能会加固人们对劣势群体（比如，贫困黑人家庭）负面印象的结果。虽然事实上原稿中就已经包括了对贫困白人家庭及黑人家庭的描写，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不能完全缓解这些担忧。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大部分读者都将是中产阶级的读者，或者是正在向中产阶级靠拢的大学生，尽管他们来自工人阶级或

贫困家庭。作为读者，他们会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作为家长或未来家长的生活为基准来评判什么才是恰当的。这个文化和历史框架可能会成为他们解读调研讨论的基础。事实上，一些（中产阶级的）看稿人在阅读初期的几稿时就感到，一个孩子整天看电视的话，他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无聊”，而且这样对孩子“很不好”。但是，这样的解读是深植于某种对童年特有的设想上的——这一设想包含了发展潜力和协作培养。而读者在其信念上的这种历史性和文化性，往往会通过在各种文化和历史之间进行强烈对比而被削弱。[19]

总之，这些担心都围绕着读者是否会把自己的文化信念投射到书中的素材上。这种投射模式会使人很难“看到”其他教养孩子的理念也有其合理性。其结果就是，虽然我花了很大力气去汇报家庭生活的复杂性，但有时候，在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指出中产阶级儿童教养理念的弊端时，我却不能用同等的篇幅来指出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在教育方法中的弊端。尽管如此，这次调研的结果仍然有可能被扭曲或是被用来宣扬那些我嗤之以鼻的政治立场。但是，因为害怕调研结果被歪曲（尤其是那些对增援“缺陷论”的担忧）而不公布真实的发现，这看起来也是错误的。因而，虽然有人力劝我那样做，但我仍然没有因着这条标准而删漏数据。

本书的组织结构

下一章将描述调研中大多数孩子所在的两所小学以及这一年中我们所访察的所有其他地方。其中，对如何了解不平等存在的原因，我们还将进行简短的讨论。接下来，本书为每一个家庭都专设了一章，并由此分三方面来突出社会地位在孩子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运用，以及家庭和社会（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动。在第一部分里，我将通过着眼于作为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加勒特·塔林格家来揭示中产阶级孩子的生活：他们为了参加各种有组织的业余活动而在忙碌的作息时间下奔波（第三章）。虽然塔林格一家比很多家庭都富裕很多，但是其他中产阶级的家庭也一次次地不断涌现出相同的生活模式。相比之下，像泰雷克·泰勒（Tyrec Taylor，一个工人阶级黑人男孩）这样的孩子却有很多时间在户外和小朋友们玩耍（第四章）。即使在那时，就如同贫苦白人女孩卡蒂·布林德尔（Katie Brindle）的情况所显示出的那样，这些孩子的母亲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安排孩子度过一天的生活（第五章）。与塔林格家不同，泰雷克·泰勒和卡蒂·市林德尔两家的孩子们在一个与成年人分离开来的圈子里玩耍。

在第二部分，我将展示这些日常生活组织中的差别是如何与语言的使用交织在一起的：中产阶级家庭强调以理服人，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则强调服从指挥。我将以两个孩子为例来阐明这一发现：一个孩子是中产阶级黑人男孩亚历山大·威廉斯（第六章），另一个孩子则是贫苦出身的黑人男孩哈罗德·麦卡利斯特（第七章）。[20]

第三部分将展现不同的家长在监控和干预孩子的学校教育上有怎样

的不同。第八章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斯泰西·马歇尔的中产阶级黑人女孩，她妈妈对她在家庭之外的生活不断地仔细检查并加以调解。这种家长频繁干预孩子生活的行为实例，同时也出现在一个叫梅勒妮·汉德隆（Melanie Handlon）中产阶级白人女孩的身上（第九章），虽然相形之下她妈妈的监控行为并不那么成功，她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和冲突，尤其是在与家庭作业有关的事情上。和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家长相比，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在教育孩子上则依赖于专业人士的领导。有时候，由于教育工作者期待家长们遵循协作培养的策略，其结果就会出现很多困难，温迪·德赖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升到了四年级却在阅读方面仍然跟不上（第十章）。另一些时候，工人阶级的家长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又沮丧失意，因为那些在他们看来是恰当的行为规范（比如说，在操场上自我防御或是为严明纪律而责打孩子）会遭到毁誉贬低，更有甚者，还会被看做是虐待儿童的表现。比利·扬内利的案例正好说明了这种紧张的张力（第十一章）。

在综述性的第十二章中，我重新回顾了社会地位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一宽泛的问题。我将指出，在很多重要方面，社会地位并不会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在保持整洁、遵守秩序和有幽默感等方面。但总的来说，我也相信，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随着孩子逐渐步入更广阔的天地，阶级地位的确塑造着家庭教育的逻辑策略，同时也塑造了符合这些策略的价值观。附录一提供了一个“圈内人”的角度，以便读者认识调研中出现的问题和两难境地。

总之，我认为，在关于应该怎样教养孩子的问题上，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占支配地位的官方教育机构（比如，学校或社会公益服务中介）提出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公共机构场景之外，两种教养孩子的逻辑各有千秋。比如说，协作培养让家长们疲于奔命，让孩子筋疲力尽，而强调个性发展有时则会损害家庭群体观念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孩子和父母争论，对父母的无能大发牢骚，还蔑视父母作出的决定。在历史上其他时期，一个对医生吆五喝六的10岁孩子会因这类无礼和不恰当的行为而受到惩罚。而且，也并不是说表现出逐渐形成中的优越感的孩子，在本质上就比那些表现出逐渐形成中的局促感的孩子更有价值或更令人满意。在一个不像美国这样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人们会更强调群体的重要，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所表现出的那种局促感还可能被认为是健康和恰当的。但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教育策略却通常都会受到贬低，而且还被看做是毫无帮助甚至是对孩子今后的人生机遇有害的。中产阶级孩子自然积累的受益有可能是很重大的，但是这些无形的受益并不为他们自己和他人所见。用句俗话来说，中产阶级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处在像棒球第三垒这样好的位置，却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就应该有权享受到难得的三垒安打”。本书通过研究孩子和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乐趣、机会和挑战，将会把这些看不见的无形的损益都呈现在大家眼前。

[1] 在描述社会群体时，社科工作者经常为选用恰当的词语而担忧，他们尤其担心自己的描述会加深人们固有的负面印象。我发现，现有用以描述种族和民族群体的术语都

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探访的家庭都一致把自己描述为“黑人”。一些审读者强烈建议“黑人”应该大写，为了对他们的建议表示认可，我也遵从了这一约定俗成的常规，虽然这样就显得和小写的“白人”十分不对称。总之，在本书中，“黑人”、“美国黑人”和“非裔美国人”这三个词可以随意互换，“白人”指的则是非西班牙语裔的亚群体（译者按：在美国，“西班牙语裔”大多特指南美讲西班牙语的人之后裔，例如，墨西哥人，而不是西班牙人，他们仍然认为从欧洲来的西班牙人是白人）。

[2] 一些审阅者对“成就自然成长”这一短语表达了担忧，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短语对父母照顾子女付出的辛劳没有给予充分强调。他们正确地指出，那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本人很可能并不会这样形容自己照顾孩子的过程。这些担忧十分重要。正如我在行文中所强调的（尤其是在第五章描写卡蒂•布林德尔时），各个阶层的家长，尤其是母亲，的确都在照顾孩子上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但是，贫困家长和工人阶级家长没有那么多资源来达成这些要求。我和助研们调研的这些家长与中产阶级家长的教子方法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把安排孩子的闲暇时光看做是自己的责任，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坚决果断地干预孩子在学校的经历。相反，这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处理日常琐事，给孩子定下界限和规定，然后，在这些限定的范围内，允许孩子设计自己的生活。我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成就自然成长”这一术语的。

[3] 我定义的儿童教养环境包括日常生活例行，即日常生活的特性，或日常生活的“惯习”。我注意的焦点在两种环境上：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在这本书中，我主要使用“儿童教养”这个概念，但是有时我也会用到社会化这个术语。很多社会学家都对儿童教养这个概念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他们指出，它（很不确切地）暗示着孩子们只是消极的接受者而非积极的执行体，而且还暗示着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而非共同互动的。例如，可以参见：William Corsaro的Socrology of Childhood；Barrie Thorne 的 Gender Play；和 Glen Elder的文章“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 Theory”。然而，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给现有的术语重新注入活力，从而更精深地了解各种社会过程。与其他选择相比，“儿童教养”和“社会化”这两个术语要更简短，行话的味道也没有那么重。因此，我使用了这两个术语。

[4] 对专业人士作用的讨论见Eliot Freidson的Professronal Powers；Magali Sarfatti Larson的TheRise of Professionalism；还有，Amitai Etzioni所著的作品集The Simi-Prolfessionals and Their Organizatrons虽然已经相当古老但仍然很有价值。当然，专业标准总会受到挑战，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我并不是说就没有人会去反抗或挑战专业标准。但在最普遍的水平上，专业人士基本上一致同意，家长应该常与孩子多多交谈，读书给孩子听，并在医疗保健上扮演积极主动、果断自信的角色。

[5] 在她1996年出版的著作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中，Sharon Hays研究了中产阶级母亲和工人阶级母亲对待儿童教养的态度。她发现，所有的母亲对孩子都会进行“无微不至的照管”，虽然在惩戒孩子这方面这些母亲之间存在着差异（中产阶级母亲更倾向于使用讲道理的方式，工人阶级母亲更倾向于使用体罚）。我的研究重点在于行为上的差别，而不是态度上的差异。如果我研究态度，那我看到的差异就会比较少；例如，所有的女性都想成为好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然而，我发现的则是，家长在实行其“做个好家长”这一理念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6] 见Urie Bronfenbrenner的文章“Socialization and Soaal Clas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7] Katherine Newman的Declining Fortunes，以及Donald Barlett和James B．Steele的American：What Went Wrongr另见Michael Hout和Claude Fischer的文章“A Century of Inequality”。

[8] 一些审阅者担心，与“自然”相对的概念会是“不自然”，但这并不是“自然成长”这一术语在此所表达的意义。相反，在这里与之相对的词是“受过培养的”、“人工的”、“人工培育的”或“打造出来的”。这种在儿童教养上的对比是一个不能过分延伸的启发式手段，因为正如社会学家所展示的，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建立的。事实上，随着时代的不同，家庭生活也有着急剧的变化。参见Plulippe Aries的Centurres of Childhoodi Herbert Gutman的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1750-1925；和Nancy Scheper-Hughes的Death without Weeping。

[9] Elijah Anderson．Code of the Street；尤其是第二章。

[10] 对布迪厄著作更深远的讨论，请见理论附录；另见David Swartz，Culture and Power。

[11] 我并没有研究美国社会中所有类型的家庭，既没有研究极其富有的精英家庭，也没有研究在另一个极端的无家可归的家庭。此外，我的取样是有目的性的。因此，我无法说出是否还有与其他文化逻辑相对应的其他形式的儿童教养方法。尽管如此，在根据有代表性的全国范围的数据而做的量化研究中，其数据也支持我遵循的模式。孩子时间利用方式与家长的社会地位的关系特别见Sandra Hofferth和John Sandberg的文章“Changes in American Culdren's Time．1981-1997”。在全国性的调查中家长对孩子说话的模式比较不易捕捉到，但是，Melvin Kohn和Carmi Schooler特别在其著作Work and Personality中展现了家长的儿童教养价值观。Duane Alwin对家长愿望的研究大致与此处汇报的结果一致，见Duane Alwin的文章“Trends in Parental Soaalization Values”。在家长对公共机构的干预方面，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不同社会地位的家长参与孩子在校教育的程度也不同，见美国教育部的The Conditron of Education，2001，第175页。

[12] 在本书中，除非特别说明，所有的统计数字都是1993-1995年的，数据即是在此期间收集的。同样，除非特别说明，所有资金都以（未调整的）美元形式在1994年到l995年到位的。此处报告的数字来自Everett Ladd的Thking about Amenca，第21- 22页。

[13] 此处引文来自比尔•克林顿总统1993年对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做的演讲，引自Jennifer Hochschild的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第18页。

[14] Paul Kingston，The Classless Society，第2页。

[15] 如我在研究方法附录中所详细解释的，在此个案取样中，家庭结构与阶级地位相

互交织在了一起。我们观察的所有中产阶级黑人和白人孩子都与他们的亲生父母住在一起。相比之下，虽然一些穷人的孩子经常与他们的父亲保持联系，但是在这次深度观察中，没有任何一个黑人或白人的孩子家里住着亲生父亲。工人阶级家庭介于中产阶级和贫困家庭之间。这种模式引发了很多问题：例如，协作培养的模式是否会依父母双亲的婚姻状况而定。我们的取样范围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16] 如我在附录一中所解释，12个孩子中的3个来自这两所学校之外。

[17] Arlie Hochschrld，Te Second Shift.

[18] 此处我的问题是，美国白人及黑人所持的观点十分多样化。“白人的观点”这种说法看起来并不确切。这并不是说白人不因为自己的种族而体验到各种优势。他们的确因为自己是白人而得到很多好处。白人从种族歧视中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包括他们更能得到房贷和找到工作，以及因为住在种族隔离的区域而使其房产更容易得到较高的市场价。在大街上与他人互动时，白人和其他种族也有很大的不同，包括在一条忙碌的街道上更容易打到出租车，这一点也有很多记载。因此，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社会里存在多少种族歧视。相反，问题在于，一个来自主导人群的人如果对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种族差异感兴趣的话，他在多大程度上会“看不到”或“理解不了”这个现象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参见Douglas Massey、Nancy Denton，American Apartherdl Kathleen Neckerman和Joleen Kirschenmann的文章“HiringStrategies，Tacial Bias，and Inner-City Workers”Elijah Anderson，Streetwise。最后，关于“白人特征”和白人通过自己特权地位得到的优势这方面也有大量的文献，其中可以参见Phil Cohen的文章“Laboring under Whiteness”。

[19] 参见Julia Wrigley在Linda A Pollock的文集Forgotten Children中的文章“Do Young Children Ne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第二章 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

每个人都在各种公共机构中扮演着自我、演绎着自我，而一个人作为个体的生活，如果不以其所在的公共机构为参照，就不能被充分地了解。

——赖特·米尔斯

这本书中所描述的这些家庭，都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创造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并没有去建造自己开车经过的那些道路，没有去解雇自己孩子所在学校的老师，没有下命令说哪些公园需要受到更好的保养，没有决定市政工作人员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去清扫路上的积雪，没有去定下自己所在街道的房价，也没有去安排自己所在校区和邻里的种族、民族或社会地位的构成成分。他们也没有去决定自己所在地区是否有薪水高的好工作，没有去决定全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没有去操纵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然而这些元素却侵入到这些家庭的生活，虽然有些家庭受到的冲击比其他家庭要小一些。一种对这些背景环境的构想就是，每个人作为个体都在一定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中开展自己的生活。

对社会结构的定义有很多种，但是这些定义大都强调固定的互动模式，而这些固定的互动模式又常常以社会团体的形式存在。其中最关键的基本成分是团体（或者在一个常见的定义中是“一群以对彼此共有的期望为基础而进行互动的人”）[1]。每一个个体都在自己所隶属的（几个）团体中拥有多种由社会定义的位置，即地位。个体的行为是由各种规范（为具体情境所制定的规则或指导方针）来指引的。随着时间推移，其中一些规则系统——通过在官僚机构、法律程序和官僚规章中编码——接合成公共机构[2]。举例来说，婚姻、家庭、军队、企业、政党和种族隔离制度都是公共机构。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强调公共机构的重要性说：“大部分人类生活都是由在特定的一些公共机构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组成的。要了解个体的自我演绎，就必须了解他曾经和当前所演角色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而要了解这些角色，我们就必须去了解他们身为其中一员的那些公共机构。”[3]个体与任何一种公共机构之间互动的机会并不是随意的：有社会精英背景的家庭趋向于参与到为社会精英服务的公共机构中，而贫困家庭则倾向于参与到为穷人服务的公共机构中。有些公共机构——像动物园、欢庆游行、某些商店、有时候还加上公共交通——都是“强大的均衡器”，能够把各种各样不同的家庭拉到一起。但是，富人和穷人之间诸如此类的混杂却是相对少见的。

简而言之，孩子们是在一个宽泛而分层的社会系统里成长的。在这一章中，我将通过描写一些关键方面来勾画出参加本次调研的孩子及其家庭所在的社会结构环境。我把视野集中在两所目标学校：位于城区的下里士满小学和郊外的斯旺小学，我将分别描述这两个教育机构及其周围的社区。我还将讨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社科人员是如何解释我们社会中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的。

下里士满小学及其周边社区

下里士满小学招收学前班至五年级的学生。学校校园坐落在东北部一个大城市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看起来令人难以亲近：教学楼共有三层，并被一道高高的网链状的栅栏团团围住。教学楼很老了，里面的墙壁已经变成一种脏脏的米色，窗户也很少。墙上斑斑点点尽是油漆，以覆盖住经常出现的涂鸦乱画。学校的两侧和后院是沥青的操场和一个小篮球场，前院有一些树木和一小片草地，但是孩子们不能在课间的时候在这里玩耍。学前班有自己单独的操场，同样是一色的沥青地，但是周围有由孩子们画的壁画，看上去要更愉悦一些。学校大门外面有一个保安坐在办公桌后面。总的来讲，据一位教师说，下里士满小学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她注意到，这个学区的其他小学在校园里会有好多啤酒瓶子和碎玻璃碴子，比起那些学校来，[这里]“很安全；当你走进来的时候会发现前面很漂亮，有草地还有树木，还有一个停车场，教学楼也比较干净”。

下里士满小学周围邻近的住宅区把不同种族的居民隔离了开来。很多学生都来自开车十分钟以外的贫困黑人住宅工程区。而学校本身则坐落在一个主要由白人工人阶级住户组成的住宅区里，这里的大多数住宅都是小型廉价的房子。（描述性的社会和人口分布数据请参见表C2。）这里还有一些公寓楼，其中有一部分是租给符合政府补助标准的（“住房法案第8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在这些公寓楼里，不同的种族混杂居住。下里士满小学约有一半的在校生是黑人孩子，另一半是白人孩子。有不到5%的学生是亚裔人或西班牙语族裔。大多数执教人员都是白人，包括校长，但是也有黑人教员，其中包括我听课的三年级老师、校内的心理顾问、掌管阅读资源的老师和音乐老师。大多数非教职员工均为非裔美国人，比如秘书、保安、清洁管理员和校车司机。大部分学生都符合免费午餐的标准（译者按：此处表明学生大都来自低收入家庭）。

离学校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有一个小购物区，里面有几个加油站、一个比萨饼店、一个冰激凌店（只在较暖的月份里营业），一个从早上7：00开到晚上11：00的便利店和一个五金店。和其他市内的街区不同，这里的商业用房和居住用房都租了出去并有人使用，在这里并没有什么被遗弃的建筑。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工人阶级居民区，有狭窄的街道、老旧但保养得很好的红砖二层楼房，还有足够多的商业消费者和雇员，以至于停车位经常短缺。在单调的混凝土路面和建筑之间，也有足够多的树木和鲜花来打破沉闷并标记出四季的更迭。建筑物都密集地挤在一起。大型商厦非常少见：超级市场只是零星可见，而且也没有像焦点（Target）和沃尔玛这样的打折优惠店。居民们必须驾车到郊区才能有机会买到价格便宜的货物。

下里士满小学周围的交通十分忙乱。市内的公交巴士每小时有数次呼啸着在路上往返穿梭，小卧车飞速驶过十字路口。车喇叭时时高声作响。与地广人稀的地方相比，密集的住房和稀少的停车场使得邻里之间

的接触更加频繁。许多与养车相关的活动都发生在大街上，从洗车或修车到铲去车旁的积雪都是如此，和全国大多数市区中心一样，这里的犯罪行为也引人关注，尤其是在公共建筑上涂鸦破坏、入室行窃和小偷小摸。（在大街上或当地的小店里）持枪抢劫则相对比较少见，但是其频繁程度也已足以破坏掉当地居民的安全感。

多年以来，下里士满小学在家长、孩子和教育工作者的心目中的形象一直都很不错。伯恩斯坦女士（Ms. Bernstein）是该校一位四年级老师，她说，与市内其他小学的艰苦环境相比，下里士满小学是一个“柔滑可爱的奶油泡泡”。在校方提供的条件的基础上，下里士满小学为学生提供了各种有价值的资源：一个计算机房和一个专教电脑的老师，还有专门教美术、音乐和体育的老师。学校里还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由专门基金支持的以科技为重点的科教计划。学校主办的课外活动包括一个唱诗班和一个乐队，这两者都会在校内、区里和地方社区进行表演 [4] 。下里士满小学每年还会组织一场受人欢迎的春季教育集市。

尽管如此，这所学校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从缺乏像纸张和美工原料这样的教学用品，到教师短缺，到能损害学生受教育的繁冗的行政机制。虽然大家都公认在市区的学校里教书要比在郊区教书更具挑战性，但是教师们的薪水（以及每个学生的花销）却要比在郊区学校里少很多。而且也不是总能找到合格的教师。下里士满小学的一些学生就对教师短缺有很切身的体会：例如，三年级的一个班就曾在一整个学年里有过一系列不同的替补老师。据学区规定，班级的名册要到新学年开始好几个星期后才能最后定下来，因而，像到十月中旬那么晚的时间，一个孩子还有可能会再分配给一个新的老师（学区为了对付教员安置和预算问题，有时会打破原有的班级并进行重新组合）。区里强加给学校的官僚政策还制造了其他很多困难。一位教师解释说，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请求就可能需要很多笨重耗时的繁文缛节：

> 一个孩子的祖母打电话来说[一个校外课后班]需要一些信息。而我却没有权力把任何学生的书面信息给任何人，除非我有孩子父母在[需求该信息的机关提供的]正式公函纸上签字的应允书。而且学校的顾问和校长也必须在上面签字， [5]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也常常对学区的教学指导方针感到迷惑和失望。比如说，一个学生要被推荐去参加全天特殊教育，就首先需要两次先遣推荐（每一次都要在不求助于全天特殊教育干预的情况下，并在使用普通教育方法努力改善后还无济于事的时候才可进行推荐），然后才可以正式审核一个孩子是否需要特殊教育。由于每一个阶段都至少需要60天，而每一学年又只有180天，以至于有时整个一学年都消磨过去了也不见得能等到一个明确的决定。就像我在本书后面所展现的，诸如此类的官僚构造带来的结果有时候就是，当他们在学习上存在的问题也无法得到对症解决时，孩子们就“被体制给抛弃”了。

在调研进行中的那一年，一些地方政客就曾公开批评这个学区没有做好学校教育。即使在像下里士满小学这样在这个学区很有成就的学校，也有大约一半的学生没有达到所在年级的阅读水平标准，四年级组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比该年级应有的水平低至少两个年级。区里在提高考试成绩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财政预算却十分有限，而且每年

都不够。和郊区的学校不同，市内的学校没有富有的家长联合会为它们吃小灶补充资金。在下里士满小学，很少有家长参与家长联合会；每次开会都只有三四个人参加（通常只有头目们到场）。教师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潜伏着另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在通常还很热情的氛围里潜伏着严重的紧张关系。一些黑人教师觉得白人教师对某些黑人孩子不公平。一位三年级黑人老师气愤地控诉说：

> 有一些教学人员——有些孩子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一些名声不好的黑人孩子做了某些事情以后……[被]开除学籍。一些白人孩子会犯很严重的错误，而他们所受的处罚却只是在放学后被留堂、请家长或是停学检查。虽然白人领导和白人教师大都不同意这种看法，其他黑人教师却都重述了同样的担忧和困扰。

有时候，下里士满小学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严重威胁安全的行为很少见。 [6] 但是，每个星期，孩子们在操场上的拳脚之争却是屡见不鲜。老师们估计，至少有一半孩子在生活上有严重问题，通常涉及没有自理能力或缺失的家长。学校的心理顾问定期与儿童保护机构合作以帮助那些在她看来被忽视需要照看的或是受到虐待的孩子（例如，那些没有穿大衣就来上学的孩子）。仅仅在一个班级里，通常就有好几个孩子存在“严重的问题”。在蒂尔先生（Mr.　Tier）的四年级里，就有很多这样的白人孩子。莉萨的妈妈不要她了，她现在“和她的父亲一起住，而这个当爸爸的总是喜欢过量饮酒”。托马斯的妈妈有一天突然就消失了，虽然她最终还是出现了，但她始终没有和自己的儿子取得联系。还有坦妮莎，她甚至没有老师希望每个孩子都有的最基本的学习用具（比如书包）。另一个叫托娅的学生，经常扰乱课堂，她“总是在和别人打架……但是她的妈妈……[不但不呵责她，反而过来花时间]向我解释为什么这些都不是托娅的错”。朱利叶斯来自一个“有很长的吸毒和暴力历史”的家庭。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们还注意到，这些学生在生活上的问题，除了在感情上令他们苦恼之外，还扰乱了全班的学习进度。老师们一致希望他们的学生每天都“干净整洁”地来校上课，并要“为学习功课做好准备”。用一位四年级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还希望家长能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在家庭作业上签字，帮孩子做课业项目”，并且还要“抱有积极的态度”。

还是有一些家长可以实现老师们提出的这些期望的。有不少黑人和白人家长都有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些家长正在积极地谋求在社会上更好地立足。蒂尔先生的班上有三名黑人学生——艾赛亚的妈妈不要他了，但他爸爸却在一心一意地照看他，莫雷尔的妈妈已经“回去读大学以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还有丹尼艾尔，她的妈妈在“乔的牛排店”工作。有很多白人孩子的家长也是如此，包括那些被蒂尔先生称作“呈上升趋势”的父母。

总之，下里士满小学有很多值得肯定的方面，尤其是和学区里的其他学校比起来。尽管如此，这所学校也与其他市内的学校一样，存在很多实质性的局限性，比如说教师短缺、教师工资偏低、学习用品缺乏和繁冗的官僚制度。家长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力量。学生们来自种族之间互不杂居的居住区，在这些居住区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土地使用模式和市场的压力限制了大型商店存在的可行

性，这里的住宅很小而且都挤在一起，交通很混乱，犯罪率通常也让人担忧。因此与像斯旺这样的郊区学校相比，下里士满小学就要显得逊色许多。

斯旺小学及其周围环境

和下里士满小学相同，斯旺小学也招收从学前班到五年级的学生。该校坐落在下里士满小学所在的东北部某大城市边缘的一个郊区小镇。与很多其他的郊区学校一样，斯旺小学是平铺而伸展着的。学校里只有单层的建筑，都在校园的各处延展开来。每一间教室都有一整扇墙排满了大窗户。虽然所有的窗户都可以打开，但是在秋天和春天的时候（冷气不开放）教室里仍然会很闷热。教学楼外面是一片宽广的草地，缓缓地沿着小山坡舒展开去，面积之大，足可以让孩子们同时进行好几项运动而互不干扰。和下里士满小学不同，斯旺小学的操场上有一套功能繁多做工精细的秋千和横木，横木下面还有微微发红的碎木屑以便在孩子们不小心摔下来时起到保护作用。斯旺小学周围并没有篱墙，整个学校看上去显得开阔而有吸引力。

斯旺小学所在的居民区里都是单层的独门独院的中产阶级家宅。每座房子前面都有一大长条绿色的草坪。这里的房价比下里士满地区的房价要高出两倍（详细数据请参见表C2）[7]。除了有活动的时候家长们的私家车会挤满校园之外，这里的土地显得十分充足。学校的校园和周围临近的住宅区都有大片大片美化得很好的绿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树木、开花的灌木和各种花卉，每当季节变换，大自然的存在简直无法抗拒。秋天的时候，深橘色的落叶铺满了大地，春天一来，当高处粉色的、白色的山茱萸猛然盛开的时候，地上则成了水仙花的海洋。

斯旺小学及其周边地区没有可以徒步到达的商店。当地的商业区位于一条主干道的两侧；商店都是巨型的，并且在大型停车场的后面，离主路本身还有一段距离。购物的人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零售商，包括好几个折扣店。比起城里的店来这里的货品更齐全，价钱也更低。因为商店太大了，每家在从一个商店到几街区远的另一个商店时，常常要开车前往。孩子们参加各种活动需要车接车送，而且连到小朋友家去玩也不例外（但也有一些孩子能得到家长允许骑车到小朋友家去玩）。虽然这个市郊的生活都很依赖于私人汽车，但是这里几乎从不堵车；而且比起城里人来，这里的居民开车的时候更加安详舒缓。道路的状况也比下里士满附近的明显要好得多。市郊公路上坑洼不平的地方要少得多，扫雪也更为及时，常常能在暴风雪过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统统扫清。因此，一月份的时候，当下里士满小学的停车场一连几天都盖着危险的冰层时，斯旺小学的停车场却完全没有冰雪覆盖。

在访谈当中，市郊的一些成年人提到，他们认为市区非常之“危险”，还说他们会尽量避免进城。尽管家长们都为犯罪行为而焦虑，尽管他们都担心孩子的安全，这里的家庭却通常会把像自行车、棒球手套或球棒这样值钱的物品扔在院子里不管。入室行窃和小偷小摸很少在斯旺

小学周围的地区出现，在居民区内持枪抢劫几乎是闻所未闻。总的来说，这里的人并不像城里人那样担心各种犯罪行为。

斯旺小学周围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白人，但是也有一些黑人家庭、黑人学生几乎占到在校生总数的10%（另有不到5%的亚裔和西班牙语裔学生）。“多元文化”的主题在校内占支配地位，学校的拼布壁挂、海报、集会活动和课程都致力于这一主题。尽管学校密切注意提倡多元文化，但是这里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象征性的，因为和下里士满小学不同，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学生、教员、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都是白人。

家长们和学区主管们对斯旺小学及其所在学区都评价极好。返校日的晚上，副主任着重讲述了斯旺小学的这种极为显著的“特别好感”，并强调，学区十分注重听取家长的心声。他把自己的电话给了在座的家长，还鼓励他们给他打电话。比起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斯旺小学的老师们有更多的教学用品，他们有复印机，还有充足的纸张和美术用品。推介孩子接受特殊教育并不那么普遍，也没有那么多官僚的繁文缛节。家长仍然必须（通过在许可表上签字来）正式同意让孩子参加学习困难的测试，但是书面审核工作通常只需几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就可以处理好。在斯旺小学，大多数四年级的孩子，包括那些成绩差的，都达到了四年级的学习能力标准，在阅读方面，很多学生都超过了四年级标准两到三年。虽然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都提供电脑训练课、美术课、合唱团和体育课，但是斯旺小学在课程性质、教学用品和教育内容方法上都更精工。比如说，在下里士满小学，学生们用冰棒的木棒做美工。而在斯旺小学，孩子们用白色的方布和黑色的墨水来做写有日文字的标幅。下里士满小学的合唱团对所有来参加排练的学生开放，孩子们在当地的养老院表演。斯旺小学的合唱团是“选拔”出来的，孩子们必须通过试音才能得到席位。得力于一次大型的募捐活动，斯旺小学的合唱团乘专车到中西部地区参赛演出；而且在音乐老师的安排下，孩子们还在该学年内参观了一个录音棚。最后，斯旺小学的家长参与度也远远高于下里士满小学。这两个学校在规模上不相上下，但是，斯旺小学的家教联会（即家庭教师联合会）却比下里士满小学的参与者多十倍，而且郊区的这个组织在集资（和消费）上都比城里的家教联会多得多。比如说，斯旺小学的家教联会每年要花费3000美元左右为学校提供增补集会。他们赞助了“住校艺术家”及木偶表演、话剧和其他的专业表演。他们还为年度的学校信息集市提供帮助，斯旺小学的信息集市比下里士满小学的要精致得多。

即便如此，斯旺小学的家长和老师们还是有怨言，虽然他们要抱怨的问题与下里士满小学面临的困难有所不同。在斯旺小学，经济方面的安全感不是问题。这里的孩子大都生活在父母双方都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很多家长都是像律师、社会工作者、会计师、经理、教师和保险公司主管这样的专业人员。很多孩子的母亲在外面做专职工作。学校里有些老师担心孩子们在家里会因为父母“太忙了”而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内特尔斯女士（Ms. Nettles）注意到，在新学年刚刚开始的前几个星期，她班里的二十六名学生中就有十个没有做家庭作业；她评论说：

我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七年了，这种现象已经愈演愈烈。家庭生活出现了很多变化，很多家庭都变成了双职工家庭还有单亲家庭。家长回到家里，显然会因为劳累而不愿再去督促孩子去做[家庭作业]。

家长还经常会对孩子的成绩及能力估计过高。比如说，他们说自己的孩子觉得功课太容易“太没劲”了，而从老师的角度看，这些孩子并没有熟练掌握课业内容。而且，家长们还会过于仓促地对老师进行批评责备。教三年级的内特尔斯女士汇报说，一个高材生的母亲听说她女儿的成绩受到了高声批评，感到十分愤慨：

一天，她到学校来[抱怨]我把克洛伊的低分86分在班里[高声地]读了出来，她说我让克洛伊很难堪——因为克洛伊不可能得86分。

这位老师觉得孩子的母亲对自己女儿的成绩没有正确的评价：

克洛伊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在加减法的预测中，她才得了58分。她妈妈却告诉我她觉得这些太简单了没意思。“克洛伊早都学过这些了，她已经算得很好了”。当我把她得了58分的卷子给她妈妈看的时候，她简直是震惊得不得了。

家长们严密地注视着老师们的教学工作而且总会毫不犹豫地替孩子说话。一位三年级老师报告说：“孩子们的母亲受到家教联会的影响。[校长]自己也说过，家教联会总是带来很多麻烦。你知道，那个联会是个组织很严密的小团体。”家长们浓厚的优越感在老师们眼里显而易见，正像这位斯旺小学教员在下面所解释的那样：

这些家长们，他们当中有好多人都好自我中心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已经把自己这种自我中心的东西传给了他们的孩子。简直就像是，“你欠我的。现在你得替我做点儿什么才能补偿给我呢？”……或者，“你有什么理由这么做？你欠我一个说法。”有时你简直觉得自己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家长和教师之间不时发生冲突。比如，合唱团的老师觉得那些在孩子们表演时还在后排聊天的家长十分无礼。她在节目单的内侧为前来观看演出的家长加入了几条有关观众文明举止的建议，但是由于家长对此怨声载道，校长就把这些建议都删掉了。一些起初资格考试成绩并不符合天才班标准（斯旺小学的分数线是智商为125）的孩子，他们的家长还会私底下另请他人为孩子再测试一次，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如果孩子在私人测试中得分符合了标准，家长就会坚持让孩子加入到天才班。为了减少各种矛盾的发生，校长（家长们觉得他有时候太护着学校老师了）会事先采取行动，给家长们打预防针，比如说，致信给家长并请他们在下一学年的班级分配问题上尊重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判断力：

你知道，校长的确在信中告诉了家长，所有的因素都会被考虑进去的，但是恳请各位家长在下一年的分班问题上尊重他和他的教员们的判断力。因为那些让孩子进入天才班的要求，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真的会是这样的。

斯旺小学的学生家长与下里士满小学的相比，其参与程度之高令人瞩目；可是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的家长们却抱怨说，为各种活动征集足够的

志愿服务员总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学校的活动有很多，比如，“和爸爸一起吃多纳圈”、每年一度的三年级学生和妈妈一起吃午餐、家长们组织的谢师午宴，以及全校的春季信息集市[8]。

由此可见，斯旺小学的日常生活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家长埋怨老师，老师也在埋怨家长。为学校的众多活动征集志愿者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这个学校享有很多下里士满小学无法得到的社会结构资源。教师工资更高，没有教员短缺问题，教学用具十分充足，而且老师们还可以复印教学资料。尽管斯旺小学在自有资源上已经超过了下里士满小学，家教联会还是进一步为学校增加了更充足的资金。该联会集资数千美元，使学校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专业水平的美术班和音乐班。

总之，这两所研究对象小学在关键的结构资源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包括物质设备上、教学用具上，以及后续资金及家长的贡献与志愿参与上。[9] 如果社会地位不起紧要作用的话，这些差别就会是无规律地随机分布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全国范围内，家长的平均社会地位较高的社区，都拥有声誉要好得多得多的公立中小学系统。[10]

已确立的职业惯例和教育机构制定的标准

虽然这两所学校之间有很大差别，但是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美国的小学有很多一致的成分，比如说，包括教学日的组织安排都很相近。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的老师们看起来都对什么是恰当理想的童年经历拥有类似的看法。大体上他们都同意，家庭应该在促进孩子的教育发展上担当起恰当的角色。这些前提并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对自己个人信念的一种表述，而更是他们对一整套已受到教育界普遍赞同的文化惯行的一种附和。[11] （译者按：惯行，即“惯常行为”，这里的“practice”一词在本书中并非指与“理论”相对的“实践”，而是指“按照惯例／习惯去行事”。）

总的来说，老师们都支持协作培养的惯行，强调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发展孩子的能力、通过说理和阅读增大孩子的词汇量，并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教育和家庭以外的各种文教机构组织的活动。教育工作者每天都会有选择性地对孩子提出表扬，在闲聊中对他们父母的教育方式或褒或贬，并遵从那些学校和区里制定的编有特定教法的成规。教师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也会遵从协作培养的规范。正如我下面要展示的，在有限的取样里，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的教育工作者在这一点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重视培养孩子

教育工作者对家长们为培养孩子的技能才干而在课外作出的努力都

相当支持。在访谈中，两个学校的老师们都汇报说，他们认为孩子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对其成长很有帮助：

> 他们都需要一些动手动脑的活动。我认为参加这些活动是好的，因为上手操作的活动可以刺激心智的发展。音乐课可以帮助孩子集中精力。我认为参加校外活动是件很好的事情。
>
> 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你让他们接触得越多就越好——说不准将来这群孩子里就会出现一个剧作家呢。就算不是为了将来的工作着想，他们现在也很喜欢参加这些活动。他们只需去了解并且去谈论那些各种各样的才能和职业就可以了。

在这两所学校里，学生的校外活动常规性地涌入校内生活中。内特尔斯女士要求她的学生写班级日志。校外活动就是其中一个常常出现的主题，正如10月11日的实地记录所述：

> 班里的五个男孩子写的全部都是有关足球比赛的内容。其中一个说："比赛之后我气恼极了，因为我们输了。"另外四个女孩中有两个写了与足球比赛有关的事。

在下里士满小学，正当孩子们排好队准备休息时，温迪·德赖弗向她的三年级老师格林女士骄傲地描述了她的舞蹈表演会。她还带来了自己得的奖杯给格林女士和班里的同学看。比起那些像让孩子在院子里玩球或是看电视等等的随意玩耍，成年人更重视像体育竞赛和舞蹈表演会这样有组织的活动。当孩子们主动告诉老师他们看了某个电视节目或是和表亲的孩子玩了什么游戏时，老师们并没有对他们表示那么高度的兴趣或赞许，而如果孩子们告诉老师他们参加了一个有组织的活动，老师则会对他们大加赞赏。

老师们也以身作则，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给他们安排了满满当当的日程表来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斯坦顿女士让自己的一个女儿在离斯旺小学很近的一所市郊小学的四年级班上学。她女儿要参加的各种活动就和本项调研中其他中产阶级孩子的十分相似：每周常规的活动有美术班，舞蹈班，音乐班，主日学校，教会青年唱诗班，还有马术班。另一位三年级老师说，她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上天主教讲习班（基督教义团会——译者按：CCD为Confraternity of Christian Doctrine），童子军，少小联盟，钢琴课和游泳队。老师们通过自己在家庭中的言行，展现了他们对协作培养这一教养逻辑的信奉与投入。

尽管如此，老师们还是会抱怨协作培养削弱了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体验：孩子的日程安排得太满，而且孩子们由于太累了或是有活动要请假而不能顾及到学业。一位斯旺小学的老师感叹道：

> 足球经常抢占家庭作业的地位……有时候他们要在周末到其他地方去比赛。孩子们踢足球，晚睡，然后就很疲惫。我喜欢让他们参加体育运动，但是当孩子的学习受到影响，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课外活动的地位。
>
> 你没有办法同家长们作无谓的斗争。孩子是他们的，他们可以让这些活动影响孩子的学习。汤米·丹尼尔斯今年就请假跟着家人度假三次，每次都有足足一个星期。然后她[他的妈妈]居然还为他的数学成绩担心！嘿，让他每天都来上学就对了。

老师们还支持家长努力发展孩子的词汇量。他们都鼓励家长为孩子读故事，带孩子去图书馆，给孩子买书，确保孩子在家里看课外书。下里士满小学教四年级的伯恩斯坦女士给她的学生留的一项家庭作业，就是每天晚上至少要读十分钟的书。斯坦顿女士同样在教四年级，她在给孩子父母列单建议孩子的圣诞节礼物时，都在其中包括了图书。在斯旺小学，内特尔斯女士有一个公告牌，她在上面列出了学生近期必读的课外读物。

相比之下，老师们并没有直接对家长强调和孩子讲道理的重要性（他们并没有指定家长必须对孩子采取说理的教育方法）。即便这样，仍有众多迹象表明，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的教师们都强烈建议要用语言来和孩子讲道理，而不是对孩子下达命令。在课堂上的互动中，这些教师和全国各地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一样，常常对孩子使用讲道理的方法，尤其是在讲课文时更是如此。老师们在以文句的方式回答孩子的提问时 [12] ，努力去通过常规性的互动来发展孩子们的说理能力。而且，老师们大都（虽然不是一律）支持家长把“叫出去暂停”作为一种惩罚方式。

教育机构中的干预

老师们希望家长参与孩子的在校教育，尤其希望家长能督促孩子写作业。在斯旺小学，学生必须每天都让家长在作业上签名。老师认为，父母不出席家长会就是不重视孩子的学业——虽然在下里士满小学家长会都是临时匆忙通知的，也没有在时间安排上听取家长的意见。在强调家长要配合学校教育孩子这方面，这些教师的言行反映了教育界的一贯做法。 [13] 即便如此，老师们仍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去选择孩子父母的参与方式，正如下面这位下里士满小学的四年级老师所说：

> 一个不支持学校工作的家长就会和老师对着干。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家长的敌对行为让老师简直无法做工作。如果你要管教孩子，而孩子的父母不支持你或者不支持学校的立场，孩子就会和你发生争执，拼命和你作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我不需要听你的话，我不需要按你说的去做。”

斯旺小学一位三年级的老师在表达自己的忧虑时所说的话，和上面那位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惊人的相似：

> [家长们]现在总有这样一种态度，他们怀疑得太多了。孩子们耳濡目染着这一切，因此他们也把这种态度带到教室里来。虽然这样的孩子并不太多，但你的确总能马上感到这种态度的存在。一些孩子的确如此……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

虽然老师们希望家长能在琐事上给予正面的和恭顺的支持，但是他们同时也更特别希望家长能按他们的要求多多督促孩子的学习。让伯恩斯坦女士感到失望的是，真正给孩子读故事书的家长竟然如此之少：

[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成绩优异。他们都说希望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他们总是这么说，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该怎样去实现这些希望……他们就是想要……就是想要。但是他们有没有坐下来给孩子读过书？不过他们的愿望确实是好的。

两所学校的老师都认为，家长应该在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方面起到领导性的作用。他们抱怨说，家长对待孩子的问题不够“严肃认真”，也没有主动就此类问题与老师联络。简短来说，老师们希望从家长那里得到自相矛盾的行为：遵从和支持老师的决定，同时又要在孩子出现问题时果断地承担起领导性的角色。

不仅如此，在法律上，当一个家庭违反了所在州的儿童教养标准，教育工作者还有义务采取干预措施。一些在历史上较早时期全社会都很普遍的儿童教养惯行（例如，痛打孩子），在当今则被认为是不妥当的。无论老师们自己有什么看法，比如说，如果孩子因被父母责打而带着身上鲜红的伤痕来到学校，老师都必须依法把孩子交给有关部门。在后面的几章里我将向读者展示，这一法律上的要求把本项调研中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置于了一种不利的地位：比起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来，校方的官员更容易通过法律手段来干预他们教养孩子的行为。

总之，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在这些情况下都面临着一个自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各个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存在深刻的差别。另一方面，各个教育机构在文化技能库方面则接受并推崇同样的标准。因此，老师们都强调要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培养孩子的才能，强调由父母来发展孩子的词汇量的重要性，强调父母积极和正面地配合参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标准更照顾中产阶级的文化惯行，而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则很不利。这种模式使得中产阶级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能够更安逸地，有时甚至是更容易地实现他们的心愿。

不平等

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在日常教学和生活方面的差别，是在更广大的社会范围内普遍存在着的不平等的一部分。整个人口中相对少数的人以及如学校这样的公共机构占有比其他人和其他机构要多得多的资产。比如说，各个家庭之间在关键性资源上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孩子家长的收入和财富、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环境的质量都存在着显著差别。如果说不平等在美国并不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那么，这些令人垂涎的资源就会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

在收入和财富方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仅占10%的富人家庭就占有了近80%的（除了自家住房之外的）不动产、超过90%的有价证券、约60%的银行存款。 [14] 一项广泛应用的收入不平等指标就是儿童贫困率，该指标严重依赖于社会政策。（比起大多数西欧国家来，美国有更多的贫困儿童。） [15] 在美国，有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以下的黑人儿童大约是白人贫困儿童的两倍 [16] 。在20世纪末的几十年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更加严重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17] 虽然

如此，在调研期间，有七分之一的黑人年收入在五万美元以上[18]。

受教育程度也十分不平衡。在美国，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成年人读完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与其他年龄组相比，20岁年龄组有更多的人持有学士学位。有高于10%的高中生辍学。[19] 即使在年轻人中间，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但是大多数人（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人）显然都毕不了业。[20] 虽然有些研究表明，如果把家长的社会地位也考虑在内，黑人青年比白人更愿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总体来说，黑人孩子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差得很远。[21] 在高等教育内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阶层差别，从社区学院到精英级的综合大学，差别很大。学生越从更好的大学毕业，就越会得到更丰厚的报酬。[22]

此外，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也一直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薪水高的“好工作”越来越少，养老金锐减，医疗保险越来越差，晋级机会非常少，而且工作也缺乏稳定性。[23] 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这些似乎各不相干的线索——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工作和薪金多少——都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家长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很多学术研究都表明，父母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对其子女的人生机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在上学前班之前，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更有可能会在学习技能上表现出他们已经做好了“教育准备”，像熟记字母表、认识各种颜色、能从一数到二十、会写自己的名字（译者按：此处所指的名字不含姓氏）。[24] 学校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帮助，在学年当中孩子学习成绩上的这种差距会缩小很多（但是在暑假中又会被拉大）。在他们的整个学业中，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一直比母亲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孩子成绩好。当这些年轻人为升入大学而参加学术能力测验和学术评估测试时，这一差距也是大得惊人：（相对于500分的总平均分来说）父母高中肄业的孩子和父母有研究生学位的孩子之间平均相差150分。[25] 依照父母的社会结构位置，孩子在学校里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存在着差别。[26] 很多研究都论证了教育成功在决定事业成功上所起到的紧要作用。父母的社会地位能够预示孩子的在校教育成功与否，进而也能预言他们最终的人生际遇。[27]

如何去理解不平等

在美国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开放型的。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才干来为自己开拓生活道路。所有的孩子都被看做是拥有近乎平等的人生机遇。或者，如果孩子们的人生机遇看上去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也会被看做是天赋、主动性、抱负和勤勉程度上的差别。这种观点直接回绝了本书的主题，即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规律有系统地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成就。与本书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每个人在自己一生中所取得的成绩如何，只应由他们自己来担当。

一些社会学家则持有第二种观点，他们承认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形式

的重大的不平等。他们很适时地注意到家长在受教育水平、工作经历，收入和其他因素上的种种差别。但是这些社会学家，比如像保罗·金斯顿（Paul Kingston）就在他的《无阶级的社会》（The Classless Society）一书中辩论说，这类不平等最好被理解为一连串互不关联的局部社会模式。换言之，这些学者采取了一种等级渐次（gradational）法。他们认为把社会差别按程度分层是有帮助的。采用更强硬的说法来表达就是，他们认为旗帜分明地去定义社会地位的类别，在理解家庭中“有界定人生之重大意义的体验”时毫无用处。另外，金斯顿等人还不相信这些渐次出现的差别会聚合成一个跨层次的有序的整体。相反，他们只看到了偶然割裂的局部模式和到处任意出现的结果，但却看不到清晰确定又涵盖全局的整体社会模式。[28] 那些加入金斯顿这一研究方法阵营的人都强调，在某个经济范围内地位相似的人看来，“阶级意识”或“阶级认同感”是不存在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学者声称：“阶级共通的方面，即阶级亚文化和周边环境，早已经消失了。”[29] 这些社会学家根本就不相信不同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着清晰可辨的、明确的差别。

然而，这些主张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援引的调研都只是破碎不全的和太过特殊的。社科人员在评估事物间共有的联系时，汇集多项调研并把它们整合成了一个互不相配的、七拼八凑起来的解释。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路不是那么狭窄的调查研究。具体来说，为了确定社会地位是怎样在儿童的生活中起到重大的作用的并且也为了认可那些生活中根本不受社会地位影响的领域，我们就必须有从大处着眼来调查社会生活的学术研究。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幅更具整体性的图景来精确地反映出家庭和阶级之间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之间既有能够相互渗透的，又有不能相互渗透的。而且，这样的学术研究既需要概念理论方向上的指导，又要有切合实际的期望值以允许具体调研有发生偏差的可能性。

在本项调研中，我和我的助理们追踪并深入研究了一小部分家庭，以便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节奏。根据已收集到的数据，我揭示了如下的主张：以本阶级的成员资格来定义的在社会中处于同等经济地位的人，他们在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上与处于其他经济地位的人存在着明显差别，这些差别与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连。遵从于一个已经很完善的西欧哲学传统，我为本项调研提供了一种范畴分析法，把各个家庭按社会类别分成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30]（关于本项调研中的这些类别是如何定义的，详见表C1，附录三）。我认为这种方法比美国学者通常采用的等级渐次分析更有价值。[31] 此外我还将展示，家庭生活中的阶级差别表现在很多截然不同又十分独特的领域之间，而社会学家们通常并未把这些领域放在一起来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描述了两种教育模式：中产阶级家庭的协作培养和工人阶级与贫困家庭的成就自然成长。表1提供了一个关于本书主要论点的总纲。它暗示我们，协作培养必须强调让孩子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在家中发展孩子的语言和说理能力，并对孩子的学校教育主动进行干预。与此相对，成就自然成长描述了一种松弛的儿童教养形势：孩子们经常和亲戚的小孩“约在一起打发时间”一起玩耍，父母给孩子下达清楚的指令并且没有多少可商议的余地，在家庭以外的公共机构里，家长给孩子们更多的自主权来管理自己的事情。这些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揭

开日常生活中社会地位可以传送优势的机理。在讨论这些重要问题的时候，我一直深受已故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及其作品的指引（对其理论思想的简短说明，参见附录二）。[32]

表 1 儿童教养差别类型

	儿童教养方法	
	协作培养	成就自然成长
关键元素	• 家长主动培养并评估孩子的天赋、主张和技能	• 家长照顾孩子并允许他们自己去成长
日常生活的组织	• 成年人互相配合为孩子精心安排了多种休闲活动	• 小朋友“约在一起打发时间”，尤其是和亲戚的孩子在一起
语言运用	• 讲道理 / 发指令 • 孩子反驳成年人的话 • 家长和孩子之间延绵不断的协商讨论	• 发指令 • 孩子很少对成年人进行质疑或挑战 • 孩子通常都接受所给指令
对公共教育机构的干预	• 代表孩子对教育机构提出批评并采取干预措施 • 训练孩子也承担起批评和干预的角色	• 依赖于公共（教育）机构 • 无权力感和挫败感 • 家中和学校里的儿童教养惯行产生冲突
结果	• 孩子出现了逐渐生成中的优越感	• 孩子出现了逐渐生成中的局促感

尽管孩子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生活经历存在着很多差别，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却不会因阶级不同而有区别，这些相同之处包括看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在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吃快餐，对某个特别的娃娃或是玩具人物模型感兴趣，以及急切地盼望万圣节和家中重要节日的到来。正如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所展现的，所有的家长（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要面对很多繁重的任务，比如叫孩子起床、帮孩子穿衣服、做饭给孩子吃、送他们上学，而且还要在孩子生病时带他们去看医生和照顾他们。因此，有些经历是所有的家庭在生活中所共有的。然而，社会地位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步调和节奏。在下一章中，我将通过审视加勒特·塔林格的生活来研究中产阶级的家长如何通过有组织的闲暇活动来努力发展孩子的才能，并由此展现家长的这种努力是怎样造成一种狂乱的家庭生活的。

第一部分 组织日常生活

在儿童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在很多生活细节上看到社会地位的差别。

在我们的调研中，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相比，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节奏就十分不同。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生活非常紧张忙乱。家长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之间奔忙。在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中，家长更是常常要同时安排调整每个孩子的活动，尽量减少时间冲突。在这样的家庭中，衣食住行，孩子的课外活动，以及其他方面花销的财源都很充足。当然了，有些家长经常感到钱不够花。有时候他们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去享受高消费的假期。但是，就像我所说明的那样，这些家庭每年都会常规性地花上成百上千美元来增益孩子的各种活动。

因为孩子们要参加很多活动，又因为这些活动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重要性，孩子的活动就决定了全家的时间安排。一个孩子参加活动，其他的兄弟姐妹都要跟着去，有时是出于自愿，有时则并非自愿。成年人的闲暇时间都被孩子的活动所吞噬。孩子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和大人在一起或是按照大人的吩咐去做事。虽然他们也会有闲散的自由活动时间，但是这些时间通常都是夹在有组织活动的缝隙里。在生活的安排组织方面，孩子的兴趣爱好和各种活动被看做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日常生活的组织安排与中产阶级大为不同。在这些家庭中，我们能体会到很多在中产阶级家庭中体会不到的经济拮据。尤其是在贫困家庭中，仅仅为了满足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就要付出很大的辛劳——母亲们尽量节省以使食物可以坚持到她们有钱买菜的时候；她们长时间地等待着根本就不会来的公共汽车，把孩子们的脏衣服拿到公共洗衣房去洗，叫小孩子起床、吃饭、穿衣并准备好去上学；她们还要监督孩子每天的日常生活。孩子们也了解家里经济的拮据。钱的问题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

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但是孩子们却生活得更加闲散，而且更重要的是，生活节奏也要更加缓慢。孩子们在外面和其他小孩一起玩耍。他们经常和自己表亲的孩子一起玩。有些孩子会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但是他们这方面的活动远远比中产阶级孩子的要少得多。另一些时候，孩子们很想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但是由于经济拮据再加上交通不便，他们无法或很少能够去参加。当孩子想在家长面前崭露头角表现自己的才艺时，当他们想不拘形式地在家中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时，成年人却常常并不重视他们的兴趣爱好。而且，由于他们没有坐在车里由家长带着到处去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或是参加大人指导下条理分明的活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反而有了更多独立于成年人的自主权。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有很长的自由活动时间来同亲戚及邻居家的小孩一起玩，他们还会创造出好多自娱自乐的方法来。在这些自发的活动中，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界限更加鲜明。

总之，这些家庭在很多方面都因社会地位不同而存在着差别：在孩子参加的有组织活动的数量上、在家庭生活的节奏上、在家境方面、在自由玩耍的时间方面，在大人是否对孩子的活动感兴趣方面，在孩子的活动是否支配大人的生活方面，以及在孩子能独立于成年人而自由支配课余时间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当然了，除了社会地位之外，

其他一些方面也很重要。性别上的差异尤为突出。男孩子和女孩子喜欢的活动很不一样。女孩子的活动比男孩子的更偏静少动。女孩子也不会跑到离家太远的地方去玩。种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把不同种族隔离开来的居民区，孩子们自发形成的小圈子也是按种族来划分的（虽然种族并没有影响到孩子们会参与多少活动）。

本书第一部分把我们带入三个家庭的生活中来阐述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将仔细审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来展示一个名叫加勒特·塔林格的白人男孩的生活。（虽然该章中所选取的是一个白人男孩，但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这一选择是任意的。把我们所观察的任何一个中产阶级孩子，包括中产阶级黑人男孩和女孩，放在这一章中都很合适。）然后我要揭示出中产阶级孩子的生活和工人阶级及贫困儿童的生活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我还要讨论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差别，并强调男孩子的经历和女孩子的经历之间也存在着差别。我尤其要把加勒特的生活和其他两个孩子进行比较：一个是名叫泰雷克·泰勒的工人阶级黑人男孩，另一个是叫做卡蒂·布林德尔的贫困白人女孩。每一章都提供了每个孩子的基本信息，同时每一章也都尽力突出了社会地位差别中一些特有的维度。具体来说，第四章描绘了（泰雷克·泰勒的）自在少忙的生活，其中的重点就是不拘形式的自发游戏及为数极少的有组织的活动；第五章讨论了经济拮据的问题和不重视孩子的活动这个问题（卡蒂·布林德尔）。第四、五两章都突出了孩子对大人的独立性。这三章只提供了对这三个入选家庭的深层写照，附录三中的表格则提供了我们访问的这十二家的活动日程以及我们采访的88个孩子的家庭摘要。

[1] William Kornblum，Sociology：The Central Question，第72页。

[2] Jepperson把公共机构定义为“一种已经达到了某种状态或得到了某种特性的社会秩序或模式……换言之，在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再生产中，公共机构是那些因为有相对自行起始的社会过程而存留下来的社会模式。”Ronald L Jepperson的文章“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第145页。

[3] 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第161页。

[4] 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们还与一个在当地住房援助项目里的课后辅导班合作，针对课堂教学协调课后辅导内容，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学校正式出资开展的活动。

[5] 本书中大多数引用当事人的话都来自采访或观察录音。有时候，沿袭传统的人种学研究，节选的引文来自我和研究助理在观察后马上写下来的实地笔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在确定自己能一字不错地记住对话时才加上引号。因此，有些从实地笔录中摘取的话语并没有放在引号里。（在实地观察的时候，我自己不带笔记本也不允许其他人带，我们只是与他们一起“待着”。）在编辑引文的时候，为了阅读的流畅，我删除了那些对分析数据并不重要的口头禅和磕巴重复，如，“嗯”、“你知道”和“就像”等等。省略号代表某词语有删减（有几例是语序有轻微变动）。最后，我和研究助理都在实地笔录中给参加调研的家庭成员起了不同的绰号（例如，“塔林格先生”、“塔先生”和“唐”）。我并没有更改实地笔录，而是保留了这几种不同的叫法。 实地笔录中的

中括号是我插入的文字，通常是为了澄清事情，比如当用名字代替人称代词的时候，或者在写书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旁注。小括号是研究助理用来表述旁注的，这些是在做实地笔录的当下加上去的。

[6] 比如，在一次拼写测验中，一个三年级孩子造了一个句子，在句子里他说他想杀死他的老师。这件事非同寻常，也在楼道里激起了很多议论。

[7] 在1990年的普查中，与下里士满地区的7.5万美元相比，斯旺的平均房价为16.05万美元。比起很多市区的房价来，这个地理位置的房价并不高，到现在为止也是如此。

[8] 有组织的活动中志愿服务的家长也有类似的抱怨。一位管理当地童子军的父亲就因为有很多家长都“把孩子撂下然后就去忙自己的差事”而感到沮丧。

[9] 在学校生活上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与斯旺小学不同，下里士满小学更强调秩序和控制孩子的行为。例如，在下里士满小学，老师要讲很多话才能让孩子们整齐地排好一队，而在斯旺小学则不需要。（在下里士满小学，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别排成两队，斯旺小学的男女生则一起只排一队。）下里士满小学的执勤老师在操场上嚷的次数比斯旺小学的多。下里士满小学的打架斗殴行为也更多。然而，这些日常惯行上的差别却不能淹没老师们力行的文化技能库中的重点，也不能淹没他们所设想的对孩子来说最恰当的文化技能。在这方面，以及通过自己的个人生活体验，教育工作者们都支持对孩子的天赋进行协作培养，尤其是要发展他们的说理技能。

[10] 参见Jean Anyon的Ghetto Schooling，和Jonathon Kozol的Savage Inequalities。另见美国教育部的The Condition of Educatron，2001。

[11] 至于这些信念是如何形成、如何传输、如何受到反诘、又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这些都超出了这本书的范围。尽管如此，很明显，专业人士的标准是由众多股力量塑造而成的，包括教师们受到的职业培训（即，师范类的课程），从国家教师组织发表的图书和文章中得到的信息，从学区的在职培训及其资料中获得的信息，以及从与其他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闲谈中得到的信息。

[12] 特别参见Shirley Brice Heath，Warys with Words。

[13] 见Joyce Epstein和MavisG Sanders的文章“Connecting Home，School，and Community”，及Annette Lareau，Home Advantage。

[14] 在本书中，除非特别声明，所有的统计数字都取自1993-1995年（通常为1995年），为数据收集时期的统计。William Kornblum，Socrology：The Central Questions，第159页。

[15] 学者们预测童年时期生活贫困会给今后的生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包括身体素质较差，在标准化考试中得分较低，学习成绩欠佳，心理健康较差等问题。参见Greg J Duncan’JeanneBrooks-Gunn等人，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贫困率综述可以参见Rainwater和Smeeding 的文章“Doing Poorly”。

[16] 参见Greg J Duncan. Jeanne Brooks-Gunn等人，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在1997年官方统计的所有孩子中有20%是贫困儿童，贫困白人儿童占16%，黑人儿童占37%；6岁以下的黑人儿童有40%在贫困线以下。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John Schmitt，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1998-1999，第281页。

[17] 例如，在1989-1997年间，全国最顶尖5%的富人其财产增长了9%，而最下层10%的穷人其财产则下降了6%。参见Mishel等人，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rca，第264页，另见Michael Hout和Cloude S Fischer的文章“ACentury oflnequality”。

[18] 参见Dalton Conley，Berng Black，Livingm the Red和Melvin Oliver、Thomas Shapiro，Black Wealth/Whit Weahth。

[19] 1995年的高中辍学率为白人9%，黑人12%，到90年代末白人的比例有轻微的下降，黑人的比例则有轻微的提高。参见美国教育部，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2001，第142页。

[20] 在1995年，25-29岁的青年人中有28%获得了学士学位；到200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33%。白人高中毕业生最终拿到学士学位的人数比例（1995年为31%，2001年为36%）与最终得到学士学位的黑人高中毕业生的人数比例（1995年为18%，2001年为21%）之间有重大的差别。参见美国教育部，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1995，第245-249页，The Condrtion ofEducation，2001，第142、150-151页。

[21] 参见Dalton Conley，Being Black， Living in the Red，及美国教育部，The Condition of Educahon，2001。

[22] 参见Derek Bok、William G. Brown.The Shape of the River。

[23] 参见Donald Barlett、JamesB Steele，America：What Went Wrong？以及Ame Kalleberg，BarbaraFReskin和Ken Hudson的文章“Bad Jobs in America1”。

[24] 例如，高中肄业生的孩子中只有51%的人能正确地用名称辨认红色、黄色、蓝色和绿色等颜色，高中毕业生的孩子中则有78%的人都能正确识别颜色，对家长上过大学的孩子来说是92%，对家长大学毕业的学生来说是95%。对于能认识所有26个字母来说，统计数字分别为：9%，19%，29%和42%。参见美国教育部，The Condition of Educahon，1995，第182页。

[25] 参见美国教育部，The Conrhtion of Educahon，1995和Entwhistle等人，Children．Schools，and Inequality。父母受教育程度同等的孩子中，白人学生的考试成绩大都高于黑人学生。另外也可参见Christopher Jencks和Meredith Philips编纂的文集The Black-Whrte Test Score Gap。

[26] 1995年，有61%的高中毕业生到大学注册；有27%的高中辍学生注册，父母是高中毕业生的注册率为47%，父母是大学毕业生的注册率为88%。参见美国教育部，The Conditron of Educarion，2001，第147页。

[27] 如Paul Kingston所说（私人通信），家长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级别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对等。有很多人都在走下坡路。而且，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社会阶级地位仍然是预测儿童教育成功事和人生成败的最重要手段。对此论断的详细解说见Paul Kingston，The Classless Society和Christopher Jencks等人，Inequality与Who Gets Ahead？。

[28] 因此，Kingston并不否认不平等的存在：“毫无疑问，社会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却在其The Classless Society一书中断言，（在像家庭生活或儿童教养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习惯与个人所在经济群体的不同并不相关：“我的主题是，有相同经济地位的人群——通常被称作‘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会拥有相同的独特而重大的生活经历。”（第1页）

[29] Jan Pakulski和Malcolm Waters，The Death of Class，第4页。

[30] 这一传统的范例可以参见Paul Willis，Leanring to Labour和Basil Bernstein，Clas，Codes，and Corrtrol。

[31] 当然，人们通常的确只把自己看成是中产阶级，然而，我并不是要断言人们对阶级的意识力十分强大。

[32] 我使用了布迪厄的很多理论，尤其是他在优势传输方面的论证。虽然有些人批评他的社会再生产模式过于宿命化，但是如果仔细研读他的理论思想，我们就会发现，布迪厄在人生轨迹的延伸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布迪厄理论模式尤为清晰的描写，可以参见Marlis Buchman，The Scrrpt of Life)。尽管如此，我与布迪厄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仍然是有分歧的。如同Elliot Weininger在他的文章“Class and Causation in Bourdieu”中指出的，布迪厄对阶级构造的构想是分级渐进的（而不是类析式的）。而且，布迪厄对同一阶级中的派系有深度的兴趣，而在这本书里，空间（和取样大小）不允许我对此作出发挥。

第三章 协作培养的忙碌节拍：加勒特·塔林格

（五月的一个星期三，唐·塔林格从单位回来时，已经是大约晚上10：00了。）唐信步走到电话旁边，站在月历前，想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当他发现第二天除了“玛丽”[调研人员]之外再没有其他安排时，唐[无声地]紧握双拳把两臂放在胸前，做了一个举重运动员庆祝胜利的姿势。（他在摆出这个姿势的时候还微微一笑。）

有一个能得闲的晚上就让塔林格先生如此之高兴，可见他家里的时间安排有多么的忙乱。他的这种反映突出了协作培养把大人的空余时间控制到了何种程度。唐·塔林格和他太太路易丝都做全职工作，而且还要出公差。他们的三个孩子，加勒特（四年级）、斯宾塞（二年级）和萨姆（学龄前）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平时的任何一个晚上或是周末的任意一天，都会有活动要参加，有时候是一个孩子有活动，有时候是两个孩子，有时候是三个孩子都有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常常是在不同的时间和这个城市的不同地点。这一家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就是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塔林格家的圣诞贺卡上，三个孩子的照片恰好捕捉到他们给了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至关重要的地位。照片上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加勒特、斯宾塞和萨姆都穿着自己的足球制服——闪着光泽的蓝白相配的短裤和运动衫——每个孩子都把一只脚放在自己的足球上。他们都笑得很开怀。

这一章的焦点是中产阶级的塔林格一家如何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一家忙碌的日程安排并不是很特别的，我们发现这种中产阶级家庭日程安排的规律总是再三地重复出现，虽然其中也会有些许的变通，但是这一模式却是不变的。 [1] 塔林格家以及与他们家境相似的家庭都坚守着自己教养孩子的方法，即要把每个孩子都当做不同的个体来发展教育，这一教育法则有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在全家同乐的时间上和整个家庭的需求上作出牺牲。中产阶级的家长通过鼓励孩子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在足球、棒球和钢琴课上，给予了孩子在学校教育中无法取得的东西。这些热衷体育运动的年轻人和崭露头角的音乐家们，得到了很多能帮助他们日后在公共机构界游刃有余的技巧和素质。他们学会了把自己看做是很特别的个体，有权利从大人那里得到某些服务。他们还得到了一套很宝贵的白领工作技能，包括如何按轻重缓急安排日程、如何安排旅行路线、如何与陌生人握手，以及如何在团队中运转劳作。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相比，我们所观察的这些中产阶级孩子对他们的兄弟姐妹都更倾向于竞争和敌对，而且他们和自己家族中的亲戚之间也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孩子参加的活动越多，他们和自己家里人面对面互动的机会就越少。在塔林格家，除了一起吃饭以外（而这也只是一天一次），家长和孩子们都很少同时待在一个房间里。由于塔林格夫妇都工作，为了能把三个孩子送到不同的活动地点，他们需要分担运送孩子的责任。他们俩更有可能是每个人分别开车送一个（或两个）孩子去参加一项活动，而不是全家一起去观看某

个孩子的训练或比赛。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孩子们大都并不和父母在一起。他们都在足球场或篮球场上奔跑，而对塔林格家的孩子来说，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更是加大了三兄弟间的距离。他们从来没有在同一个队里踢过球。

塔林格家的房子是一座40年前建造的白色二层小楼，有四间卧室和三个卫生间（译者按：和很多中国/亚洲人不同，很多中产阶级的美国人认为购买有一定历史背景的房子能体现出房主的品位）。房子坐落在东北部某主要城市的市郊，在一条死胡同的底部，环境十分幽静（译者按：美国人认为死胡同底部是最安全的，所以这个位置的房价也偏高）。周围的房子都保养得很好，其中很多座都价值25万美元。房子里有一扇面向街道的大型落地窗，窗外是一片宽阔的绿色草坪。前院中间有一棵大树，树的一根枝干上用白色的粗绳子吊着一个秋千。在通向车库的沥青车道附近有两根杆子，一根撑起一个篮球筐，另一根则支起一个饰有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会标的小黑板。在这两根杆子的正后方，伸展着一张2.1米长的黑色细孔拦网，以防没有投准的球掉到邻居家的灌木丛里。一扇木门通向由篱笆隔开的很大的后院和游泳池。总而言之，这是一座很典型的市郊寓所。

房子里面有硬木的地板、贴了墙纸的房间和各种各样的宠物（一条名叫法利的狗、一只名叫伊凡的乌龟和各种颜色的金鱼）。客厅里铺有厚厚的地毯，上面放着一架小型钢琴，还有与钢琴颜色很搭配的家具（包括古香古色的桌子和一张凹背扶手靠椅）。但是，最热闹的地方应该要数厨房、私室（电视机的所在地）、或者鸟瞰后院和游泳池并用纱窗网罩住的晒台。房子会定时请专人来打扫，但是孩子们也会帮着整理床铺、喂宠物、把报纸和铁罐及瓶子都收好放在每周有人来取的资源回收桶里。塔林格先生掌管户外的事务，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人打电话来修剪草坪。他还掌管清洗游泳池及煤气烤架。当夫人出公差时，他就自己一个人管孩子，这也促使他比其他父亲更多参与对孩子的管理和教育。

塔林格夫妇喜欢体育运动，尤其是高尔夫球。他们是某精英私人乡间俱乐部的成员并经常去参加活动。他们两个人都40岁了，结婚有十二年。他们自称是“再婚者”，他们相识的时候，各自都曾结过婚又离了婚（当时各自都没有孩子）。塔林格女士整洁健康，留着时髦的金色短发。她给人一种平静沉着的感觉。

> 她经常穿得很时髦，就像那天从单位回来，[她]穿着一件黑白间织的鱼鼓纹羊毛裙，刚好齐膝，上身穿着一件樱红色的短款羊毛夹克。她还穿着白色的长筒袜和黑色的高跟鞋。

塔林格先生高高的个子（刚刚过1.8米），宽宽的肩膀，头上略带红色的金发已经开始有些稀疏。他喜欢穿昂贵的西装去上班，周末的时候则喜欢穿高尔夫球衣和长款卡其布短裤。他喜欢说带着冷嘲又透着机敏的话，话里还略带几分反语的讥讽。比如说，当别人问他“最近好吗？”时，他常常会挂上一丝最轻浅的微笑答道：“极好无比。”

塔林格夫妇俩拥有同一所常春藤大学的学士学位，他们俩当时都曾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现在他们又都是公司的顾问（塔林格先生是做筹款

的，塔林格女士是做人事的）。他们两个人每年的收入共有17.5万美元；直到调研快要结束时，他们还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夫妇都有足够多的弹性工时来应付孩子的学校活动，但是他们经常会在晚上和周末工作。在调研过程中，他们两个人都需要出公差。塔林格先生每周有三天要在公差途中度过，而且每次下班回来经常都已经是晚上9：30了。塔林格女士则尽量避免在外面干通宵。因此，她每月都有四、五天要很早就起床（早上4：30）坐飞机到外州去，然后又要在晚饭后才能回来。他们安排最小的儿子参加了一个离家有五分钟的全托，两个稍微大点的儿子则参加课后辅导班。

塔林格家的三个儿子中，大儿子加勒特10岁，二儿子斯宾塞7岁，三儿子萨姆4岁。萨姆是一个看起来很结实的金发学前男孩。他一笑起来咯咯的，声音尖细。斯宾塞上二年级，是个开朗健谈的孩子。上四年级的加勒特是调研的“对象”，他又高又瘦，金色的头发，一脸严肃的表情。塔林格先生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儿子的：

> 他很害羞也很安静，你初次和他见面时觉得他不是很外向。但是他有特别强烈的取悦他人的欲望，所以他特别听话。然而他又十分好强。他喜欢赢，但是他又很好管。

和总是说个不停的斯宾塞不同，加勒特讲话多少是有选择性的。他能自己一声不响地玩球，也能在看电视时不对广告或节目作任何评论。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家长不在他跟前的时候，他就活泼多了。他会编出一些用来解闷的小游戏。比如说，有一天晚上8：00左右，在一场棒球赛后，他一边等玉米面豆卷一边对着镜子向自己做鬼脸。他还好几次屏住呼吸，看自己能坚持多久。他的脸憋得通红，可是家里其他人却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评论。

在观察和面谈中我们发现，加勒特既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又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在一次家长会上，加勒特的老师说他“成绩和能力都不错，正好相当”。在人际互动方面，他泰然自若又成熟老到。与成年人会面时，他会直视着他们的眼睛和他们握手，而且通常都显得十分自如。作为一个运动员，他技艺精湛，就像这则现场记录所展现的他在州际精英队练足球时的表现：

> 这些小男孩现在分成了两队，他们开始混战起来。加勒特防守得很严，任何人都别想从他前面过去。冷静地攻击是他的球风。他看起来并不会去威胁或是去压倒其他队员，然而他的形象却映射出一种至高的控制力。

加勒特和他父母一样喜欢运动。他卧室的衣橱里塞满了各种奖杯，尤其是足球奖杯。他还有很多从球队交流活动中得来的足球袖章。在学校里，加勒特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大家都认为他是班里最棒的运动健将。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和其他的男孩子（有时候也有个别的女孩子）一起拿着足球冲到草地上，相互传踢，一直到课间休息结束为止。

加勒特的朋友们都是白人，他所接触到的其他人也都是白人，不管是在家里、在学校、或是在运动场上。来家里看小孩的十几岁的少年都是白人，定期来割草的工人也是白人。加勒特所在学校的两个四年级班

里，有三名黑人学生和一名亚裔学生；该校全体学生中90%都是白人。加勒特的钢琴教师是白人，参加钢琴汇演的所有孩子都是白人。他的游泳队里所有人都是白人。实际上，陪同塔林格一家去乡间俱乐部（练游泳）的调研人员在游泳池边上只看到了白人孩子、白人家长和白人俱乐部职员（除了一名黑人游泳教练）。加勒特的全白人游泳队有时候会和有黑人孩子的队进行比赛。

组织日常生活：发展加勒特的能力

在塔林格一家人中，大儿子的日程安排决定了全家的步调。塔林格夫妇常常只有很有限的时间奔波于工作和孩子的活动之间。他们匆匆忙忙赶回家，风风火火地察看一遍信件，准备餐点，换下工作时穿的套装，确保孩子穿好符合活动要求的着装并带齐用具，找到车钥匙，把狗放到外面，把孩子和活动器具装到车里，锁上门，然后匆匆开走。除了一些小的变动之外，这一生活模式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加勒特的活动最多。因此，他的活动也就决定了家长什么时候必须要在什么地点，同时也决定了包括萨姆在内的每个人什么时候吃什么样的饭，甚至决定了一家人如何制定度假计划。

就像表2（见下页）中加勒特五月份的活动安排所示，加勒特要参加棒球、森林足球队（一个私人足球俱乐部）、州际足球（一个明星精英队，由从各个足球俱乐部挑选出的男孩子组成）、游泳队的训练、钢琴课和萨克斯管练习。只有萨克斯管课在学校进行，其他所有活动都是校外活动，加勒特的父母需要在他同意后帮他报名。表中并未包括斯宾塞的活动，也未反映出家长自己的事务。5月23日的这一周，当加勒特有他一贯参加的棒球、足球和游泳队活动时，塔林格先生自己还在周一晚上会为一场比赛作裁判，而且斯宾塞在周二也有棒球赛、还有周四的俱乐部童子军会。周末的时候，全家开车四个小时去参加一场外州的足球比赛。他们要出去三整天：周五、周六和周日，然后在周一早上才能回来。加勒特周二有游泳队的训练、足球预选赛，还有州际足球训练。周三有游泳队训练（他能自己骑自行车去），还有棒球比赛。周四，在加勒特有游泳训练和森林足

表 2 加勒特·塔林格的活动日程[1]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尚未收集数据]	[5月9日，调研开始]	棒球	钢琴课	足球I[2]		棒球照片筹款
足球 钢琴汇演	5月16日	棒球	足球I			学校信息市场（在外过夜）
棒球 足球 足球I	5月23日	棒球 足球	游泳 足球 春季音乐会（有表演）		到外州旅行：足球I（旅行）	到外州参加足球比赛
到外州参加足球比赛	5月30日 到外州参加足球比赛（旅行）	游泳队 足球预选赛 足球I比赛	游泳队 棒球	游泳 足球I	游泳 棒球	足球I锦标赛（旅行）
足球I 锦标赛 游泳派对 足球	6月6日 游泳队	游泳 棒球 足球I训练	游泳 棒球	游泳 足球I训练	游泳 夏季棒球	棒球

注：1 表中仅有预先安排好了的活动，不是他所参加的所有活动，也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员的活动。

2 足球I＝州际足球，足球＝森林足球

球的同时，斯宾塞下午5：45有棒球比赛。而后，周六的时候斯宾塞还有一场棒球比赛（在早上9：15），加勒特有两场足球比赛，一场在早上10：15，另一场在下午3：00。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只围着体育活动打转——也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像塔林格家这样忙碌。尽管如此，本项调研中的很多中产阶级孩子都有同样忙乱繁多的活动。中产阶级孩子还比工人阶级及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活动（见表C4，附录三）。参加活动的种类有一定的性别差异，男孩子比女孩子有更多的体育活动（见表C5、C6，附录三）。

塔林格夫妇在五月份都要到外州出差。在5月9日的这个星期里，塔林格先生被安排到西海岸去办事，乘早班飞机回来。他的飞机定在周三的午夜，周四早上到家，睡上几个小时，然后还要去上班。当晚，他带加勒特去参加足球训练。5月23日这周，塔林格女士周二在外面过夜，周三晚上10：00前一点点才到家。第二天是5月26日，塔林格女士要赶早上6：30的飞机到外州去，晚上8：00回到家里。后面的一个星期塔林格女士还要如此，周三出差，周四很晚才到家，第二天又要到外州去。

光是这些活动的数量就足以增加各个活动之间发生撞车和时间冲突的几率。因此，所有的活动——包括萨姆要外出——都必须事先预定：

路易丝取回信件。她站在门廊上喊着：“萨姆，这个是你的！”她打开信封，萨姆急忙跑到她身边。她把卡片（一张生日派对的邀请卡）交给萨姆，萨姆看到邀请卡正面那个像恐龙的动物，高兴地笑了。

4岁的萨姆已经知道家里的行事历有多么重要了。他知道如果他的两个哥哥有活动，那他就有可能无法接受这个生日派对的邀请了：

[路易丝]说："我知道我们11号得去一个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早上在家，你就能去这个派对。"……路易丝走到行事历前，翻到六月份，看了一下。萨姆脸上略带着一丝忧虑，充满期待地问："我能去吗？"路易丝说："你运气不错啊，我们那天早上在家。"

可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萨姆比他的两个哥哥有更多的自治权，萨姆的生活更少被提前定好的不连贯的活动所占据。加勒特和斯宾塞都没有较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归自己组织定义。预定好的活动在他们生活中占有如此中心的地位，以至于他们用自己参加的活动来确定那一天是星期几（包括晚上的时间）。加勒特和斯宾塞还把（像足球、训练、游泳和钢琴这样的活动）时间分成活动前、活动中或活动后。而且，和我们观察的其他中产阶级孩子一样，他们两个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仅仅是在等待下一个活动的到来。他们所参加的大多数活动——包括上学——都需要由大人来车接车送，其中大部分活动的起止时间也都是由大人安排的。像加勒特参加的棒球赛等体育活动都是由成年人组织安排的，像我们看到的工人阶级和穷人孩子玩的那种由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自发形成的垒球或棒球游戏在加勒特的生活中极其少见，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当然了，也不是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是由成年人决定的。塔林格家的孩子有时也会乘校车回家，给自己找点零食，然后在父母回家前看上半小时电视，所有这些都不是在家长看护下做的。加勒特、斯宾塞和萨姆也会在外面自由玩耍。在预先安排好的活动之前和之后的时间里，他们三个经常在院子里（用一个网球拍）玩棒球，或者骑自行车。有时候，他们的父母也会到后院加入他们的游戏中。但是，塔林格家的孩子却不会像穷人家的孩子那样整天在外面玩。塔林格一家的左邻右舍本就没有多少小孩子，而且也没有与这些男孩年龄相仿的其他男孩子。有时候，也会有小朋友骑车来找他们玩，但是，想互相找着玩的孩子通常都会由父母开车送到"玩伴约会"的地点。

塔林格一家既喜欢运动类的游戏又喜欢言语机智的问答游戏（类似脑筋急转弯）。有一天晚上吃饭前，孩子们就玩起了猜谜语，还把调研人员也弄了进来。

斯宾塞一边笑着一边缠着我，和我猜了一连串的谜语。他先问我："玛丽，如果一只公鸡在鸡篷的顶上下了一个蛋，你说，这个蛋会从哪边掉下来？"我笑着想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假装怀疑的口气说："嗯，让我想想，我觉得公鸡不会下蛋啊。"

一家人还会边吃饭边讲笑话。一次斯宾塞提醒他妈妈在参观美术馆的回执表上签字。加勒特为了显示自己有知识，考验了一下斯宾塞到底对凡·高了解多少。而这又给了塔林格先生一个灵感，来插入他自己的机智应答：

加勒特考斯宾塞说："你知道凡·高做了什么（不一般的）事情吗？"斯宾塞说："我知道，他把自己的耳朵割了下来，还把它寄给了一个朋友。"唐低声地咯咯

笑了几下，说："所以你可以说，他传送了'耳听邮件'！"每个人都被他的双关语逗笑了。（译者按："耳听电邮"是一种苹果电脑专用的用手机查电邮的共享软件，使用苹果电脑而不是微软公司的电脑是欧美有钱人的特点。）

塔林格女士也喜欢和孩子们玩，正如下面这个实例中所表现出来的：

加勒特在自己的卧室里和妈妈站得很近，互相对视着，胡乱搞笑。他双眼直视着她，然后举起双手，和他妈妈掌心相对。路易丝很配合地陪他玩，没有推开他。他们玩了三次，一边玩一边笑。

这个游戏进而演变成了一个"坚持瞪眼"的游戏：

[加勒特]说："瞪着我。坚持瞪下去？看谁先眨眼？"她说："好吧。"他们站在那里，双手相对，使劲儿瞪着对方。路易丝先眨了眼并把目光移开了；他们俩都笑了。他说："还想玩吗？"她就又和他玩。他们大约相持对视了十五秒钟，然后她又把目光移开了。他安静地笑了，但是很开心很满足，她也笑了。

恬静的时光也是会出现的。比如一个早晨，加勒特还很困没有完全醒来，他在通往父母卧室的走廊上用胳膊环抱着他爸爸，紧贴着他站着。身着蓝白双色浴衣的塔林格先生也把胳膊搭在儿子的肩膀上。他们俩就这样安宁地相拥着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然而，一家人之间自由玩耍和恬静的瞬间通常都是很有限很次要的。有组织的活动仍然是塔林格家孩子生活的中心。这些活动深入到了家庭生活的核心。钢琴、足球、棒球和篮球成了家庭成员谈话的焦点，孩子们和父母、和前来做客的成年人以及亲友都会谈论这些话题。对于像加勒特这样天性并不健谈的孩子来说，与有组织的活动相关的交流可能会很简短。比如说，州际足球队的第一次训练之后，塔林格先生和加勒特在回家途中在车里"讨论"了有关新赛季的情况：

唐：那个，莫尼教练怎么样？好吗？
加勒特：挺好的。
唐：他和你们谈过（球技）吗？还是他只是给你们操练？
加勒特：只是操练。
唐：他说过有关决定位置的事情吗？
加勒特：没有。

除了塔林格先生问的那个没有团队精神的"贪功小猪"是谁之外，这次在回家路上的交流总共十五分钟，全都是由典型的父子一问一答组成的。

加勒特能够和他的父母以热诚亲密的方式交流，但是这样的对话并不经常出现。更多的都是像上面描述的和塔林格先生之间的对话那样，或是像下面描述的和塔林格女士的对话那样。这里请注意，虽然加勒特和妈妈之间的感情联系显然很好，但是他们所谈论的话题却是和加勒特参加的活动有关。

（路易丝坐在加勒特的床边，她把手放在他的胸前。那天晚上斯宾塞为了给调研人员腾出一间卧室，就来他哥哥的房间里过夜。屋里熄了灯，很黑，只有走廊里的灯光隐隐照进来。路易丝和加勒特正在讨论当晚早些时候加勒特在春季音乐会上表演的歌曲。）

妈妈：啊，你知道吗？我把“从远方”（From a Distance）和你今晚唱的“从我的角度”（From Where I Stand）给弄混了。我以为你唱的是贝特·米德勒（Better Midler）的“从远方”呢。

加勒特：“从远方”是怎么唱的？

妈妈（开始唱）：从远方——（忽然停下来，笑了一笑，又开始唱然后又停了下来，记不起来了）——我记不起来了。你知道你妈记性不好！

斯宾塞（取笑地）：从远方，太遥远了，我记不起来歌词了。

妈妈：这歌儿很好听的呢。

协作培养：为爱孩子而加倍付出的努力

孩子们参加的各种活动给父母带来了十分繁重的工作。家长为孩子们填报名表、开支票、安排与其他家庭合用汽车接送孩子、洗制服、开车送孩子去参加活动，还要做点心和饮料给孩子们吃喝。在塔林格家，这些任务都依哪个孩子要做什么而定，常常总是双倍的。单是帮助孩子准备好去参加活动——拿好所有的器具、把孩子组织好、往车上装东西——就够令人疲惫的。

对于成年人来说，除了要花力气准备之外，还要花力气看孩子们的活动。五月的一天，塔林格先生头天半夜才出差回来，眼睛熬得红红的，转天的早上一直在工作，下午才眯了两小时觉。当晚天寒料峭，他又带孩子去练足球了。在训练中，塔林格先生起身出去不看了。他解释说，要到旁边的小卖部去买一杯咖啡：

晚上7：05的时候，唐说他要去买杯咖啡喝。他问汤姆（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否要他给捎一杯。汤姆摇了摇头。唐问我想不想要。我问他能不能让我和他一起去（主要是因为我太冷了）。在去小卖部的路上，唐说：“我并不是真的想喝咖啡。我只是觉得太没劲了。以前他的每次训练每次比赛我都去看，但是现在他参加得太多了，我也并不是每次都全看下去。可是这是他的第一次训练。”

塔林格先生特别渴望训练早点结束：

我们回来的时候，孩子们正在休息。唐说：“结束了？我们不会这么幸运吧？”

孩子们参加的众多活动能让家长的耐心及时间都丧失殆尽。例如，在暑假刚刚开始的一个六月的下午，塔林格先生下班回来，要带加勒特去参加足球比赛。加勒特还没有准备好，而他那种懒洋洋不想好好准备的样子也让他爸爸很是心烦：

唐说：“把你的东西准备好——你得去参加足球比赛了！”加勒特穿着白色的短护腿和长长的绿色球衣进入私室里，他是16号。他坐在和电视机斜对角的扶手椅上，慵懒无力地看着世界杯。他慢慢地心不在焉地穿上护胫，再穿上长袜。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视屏幕。唐走了进来：“快去拿你的其他东西。”加勒特说他找不到短裤了。唐说：“你是不是放在抽屉里了？”加勒特点了点头……他起身去找短裤，几分钟后却又回到了私室。我问他：“找到了吗？”加勒特摇摇头。唐在家里的其他地方翻找着，然后又走了进来，对加勒特说：“哎，加勒特，你是不是也该穿上鞋子了呢？”（唐离开了一下又很快回来了）：“加勒特，我们必须得走了！我们迟到

了！”他的口气简短而唐突。接着他走了进来看到加勒特正坐在那里，就一言不发地把那条绿色光面短裤抛到了他的大腿上。

类似这种忙乱翻找一条绿色光面短裤的事情在塔林格家是很常见的。最典型的解决办法就是家长最终找到了不见的东西，同时还要催促孩子加快动作。比起今天狂乱的时间安排来，明天的日程压力只高不低，这一点同样是事实：

唐（描述他们星期六的安排）：明天真会忙疯的。我们有一场足球比赛，然后有一场棒球比赛，然后还有一场足球比赛。

每隔几天，塔林格一家的活动日程就会出现冲突，这样一来也就更是加重了他们为协作培养而不懈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比如，加勒特一人参加了好几个足球队——“最好”的巡游赛队即私人森林足球俱乐部，镇区足球队，以及州际足球队。5月22日星期天，加勒特和他在足球队里的一个小朋友坐在车里等着家长送他们到州际足球队参加第一次训练。塔林特先生和小朋友的爸爸（比尔）则在讨论一次近在咫尺的时间冲突：

唐又说：“我发现足球训练和预选之间有冲突。”比尔说：“州际的那个看起来更紧迫，因为他们还没有太多的机会一起合作过。”唐说：“是呀，可是如果不去参加预选的话，就不能加入那个队了。”比尔说：“可不是嘛。我得[和预选的教练]谈谈这事。”他停顿了一下，转身走下台阶，然后又回过头说：“也许（戏谑地眨了一下眼）我们能被特免呢。”他哈哈笑了起来，唐也笑了。

有时候，塔林格夫妇通过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来解决潜在的时间冲突。但是，他们显然很不情愿进行这样的调整，正像塔林格先生所说：“足球总是有种傲慢的感觉。我是说，他们就认定你会有时间，你能随时放下工作，把孩子拖到球场上去比赛。可是如果你的工作是计工时的，那怎么办呢？”另一些时候，加勒特为了参加一个活动就必须放弃另一个。比如说，学校音乐会的那天晚上，他只去参加了游泳训练，而没有能够参加足球比赛。父亲节的那天，加勒特不能到乡村俱乐部去参加父子特别高尔夫联赛，因为——他解释说——那天“我有两场足球比赛和一场棒球赛”。斯宾塞倒是参加了父子高尔父球赛。所以，就连像父亲节这样特别的日子，一家人也要分头行动。

在像塔林格这样的家庭里，知道活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不能减少这些冲突给他们带来的紧张和受挫感。最后一刻的变动有时会使全家日程的综合结构功亏一篑，无论这些变动是和孩子的活动时间有关，还是和学期起始日期的调整有关，或是和塔林格夫妇各自（或二人）仓促既定的工作会议有关。比如，5月18日星期三这天，加勒特得到通知说，州际足球比赛定在了即将到来的这个星期天。当时父母都不在家，一个高中生正在他家看着他们。塔林格先生下班回到家中已是晚上9：30，塔林格女士十分钟后才到家，并开始准备送看孩子的高中生回家。当时他们都站在厨房里，塔林格先生把足球赛的时间告诉了他夫人：

唐对路易丝说：“他22号有场比赛。“他把足球时间表拿给她看。路易丝说：“这

个可没有写在我们的日程安排上。”唐听起来一副很烦的样子，说：“我知道，球赛时间变了。”路易丝走到厨房的综合时间表前，那个综合时间表就挂在电话旁边的墙上。她说：“新时间是在几点？”唐没有再去看那张纸，只是应了一句：“4：00。”路易丝说：“那他可以去。”我从来没有听到唐如此沮丧烦闷过，他对看孩子的高中生说：“他在同一天有两场足球赛，一场棒球赛，还有一个毕业派对。”路易丝（看着活动地点）说：“离得都太远了啊。”

像这样的时间冲突加剧了家长所承担的“无形的劳作”，他们要照顾孩子的饮食，收拾房间，还要协调时间表上各种不同事务的最后期限。随着职业女性人数的不断增长，家长尤其是母亲身上的强大压力也日趋增加。阿利·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已经将这一现象用术语“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来表示。她和其他学者还指出，虽然现在男性为家庭和子女所做的贡献有所增加，但是他们仍然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户外劳作上（例如，割草、刷漆或是修房子）。塔林格先生是一位很有参与精神的父亲，他经常和孩子们在外面玩球。但是，和很多家庭一样，当塔林格女士在家的时候，她在做饭、穿衣和协调孩子生活等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塔林格先生只是她的帮手。

另一方面，女性在家里做的事情仍然是在室内而且主要是有时间期限的（例如，做饭、帮孩子准备好到幼儿园或学校去、哄孩子上床睡觉）。虽然研究人员已经记载了“无形家庭劳作”的很多方面，但是现有的论文并没有去调查孩子的活动是如何影响那些做“第二轮班”的家长的。和孩子的饮食起居不同，孩子参加的有组织的活动通常有严格的起始时间。家长们得按时去接送孩子。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家长也都会尽量遵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活动刚一结束，家长们在一两分钟之内就都到了。定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有这些随意制定的最后期限，让人在感情上和身体上都可能会吃不消。

塔林格夫妇对家庭生活步调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比如说，有天下午5：40的时候，塔林格先生从外面匆忙地开进了车道。他从车上跳下来，从身上搜出钥匙，他打开房子的前门，然后几乎马上就严厉地告诉孩子们他们应该去做作业。塔林格女士6：00左右到家，她看起来比她丈夫要放松得多。即使她的压力显然很大，在孩子们向她提出很多问题或是在看到最终期限降临的时候，塔林格女士和孩子们独处的时候也不像塔林格先生那样紧张。

而且，家庭生活中的压力在塔林格夫妇身上并不是平均分担的。虽然塔林格先生很积极地参与孩子的生活，但是他每周都要出两到三天的公差。塔林格女士做全职的时候，她也还是要在家务方面承担更主导的角色，像看管孩子、给孩子做饭、帮孩子打理日常事务等工作她都要做。尽管如此，塔林格先生仍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父亲，他会在塔林格女士出差的时候积极地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当家庭利益面临冲突时，也是塔林格女士在自己的事业上作出调整。在调研快要结束的时候，塔林格女士决定辞职。她要在离家近的地方找份工作，这样她就可以为了孩子经常在家“坚守阵地”了。最终她选择了做一家极少有出差要求的非营利性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她把这个决定描述成“把我的事业暂时搁置起来”。

虽然如此，在家务的某些方面，塔林格先生比起其他中产阶级的父

亲为家里作的贡献来还是要多得多。当他夫人早上开会或是出差的时候，他总会很胜任地把孩子打理好送上学校。有天早上塔林格女士很早就要去上班，他就留在了家里送孩子上学并参加了“和爸爸一起吃多纳圈”的活动，而这个多纳圈活动就是由家教联会组织的。现在孩子们正在地下室玩呢。他们把枕垫塞在衣服里，让自己看上去更像冰球的守门员：

突然，[唐]从楼上半带愤怒地往楼下喊了一嗓子，“斯宾塞——你喂伊凡和法利了吗？加勒特，你喂鱼了吗？”斯宾塞说：“我喂伊凡了。”两个孩子都快速地向楼梯跑去，他们上楼的时候胸前还塞着枕垫。他们正往上走的时候，[唐]往下喊道：“给法利喂点食。还有加勒特——喂鱼。”我跟着他们上了楼。加勒特到私室去喂鱼了。

喂好鱼后，加勒特走进了厨房（那个鼓鼓的枕垫还塞在他的衣服里），站在桌子旁边。他爸爸在整理文件，全新的音响系统正在大声地播放着。塔林格先生（并不理会那个塞在儿子胸前的枕垫）开始很严肃地提醒加勒特：

[唐]说：“你要坐校车去上学，对吧？”加勒特说：“是呀。”“……校车什么时候来？……你有家门钥匙吗？”加勒特一边点头一边检查书包，看自已有没有带钥匙。[唐]点点头，说：“别误了车。”

在这一次互动中，塔林格先生在设法提醒孩子们完成各种任务时看上去很匆忙也很不耐烦。萨姆和斯宾塞一边在前门等爸爸开车带他们去学校，一边抱怨个没完没了。他们的爸爸穿过走廊，停下来斥责萨姆。他命令道：“萨姆！住口！”

在我们所观察的其他家庭中，在照顾孩子方面，那些父亲们都没有塔林格先生这样在行，也没有他这么高的参与程度。但是，就连他自己也不认为他在家里照顾孩子有他在单位的工作那么繁重。当父母二人都在家的时候，大多数家务就都由塔林格女士承担了。钢琴汇演那天，是她找到并熨好了孩子们的裤子，是她安排好了汇演所需的小吃（草莓和栗子松饼）。是她给孩子们的老师买了圣诞及年末礼物，又是她给老师们写了贺词，感谢老师们在一年当中所付出的努力。重要的是，这种性别分工的模式符合孩子和学校教职人员的期望：学校要求母亲而不是父亲在回执许可上签字并帮助孩子完成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务。

一个受到悉心培养的童年：加勒特的视角

加勒特并不是一个特别外露的孩子，但是显然他很喜欢自己参加的各种活动，尤其是和体育运动有关的活动。他认为，没有这些活动，他的生活将会很“没劲”。和下一章中的工人阶级男孩泰雷克·泰勒不同，加勒特不会为要去训练或比赛而抱怨。如果他不得不错过一场比赛的话，他看起来显得十分失望。在一次面谈中，加勒特汇报说，他尤其喜欢竞技比赛。比如，像篮球，他说他喜欢“防守……把其他球员推来撞去”。

森林足球巡游队和州际足球队在他心里排名很高，因为这两个队的队员技术好，“球场更大，得分更高”。相比之下，体育课的足球“踢一会儿就变得很没劲了”。当调研人员问他是否会感到很累的时候，加勒特承认说，当他一天里有两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还有三个其他活动的时候，的确会“很累”，但是跟着他就说道：“其实也并不是很多啦。”接着他想了一下，又改口道：“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但是对我爸来说可能就比较累了，[因为]他得带我到处跑，还得在大热天里看我比赛……他得接我又得送我。”

对于不同寻常的足球活动，像到外州去参加联赛，加勒特总是热切地期待着。在周末旅行前的那个星期三晚上，他上床钻进被子里，他的妈妈正和他道晚安，加勒特兴奋地说：“还有两天我们就走了！”同样的，加勒特在得到那套装饰着“精选”字样的州际足球队球衣时也十分兴奋。训练结束后，他和爸爸一坐到车里，他就马上开始研究起自己的新球衣。

唐和加勒特系上了安全带。加勒特马上打开口袋看里面的东西。他把一件上面印有“精选”字样的绿色尼龙球衣拿了出来。加勒特说：“我想我会穿这件（去比赛）的。”唐说：“这就是比赛时候穿的。“加勒特看起来特别喜欢这件夹克。然后他又往袋子（一个棕色的纸袋子）里面看了看，说里面还有两件短裤、一条裤子（其实是一条亮绿色的短裤）和两双袜子。加勒特大声地列举着袋子里的每一样物品，听起来特别兴奋。

一回到家，他就马上把这套球衣给妈妈和兄弟们看。像这样明显地表达他对所参加活动的喜爱与热衷是真诚的，但对加勒特来说又是有选择性的。比如说，虽然加勒特进入了明星棒球队，但他却说：“我并不[像]发现自己入选了州际和森林巡回赛队那么兴奋。”但是他又解释说：“棒球就像是我的第四种运动”，排在两个足球队和篮球之后。加勒特参加的活动太多了，所以每个活动本身反而显得不怎么重要。例如，他在学校的春季音乐会上表演萨克斯管三重奏，但是这个活动对他来讲却了无趣味。而在我们所观察的工人阶级家庭中，像音乐会这样的学校活动能让他们谈论好久又好不期待。同样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认为值得兴奋的事情——像吃比萨饼、面包店烤的面包、或是和大家族中的亲戚开派对——对加勒特来说都没有吸引力。

有的时候，加勒特也会很疲累很烦躁：

加勒特心情不好……布赖恩的爸爸晚上8：20开车把他送回家。他进了家门，却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我评论他新理的头发时，他也没有说什么。他看起来很安静，很疏远。整个晚上他基本上什么都没说。唐晚上9：30到家。唐进屋[对看孩子的人]说：“嗨，弗兰基。很高兴见到你。”弗兰基站起身来和唐握手。唐然后说：“嗨，加勒特。”加勒特没有回答。唐说：“嗨，加勒特。”加勒特看了唐一眼说：“嗨。”唐问：“加勒特，你还好吗？”加勒特回答道：“还行。”唐转身进了厨房。

我们观察到其他中产阶级的孩子也有同样疲累的时候。亚历山大·威廉斯，一个中产阶级黑人男孩，也在从课后辅导班到周五晚间唱诗班的路上显得很疲倦；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个名叫斯泰西·马歇尔的中产阶级黑人女孩在电吹风的下面睡着了。而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中，

我们却没有看到类似的现象。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大人们评论说这些小孩子有着无穷无尽的能量。

一个受到悉心培养的童年：斯宾塞和萨姆的视角

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是以每一个孩子的活动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生活的方式塑造了所有家庭成员的经历，包括并没有参与某项具体活动的兄弟姐妹的安排。斯宾塞和萨姆——尤其是萨姆——要花很长的空闲时间辗转在去加勒特的活动的路上，还要在一旁看着这些活动（或者只是在那里等着活动结束）。萨姆的很多个下午都是跟着他两个哥哥的日程安排团团转。他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待上一小会儿，就要坐车由家长带着去看加勒特的某一个活动。一旦到了活动现场，他通常会到处闲逛，向大人要零食，然后等着比赛或者训练结束。不足为奇，在活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他的兴趣和耐心就都已被消磨殆尽。萨姆每周抱怨哭闹四五次是常有的事（这种行为在他饿了或是累了时会变得更加突出）。

然而，就像他妈妈所说的那样，有时候他的烦躁会升级到一种让他“崩溃”的程度。他会大声嚎哭而且经常打断别人，如果他不喜欢周围发生的事情，他有时候还会乱蹬乱踢，又哭又叫。比如，加勒特参加学校音乐会的那天晚上，萨姆才过了半个小时就坐不住了。一开始他通过拒绝安静地坐着来考验他妈妈的耐心；然后他又伸长双腿把脚放在前排椅子的靠背上，差点就踢到前面的人：

> 他妈妈一把抓住他胳膊的前段（看起来很生气）说：“注意你的脚——你差点儿没踢到她！坐好了！”他坐了几秒钟然后又开始动脚。她又抓住了他的胳膊低声说：“坐好！”

每个月萨姆都要“崩溃”几次。塔林格先生会采取比较直接的方法，告诉萨姆“住口”。塔林格女士则通常会对萨姆的爆发采取温和忍让的态度，她还鼓励萨姆的哥哥们多从萨姆的角度感受一下（但其成功率却是有限的）。

萨姆才4岁，所以除了幼儿园之外他没有太多其他活动。而斯宾塞则有一个包括钢琴、幼童军和棒球在内的活动日程。尽管如此，他也还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作一个不情愿的观众。斯宾塞不像萨姆那样，他不会“崩溃”，但是他的确会与父母交流自己的无奈。例如，他爸爸知道“他确实为我们都必须去看加勒特的比赛而感到恼火”。实际上，看加勒特参加活动是斯宾塞生活的主要部分。在学校组织的和爸爸一起吃多纳圈的活动中，斯宾塞领着他父亲到自己的画前看他画了些什么。斯宾塞在讲解自己的画时告诉父亲说，画里有一些孩子在操场上训练，站在一旁观看的就是他和他的家人。这幅画的题目叫做“观看足球”。塔林格先生亲切地用手抚摸着儿子的头，评论说：“我们的确老是在看足球。”

与观看相对的，当然就是踢球了。在这方面，斯宾塞还是得适应加勒特定下的标准。虽然斯宾塞也参加棒球和足球，但与他哥哥相比，他

看起来对体育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也没有那么有天赋。从他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个就很成问题。有好几次，塔林格夫妇都（分别）提到过他们为斯宾塞对体育运动不怎么感兴趣而担心。

唐：我们和斯宾塞没少费劲，因为他不喜欢运动。我们觉得他在这方面特别一般。路易丝和我都这么想。但是然后我们又问自己："我们能做点什么？"我主张到外面去玩传球。我通常不会想到外面收集蜘蛛或是做斯宾塞喜欢的那些事情。他喜欢自然科学。我一般不会去想那些东西。

调研人员：这可不容易。

唐：我们在体育运动方面很有天赋。

调研人员：斯宾塞会和加勒特竞争吗？

唐：他知道他竞争不过他哥哥。加勒特要强得多。

斯宾塞好像自己也知道他父母为他没有加勒特那样喜欢运动而担心，正如下面这段笔记所示：

唐（好像刚刚想到这点似的）以一种疑问（但是又很热情）的语气对斯宾塞说："斯宾塞，你想加入游泳队吗？"斯宾塞看起来有点儿紧张，咬了一下嘴唇，回答说："不想。"小作停顿之后他爸爸带着一种接纳的口吻说："好吧。"（话里也带着一丝失望。）斯宾塞[到厨房]去找书包，他爸爸又站到了他身边。斯宾塞说："我也想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划水。"他爸爸说："那就是他们要教你的啊，他们会教你怎么划水。"

父子之间的整个互动过程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至少对斯宾塞来说，这是很紧张的一分钟。

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斯宾塞在体育方面稍见逊色，这也影响到他和加勒特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他会故意去找他哥哥不擅长的东西。比如，一天下午，加勒特和一位调研人员正在车道上玩投篮，斯宾塞评论说：

"加勒特篮球打得不怎么好。真的不怎么好。"加勒特很快反驳斯宾塞说："噢，是嘛？我比你打得好。"斯宾塞不理睬加勒特，他看上去并没有被加勒特的话吓倒。斯宾塞继续说："我是说，他并不擅长篮球。他不是最好的篮球手。"加勒特看起来好像是被斯宾塞的话给惹恼了，他镇定地自卫说："噢，是嘛？因为我打得不好所以才有[X个]反弹球，所以才比体育课上任何人都多。"斯宾塞实事求是地声明说："我是说篮球并不是你最擅长的项目。"

斯宾塞还会定期炫耀自己作为天才班学生的身份。加勒特虽然已经试考过两次了，但他还是没有到达智商为125的分数线（他得了119分）。当斯宾塞考入天才班的时候，加勒特特别伤心，泪流满面。对加勒特来说，他也会抓住机会突出自己高超的技能。比如，在一次钢琴课上，他故意弹起了斯宾塞将要在汇演中弹奏的曲子，而且他知道自己比弟弟弹得好，也知道斯宾塞能听到他在弹：

加勒特：我能弹……

钢琴老师：别弹了。（加勒特继续弹。）别弹这首曲子。他弹不了这么快，你别给他捣乱了。（加勒特继续弹着，还咧着嘴笑着。）你把他的方寸都搅乱了。（加勒特还在弹着。）我不想让你再弹了。（加勒特这才停下来。）

虽然兄弟两个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竞争，但是斯宾塞和加勒特之间的关系经常还是很友好的。加勒特也会帮忙的：

加勒特拿出一个练习本，低头看着上面的一道数学题……斯宾塞说："加勒特，我不明白这道题该怎么做。"加特勒轻声说："来，我来帮你看看。"这是一道加法题。加勒特说："75加99等于多少？"斯宾塞翻了一下眼睛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心算！"他听起来被加勒特问烦了。好像他简直不能相信加勒特居然还会这样问他。加勒特把作业纸放在桌子的一角，好让斯宾塞能够看到，他慢慢地说："没关系，9加5是多少？"斯宾塞说："9加5……嗯，是14，我能算出这个。"加勒特把这个数写了下来，说："然后你在这里进位，"然后他指了指进位的那个数。他又接着说："现在1加7加9是多少？"斯宾塞停了一下说："17。"加勒特把数字写了下来。唐在加勒特把作业纸还给斯宾塞的时候大步走过厨房。唐充满怀疑地问："你们俩干吗呢？"加勒特镇静地说："我给他讲了一道题。"

但是，斯宾塞却不能和萨姆处好关系。他们俩经常吵架，有时还会吵得很凶。

斯宾塞忽然在客厅里大叫起来，"停！停！躲我远点！"萨姆开始大哭。我听见楼上一声沉重的摔门声，然后路易丝大声跺着脚走下楼来。她走进客厅命令说："到底怎么了？说啊！"斯宾塞解释说："他总是跟着我！"路易丝越听越烦，说："他跟着你又怎么了！"她还用责备的口气说："你像萨姆这么大的时候也总跟着加勒特！你这样对待萨姆，一点道理都没有。没有道理。"

孩子之间发生这样的口角是常有的事，也经常需要第三方出面才能解决。父母中会有一个站出来干涉，并转移开一个或两个孩子的注意力。

塔林格家的孩子和很多中产阶级的同龄人一样，会坦诚地表达他们对自己兄弟姐妹的看法。说"恨"家里的某个人是很常见的，而且听到的人也不会作出什么特殊的反应。比如说，有天傍晚斯宾塞和萨姆跟着来看护他们的弗兰基（还有一位调研人员）在前院玩垒球时，

斯宾塞问萨姆他最恨谁。萨姆说是加勒特。斯宾塞让萨姆假装自己在[用球棒]打加勒特的脑袋。弗兰基说："萨姆，你可是告诉过我你最恨斯宾塞的。"斯宾塞重复说："假装它（球）就是加勒特的脑袋。"

这种我们所看到的中产阶级孩子在兄弟姐妹之间公开表现出的敌对行为，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中却并未出现。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之间明显有相互讨厌对方的时候，但是我们却从未听到过中产阶级孩子这种毫不掩饰甚至是随随便便就提到憎恨的话。同样的，中产阶级孩子之间的大声吵闹及需要大人出面才能解决冲突这一现象，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也是很少见的。对于后者来说，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既没有这么吵吵闹闹，也不大会在大人在场的时候发生。

亲戚的重要性相对较小

塔林格家的社交生活都是围绕着孩子的活动，而不是围绕着和大家庭保持联系来安排的。这种弱化了的亲戚关系和我们看到的工人阶级及贫困家庭中的亲属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在后者中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他们和自己的直系亲属及大家族之间的联络十分紧密。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里，家长每天都要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联络。小孩子和堂表亲的兄弟姐妹们每周都要在一起玩好几次。塔林格女士的妈妈住的地方离塔林格家只有几分钟之遥，塔林格夫妇每周至少会去看她一次。但是塔林格先生妈妈的家离得就远了，开车要一小时四十分钟，所以只有在主要的节假日他们才去看她（塔林格先生到母亲家去得比较多——大约每月一次，当他因公外出到她家附近的时候）。

即使每年只有几次亲友相聚，加勒特和斯宾塞都不会因为要和亲戚在一起而被迫放弃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塔林格女士解释说，如果有时间冲突，孩子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参加的活动。所以，当塔林格一家为塔林格先生唯一的侄子在户外开大学毕业派对的时候，虽然塔林格家族所有的人都来参加这个派对（即，他的妈妈、姐妹、侄女和外甥），加勒特却并不打算参加。

> 路易丝解释说：“他要去打半小时棒球，然后跟着希思一家去踢足球。”唐对此深感失望，他说：“我们俩不能跟着他去比赛了。”调研人员问：“如果棒球和足球产生了冲突，你们怎么做选择呢？”唐说：“足球更占优先。是吧，加勒特？”加勒特站在厨房正中，点头同意。

对加勒特来说，足球比和亲戚在一起“更占优先”，但是，塔林格一家的确也很重视和亲戚保持联络。塔林格女士每星期至少给妈妈打三次电话，姥姥经常参加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活动，而且她有塔林格家的房门钥匙。如前所说，塔林格先生会定期去看他母亲，他的大家族也会在主要的节假日聚会。加勒特有一个表兄弟和他年龄相仿，就住在离他家二十分钟的地方。据塔林格女士说，这两个男孩子在一起玩得“特别好”——但是他们只在主要节日才见面。对塔林格一家来说，和大家族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不重要，但却没有体育活动那么重要。

钱：永远存在却决不提及

塔林格家除了花很多时间在体育活动上以外，还要花很多钱在这些活动上。加勒特的活动很昂贵。足球每月15美元，但还会有另加的大笔花销，森林足球队的新球衣、袜子和汗衫一共100美元。钢琴每个孩子每星期23美元。网球50美元，冬季篮球30美元。开车到外州去参加比赛及住宿都要花钱。加勒特的各种夏令营收费不定，有的要200美元一个星期。当塔林格女士应我们的要求把注册费、制服费、活动器具费、营地费和宾馆住宿费都加起来时，她报告说，每年在加勒特一个人身上花

的钱就超过了4000美元，其他中产阶级家庭也报出了同样的数字。[2]

这些花销并不会进入加勒特、斯宾塞和萨姆的耳朵里。实际上，塔林格夫妇在家里很少谈钱的事。例如，在帮加勒特签写棒球身份照报表时，塔林格女士问到加勒特的身高体重及他在队里的位置和编号。塔林格先生原本打算预定9张互换纪念卡，但是加勒特说："我们去年得了12张。"于是他（二话没说）就把钱数换成了11美元。他也从未提过此事。

在调研快要结束时，塔林格家出现了很严重的财政困难。夫妇俩工作的公司出现了资金周转问题，造成两人都不能按时得到工资。这就依次造成了他们在房贷上的拖欠。塔林格女士在一次面谈中透露说：

> 我是说，我们有7000美元的房贷罚款。因为我们交晚了……而我们之所以晚了，是因为我们的公司没有按时付给我们工资。[3]

他们两人都很为家里的财政问题着急，塔林格先生承认说，他都快要为此而失眠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在孩子面前提到这些。塔林格女士还记得她小时候她父亲抛弃了她们母女，只是每月寄来抚养费，如果某个月的抚养费没到或是来晚了，她就会焦虑不堪。所以，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为钱而焦虑。然而，她也让孩子们知道，如果不事先攒钱的话，他们现在就不能到像迪斯尼那样昂贵的地方旅游度假。但是，在像吃快餐、报名参加运动队、看牙或是到外州去比赛这样的事情上，他们却从来都不提缺钱的事。通过不提及钱的问题，塔林格夫妇和其他中产阶级的家长们向自己的孩子传递了一种很微妙的优越感。加勒特和他的同龄人从来都不会因为收费高而不能参加某个活动。我在后面的几章里会讨论到，在工人阶级和贫困的白人和黑人家庭中，事情正好相反。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仅很公开化而且还经常出现，孩子们都很清楚家长能付得起什么、不能付得起什么。

自然了，像塔林格家孩子这样的中产阶级儿童并不是感觉不到经济水平的差别的。塔林格女士知道她儿子羡慕足球队里一些孩子住在更大、更阔气的房子里：

> 我们并不装阔。当他们到其他男孩子家里做客的时候，[那些房子]和我们的很不一样。（笑声）他们特别喜欢那座大房子。他们喜欢詹宁斯家的房子。他们能看出他家更大。他们的电视屏幕更大。我是说，他们能注意到其他人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同。但是他们也去其他人家里，也会看到家境不如我们的人的房子。

还有一点也使加勒特感到，相比较而言，自己丧失了一些特权。他在足球队的大部分朋友都念私立学校，加勒特自己也曾念过一年私立学校。但是，由于塔林格夫妇承担不起送三个孩子去私立学校的费用，所以加勒特就转学到了当地的公立学校。在调研结束时，我们在面谈中问加勒特，如果他可以的话，他希望家里面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他回答说："有更多的钱，这样我就可以回到以前的学校了。"

因而，虽然他家住在一座25万美元的房子里，虽然他经常参加那些花费上千美元的活动，加勒特仍然感到自己不够富有，并为此而烦恼。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父母的经济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他特别想要的东西

——回到私立学校——不能得到满足。他认为父母能够付得起衣食住行、医疗和孩子参加的各种活动都是理所当然的。对加勒特来说，这样的花销只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罢了；实际上这些都是（未经省察过的）优越感。他不能——也没有——去想象，对于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来说，同样是这些理所当然会得到的东西和机会都被看做是（难以获得的）特权。

终身的学习技巧

中产阶级的孩子可能会认为自己参加各种活动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的家长却知道参加这些活动能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塔林格夫妇二人都坚信体育运动能让孩子终身受益，比如说，就像塔林格女士在一次面谈中说的，学会懂得“什么时候该好好练习，什么时候该发挥成绩”。塔林格先生特别提到“有竞争精神是件好事”，他补充说：

> 你可以把所有能想到的陈词滥调都用上。但是当你是强者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所有的满足感；当你是弱者的时候，你就能很快发现谁才是你的朋友……我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其他的活动能让你这么直接地体验到所有这些。

小运动健将们在心理上也会比其他孩子成熟得早：

> 我认为体育运动会使人意志坚定。这样，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更认真或是更深入地去做，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加努力，都不会为做不好而找借口。

他们还学到了团队精神：

> 这样你就学会了作为球队的一部分来比赛……他的足球教练特别棒，给他们讲道理。如果你的队得分了，那这一分是属于全队的，而如果对方得分了，那就是全队都有责任，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他们看起来都吸收了这个道理，并且也都坚守着这个态度。

最后，九、十岁的孩子参加有组织的运动队还能够发展他们在公开场合面对成年人时的表现能力，也包括在生人面前的表现。[4] 当孩子们和自己的队友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胜败时，这种实践性表现评估就逐渐成为了常规。另外，暴露在公众的审阅下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分级渐进的。训练中的观众常常是一边看球一边聊天的妈妈们，没有多少人会在旁边作任何评论。然而在比赛中，家长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会对孩子公开强调表现出好成绩的重要性。助威喝彩声中也会夹杂着直率的建议——和批评——正如下面这段州际足球赛录音剪辑所示（其中说话的人有塔林格先生和另两个孩子的父亲）：

> ——加勒特，控制住球！
> ——就是这样的，汤姆！

——加勒特！注意你后面！
——加勒特，快点！跑回来。
——继续下去，加勒特！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跑过去加勒特，跑过去！
——看着脚底下，看着脚底下！
——保罗，如果你想休息，就说一声！
——不错啊，吉姆！

像加勒特参加的足球队这样的有组织的体育运动，都有必经的预选赛和公开比赛，也能够帮助队员为学校里的实践性表现评估做好准备。比如说，在塔林格家孩子上的小学里，孩子们要通过试听方有资格加入“一流合唱团”。同样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学到的“竞技规则”也能够运用在学习上。在一次面谈中，塔林格先生回忆说，他对加勒特强调了这样一个道理：

上个星期或是之前的那个星期，他有点眼泪汪汪地下楼[说]作业太难做了。所以我们说：“你知道吗，这就像是足球比赛一样。你赛球的时候会怎样做呢？你会哭着说你踢不了吗？不会的，你知道赛球是件苦差事，所以你只能更加努力。”就这样他又回到楼上把作业做完了。

虽然家长和孩子都没有明显地感到，但是，孩子们在有组织的活动中学到的技能技巧会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或是青年期，在这些年轻人初次工作的时候，继续发挥良好的作用。很多中产阶级孩子经常参加的活动，在组织风格上都复制了工作场所的关键方面。像加勒特这样的孩子在参加每一个活动的时候都会见到一批新的成年人并学习怎样与他们共事，这样，他们就学到了一项基本的工作技能——与相识的人顺利共事的能力。[5] 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就没有类似的机会接受就业前训练。他们在校外接触的大部分成年人都是自己的家人或是自己大家族的成员。有些工人阶级和贫困儿童经常和邻居来往，但却很少在有组织的情境下与自己认识的成年人互动。

加勒特还学到了塔林格先生提到的那种团队参与技能，而这种技能在很多很广泛的工作环境中都能直接应用，从快餐服务到高科技设计项目。此外，还是中产阶级的孩子，而不是工人阶级或贫困的孩子，始终能得到这些在正式场合下联合协作的训练。同样的，一个人参加很多活动在中产阶级孩子中也是很普遍的。因此，他们经常要为选择去参加某个活动而放弃另一个活动。[6] 知道怎样去按主次优先来安排活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技能，雇主们都会主动在候选的雇员身上寻找这种技能。

其他能真正在社会上运用的优势也值得一提。和我们所观察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不同，加勒特和他的同学们拥有很宽阔的视野，他们接触到了典型的成年人的经历，比如说，得到一张有自己照片的证件。这张证件卡片还要有持卡人的亲笔签名，这也给了这些孩子更多的兴奋和有权力的感觉：

加勒特是第四个签名的孩子。那个[掌管照片证件的]人把他叫了过来，“加勒特！”然后用手指着证件说：“在这儿签，这儿写着‘球员签名’。”其他孩子都围在旁边看着。一个孩子说：“签上唐纳德。”（加勒特的全名为唐纳德·加勒特·塔林格，遵从他父亲的名字。）但是加勒特没有理睬那个男孩。他签上了“加勒特·塔林格”。

州际足球队要到外州去参加锦标赛，球员们要在旅店时住宿并在餐馆里进餐；在比赛中，他们要和自己从未见过的孩子赛球。加勒特的朋友和熟人也总在不断的流动中。学校的精选合唱团在中西部表演，中学的艺术团到欧洲去交流，而且同学们还会一起乘飞机去参加专题夏令营。总的来说，10岁的加勒特和他的同学们比大多数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成年人走的地方都要更多更远。

加勒特和其他小孩子从各种活动中获得的经验和技能又因他们父母所运用的家教策略而得到了强化。加勒特的父母教他和弟弟们在有人介绍他们的时候怎样和成年人握手。他们明确地训练萨姆在和人握手的时候要“看着他的眼睛”。塔林格夫妇在和儿子说话的时候通常都会有眼神的交流，而且他们也要求每个孩子都要有同样的眼神交流。他们还强化了对他人负责的概念。当加勒特对吹萨克斯管稍有退意的时候，塔林格女士就激励他要考虑到他对其他乐队成员应尽的职责。于是加勒特就决定不走了。

塔林格夫妇还都很以身作则——都喜欢读书。他们经常读报（报纸就摊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尤其是塔林格女士，还经常读小说。他们把讲道理作为主要的社交管控方式。[7] 他们常常用提问的方式来回答问题，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会领着孩子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给出指令。

正如孩子们参加的有组织的活动一样，这些在家里的训练也为发展能适应职业要求和其他社会机构需求的技能作出了贡献。这样，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中产阶级孩子不仅学到了重要的生活技能，同时还得到了反复练习这些技能的机会。而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却通常既不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又没有生活在一个与中产阶级类似的家庭环境中，他们的家长首选的教养方式与社会中主导机构的价值观并没有天衣无缝地吻合在一起。

狂乱之家

19世纪的时候，一家人都是在壁炉前聚会的。在当今社会，中产阶级家庭的中心是月历日程——我们探访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般都有一个很大的白纸月历，挂在厨房里电话旁边的墙上。孩子们预订要参加的有组织的付费活动（有时用不同颜色的笔）都要写入某月某日下面两英寸大的小空格里。月复一月，孩子们忙着参加各种体育活动、音乐活动、童子军和游戏小组。他们的父母则在上班前和下班后都在忙着接送他们到各个活动场所去。有时候，中产阶级人家的房子简直就只是一个在众多活动之间的短暂间隙滞留的地方。

我们发现，像塔林格家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都会让孩子参加很多活动并调整家庭生活来适应那些活动的需要，这种模式并不完全符合社会学的研究套路。对塑造儿童生活之主要因素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只专注在寻找一个单一的决定因素上——比如说，他们都希望这个决定

因素能指向收入或受教育水平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我们也曾很勤勉地去寻找关键性的因果关系元素，但是从我们所密切观察的所有十二个家庭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以各种形式附着在中产阶级文化上的惯行或策略模式。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孩子活动造成的忙乱日程安排并不是由他们生活的某个单一层面引起的：像家庭收入、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或工作状况、临近区域类型、有几个孩子或孩子性别构成、或是家长的业余爱好等方面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起到压倒多数的决定作用。而且，至少是对塔林格家这个案例来说，他们对有组织活动的重视并不是父母努力重演自己童年经历的结果。塔林格先生从4岁起就由母亲一人抚养。他小时候就自己在外面玩很久，经常加入那些“随便想出来的”游戏并和邻家的小孩们一起玩。塔林格女士也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她小时候会有很长的自由活动时间，直到她比较大了，有组织的活动才开始占用她的闲暇时光。

此外，家长们好像也并不完全明白，这个被我叫做协作培养的策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会让他们付出什么代价。比如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孩子们在足球赛上或是在钢琴汇演上学到的技能与白领工作或技术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是如此的匹配。同样的，中产阶级孩子不会安排自由时间，也不会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建立起深厚正面的关系，而且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协作培养的这些代价。类似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代价还有一个孩子的时间安排支配着全家的时间，特别是这种时间支配是建立在牺牲年龄小的孩子的利益之上。当然了，家长有时候也会抱怨日程安排太狂乱了。家长们还说，他们当年并没有让自己的父母如此的辛苦。但是，中产阶级的家长又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有责任用包括有组织的活动在内的各种方法来发展孩子的能力。

关于中产阶级教养孩子的方法是如何与我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我们还知之甚少，这也使得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想象中产阶级所使用的方法也许并不是最理想的教育方法。但是，正如下一章中所解释的，工人阶级首选的教养方法也的确对孩子有很真实的益处。

[1] 最近的全国统计数据也表明，家长受教育程度高的孩子会参加更多的有组织的活动，也有更忙碌的日程安排。尤其可以参见Sandra L Hoffertb和lohn F Sandberg的文章“Changes in American Children's Time，1981-1997”，及Elliot Weininger和Annette Lareau的“Children's Pafliapation in Organized Activities and the Gender Dynamics of the‘Time Bind'”。对儿童参加的有组织的课外活动，还有一些较早的研究，包括Janet Lever的经典文章“Sex Differences in the Complexity of Children's Play”；Elliot等人，The Serious Business of GrowingUp，和Gary Alan Fine，With the Boys。

[2] 参见David M Halbfinget的文章“Our Town”，其中家长报告说他们每年仅参加冰球就要花6000美元。

[3] 与很多美国家庭一样，塔林格一家积累了很多的债务，攒下的钱却很少。对塔林格

家（及扬内利家，德赖弗家和格里利家）的经济状况详见Patricia Berhau的博士论文“Class and theExperiences of Consumers”。

[4] 对父亲与孩子在冰球和足球巡回队的研究，参见Gai Ingham的论文“Are Children's Competitive Team Sports Teaching Corporate Values？”父亲们表示，让他们的儿子参加这些运动队能增长他们的“团队精神”和“自控能力”。尽管如此，参加这些活动的实际作用并不明显；而且，在一次对大学运动员的调研中，James Sbulman和WiIliam Bowen的TheGame of Life向参加运动项目的长期效果提出了挑战。

[5] 参见Melvin Kohn和Carmi Schooler，Work and Personality。

[6] 可能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州际足球队的组织者要求队员签署一份文件，保证把这项活动放在优先的位置上。

[7] 然而，塔林格先生相信打孩子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对萨姆，他会威胁说要打他。协作培养中讲道理的作用详见第六章。

第四章 孩子的节拍：泰雷克·泰勒

> 他会跑着进来，因为他要么才想起自己有[橄榄球]训练，要么……我们两个中的一个人找到他，告诉他该回家了。而且[他的朋友们]也都会和他一起跑进来。然后，让他不要再和他们玩了并告诉他们我要去训练了，就很困难……我就只好说："快点儿，泰雷克，我们要迟到了！"他就会说："好的，我来了。"但是，他还是会接着在外面聊天。
>
> ——访谈泰勒女士的笔录

对9岁的泰雷克·泰勒来说，有组织的活动打断了他的生活。与加勒特·塔林格不同，泰雷克的生活是以不拘形式的游戏为中心的，他总是和邻居家的工人阶级黑人小孩一起玩。除了上学和暑期日托夏令营之外，泰雷克只参加了两项有组织的活动：他整个学年都定时参加主日学校，暑假里还会参加圣经讲习会。四年级的时候，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个社区橄榄球队，于是又央求妈妈允许他参加。最终，泰勒女士作出了让步，同意他参加。决定一旦作出，泰勒女士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费用上都非常尽职尽责。但就像上面那段访谈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泰勒女士觉得参加球队特别累人，而且她"[曾]祈祷过，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参加了"。

这一章通过聚焦泰雷克·泰勒的工人阶级家庭如何组织日常生活，来突出被我定名为成就自然成长的儿童教养方式中的一些方面。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经济资源有限，这就使得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成为一项艰苦的劳作。家长们倾向于把精力投入到保证孩子的安全、强化纪律中，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孩子的行为。在这些界限内，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可以自由成长和发展。家长允许他们自己选择各种活动，自己选择玩伴，自己决定参与这些活动时的积极程度。因此，中产阶级孩子常常被当做有待开发的项目，而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则能在由家长划定的界限内自由成长。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更注重和亲戚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孩子们和家庭成员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和中产阶级的孩子相比，也给自己的亲戚带来了更重要的物品和服务。虽然兄弟姐妹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吵架，但是和我们所观察的中产阶级家的孩子比起来，他们更多的是给予对方友谊和支持。成就自然成长的文化逻辑给予了孩子一个独立于成年人的世界，在这个自治的空间里，孩子们有自由去尝试新的体验并发展重要的社交能力。泰雷克与其他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都学到了怎样做一名非正式的同龄群体的成员。他们学会了如何去安排自己的时间。他们学会了自己制订行动计划。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学会了怎样在游戏里的公开冲突中进行商榷，包括怎样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和女孩子相比，男孩子还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去玩。

这些社交能力和中产阶级孩子学会的社交能力一样真实不虚。然而，这两套能力却又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在社会公共机构中也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但是所有的孩子却都必须与这些公共机构打交道（例

如，学校、医疗机关、商店、工作场所）。和加勒特·塔林格不同，泰雷克·泰勒和他的小伙伴们没有机会去开发那些能够在公共机构的场景下收获最大利益的技能。比如，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一般不会学到怎样在有组织的活动发生冲突时作出选择，不会学到怎样读懂旅行路线，不会学到怎样签写证件卡片，不会到外州去旅行，也不会学到怎样在成年人带领的有正式明确规定的团队里工作。他们也不会像加勒特和他的伙伴们那样，认为自己有权利在公共机构的场景下得到成年人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关注。事实上，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常常被教导说，要听大人的话。[1]

一方面，这些中产阶级孩子和工人阶级及穷人的孩子之间存在着重大阶级差别，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家庭中的孩子和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之间也在生活上有重要差别。与贫困的孩子相比，工人阶级孩子的生活有更大的稳定性，他们的生活不像贫困儿童的那样没有着落，尤其是在饮食、交通、买小吃的零用钱和其他经济资源等方面。他们在种族和性别上也存在着差别。虽然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都参加相同或相似的活动，虽然他们组织生活的方式都大致相同，但是他们通常都是在各个种族相互隔离的群组里进行自己的活动的。就连住处相隔只有几个街区的孩子也是如此，而且他们还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在同一个班里读书，而且就像其他研究所示，我们还发现性别差异在塑造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上也具有很强大的力量。虽然女孩子也有活跃的时候，但是她们更多的时候是好静少动的，她们会在离家更近的地方玩，和男孩子比起来，会有更多的人评论她们的体形外貌，这些评头品足也会更多地影响到她们对自己的看法。不过，据我们观察，这些孩子之间最重大的差别，就是那个现有文献尚未完全承认的差别：一个以阶级为根源的在日常生活组织方式上的差异——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孩子追从着一个由成年人组织的忙乱至极的活动日程，而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则遵循着一个并没有多少成年人管控的可自由支配的议程。我们可以从泰雷克·泰勒参加橄榄球队这件事如何影响其家庭成员的生活上，看出这一差别的一些重要方面。

泰勒一家

泰雷克·泰勒、他的妈妈西莉斯特（Celeste）、他13岁的姐姐阿妮莎（Anisha）、和他18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马尔科姆（Makolm）在一个小型而稳定的黑人工人居住区租住一座有四间卧室的房子，附近是一条主要的公交干线街。这里的房子会卖到5万美元左右。据泰勒女士说，这边的邻里“还蛮安静的”，但是她又补充说：“到处都有犯罪行为，所以我还是不得不很小心。”泰勒家周围的邻居都是非裔美国人，但是一个更大的白人居住区离这里很近，可以步行到达。泰雷克和他的朋友们有零花钱的时候，就会到那个白人居住区去买冰激凌或饮料。因此，和住在黑人住房建造计划区的住户比起来，泰雷克会在生活中见到更多白人。

泰勒家的房子有三层，楼梯又窄又陡。所有的卧室都在楼上；有一

个卫生间，卫生间顶上挂着带有异国情调的暗色吊扇，旁边挂着折纸蝴蝶。第一层有客厅、餐饮间和一间厨房。厨房很大，有金属柜橱、日光灯和一个做饭用的矮桌。客厅总是收拾得很整洁，地板上铺着一块色彩斑斓的粗毛地毯，上面摆着一张印有碎花蓝色天鹅绒的长沙发，对面的一角里侧放着一台大屏幕电视机，旁边是一个书架，上面摆着一只木雕的长颈鹿、一个时钟，以及几张孩子们婴儿时期的照片。桌子中央放着一个盛满装饰用鹅卵石的圆形玻璃碗，里面插着几朵大大的粉色布艺花。整个房子看上去都装饰得很精心。然而泰勒女士却抱怨说房子早已年久失修，事实上，有些地方真的需要维修了：纱门上已经有了裂缝，房间的门也油漆剥落，露出里面的木头。

泰雷克的父母分居了。他们在一起十五年，结婚九年，两年前才分居的。老泰雷克住在市中心一套单元房里，离他妻子和孩子的住处约有十五分钟的路。泰勒女士不喜欢她丈夫住的地方，她把它叫做“黑人贫民区”。虽然泰勒先生的邻居都是工人阶级的黑人，但是这附近也有很多生意兴隆的店铺、小花园、有人居住的老房子和住家户。通常，这片地区比城里其他很多贫困黑人区都令人满意。老泰雷克身材瘦长而结实，总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感觉。他每周都会有很多天和孩子们通电话，而且会一周去看他们一次。他曾有过吸毒的问题，现在他为自己能戒掉毒瘾而感到十分骄傲。他年轻的时候就辍学了，读书识字对他来说好像很难。他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包括世界局势，他还会很愿意对任何想听的人发表他的见地。当孩子们抗议说他们做不了某件事时，他会坚持说他们能行。他还会在与孩子有关的问题上参与意见，比如，他因为担心安全问题而反对泰雷克打橄榄球（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他目前在待业中；过去他曾做过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包括有关戒毒问题的咨询。

泰勒女士有高中学历，她是做秘书工作的。她的责任包括管理公司的车队，在正式的接话员午餐休息时负责接电话。她中等身材，头发打着有弹性的螺旋形小卷儿披散在脸的周围。她经常面带微笑又经常看起来很慌张。虽然她只有一点超重，但是她很为自己的身材担心。当我说她穿了一件“可人的外衣”时，她回答说：“啊，谢谢，但是我太胖了。我没法儿穿可人的衣服。”调研人员是这样形容泰勒女士的：

> 西莱斯特大约6：45分走了进来。她是一位有一点点超重的女性……有一张很可爱的脸。她经常微笑，后来，在客厅里，我们坐在饭桌前，她一边说话一边不时朝桌子旁边的镜子里张望（时而还会摸一下头发）。她的嘴唇上残留了一些口红，指甲上涂了（鲜）红色的指甲油，她的卷发里隐隐现出一双大大的耳环，手上还带着一副很厚重的银镯子。她嗖的一下冲了进来，看上去慌里慌张的，但是很高兴回到家里。

她的车能用的时候，泰勒女士就开车上班；车坏了的时候（经常坏），她就坐公交车上班。她的工作福利确实包括医疗保险，但是她这个职位的年收入（大约2万美元）却很难覆盖全家所有的需要。房租650美元，（经常每周都要）吃快餐，还有（每月）到像“时时乐”这样的连锁餐馆吃晚餐，这些开销之后就没有钱来修车了。全家通常都会花一个星期到海边去度假，但是泰勒女士需要预先计划好开支，还要加班，才

能省下钱来（否则她通常并不会去加班）。在泰勒家，讨论钱的问题是常有的。孩子们的生活会由于资金短缺而受到限制。泰勒先生会给泰雷克和他姐姐阿妮莎买衣服（例如去年他给他们买了四双运动鞋，每双70美元），但是他并不给他们抚养费。虽然泰雷克想要很多电子游戏，但他妈妈却说："我买不起这么多。"他只能在生日的时候得到像电子游戏这样的"大礼"，而这通常也都是他姥姥送给他的。而在另一方面，泰勒女士却愿为泰雷克出那50美元的橄榄球队报名费以及钉鞋、防护罩和防护带的费用。她觉得，权衡起来，她儿子参加这项有组织的活动"并没有花很多钱"。相反她深感"这个活动更是比什么都花时间"。

泰雷克的姐姐阿妮莎13岁了。泰勒女士在上班的时候，阿妮莎经常会作她弟弟的"妈妈"，比如，她会提醒泰雷克饭后要收拾碗筷。她喜欢和其他孩子玩，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她盼着每天至少要和附近邻居的孩子们玩上一会儿。18岁的马尔科姆就要高中毕业了，还正在做全职。他还没有确定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也许秋季的时候他会在社区大学选几门课。

泰雷克快10岁了，他身材瘦小，是个小调皮鬼，长得很像爸爸。他在下里士满小学上学，成绩不错，总是按时交作业，大部分时候都能得B和c。在学校里，他很听话很顺从，但是在自己的地盘上面对同龄人，他却能特别果敢厉害。正如一位调研人员所记载的：

> 泰雷克的同伴们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跟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相比]他和朋友在一起时更滑稽有趣，也更镇定（而不磨叨抱怨）。他和自己的同龄人能说上很多知心话，能在一起做游戏，在自家附近跑来跑去，[还]拥有这样一个环境来发展一种自治感。

有时候泰雷克面对成年人也会很厉害，包括他的妈妈在内。比如，有个星期天下午在汉堡王，他把自己的白色飞盘和（没喝完的）大杯饮料放在一张空桌子上。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白人老头走进店里，直冲着泰雷克的桌子奔过去。当泰雷克大叫"嘿！那是我的桌子！"时，那个人改变了路线，躲开了那张桌子。泰勒女士咯咯地笑了起来，阿妮莎和我也都笑了。

泰勒女士有很多规矩来指导孩子们在家里和在外面的行为。她会把很多自己对孩子的期望明确地表达出来。她鼓励孩子们尊重成年人。所有的成年人，无论他们是否是泰雷克的亲戚，孩子们都要自动地遵从。他们不需母亲的提示，就必须在所有女性成年人的名前都加上"小姐"这个称呼，比如说，乔小姐（我们在其他贫困和中产阶级黑人孩子中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 [2] 泰勒女士不允许孩子骂人。她要求泰雷克，如果有人叫他回家，他就必须回家。她给泰雷克规定他最远能到哪里去玩，以及他能做什么（例如，步行到公共游泳池去游泳，由于路上车不多，他还可以在街上玩球）、不能做什么（例如，不能到城市的另一头去，不能晚回家好几个小时，不能喝酒吸毒）。他出去玩之前必须把作业写完。泰雷克也常常会有些小打小闹——比如说，一次又一次晚回家。有天晚上他因为表现差而被禁止参加圣经讲习会。在家里，当他有不如意的事情时，他常常会用看起来很烦、发牢骚或哭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泰勒女士用得最多的惩罚方法就是撤销特权和不许（尤其

是泰雷克）出去玩。有时她也会对泰雷克睁只眼闭只眼（就像有时候泰雷克会在被禁止出门时还在外面和小朋友们玩）。她说，她认为泰雷克之所以定期表现不好，就是因为他最近没有挨打。在她看来，那样的惩罚有可能会奏效的。

泰勒女士抱怨说，泰雷克经常“精力过剩”。但是，她对儿子的喜爱之情却显而易见，而且常常会对儿子表露出来。实际上，泰雷克的父母都经常以身体接触的方式对他表达感情，摸他的头或是拥抱他。比如，有天晚上泰雷克正在看录像（李小龙主演的《死亡游戏》），他把录像带快进到武打的场面上。

> 大约11：15，[泰勒先生]回来了。泰雷克站起身，到厨房去找他爸妈。泰勒先生一把抓住儿子，从后面抱住他，前后摇晃了大约三十秒，说：“你又在看那个傻片子了吧？”泰雷克说：‘那不是傻片子！”泰勒先生说：“就是。你被灌输了很多东西。”

我们在很多工人阶级黑人和白人的父亲与儿子之间都观察到这种用挑衅来表达感情的方式。

泰雷克的父母为了再次努力挽救他们的婚姻[3]，最近开始“约会”了。虽然他们俩都很希望能破镜重圆，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总是吵架。很普通的家庭生活琐事都会让他们吵得很凶。有一个星期天，在圣经讲习所课后，他们俩又闹起了别扭：

> 泰勒女士说：“泰雷克，让你爸爸课后带我们到麦当劳去吃午餐。”泰勒先生（轻声但很恼火地盯着她的眼睛）说：“别强迫我。”泰勒女士瞪着（低头站在那里的）泰勒先生，泰勒先生说：“别利用他们来强迫我。”她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向了厨房。

泰勒先生常带全家到离自己公寓较近的汉堡王吃饭。总会有人不赞成他的这个选择，尤其是泰勒女士。她更愿到米尔威尔（Millville）购物中心去吃饭，米尔威尔坐落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地区，但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都会去那里购物。

> [泰勒女士]说：“他非得到那个黑人贫民区去……[那里的]都是干瘪了的炸薯条……”[泰勒先生]说：“我不喜欢到那边去。我在这边感到很舒服，我喜欢这里。”[泰勒女士]又（在同去的另一辆车里对调研人员）说：“我们想去米尔威尔，但是他想来这儿。”

这样公开的唇枪舌剑在泰勒先生和女士之间经常发生。虽然他俩有时也有友善的对话及舒服的沉默，但是他们很少一起欢笑，他们的关系通常都很紧张。

日常生活的组织：闲在无事的时间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与中产阶级家庭安排时间的方式不同。他们的

生活节奏并不是由孩子参加的有组织的活动来支配的。塔林格家如果周末只有一两个活动的话，就算是很安静的一个周末了，而泰勒家若是有一个主要的活动就算是忙的了。任何计划好的活动对泰勒家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而日程月历也不是他们家庭的中心。孩子们的课余时间相对没有什么组织结构，而且和加勒特·塔林格不同，他们的课外生活与成年人的世界是截然分开的。泰雷克和阿妮莎小的时候，泰勒女士的祖母会到他们家来看着他们，直到泰勒女士下班回家。现在他们可以不用大人看着自己独自在家了。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日程安排和活动。

有时候，泰雷克只是这么待在家里。比如，一个七月的下午，他从白天夏令营回来后，就和他的朋友克莱顿、还有我互相做伴，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消磨时光。

> 泰雷克仰面躺在地板上看卡通片（我躺在泰雷克旁边）……克莱顿在沙发上伸长了身子，他试图劝说泰雷克出去[到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公共游泳池]游泳。克莱顿一边说着话，一边把手指头一前一后地掰来掰去。他看起来一副慵懒无比的样子。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克莱顿没有听清泰雷克说的话。他慢慢地滑下沙发，仰面躺在沙发和咖啡桌之间的空隙里。我们三个人都躺在地板上，身上都有一部分伸到咖啡桌的下面。（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无比的正常，没有人拿我们的样子来开玩笑。我们只是在那里待着。）

每项具体的活动所用的时间不定。看电视和玩电子游戏是主要的娱乐方式，但是在户外玩耍可以把上面两个给挤掉。自发的游戏活动没有事先的计划，没有电话提醒，没有必要和妈妈商量玩什么，也不需要车接车送——根本不费什么特别的力气。例如，一天下午，阿妮莎和泰雷克走出自家的前廊来到门前狭小街道的路边。阿妮莎开始玩球，她很快就有了玩伴：

> （两个住在附近的男孩子走过来。）阿妮莎正把小球往前面一排房子侧面的墙上抛着。泰雷克加入进来。他们一边往墙上磕球，一边说他们必须拿球做的事情。游戏是这样的：约翰尼·克劳想知道……（往墙上扔球），摸膝盖（扔球），摸脚趾头（扔球），摸地面（扔球）。阿妮莎和泰雷克玩了四个回合。

意外事件也带来了很多欢闹嬉戏：

> 有一次阿妮莎不小心把球扔到了泰雷克头上。所有的孩子都笑了；然后泰雷克拿到了球，他就在后面追赶阿妮莎。那是一个很亲密很开心的瞬间——很多的欢笑，很多目光的交流，咯咯地笑闹，还有相互追逐。

很快又演变出了另一个游戏。泰雷克正在被管束中，他本该全天都不得离家半步的。所以，当他以为自己瞥见了妈妈下班回来，他就飞快地冲入家里。而当他发现是看错了的时候，就又出来了。附近的小孩就开始玩一个引逗他的游戏：

> 孩子们一直在逗泰雷克，说他妈妈回来了——他一听说，就飞跑回家里，从纱门后面向外窥测。这个游戏反复了六次。泰雷克还在街上到处追阿妮莎，想把球从她手里抢过来。阿妮莎几次告诉泰雷克让他最好“回家”；他都不理睬她。然后，[下午]6：30的时候，肯（泰雷克的一个朋友）说：“你妈妈来啦！”泰雷克疾速回到家

里，然后说：“哦，好家伙，这次可是当真的。”

不拘一格自由发挥的户外游戏在泰雷克家附近十分常见。一群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常常在一起玩，通常有四五个人，有时能有十人之多。他们一起在街上玩球，步行到商店去买零食，轮流到某个小朋友家看电视，通常总会在一起。 [4] 一天下午，这群男孩子站在街上，旁边停着一辆车。他们的头挤在一起，泰雷克和他的朋友们正谈得尽兴：

第一个话题是怪异的手指把戏。肖恩讲的故事是，一个女孩可以把中指向后弯到手背，然后再把她的小拇指钻到中指的下面……不知何故，话头又转到了健康和婴儿。肯对其他男孩子说：“你吃什么，你拿什么喂他们，他们的身体就会是怎样的情况。所以，如果想要孩子健康，你就得喂他们健康食品。”泰雷克说：“我要给我的孩子吃比萨饼。”（笑声）肯：“我才不呢，我要给我的孩子吃像水果那样健康的东西。”……肖恩：“胡萝卜？”肯大声说：“不是，是水果。“肯又接着说：“甚至连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你也要给她吃健康的东西。”……然后他们又接着谈论健康和体育运动的关系……然后，他们又谈起了某人的姐姐和另一个人约会……这些交谈后不久，肯决定他要去商店。肖恩说他也去。肖恩问泰雷克去不去。泰雷克说他先得问问妈妈。他进了家门，我也跟了进来。

在泰雷克和他的朋友做的活动中，性别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和本调研中的女孩子相比，他在肢体上更加活跃，而且也有更多的自由可以跑得更远一些、在外面玩到更晚一些。另外，他们做的很多游戏都有更多传统上更男性化的元素，要展现速度、威力、运动能力、体力和勇气。有时他们会互相测试，看看谁扔得最猛最远，或是轮流用力试着掰碎某件物品。假装打架、互相追逐并威胁要打架和真正动手，都是很普遍的活动。

（泰雷克和阿妮莎一直在一边吃蓝色的冰棒一边看电视，他们吃完了，就跑到外面去玩。）有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马上开始威胁泰雷克[说]：“我要打你！我要揍你！”泰雷克到处追他，问他敢不敢打架。泰雷克：“喂，你先来！”那个孩子围着泰雷克乱跳，引逗泰雷克，直到他鼓起勇气在泰雷克胳膊上打了一拳。泰雷克作出了反应，一圈儿一圈儿地在后面追他。小男孩笑着，玩得很欢。泰雷克并没有那么激动，但还是在满腔热情地自卫反击。

一辆卖冰激凌的小型卡车驶过街道，暂时打断了他们的打闹。小卡车一开走，游戏就又开始了：

泰雷克捡起一根细棍儿，威胁说要扔过去。那个男孩笑着，到处追逐着，直到泰雷克真的把小棍儿朝他扔了过去。阿妮莎停下和朋友的交谈，对泰雷克说：“泰雷克！别扔那个东西！”泰雷克没有理睬她。小男孩捡起那根棍儿向泰雷克追了过来。他们一圈一圈地越跑越远。

阿妮莎这时大声对泰雷克说，她要告诉妈妈说他正在街上和小朋友玩。泰雷克并没有回答她。

一个稍大的男孩坐在一个邻居的车盖上，和那个小男孩开玩笑说：“你要是再扔那根棍儿的话，我就把你扔到篱笆那边去（用手比划着）。”小男孩朝泰雷克吐了口吐沫，泰雷克有点生气了，朝他追过去（他皱着眉头，没有了笑容），直到抓住他

为止。

他们跑到街道的另一头儿，所以现在他们离在那边说话的阿妮莎和她的女伴们更近了。
泰雷克朝那个男孩大吐了一口吐沫——我后来发现那个男孩的衣服上有一大块蓝色的痕迹，是泰雷克嘴里留下的冰棒颜色。阿妮莎注意到了这一切，回过头来对泰雷克大声吼叫，而泰雷克为了逃开那个男孩则已跑到街区的对面。在和泰雷克的争执中，她说："泰雷克！你干吗吐吐沫啊？太恶心了！等妈妈回来我要告诉她，你听到了吗？"

这些例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泰雷克不像中产阶级孩子那样只和与自己同岁的孩子玩（有组织的活动往往都是按年龄来分的），他经常和各种年龄的孩子一起玩。他对加入较大的孩子中玩也感到很是轻松自如：

> 泰雷克消失在街角……我走到街角去瞥一眼他在做什么。[人行]道边的台阶和长椅上一共坐着九个人。有三个看起来有十几岁了或者[甚至]更大。

总之，与中上层中产阶级孩子相比，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的日常生活节奏更慢，压力更小，也没有那么结构分明。因为成年人极少把时间花在监测孩子的活动上，对孩子的实际表现也没有那么重视，孩子们也就有了更多的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孩子们有独立于成年人的自己的世界。当然了，泰雷克和朋友们的自治也是有限度的。家长加给他们各种规矩来确保他们的安全；而且有些活动的时间也是家长决定的，比如跑腿做事和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去亲戚家做客往往也由家长决定。和大多数工人阶级孩子及穷人的孩子一样，对泰雷克来说，和亲戚联络——从大家族在周末安排的活动到平时的随便走访——都是他生活的组成部分。他的曾祖母、几个姑姑、表兄弟姐妹和他的奶奶、姥姥都住在附近（他的三个表兄弟就住在"下个街区的街角"）。另两个和他年龄相仿的表亲孩子常常来泰雷克家过夜。周末的时候他经常帮曾祖母做家务，当曾祖母需要他帮忙时，泰雷克必须先帮曾祖母做好事情才能和朋友们去玩。

当然了，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的日常生活也并不是像田园诗般那样自由自在。我们所观察的这些孩子知道家里的经济不稳定，也知道没有钱就会受到很多限制。他们会听到并在孩子圈里重复谈及物品的价格，谈及缺钱和需要更多钱的话题。

兄弟姐妹：可以依靠的人

泰雷克的姐姐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他的哥哥都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虽然阿妮莎有时会有点蛮横，但是她和泰雷克是很亲近的同伴。他们互相帮助，遇到困难时相互给予支持，比如说，在他们的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在家里家外都会有很多时间共处。他们经常在一起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有时他们坐在客厅看电视时会一起捧腹大笑。不过，

有时他们也会争吵：

> 泰雷克在地板上坐好……继续着《考斯比一家》。阿妮莎刚好在节目快要演完时走了进来，扑通一声坐在了沙发上，我正坐在沙发的另一头。阿妮莎说：“泰雷克，把这个碗拿走。不然一会儿会掉到地上。把它拿到厨房去。”泰雷克不听她的；我猜想他是在抱怨，并没有按姐姐说的去做。他开始拿沙发靠垫闹着玩，躺在那里把靠垫抛到空中又接住。他玩了有一分半钟，然后阿妮莎说：“泰雷克，别玩了。把垫子扔给我。”泰雷克把两个靠垫一个一个地抛向阿妮莎，阿妮莎接住垫子并把它们整齐地放回沙发上，她脸上写满了厌烦，好像在说：“我是你姐姐，却还得这样像妈妈一样管你，我好烦啊。”她嘴上说：“你这个痴呆症！”然后他们又回到原处，接着看《考斯比一家》的第二集。

尽管阿妮莎经常惩罚泰雷克，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比我们看到的中产阶级兄弟姐妹之间那种尖刻的关系要热情友好得多。这一点不论在黑人家庭还是在白人家庭中都是如此。

我有一个梦想：尝试正式的体育活动

中产阶级的母亲经常会率先向孩子建议可以参加的活动。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里，除非小孩子提出明确的要求，否则他们就不会加入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具体到泰雷克的情况，他特别热衷于橄榄球，所以就求他妈妈让他加入一个球队。当时儿子上三年级的时候，她拒绝了他的要求，并给出了很多理由，包括泰勒先生担心孩子的安全。可是，在四年级开始前那个暑假的傍晚，当她听到泰雷克的恳求时，儿子如此强烈的渴望给泰勒女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去年他想参加，但是我们不让。我们觉得他太小了，他很不乐意……然后我想他大概是和这附近的谁去了一次训练，可能是他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想加入了。他对我说他想打橄榄球，我说：“不行，我不想让你参加。”他说他太想参加了，连做梦都想。他梦见自己手里拿着橄榄球跑着穿过球场。

她终于松口了。

可是，泰雷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参加橄榄球训练就意味着他不得不减少放学后和附近朋友们玩的时间。面对这两个抉择，他不想再参加的却是有组织的活动：

> 刚刚开始不久，大约有三次训练之后，他就不想去了……他的问题出在因为要去训练而不能和朋友们一起玩。我可不让他这样——他说服了我给他报名，我现在拒绝让他半途而废。[尽管]参加这个活动很是有些费力不讨好，但是既然他已经开始了，我们就得坚持把它做完，并且祈祷再也没有下次了。

作为一个做全职工作的单身母亲，每天都要在6：00之后才能回家，泰勒女士发现，泰雷克参加橄榄球队非常累人，要达到那些球队的要求真的很困难。她重新安排了餐点时间，而且她还得花时间帮泰雷克准备好，花时间送他去球队，并花时间观看他训练：

一开始因为还没有开学，他每周有四天晚上要去练橄榄球。训练是八月开始的……我得在下午4：00从单位[给家里]打电话。[我告诉他]“收拾好东西”。[但是]他从来就没准备好过……所以我得回到家里抓到他，赶紧弄点吃的。[有时候]在夏天……我们会等训练完后再吃饭。

泰雷克的妈妈还要花时间筹款。她带头卖奶酪蛋糕给同事、亲戚和邻居，10美元一块。她卖了二十多块。

虽然训练的节奏在十一月份慢了下来，但仍是件十分累人的任务。星期六早上8：30或9：00有比赛。泰雷克和妈妈需要在7：00起床才能准时到达。他们通常会在赛后去吃顿饭，并且要到下午3：00甚至是5：00之后才能到家。经常变换的日程安排，像训练提前结束、比赛时间变化，以及其他最后一分钟的变更，更使泰勒女士疲惫不堪。在赛季还未过半的时候，她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时候我真的很累了。我是说，这个训练变成了很重的负担。一开学训练就从每星期四次变成了两次，所以这就让我喘了口气。但是天冷了之后——我是说，他们给我们半小时的时间，因为训练6：30开始，所以你就只能——你回家赶紧吃点东西然后又得赶紧跑出去。训练之后还得再做作业。

虽然有这么多困难，泰雷克的妈妈还是继续到场观看他比赛训练。她觉得自己在那里陪着孩子很重要。

我得支持他，这就是为什么我去看他训练。而且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不关心他……我错过了几次。但是我也并不为此而感觉不好，因为我去的次数比我错过的次数要多。我通常都会去的。

泰勒女士认为她儿子参加橄榄球队是件好事。她说泰雷克“特别喜欢”，她还强调这项运动帮助她儿子发展了他的男子气概，尤其是在运动技能方面。

泰雷克男孩子气十足。他的运动技巧特别好……他动作非常协调，所以他样样都行……他知道自己能行，我觉得他想证明这一点给自己看。我觉得他真的喜欢橄榄球。他让这边的每个孩子每天都和他打橄榄球（笑声）……就在这条街上。

当我们问她为什么喜欢泰雷克参加橄榄球队时，她说，她认为这次经历让她儿子有了“一点独立性，而且也表现出了一些[独立性]”。当我们追问她“独立性”怎么讲，泰雷克的妈妈详细描述说：

他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生人，你知道——而且加入一个体育队要与队员们搞好关系。我很高兴他能做到这些。我想我小时候就不会这么顺利过关。我那时不会和别人相处。

然而，与中产阶级的家长不同，泰勒女士并不认为泰雷克参加橄榄球队对他的全面发展会起任何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参加这个对他有什么帮助”是她对“你觉得参加橄榄球对他生活的其他方面有帮助吗……哪怕是很微小的帮助？”这一问题的回答。泰勒女士最鲜明的观点

就是，她不认为橄榄球对泰雷克的人生会有任何帮助。当我们问她“在他生活的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你没有预期到的伴随效果？”时，她给出了如下的回答：

嗯，就是责任心的那部分吧，知道我必须做这件事，我就要去做这件事。这个活动给他自己定下了一条常规：我必须做这件事，然后我必须做作业，然后我必须吃饭，你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好的。

这个赛季结束的时候，泰雷克也就不再参加橄榄球队。[5] 他五年级时并没有在队里打橄榄球。虽然泰勒女士看起来的确为儿子喜欢参加橄榄球队而感到高兴，但是她觉得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一经历。她爱泰雷克，关心照顾他，并希望他快乐。既然他出门就有邻居的孩子和他玩，而不拘形式的玩耍让泰雷克十分快乐，他的妈妈也就不觉得让他参加一项让家长耗时费力的活动有什么必要。对她来说，就像对其他工人阶级和贫困的母亲一样，做一个好妈妈并不包括培养孩子多种兴趣的义务，尤其是如果这样做会让她从根本上重组自己的生活的话。

学会生活的技能

泰雷克一次次地和人员比较稳定的一群孩子玩，因为这群孩子没有成年人管控，他学会了由自己来建立并保持友谊，也学会了怎样自我组织和与人商谈。相比之下，加勒特的玩伴经常变化，随着每个新的赛季和新的有组织的活动而组成并解散。每个场景中的唯一常量就是成年人，这些成年人也许并不在意孩子们是否知道对方的名字，但他们定然会让孩子们知道活动的规则。

泰雷克和他的朋友们参加的大多数非正式活动都在户外，他们自己选择时间和地点。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他们自己设计的游戏，这些游戏都很完整，有各种规则，还有执行规则的系统。因此，泰雷克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给了他很多机会来发展与同龄人之间的调解能力、管理冲突的技巧、个人责任感和战略技能。下面一段实况记录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不断进行中的社交能力的获得，其中描述了泰雷克和朋友们之间的一个游戏，肖恩、肯、雷吉和克莱顿都在场：

游戏有点像排球，但比排球要复杂得多。做游戏的人大致围成一个圆圈，相互传球。每个人都必须仔细看把球传给他的那个人在击球之前有没有跳起来。如果你击球之前没有跳起来，你就出局了。如果你让一个人出局了，你就“赢了一条命”。

他们经常争论某个人是否跳了起来：

“嘿，不对，那可不是[跳起来]。你就这样了一下。”（肖恩跳了一下，但是他的脚几乎没有离开地面。）“我指的不是那个。”肯并没有提出抗议。他只说：“好吧，重来一次吧。”游戏重新开始了两分钟，他们又争了起来。

当争论演变成长时间的争吵时，孩子们一般都会采取某种非正式的解决

冲突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走上一个街区去找一个朋友来裁决：

> 肖恩建议大家去找雷吉问问。雷吉住在泰雷克家的下一个街区。他们放下球走到雷吉那个街区的尽头，[朝房子里的人]喊……“嘿！雷吉——雷吉。”“出来呀。”“雷吉在家吗？”雷吉走下楼来……每个人都在同时试图讲出自己的理来。雷吉大声说：“等等，一个一个来。肯，你先说。”肯把自己那一方面讲了出来，然后泰雷克讲了他的，然后肖恩最后讲。结果，肖恩是对的。肯被判出局。肯并没有提出抗议。他接受了雷吉的裁判。他只是在旁边停着的一辆车的车盖上坐着看。现在雷吉和克莱顿也来玩了。

现在有了新人参加，游戏又开始了，中间偶尔有一些争吵，倒也坚持了三十分钟。而后，他们提出要赛跑，跑到三个街区以外的某个地方，那儿有一座公共建筑，楼外面有一小片草地。在那儿，他们又开始了一个新游戏（“滚球”）；孩子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夜一直玩到很晚。

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泰雷克和他的朋友们经常显出真的很兴奋很开心的样子，有时也会显得很躁动。与中产阶级的孩子不同，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很少抱怨说自己“无聊”。我们听到泰雷克对很多事都发牢骚（例如，被限制在家里玩），但是和中产阶级孩子不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抱怨自己没有事情可做。尽管没有多少有组织的活动，但他能毫不费力地填满自己的时间。他有主意，有计划，有各种活动来和小朋友一起玩。与他的中产阶级同龄人不同，泰雷克的大多数计划都无需大人帮助。他不需要催他妈妈开车带他到朋友家去玩，或是为他组织过夜派对，或是带他去商店。

总之，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泰雷克学到了加勒特无法接触到的重要生活技能。他和他的朋友们发现了很多种自娱自乐的方法，展现了他们的创造性和独立性。这样的经历是极其有价值的，但也与加勒特生活中有组织的活动所带来的官僚机构经历有着明显的差别。泰雷克和他的同伴们没有机会去演练机构规范，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训练。在本书的后面我还会揭示，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更没有像我们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观察到的那样，在怎样通过给一个机构施压而促使其响应孩子的个别需要这方面得到训练。简短来说，比起同成就自然成长相关的自发的游戏玩耍，同协作培养相关的业余活动更有潜力让孩子在公共机构世界中受益。

泰雷克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体会到他们的业余时间缺少什么重要的成分。尤其是，他们看起来也并不想要或期望成年人参与他们的游戏。而在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孩子却习惯了家长和其他成年人监控他们的活动，从而感到他们有权利在游戏中也得到成年人的注意和干预。下一章将通过对生活在白人贫困家庭的卡蒂·布林德尔和她的家人如何对待游戏活动来进一步阐明这一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差别。

[1] Elijah Anderson记录了遵从尊重准则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孩子尊重大人这方面。参见他的著作Code of the Street。

[2] 我们没有观察到中产阶级黑人孩子使用这样的称呼，相反，他们对成年人是直呼大

名的。我们也没有观察到穷人的孩子和工人阶级孩子主动对成年人使用尊称，这就暗示着，这种使用尊称的习俗是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在种族之间的差别。

[3] 在他们4年的分居中，泰勒女士和泰勒先生曾一度重归于好。他们在一起住了18个月，然后再一次分开了。

[4] 泰雷克最要好的朋友，那些我们观察到和他每天在一起玩的男孩子，都是黑人。然而，在一次访谈中，他妈妈说，他有三个好朋友是白人。

[5] 我们并不清楚泰雷克到底有多想再次加入到球队。明显可以观察到的是，他妈妈“祈祷”说希望他不要再想参加了。与中产阶级家庭不同，他们并不认为孩子当然要参加各种组织和活动。对在允许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前母亲的筛选工作的重要作用，参见Dennis R Howard和Robert Madrigal的文章“Who Makes the Decision：The Parent or the Child？”。

第五章 孩子的玩耍是孩子的事情：卡蒂·布林德尔

卡蒂在电话中兴奋地对我说："我正在做一个娃娃屋！我奶奶带来了一些盒子，我正做一个娃娃屋呢！"当我到了[她家的单元房]的时候，我问她娃娃屋做得怎样了。她耸了耸肩，一副失望的样子，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卡蒂从福米卡贴面的[厨房]柜台上把盒子高高举起，拿到客厅，扑通一声放在小地毯上。她说："妈妈，你能帮我吗？"西西说："不行。"卡蒂没有说话，但却很失望。

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成年人对待孩子的活动十分认真。孩子要求帮助时，也不会置之不理。由于中产阶级家长对孩子的生活十分关注，对孩子来说重要的事情很容易也会成为家长的要事。这也给孩子带来了压力，让他们觉得自己必须成功（想想塔林格先生怎样在足球赛中为加勒特呐喊"助威"的）。中产阶级家长不仅会通过让孩子报名参加各种活动来持续支持孩子的爱好，还会观看孩子即兴表演的幽默小品或是加入其中一起在后院玩球或是在饭后和孩子一起玩文字游戏。家长们通常很喜欢这样的参与，但是他们也把这些看做是自己对孩子应尽的责任之一。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家长的参与。因而，中产阶级孩子就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事无巨细都有权利得到成年人的关注。

我们观察到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大多是9-10岁的儿童，他们年龄尚小，仍然会喜欢得到父母的关注。有时候他们会要求大人关注他们或是帮他们做某些事情。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揭示，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成年人常常（但并不总是）会拒绝孩子的这些要求。孩子们往往也会默默地接受这样的决定，就像卡蒂在做娃娃屋一事中所经历的那样。他们不会催促成年人满足他们的愿望。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长认为孩子的社交生活并不怎么重要，他们的孩子往往也会接受父母的这种观点；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孩子们没有受到训练，没有感到自己很特别，也没有觉得自己值得在生活中得到特殊照顾。在对待更大的世界时，孩子们看起来得到了一种局促感，而不是优越感。

然而，局促感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成就自然成长在监护方面对孩子管控严密，但却在休闲娱乐方面给孩子以自主权；当家长遵从成就自然成长的儿童教养策略时，孩子看起来的确在玩耍中得到了真正的快乐。孩子的活动不受大人的关注也没有大人的参与，这就使得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能够有自由去做让自己高兴的事情。与中产阶级孩子在参加有组织的活动时的表现相比，我们观察的这些孩子在他们的休闲娱乐中都展示出了更多的创造性、自发性、快乐和直觉。

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家长不太关注孩子的业余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孩子玩得开心。但就像我们从泰雷克·泰勒那里看到的，喜欢孩子开心并不会让家长觉得自己应该经常给予孩子类似的经历。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家长也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关注或是跟踪培养孩子所表现出的创造性。总之，孩子的业余活动被看做是令人愉快的，但

又是无足轻重的，并且是和成人世界割裂开来的。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那些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的繁杂步骤：叫他们起床，冲澡，吃饭，穿戴整齐，穿暖冬装，按时出门上学，然后这一天要结束时还要确保他们安全到家，吃晚饭，做好作业，按时睡觉。

与中产阶级家长在这方面的负担相比，这些任务要耗费工人阶级和穷人家长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劳累，也造成了更多的挫败感。想通过公共援助来把日子过下去，就得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繁冗的官僚机构。由于没有私车或只有很破旧经常抛锚的私车，使得他们连完成像买菜这样例行的任务也不得不坐公交车；按时赶赴与医生的预约也会包含同样复杂的后勤过程。而且在长期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很小的问题（例如，洗衣机损坏，或是退款没有如约到位）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深远的后果。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的孩子都了解他们生活中的这些局限，但是对穷人的孩子来说，资源匮乏的后果则更加紧迫更加无法抵御。

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记住，即使在经济状况相同或是近乎相同的地方，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作出不同的反应。而且无论其经济地位如何，每个家庭（和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在他们面对的很多其他方面的限制上有所不同。正如赖特·米尔斯所指出，社会结构和个人经历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1] 这一章中将要展开的故事证实了米尔斯这一论断的强大力量。布林德尔一家面临着的很多问题并非只局限于某个阶级，而是那些不论经济地位稳定与否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挑战——包括性虐待、严重的抑郁症和艾滋病感染。然而，如果这一家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经济来源——如果他们所依据的社会公益服务机构但凡能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支援，让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得到保证——他们也许还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而那些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也许还不会那么悲惨。换言之，一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会给其家庭成员带来不同的资源储备以应对生活中类似的问题，但是，即使在社会地位相似的家庭当中，人们使用手头的各种资源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布林德尔一家

卡蒂·布林德尔是一个9岁的白人女孩，她和妈妈西西、18个月的同母异父弟弟梅尔文（绰号“梅尔梅尔”）一起住在一个有三间卧室的小单元房里。和卡蒂同母异父的18岁姐姐詹纳有时候也会来住，还会把她六周大的美洲叭喇狗罗迪欧也带来。布林德尔家的单元房在一座破旧的楼房里，楼房坐落在一个绝大部分居民都是白人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这里大都是低矮的小房子。离楼房步行约五分钟有一些小店，包括一个冰激凌店，一个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一个五金店和一个加油站。卡蒂在下里士满小学上学，学校离她家只隔着几个街区。[2] 然而，最近的杂货店却离这里很远，要坐20分钟的公共汽车。

布林德尔家的单元房保养得很不好。客厅的天花板漏水，布林德尔女士必须定期移动家具以防天花板上漏下来的水滴到家具上。厕所的马桶也总是漏水。进门处那块芥末色的碎布垫子上有很显眼的黑色污渍。

蟑螂经常出没，即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也会爬到墙上。晚上，卫生间里的灯一开，蟑螂就会在白色的瓷砖上四散奔逃。这些无时不在的害虫很是让布林德尔女士烦恼，她把这个单元房称作“蟑螂的汽车旅馆”。因为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布林德尔家住房的破旧失修就更是一目了然。所有的墙壁都空空如也，厨房的案台上什么也没有，客厅的咖啡桌上也是空无一物。房子里看起来没有一点儿乱堆的东西。布林德尔女士坚持要卡蒂把所有的东西都物归原处，书包大衣等东西都不可以乱丢。她一回家就必须马上把自己的东西放到该放的地方。房间里的一切总是特别干净整齐。空气中总是飘着漂白剂的味道。唯一一件引人注意又有装饰意味的物品放在厨房的柜台上。那是布林德尔女士的普通高中学历证书（普高证书）。她为自己取得了普高证书而感到十分自豪。圣诞节的时候家里也会有些许节日气氛，会有一棵真正的圣诞树（是布林德尔女士省吃俭用才买来的），厨房里挂着一串灯，门上有一张圣诞老人的金属画。

布林德尔女士37岁，看上去很是憔悴疲累。虽然她以前曾经酗酒吸毒，但是现在她都戒掉了。她16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但现在是单身一人。她的三个孩子都是由不同的父亲所生，而她也并没有嫁给那些男人中的任何一个。她的第一个孩子“彭妮”（系与詹纳的父亲所生）因婴儿猝死症而不幸夭折，虽然彭妮已经去世近二十年，她还是经常会在谈话中提到她的名字。詹纳是布林德尔女士19岁时生的。詹纳的父亲一直不定期地（但只是很肤浅地）参与着她女儿的生活。现在他住在佛罗里达，离这里有千里之遥。布林德尔女士和卡蒂的父亲只有过很短暂的交往。一开始，他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后来验血结果证实了他就是卡蒂的父亲。他交钱给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以弥补一家人在官方经济援助后还存在的亏空。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把这笔钱中的一小部分交给布林德尔女士。卡蒂的父亲拒绝来探访女儿。有时候，在布林德尔女士反复给男方父母打电话之后，他会让人送来一些礼物。卡蒂特别珍视他几年前在圣诞节时送来的两部录像片。我们做调研的这年，他并没有在节假日或卡蒂的生日送来任何礼物。最小的孩子梅尔梅尔的父亲是这三个男人中出现频率最高最活跃的一个。他定期来看他的儿子，经常每月要来好几次。布林德尔女士现在没有工作。全家靠公共经济援助、食品券和医疗援助卡过活。为了能给孩子们买些圣诞礼物，尤其是给卡蒂买一件大衣和一个娃娃，布林德尔女士说她“[把]一些账单”拖延到了节日之后。

卡蒂是一个矮小活泼的四年级孩子。她的头发很直很薄，刚刚齐肩，金色中略带着一点淡棕色，长得很结实。她担心自己太胖了，其实她并不胖，事实上，她连敦实都算不上。家里人经常谈论她的身材。比如，她妈妈会很沮丧地对詹纳说，卡蒂“的屁股简直能把人雷死”。当卡蒂和她的亲戚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他们经常谈论头发的颜色、头发长度、发型、指甲、如何修指甲、穿着和体重。所有这些都会吸引卡蒂的注意力（也会吸引很多其他女孩的注意力）。她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15岁的少女。在圣诞节那天照的一张照片里，她穿了件新的白色长袖衬衣、黑色发亮的长裙、白色的尼龙袜和帆布平底鞋，试图让自己看上去妖艳迷人。她把头发扎成法式竖盘（一种一般只有成年女性才会用的

精致发型），还抹了口红。

在某些方面，卡蒂的行为和她的打扮一样成人化。比如，当她从学校回来，她会给自己准备点零食，比如说一碗金宝罐装番茄汤。她打开罐头盒，把汤倒在一个铝箔小罐里，放在火上热，俨然一副很胜任很家常便饭的样子。她既不需要也不会得到成年人的帮助。但是，当她和同伴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和她的表姐妹艾米一起玩时，卡蒂看上去更符合一个9岁孩子的本然状态。和我们观察的其他孩子一样，在外面——不和妈妈在一起时——她更加精力充沛，更能大声笑闹，也更有霸气。每个周末，她都会在祖母家里和艾米一起玩很长时间。卡蒂有种戏剧性表现的才能，“天生”就是个演员。她和艾米一起设计演出了很多小品，玩得特别开心。与泰雷克·泰勒和调研中的其他男孩子相比，她玩的东西很显然受到性别的影响。她不能像男孩子那样跑得那么远。卡蒂在布林德尔家单元房旁边的大停车场跟附近的孩子一起玩。她在那里骑自行车，玩逮人，还到其他孩子家里去玩，但是她不会像泰雷克和我们观察的其他男孩子那样结伴到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乱跑。和男孩子的好动相比，她玩的东西大都是少动多静的，还很强调女性特质。她在家里喜欢玩芭比娃娃（她有15个）。在和一个邻居女孩玩的时候，她花很长的时间来练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耐人赏味的美女（这一点我们从未在男孩子身上观察到）。卡蒂和她的朋友会练习打扮芭比娃娃，还会玩互相梳头。卡蒂还看电视并玩任天堂电子游戏。在她（而不是她妈妈）的主动要求下，卡蒂参加了两项有组织的活动：她参加的合唱团每周一次在课后排练一小时。有些周五晚上，她和附近的孩子乘面包车到一个基督教青少年组织去唱基督教歌曲，学习圣经，还一起做游戏。

然而，卡蒂也出了很多的问题，有时候她会主动讲出一些她觉得自己寂寞和被抛弃的故事。她的妈妈（在深入的访谈中）倾诉说，卡蒂在一年级 [3] 的时候遭到性骚扰。去年，她上三年级时有很长时间没有去上学，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她因自残行为而住院接受治疗。

布林德尔女士的家庭成员——她的妈妈塔米，两个已成年的兄弟约翰和赖安，还有艾米——都住在附近。 [4] 赖安和艾米的妈妈离婚了；艾米平时和她母亲一起住，周末的时候来她父亲和祖母这里。卡蒂可以自己坐公交车到她“阿婆”家去；只有十分钟，仅一条路。她几乎每周都去。艾米也几乎每次都在那里，因为她周末总来找她爸爸（布林德尔女士的兄弟赖安）。虽然布林德尔毫不羞愧地把她的亲戚形容成“功能失常者”，但却恰恰是她的大家族为她和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赖以组织生活的结构。阿婆在周末的时候看着卡蒂，她和赖安有时都会开车接送布林德尔女士和她的孩子们（布林德尔家没有车）。卡蒂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她的表姐妹艾米，布林德尔女士最好的朋友则是她的前妯娌玛丽（曾是约翰的前妻，约翰患有精神分裂症）。布林德尔女士和玛丽每天都通电话，每周还会见好几次面。玛丽的几个女儿都十几岁了，她们也经常到布林德尔家来。

卡蒂的世界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种族交融。她家附近的商店里，店员和顾客几乎全都是白人。虽然单元楼里也住着几家非裔房客，但是这个居住区内的住户绝大多数都是白人。布林德尔家受益于城市住宅供给中存在的种族隔离现象。 [5] 与住在公共住房项目里的贫困家庭不同，

因为种族隔离，他们住在一个所有家庭都来自同一个种族的地方（在这里所有人都是白人），而在这里，这些人都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尽管如此，卡蒂生活中的一些关键方面还是有种族融合的。比如说，她班里的同学一半是黑人一半是白人。课间休息的时候，她有时会和黑人女孩一起玩。她在自家附近一起玩的小朋友中有一些是黑人，她有时还会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她们一小会儿。她也在一些社交场合看到过其他黑人成年人，包括和她妈妈约会过的那个黑人男子。

对于布林德尔一家来说，经济资源的匮乏使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比中产阶级（甚至是工人阶级）家庭所面临的境遇要复杂得多，也紧张得多。凑出一顿饭来就有可能是一个挑战。食品券每14或19天发一次。在下一次领食品券之前，全家经常已经没有吃的了。领食品券也是一个很折磨人的过程，需要坐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而且还要在分发处等上更长时间。公共汽车很慢而且经常迟来。夏天的时候，布林德尔女士就步行一小时去领。她尽量不带梅尔梅尔去领食品券，但是会在去其他地方时带上他。她抱他到车站并在要坐很长时间车时把他放在腿上抱着。

在家里的日常劳作：照顾孩子

在我们探访的所有家庭中，无论社会地位如何，家长的角色都是照顾孩子。是家长，而不是孩子，承担着照顾家人的责任：确保家里有吃的，确保孩子有澡洗，有干净衣服穿，确保孩子着装整齐搭配，并确保他们按时睡觉以保证充足的睡眠。孩子生病的时候家长会照顾他们，送他们上学并参加各种其他活动，还带他们去看牙和看医生。每个家庭都会面对这些日常琐事，每个成年人都觉得这些劳作十分繁重，即使是中产阶级也是如此。孩子虽然很可爱，但也会很难对付。他们会偷懒，丢东西，拒绝吃不喜欢的东西，不听话，有时还会反抗、叛逆，并测试家长到底会对自己有多宽容。每个社会阶层的家长都会和这样的孩子摸爬滚打。

在布林德尔家，所有照顾孩子的重任都压到了卡蒂妈妈的肩上。布林德尔女士是一个超常有条理的人。她认为报纸、玩具，衣服等都应该整齐地放到指定的地方。卡蒂的衣橱里用衣架挂着整套的套装。比如，运动长裤、配套的T恤衫和厚运动衫都挂在同一个衣架上。其他的衣架上也用同样的排列方式挂着衣服。每次洗完衣服，布林德尔女士都要重新归类。她还喜欢让卡蒂及时完成手头的事情，尤其是不能把作业拖到最后一分钟再做。她认为女儿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应该写作业。卡蒂有时也会反抗，“忘了”写作业。所有睡觉前没有完成的功课都必须在第二天早上上学前完成，都要在客厅或餐厅写，因为卧室里没有桌子。就像下面的调研记录所示，这就意味着母女俩都得少睡觉多做事：

> （卡蒂和西西在7：00之前就起床了。妈妈给卡蒂冲了一杯热巧克力。）卡蒂伸直双腿横坐在双人沙发上……她穿着粉色的睡裙，头发不整齐地龇着毛。她把蓝色笔记本摊在腿上，眼睛看着一列单词，嘴里还叼着铅笔。

显然，作业是要把一列单词的拼写改成缩略式，然后再把它们按字母顺序排序。一共有十六个单词……7：10分左右，卡蒂宣布说：“我做了十个，还有六个没有做。”她妈妈说：“还有这么多没做啊。”

当卡蒂有一道题做不下去时，她就会去问她妈妈。卡蒂的妈妈会给卡蒂发出一个直截了当的指令，而不是像中产阶级家长那样一步一步给孩子作出提示来引导他们自己得出答案。在卡蒂对某些单词的排序有问题时，她会告诉卡蒂具体的排序数字：

卡蒂……把那列单词递给妈妈说：“我该怎么办？”卡蒂在睡裙下面抬起一条腿，另一条腿在沙发边上摆来摆去……[西西]看着那列单词，一脸疑惑的样子……卡蒂安静地坐着，一边等一边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她把那张纸还给卡蒂说：“把那个词放到第十位，然后原来在第十位的挪到第十一，原来的第十一变成十二，原来的十二变成十三。”卡蒂把以前的排序擦掉了。

大约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卡蒂都在做这个单词的作业，而她妈妈则隔一会儿就提醒她一次，让她吃早饭并准备上学。卡蒂并没有忽略妈妈的提醒。她很听话，但是她的动作却像蜗牛一样慢：

她妈妈说她应该吃一个多纳圈。卡蒂拿起一个多纳圈，开始慢慢地吃起来……她妈妈说；“你得穿好衣服了。”然后又问她：“你想穿什么？你这在儿只有几套衣服。大多数衣服都放在姥姥家了。”她又接着说：“你想穿那套粉色的运动服吗？”卡蒂说：“不想，那套衣服让我看起来很胖。”她妈妈回答说：“你不胖。”卡蒂没有回答。

卡蒂做完了那列单词，但是声明说她要重新抄一份。布林德尔女士没有检查卡蒂的答案是否正确，也没有再提这列单词的事。由于卡蒂并没有去换衣服，她妈妈又平静地提醒她该准备好上学了。然后，她打开了“美国你早”节目。很快卡蒂就放下了手里的翻抄，开始看起电视来。布林德尔女士并没有反对，因为家里对孩子看电视没有限制规定。

卡蒂继续哈欠连天。她把单词原稿放在地板上的小地毯上，把笔记本靠在膝盖上，开始慢慢地写。她倦意十足地做着。她妈妈说：“我要买一个转笔刀，用刀片削铅笔让我好烦啊。”……卡蒂一边看电视一边写作业。进展真的很慢，她看起来就是在磨蹭时间……7：44分的时候，卡蒂说：“我写完了。”她伸了个懒腰，向后仰成拱形，打了个哈欠。她妈妈说：“你该去穿好衣服了。”卡蒂没有动窝。她妈妈等了一分钟……[然后]走到衣橱前，拿出了两套衣服……一手一套，[她]对卡蒂说：“你想穿这套（举起一套）还是这套（举起另一套）？”卡蒂指着其中一套说：“这套。”

卡蒂接着很专注地看“美国你早”。在她妈妈又一次更严肃地要求她换衣服以后，她穿上了衣服，但还是在看电视。她妈妈坐在沙发上抽烟。8：00了。卡蒂穿好了衣服，但还没有梳头。给她梳头是布林德尔女士的事情。她给卡蒂把头发梳通，然后在和女儿低声商量过之后，给她扎起了一个马尾巴，并解释说：“她不喜欢把头发扎起来，可是我喜欢她这样。”

快到该走的时候了。卡蒂离开电视机前，环视了一下餐厅，然后到她的卧室里去了几秒钟。当她回来的时候：

她径直站在妈妈面前（挡住妈妈前面的电视机）问："妈妈，我的书包呢？"她妈妈看上去很沮丧。她皱起眉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提高嗓门儿说："这句话问得很关键，你的书包呢？"

布林德尔女士也来帮忙找包。她站在卡蒂房间的门前，往里面指着，看上去很不耐烦。卡蒂笑了，轻轻从妈妈身边滑过，从房间里拿出书包。最后，终于到说再见的时间了，而她还要穿暖，因为外面只有8度：

西西[给卡蒂]拉好大衣的拉锁，但没有戴上后面的兜帽。卡蒂手上也没有戴手套……西西站起来走到门边把门打开。卡蒂先走出门外。她妈妈弯下腰在她的嘴唇上吻了一下，慈爱地说："回见，小怪兽。"

整个过程一步一步总共花了九十分钟。每天上学和大部分周末都是如此（虽然周末会小有变化），卡蒂和她妈妈每天都会例行一遍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累人。这一天，梅尔梅尔还在睡觉，但布林德尔女士经常还要同时照顾儿子——给他换尿布、穿衣服、喝牛奶或是"高VC"的果汁，然后在她督促卡蒂的时候还要抱着儿子到处走。和其他有婴幼儿的单亲家长一样，布林德尔女士肩负着很多没有商量余地的责任，每天没有她的协助，她的孩子就无法应付生活。

贫困家庭：爱的操劳倍加繁重

所有的家长每天都会面临着教养孩子的多重任务。但是在贫困家庭中，执行这些任务所要遇到的困难却远远比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的要大得多。贫穷造成的更多的负担与个人能力并没有关联（虽然个人在社交方面的确是有差异的）。倒不如说，这些困难都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造成的。在西欧国家，所有有孩子的家庭每月都会得到国家的津贴，而在美国，经济来源的稳定性被看做是个人自己的责任。公共援助并不能涵盖抚养孩子的最低消费。而且，穷人能得到的社会资源还不仅仅是不够；其申请过程往往还很官僚、缓慢并受他人轻贱。

布林德尔女士目前没有工作，但她过去有过工作并为此感到很自豪（例如，在说到她曾在麦当劳工作时，她补充说："我做得很好呢。"）。她希望梅尔梅尔开始上学的时候，她能回去工作。同时，布林德尔一家也试图靠公共援助过活。每月两次，布林德尔女士不得不亲自去领食品券和现金补贴。通常，由于没人看孩子，她要带着梅尔梅尔一起去。但是，这一天梅尔梅尔有姐姐詹纳看着他。去领取食品券是一件她"痛恨"的杂事。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分发处很冷，而且在发食品券的那一天，里面十分拥挤，队伍走得很慢，到处都可看到带着小孩子的形容疲倦的妇女（男人太少了）。在分发处还没开门的时候，楼外就已经开始排起长队。我们去的那一天，在外面一寸一寸地挪了十五分钟才进到楼里面。一旦挤进楼里，我们就加入到一个有75人的长队，在一间狭小、充满灰尘又肮脏的屋子里又等了好久。那里没有公共卫生间，也没有自动饮水器。我们又等了三十分钟。出纳员动作很慢，他们显得

很无聊很是漠不关心。9：05分的时候，我们的事情终于办完了，但是我们都被长时间的等待弄得疲惫不堪。

> 排队的时候布林德尔女士带着焦虑和些许绝望的口吻说："我什么都没有了。牛奶、鸡蛋、面包都没了。"我们一拿到食品券就马上到杂货店去买吃的。卡蒂的妈妈买了四盒早餐麦片，一条白面包，一加仑牛奶，一个大腊肠，美国奶酪，一打鸡蛋，和一盒预先配好的蛋糕粉加糖霜。那天是卡蒂的生日。蛋糕粉得用植物油来调揉。这一项是通常没有的额外开支。布林德尔女士盯着那个放着黄色植物油的亮闪闪的塑料瓶子，显得很紧张。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希望吃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6]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整个"远征"大约花了两个小时。

在每一元饭钱都很要紧的情况下，意想不到的损失是很严重的问题。一天下午当布林德尔女士领了食品券回到家里时（她独自一人去领的），她很沮丧。她觉得自己被骗了：

> 西西在餐桌旁边坐下。她叹了口气，脱下大衣，放在一旁的椅子上。她看着詹纳说："我觉得他们骗了我40美元。后面排队的一堆人都在喊快点快点，我努力把钱数清楚，但是我没办法集中精力。"西西听起来很难过。
>
> 她开始数第一本[食品券]的页数，然后再数第二本……西西数着的时候卡蒂出了点儿声——一点儿哼哼声（声音并不大）。西西生气地说："安静点儿。排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没办法集中精力。所有的人都在大喊大叫。"……西西看着詹纳说："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他们给我的这些券本都（钱）数很低。"妈妈朝她嚷了之后，卡蒂就再没有说过什么，只是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詹纳安慰妈妈说："别着急。你不用给我吃的。"9岁的卡蒂很清楚地了解家里在物资上的缺乏。她反驳詹纳说："那也毕竟是40美元啊。"

洗衣服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是件枯燥却也没有什么难度的事情，但对布林德尔女士来说却很麻烦，很昂贵，也很令人沮丧。她发现自己手头很难常有足够的0.25美分硬币。银行常常不愿把卷好的一柱硬币卖给不在该银行存钱的人，她没有银行账号（有必要时她就用汇票）。杂货店里倒是有硬币，但却要坐二十分钟公交车才能到。然而更重要的是，单元楼里的三个洗衣机和两个烘干机还总是爱出故障：

> 西西说："我真希望有辆车。我都快没有干净衣服穿了。"（她看着双人沙发旁边的一堆脏衣服说。）我问："洗衣机坏了吗？"她回答说："我第一次下去到洗衣房时，吓了一大跳。我下去后看到洗衣机里的水直往外冒。今天洗衣机里还是灌满了水。然后我就到那边[另一座单元楼]去了。他们的洗衣房上着锁，所以我想，他们的也坏了……[洗衣房里]没有开暖气。简直是荒唐……这就是为什么水管子都裂了。都零下22度了。"

对卡蒂来说，有时候洗衣机坏了她就无法去上学。个别时候她彻底没有干净衣服穿，就不得不待在家里，直到衣服能洗为止。

不得不依赖公交系统也使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带着很小的孩子时。如果你同时抱着一个刚刚开始学走路的孩子、拿着一个放纸尿裤的袋子、还背着几个包儿，那么像交钱买票这样的小事都有可能很困难。与此类似，一旦上了车，即使是有座，在长途坐车时抱着或看着幼儿也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公交车还时常会迟到，有时候则是根本就没

车，而且坐公交车总是比开车要慢得多。最后，坐公交车还很危险。母亲和孩子夏天出门要在严严烈日下站上很久，冬天则得顶着寒风，一年中还有好几个月要站在暴风雨中等车。公共汽车都经过交通繁华地段，家长必须一边等车一边严密监护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走近往来穿梭的车流。梅尔梅尔喜欢公共汽车，看上去他很喜欢车子开动的感觉。布林德尔女士有时候趁坐车的机会和儿子一对一地单独在一起。比如，在坐车去参加一个市立听证会（去为她收到住房驱逐令申辩）的路上，她对梅尔梅尔笑着，很亲切地说："梅尔梅尔，我爱你！" [7] 有私家车搭始终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如果能安排成的话。但对布林德尔女士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却十分困难，因为她兄弟的车有时会抛锚，而且即便车没坏，他们之间的时间安排也很难达成一致。她妈妈的车也是如此。而且，法律还规定婴幼儿必须有专用的安全座，但是安全座很贵，很重，也很不容易从一辆车搬到另一辆车上。梅尔梅尔坐外祖母的车时，车里没有安全座，她就总得小心翼翼地盯着外面看有没有警察。如果看到警察，她就会赶忙把外孙子按住，让他低于车窗，好不被警察看到。她说她觉得自己"像个罪犯"。她付不起被警察抓住后的罚金："罚单有一千美元！"

和交通一样，贫困家庭也没有多少余地来选择住所。因此，卡蒂和家人还要设法应付单元房的各种问题：与蟑螂共处，整个楼保养得很差，冬天台阶上满是积雪和冰面，永远也修不好的电器，还有漏水的管道。到目前为止，他们很"庆幸"邻居都还好，也就是说，楼里还没有出现严重威胁人身安全的事件。布林德尔女士的前弟妹也是她的密友，玛丽，就没有这么幸运。她住的楼里搬进了一些毒品贩子。

尽管有这么多的问题，布林德尔一家的单元房最起码还是给他们提供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然而，观察调研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连这一点也受到了威胁。布林德尔女士开始不能及时交纳房租。她刚搬进来时，原指望着和詹纳一起分担每月600美元的房租。詹纳生了病，而后又被诊断为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因此她没有办法交自己那一半房租，她妈妈也无法自己负担所有的租金。等待搬入公共援助房的大排队特别长。和卡蒂的外祖母住到一起去也是一个选择，但只能是在无计可施时才能考虑。那座房了本身就已够挤了：布林德尔女士的兄弟约翰（有精神分裂症的那个）和赖恩都住在那里。真到那一步布林德尔一家也只能住在地下室。而且，她妈妈用来取暖的烧木柴的壁炉和煤油加热器也会加重詹纳的过敏症。但最重要的是，詹纳和她外祖母关系不好。她们之间有着多年刺骨的冲突，包括詹纳10岁时处于低落期的时候她外祖母骂她是"娼妓"。

这一打击让布林德尔女士无所适从，她只能坐以待毙，先用光了上个月的房租，然后就等着突如其来的搬迁令。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艰难地过去，她的房东决定提出诉讼开始驱逐他们。在一个寒冷的二月天，布林德尔女士、梅尔梅尔和一名调研人员一起到市政厅去听审。等过好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被叫到了法官面前。在那段简短的交流中，法庭官员告诉布林德尔女士说，她必须在三十天内搬出去。可是，再转一个星期，她却从法院得到了一封"未出席"的通知。根据法院的记录，布林德尔女士并没有出席上次的传讯，因此她的房东有权力立即把他们锁

在门外。和法院取得联系是一场充满挫败感的演习：

西西说："我给他们给我的那个号码打了好多次电话，他们一直告诉我过会儿再打回来。我真是烦透了回他们电话。我问他们我应该找谁说话。我烦透了回他们电话。然后我就在邮件里收到了这张通知，我真是气坏了。"

与此同时，詹纳决定搬到佛罗里达去和她的父亲住在一起，这样也可以避免东北部寒冷的冬天。但是到了那边之后，事情却并不像她计划的那样。詹纳的父亲并没有如她期望的那样帮助她，其他的安排也没有成功，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她住了一小段时间医院。布林德尔女士急得心乱如麻，在詹纳请她过去的时候决定到佛罗里达去陪她。为了筹钱买机票，布林德尔女士把客厅和卧室的两套家具都卖了。可是买卧室家具的人付款又付晚了。这种耽搁真的很是折磨人。布林德尔担心交易做不成，她担心得不到那笔急需买票的钱：

她说："我需要把这套卧室家具卖出去。现在本应该已经卖出去了，要不是这场雪让他们没法来取的话。他们当时有钱买，但是谁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笔钱了？我需要这笔钱来买机票，而且我应该明天就去交钱买票。（她因焦虑而提高了嗓门。）我正等着一张40美元的支票。有了这40美元我就有钱买票了，剩下的钱还可以在路上用。"

布林德尔女士不顾一切地想去佛罗里达。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而詹纳的病更让她无可言表地方寸大乱。秋天的时候，当她刚一听到詹纳被确诊时，布林德尔女士曾企图自杀。她当时在极度的忧郁和窘迫下就着烈酒吞下了一大堆药（在家里，孩子们在其他屋里）。她被紧急护送到医院，洗了胃，活了下来。她坚决要照顾詹纳，但是所有这些要做的事情把她淹没了。她并不是很认真地考虑着把卡蒂留下，让她读完这个学期。一开始她建议卡蒂和阿婆住到六月份，但是卡蒂说："不用，我跟你一起去。"后来，卡蒂甚至更坚决地拒绝在妈妈去佛罗里达时和舅妈玛丽住在一起：

西西说；"你可以留在这里。"一分钟过去了，西西又说："你可以住在玛丽这儿。"

玛丽这时正朝厨房走来，她说："不行，如果她住我这儿，我会揍她的。"玛丽看着卡蒂说："你妈不打你是因为她怕伤着你。我可是会打你的，这样你就不会再调皮捣蛋了。"西西屏住气说："这倒是。"卡蒂什么也没说。

舅妈玛丽主动说："我要像我爸当初打我那样打她"，然后她又讲起她爸爸怎样打她打到流血的事，但是她也因此改好了。

卡蒂对西西说："你的确有一次出拳打了我的脸。"西西说："我只是扇了你一个嘴巴。别夸大其词。"卡蒂说："我是带着眼睛周围的淤血上学的。"

下午的时光慢慢地过去了；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在看肥皂剧和奥普拉的节目。卡蒂就在离她妈妈和舅妈几英尺远的地方开始自己打自己。她们绝对看到了她的举动，但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卡蒂开始用拳头打自己的前额。她坐在床上，在打到自己前额的时候向后倒了下去。她是用右手打的。她就这样连续打了三分钟，但在我看来却十分的漫长。

而且，梅尔梅尔也开始学她：

梅尔梅尔爬上床坐在我和她之间，开始学卡蒂。他就这样打了一分钟。西西和玛丽看着他们，什么也没说。卡蒂对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时住院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自己伤害自己。"我问："他们怎么治疗你的？"她说："他们把我关了起来。"我问："然后他们做了什么？"卡蒂说："他们教我要有自尊心，还告诉我不要再自残了。"我朝那边看了一次，西西和玛丽在看奥普拉主持的节目。

显然，卡蒂并不想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管是姥姥家还是舅妈家她都不想住。也许是了解她女儿经常小题大做，布林德尔女士可能是因为觉得卡蒂在成心夸大自己的感受而对她不予理睬。或许，她只是无法承认自己最小的女儿有情感上的问题，不管女儿的反应是否正当。布林德尔女士有忧郁症的病史，而且第一个孩子的不幸夭折使她一直深受折磨。她觉得自己必须到佛罗里达去帮助詹纳。让别人暂时照管卡蒂会在很多方面简化她的旅行。（最后真的要走的时候，布林德尔女士还是带上了梅尔梅尔和卡蒂。）

调研中的所有家庭——各地的所有家庭——都面临着各种问题。不同的是，他们面临的困难种类和数量不同，每个人的性情也影响着他们面对挑战所作出的反应，每个家庭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也不尽相同。布林德尔一家比我们访察的其他贫困家庭有更多也是更深层的心理问题。而他们面临的其他很多问题都和其他贫困家庭一样，也都起因于同一个基本的两难境地：没有足够的物资来供给孩子的每日所需，无法满足孩子的需求。我们观察到，布林德尔女士尽力应付的那种种困难——去领食品券、找到能用的洗衣机、对付房东和滋事的邻居，以及纠正强大的官僚机构所犯的错误——都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家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这些日常的两难境地符合社会结构问题的定义：它们是由社会结构系统的组织形式造成的。而家庭成员的个人经历又和这些社会结构问题混合在一起。因此，通过观察真实生活中的家庭每天如何生活，我们观察到一个社会结构与个人经历之间持续进行的互动。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结构问题是结构—经历混合物中最具压迫性的一方。物资缺乏决定了全家住在哪里、家长有（否）工作、如何出行，以及家长能给幼儿多少及何种照顾。

在这样的条件下，家长不优先考虑孩子的业余生活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较少参与孩子的游戏，也不会通过给孩子注册加入有组织的活动来持续支持孩子在音乐、美术、戏剧或体育方面绽露的兴趣。不过，在下一段中我们将会展示，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不是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的家长不支持孩子业余爱好的唯一原因。在中产阶级家长中显著存在的协作培养的责任感，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中并不普遍。同样，中产阶级孩子那种有权享有成年人关注的优越感，在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中也并不流行。

中产阶级家长经常会很忙，甚至在家里也很忙。他们当然不会每次都停下来看孩子在做什么活动，不管是弹钢琴，还是表演小品，还是跳舞。尽管如此，这些家长看起来都觉得培养孩子的天赋是他们的义务。他们经常会通过观看，评论和鼓励孩子在家里做的活动来履行这一义务。 [8] 有时家长也会自愿参加孩子的活动，和他们下棋、玩猜字，在后院进行体育活动，以及指点他们完成各项作业。

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长有时也会和孩子们一起玩。比如，在以比利为观察焦点的那个工人阶级白人家庭（参见第11章），比利的爸爸会在自家门前的道边坐下一边抽烟一边和孩子打牌。在卡蒂家也是一样，成年人有时也会参与其中。布林德尔女士同意会观看卡蒂和她表姐妹艾米演小品，有时还会和卡蒂一起玩强手大亨。

虽然在我们观察的所有家庭中，成年人看起来都愿意偶尔观看孩子的活动或是加入到孩子的游戏中去，但是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却较少去干预孩子的业余生活，尤其是和中产阶级家长参与的水平相比。大多数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都认为孩子的活动并不重要，或者，更具体地说，他们并不认为孩子的活动应该牵扯大人的时间和精力。在他们看来，孩子的活动是孩子互相之间的事情，不用和家长一起做。因此，孩子的世界和成年人的世界是分隔开来的。当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要求家长参加他们的活动时，他们的要求会被看做是没必要的，也有可能是烦人的：

> 艾米忽然说：“卡蒂最擅长演垂死挣扎了。她最擅长死戏和哭戏。”卡蒂回过头对我们说：“给我一枪。”……阿婆面无表情也毫无激情地用手指比划成一杆枪，对准卡蒂的胸膛（以一种单调的声音）说：“砰。”……卡蒂向后踉跄了一下……[她]开始了一场缓慢而戏剧性的死亡表演，用双手抓住心脏，然后双手双臂都完全朝外伸开，[接着又]向后倾倒在长椅上。她慢慢地从长椅上滑下，落到地上，然后——作为最后的一笔——把头垂下，歪到左肩。她躺在那里不动了。
>
> 艾米激动得上下雀跃……我笑着说：“太棒了。”阿婆什么也没说，她看上去觉得很无趣。卡蒂爬起来说：“再毙我一次。”这一次我用右手比划成枪打了她。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个表演。阿婆在看电视[并没有去关注卡蒂]。

卡蒂第三次要求被“击毙”时，阿婆看起来已经很烦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她也没有再提出同样的要求，因为和典型的小孩子不拘形式的玩耍一样，卡蒂和艾米忽然开始玩起别的了。她们到厨房去筹划一个圣诞节的小品，然后到客厅来表演。在中产阶级家庭，家长经常赞扬孩子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在阿婆家，这些小品却无一例外地被成年人所忽略：

> 艾米对我们说：“我是圣诞老人，你[卡蒂]是一个被惯坏的臭小孩。”艾米戴上帽子，卡蒂也戴上顶帽子，然后艾米说：“看我们！看我们！我是圣诞老人，你是小孩。一开始你是个被惯坏的臭小孩，但是后来你不是了。”
>
> 只有我在看她们，没有别人看她们表演。阿婆在看电视。（她眼睛直盯着前方；艾米的爸爸也在，但他并不理睬她们的表演，约翰叔叔也在，他坐在沙发上，显然对周围的一切都了无知觉。）[9]

当孩子们进一步要求得到大人的关注时，阿婆顺从了她们，但却明显没有什么热情：

卡蒂假装是一个来找圣诞老人的孩子。艾米[圣诞老人]坐在椅子上接见了她……阿婆并没有看她们表演，而是在看罗斯安[电视节目]，艾米生气了，她走过来把电视关掉，说：“阿婆！你根本没有在看！”阿婆什么也没说，把注意力放在艾米身上一小会儿。[10] 卡蒂站在艾米旁边，微微跳了几下。艾米重新演了一遍：（手里拿着一只鲜红的毛茸茸的圣诞长袜）说：“这个小精灵的长袜里有几块石头，因为有人给了她煤炭。”（她把石头拿出来，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艾米和卡蒂突然离开了，到[另一个]房间里互相拥抱。阿婆看上去对这个小品一点也不感兴趣。

孩子们回到客厅，高声用舞台腔宣布说：“这是第一幕。”接着，她们又把圣诞长袜戴在头上，开始演下一幕。这时，卡蒂解释说，她是一个孤儿，（停顿）“我父母双亡。”孤儿走了进来，殷切地恳求能见到圣诞老人[艾米]。小品演得正起劲儿时，艾米的父亲走了进来。

[赖安]并没有先看看孩子们在做什么。他拿起一台旧的立式吸尘器，插上电门……开始吸圣诞树下的金丝流苏护裙，而艾米和卡蒂正站在上面。他看也不看她们一眼，很稳当地吸着……艾米不得不上到楼梯上，躲开她爸爸。她和卡蒂并没有对这次干扰提出异议。

艾米转向观众（现在只有我在看了），坚定地宣布说：“第一幕结束。”我笑着说：“很棒啊！”她们开始重编，策划第二幕，回到客厅来，然后表演这一部分。同样的，她们的外祖母只给了她们极其微小的认可，赖安则继续对他的侄女和女儿不予理睬。

吸地的声音越来越响，赖安说：“这个吸尘器听起来不对劲儿。”他拿起吸尘器，在进门的地方（正是两个孩子表演的地方）把机器放倒，蹲了下来，开始查看底座。阿婆也对两个女孩不予理睬，过来跪在地上看吸尘器。

孩子们一起谢幕，然后就去准备第三幕了。我也过去看吸尘器。滚筒的毛刷上缠满了流苏。我和阿婆一起把流苏择了出来。与此同时，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第三幕。她们返回来，就站在阿婆旁边，开始表演。由于我正坐在地上忙着修吸尘器，根本没有人在看小剧的这一段。

孩子们并没有停下来或是要求任何人观看，但是艾米大声地宣布说：“第三幕。”这次她们跳了一小段舞……她们上下跳着，把腿摆来摆去，并唱着圣诞老人和他的精灵们要来了的饶舌说唱。

阿婆看起来很烦。孩子们几乎要踩到她了，她们的腿离她很近，她们唱歌的声音也很大很热烈。她苦着脸但是并没有让她们不要玩了，只是更加专注于修吸尘器。[11]。

也不是所有卡蒂的活动都会被忽略。比如，卡蒂因在秋季学期开始时连续三个月全勤而受到嘉奖，她妈妈看了她在家里重演学校的颁奖仪式，脸上有时还泛起微笑。布林德尔女士还赞成卡蒂参加唱诗班，放学后一小时的时间是卡蒂自己报的名（免费，每周步行到学校去参加）。在深入的访谈中，布林德尔女士解释说，她认为参加唱诗班很好，有如下几个原因：

因为这样她就会有事情做，而且可以和其他孩子在一起，这比待在家里闲得发慌让她感觉好多了……你知道，唱诗班给她带来了很多快乐，让她有事可做。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布林德尔女士不仅给予卡蒂口头上的支持。她还特地到商店去给卡蒂买了一件唱诗班在节假日表演时穿的黑裙子，虽然她原可以用这些钱来买很多其他生活必需品。[12] 布林德尔女士没有做的，是她没有像中产阶级母亲那样把女儿喜欢唱歌的爱好看成一种可以培养成正式才能的信号。布林德尔女士不去谈论卡蒂对戏剧表演的兴趣，也并不为自己没钱培养女儿的天分而表示遗憾。相反，她把卡蒂的技能和兴趣看成性格特征——唱歌和表演就是卡蒂与众不同的个性。她把卡蒂表演的节目看做是“可爱的”，并认为卡蒂用这些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她认为别人对卡蒂说她演得很好可能会给卡蒂更多的自信，但她并不认为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还包括开发卡蒂崭露的才华。

家里并不强调给卡蒂提供能让她进一步开发创造力的材料。而且，因为家境困难的孩子拥有的东西相对较少，临时找东西代替来充当道具是常有的现象。比如，卡蒂喜欢玩的那些临对道具都堆在阿婆家，她自己家里什么也没有。中产阶级家庭常常有几乎用不完的纸张、彩铅笔、水笔和各式各样小孩子用的手工工具。布林德尔家却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连一根尺子或一杆水笔都没有。任何种类的纸张都很紧缺。卡蒂用从单元楼附近的垃圾桶里捡来的干净硬纸壳做了一片雪花。她把雪花送给妈妈的时候，她妈妈只说：“冬天就快要过去了。”她并没有赞扬卡蒂，也没有对卡蒂的聪明才干和创造力给以任何评价。布林德尔女士把卡蒂的创作成果看做是卡蒂的功课，与她本人无关。因此，当卡蒂请她帮助用厚纸板建造娃娃屋时，她就随随便便地拒绝了，并且没有感到一点内疚。

同样的，布林德尔女士也不认为梅尔梅尔需要任何特别的帮助或是玩具。她看着梅尔梅尔用敲咖啡桌、在地上打滚、或戳詹纳的小狗来自娱自乐，却不觉得这些和让孩子玩“适合于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玩具有什么差别。梅尔梅尔的这类玩具都整齐地堆放在一个壁橱里，有特殊的时节才可以拿出来玩。

当然了，布林德尔女士生活中的很多重担都使得她无法去细微地关注卡蒂的业余爱好。经济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她大女儿的身体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尽管这些问题都很严重，但是它们只是布林德尔女士所采取的儿童教养方式的一部分原因。即使没有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卡蒂的妈妈很可能也不会太多地改变自己对女儿的天赋的看法，也不会改变她对卡蒂努力得到大人关注所作出的反应。她尽力去满足孩子们的基本需求。为了照顾她的大女儿，她愿意卖掉自己的财产，搬到千里之外的加州。她喜欢看卡蒂和艾米还有梅尔梅尔开心地随着公交车的节奏摆动。但她并不认为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在她的职责范围之内。总之，她认为孩子的玩耍是孩子的事情。

讨论

在观察中我们发现，对于经济资源最有限的家庭来说，完成生活中简单的事务都比其他家庭更困难。所以贫困的母亲比工人阶级的母亲面临更多的经济压力。在这两个社会阶层中，孩子们都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家中经济资源的限制。当别人少给了妈妈食品券的时候，卡蒂看起来很担心，她在阿婆家也尽量不要吃的，即使饿了也不说出来。在布林德尔家，冰箱里每个月有一两次空空如也是常有的事。虽然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都面对着强大的经济约束，但是贫困家庭受到的打击则要更大。在贫困家庭中，像布林德尔家这样的一些人家，在生活上比其他贫困家庭有更多的困难。同样，像卡蒂·布林德尔这样的孩子，和其他孩子相比，因为受到过性虐待也要面对更多的人生困苦。[13] 因此，在大的社会地位类别里，个体之间在个人经历上也存在着差异。

开始做这项调研的时候，我曾预期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之间在教养孩子的策略上会有显著的差别。事实却并非如此。就像泰雷克·泰勒一样，卡蒂·布林德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拘形式的玩耍中度过的，两个孩子都到外面和邻居家的孩子玩，都会在单元楼外的停车场上游戏，也都会和自己亲表的孩子一起玩。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里，家长们看起来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孩子的衣食住行和经济资源匮乏带来的影响上。从另一个稍有不同的思路上来讲，与亲戚之间丰富而深厚的纽带既带来了快乐又带来了责任，也需要成年人投入精力去关注。这些因素都让家长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同时也界定了孩子生活的局限性。然而，在这些界限之内，孩子们却又得到了很多的自由（尤其是和有支持经济的孩子相比）。家长似乎相信孩子会自然而然地茁壮成长，而不需要特殊的玩具和课程——这些东西可能会让孩子很高兴，但是在这些家长的眼里，它们并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孩子和大人各有各的圈子，互不相干。

这种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也有它的优势。对家长来说，这样的生活比中产阶级的麻烦更少，步调也更闲散。孩子的活动不会控制家长的时间。平时的傍晚和周末也没有安排，不会急匆匆地赶到孩子的活动地点又急匆匆地赶回家。家长们也不会把本来就有限的资金花在给孩子交课外活动报名费上。孩子们看上去更放松也更有活力。他们不会那么疲劳，也不那么沉闷或是感觉无聊。他们玩起来很投入，看起来真的很开心。而且，由于他们通常自己掌握自己的游戏，孩子们想换一个游戏玩的话马上就可以换——这也是常有的事。没有像下一章中在亚历山大·威廉斯身上发生的像其父母那样毫不留情地逼着他不停地学习，孩子们在家里也不会还有如同在学校里一样的经历。

第二部分 语言的运用

词语是人类体验的零件和组成部分。但是各种社会言语模式（各个

社会阶层在言谈中所使用的词汇和句法）之间却有着重要的差异。一些研究人员，特别是雪莉·布赖斯·希思（Shirley Brice Heath）发现，不同的父母在是否把（还不会说话的）婴幼儿当做潜在的交谈同伴上存在着不同之处。有些母亲和婴儿交流的时候就像是在和他们对话："好了，好了，这样感觉就舒服多了是吧？"（停顿）"你现在想小睡一会儿了吗？"（停顿）小孩在生命的这个阶段还不能够回答母亲的问题，但是等他们慢慢学会说话，他们就会把自己看做是与成年人交流的同伴。不过在其他家庭里，希思发现，家长们虽然会谈论自己的孩子，但却不把婴幼儿看成可以与之交流的聊天伙伴。希思认为，这些社会语言学风格策略上的差别，与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有很重大的关联。

在这一部分中我将展示，调研中这些家庭里的孩子们，也在父母的教养下学会了使用不同的语言。有些家庭甚至就是为了培养语言能力而使用语言——特别是亚历山大·威廉斯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虽然他们已经很富有了，但还属于中产阶级）。他们由内在本然的愉悦感使然，就是喜欢语言本身。他们讨论词语的众多含义。父母用语言作为管教孩子的关键性机制。这种方式常常导致日常家庭生活中大量的谈判磋商、讨价还价和牢骚抱怨。但是这种方式也让亚历山大获得了巨大的词汇量和娴熟的语言交流能力。对于其他家庭来说，特别是哈罗德·麦卡利斯特的贫困黑人家庭，语言的使用则更具实用性。家庭成员能够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偏好，就像哈罗德在和父亲一起购物时很坚决地拒绝买一条桃红色的毛巾那样，但是他们却只用了很少的言词来达到目的。这些家长在与孩子交流时会使用指令性的语言，而不是进行大量的磋商；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会用体罚来进行威胁。这种做法的一个后果就是，孩子们很少（甚至根本不会）和家长犟嘴。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牢骚抱怨，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却很少见。尽管如此，由于语言交流常常会增大词汇量以及强化其他重要的阅读技能，在家里面使用语言的方式不同，也就造成了孩子们从学校教育中受益程度的不平等。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还在与成年人的商谈上获得了较少的经验，而这一技能很有可能会在他们日后与公共机构打交道时派上用场。

[1] C.Wright Mills，The Socrological Imagination。

[2] 虽然布林德尔家过去经常搬家（詹纳只念到十年级，但却先后在20所不同的学校就读），他们已经在现在的住处居住了两年多，卡蒂在同一所小学里读了四年书。

[3] 虽然那个人从来没有被发现，但是布林德尔女士怀疑是他们以前住过的单元楼里的一个邻居所为。那名男子是卡蒂一个玩伴的父亲。

[4] 约翰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能工作；赖安不识字，但他有工作。

[5] 与经济状况类似的黑人家庭不同，布林德尔一家住的地方有各种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总之，就像Massey和Denton在American Apartheid中所示，贫困的白人家庭并不像黑人家庭那样经历同样超高的种族隔离。

[6] 对贫困母亲如何在购买食品杂物时平衡收支的讨论，参见Marjorie DeVault的Feeding theFamily，特别是有关“日杂”那一章。

[7] 她对卡蒂没有那么直白，但是，她们之间也有特别的充满深情的仪式性惯行。例如，当卡蒂不在家时（通常她都是在外祖母家），她会给妈妈打电话，布林德尔女士会用充满爱和温暖的口吻说“我爱你”和“我也想你”。此外，她和卡蒂之间还形成了一个礼节，这样她们告别的时候就不会太依依不舍。她们一起数到三，“好，一、二、三”然后一起在同一时间挂上电话。布林德尔女士解释说：“[卡蒂]不喜欢挂电话，所以我们一起数数。”

[8] 中产阶级家长尤其会在孩子要求他们当观众的时候停下来看孩子表演。虽然有的家长会让孩子稍微等一下，暂时延迟一下表演开始的时间，但是很少有家长会拒绝孩子的要求。

[9] 卡蒂应邀表演哭鼻子的时候的确能抓住成年人的注意力：“[卡蒂]绷紧了脸，开始假装啜泣；她——以一种激动而有说服力的方式——开始疯狂地抓自己的头发，她整个人都趴在了沙发上，啜泣声也更大了。”这一小段表演招致了成年人的一些评论，但这些评论并不是为了培养卡蒂的天赋而发表的：“演得不错啊——尤其是手和头发。”……[她妈妈说，]“是呀，她在那里演得真的很到位。”（约翰叔叔走了进来，继续对卡蒂的表演视若无睹。）对孩子把成年人而非小孩看做恰当的交谈对象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Shirley Brice Heath，Ways with Words。

[10] 在一个电视几乎永远开着并且人们只是不经意地看上两眼的场景里，艾米的这种行为看起来是为得到祖母的注意而作出的努力。祖母看起来也不认为艾米的行为是对她的不尊重。

[11] 没有人看她们让我很吃惊。我有时会坐在地上伸长了脖子四处看孩子们玩耍。

[12] 她建议卡蒂用她过生日时得到的钱来买黑色的鞋，凑齐这套衣服。

[13] 由于他们的儿童教养惯行有时候违反盛行的标准，这一家尤其有可能受到州政府的干预。正如我在附录一中作的简短讨论，我和实地调研人员感到，与其他家庭相比，访察这一家要更加困难。

第六章 发展孩子的能力：亚历山大·威廉斯

> 我们驶入帕克巷的时候，[威廉斯女士]低声对亚历克斯（亚历山大的昵称）说："亚历山大，你得想想要问医生什么问题了。你什么都可以问他的。别不好意思，你真的什么都能问。"亚历克斯想了一分钟，然后说："我用了除臭剂之后腋下就出现了几个肿块。"（妈妈说：）"真的吗？你是说用了新的除臭剂之后？"亚历克斯："是呀。"[威廉斯女士：]"嗯，你应该问问医生。"

在一座东北部的主要城市里有一片安静的以黑人住户为主的中产阶级居民区，小区里坐落着很多宽敞而古雅的石砌房子，房子前后有敞亮的门廊和宽阔的绿地。亚历山大家就住在这样一所有六间卧室的房子里。他是一对非裔夫妇唯一的孩子。他的父母，克里斯蒂娜·奈尔（Christina Nile）和特里·威廉斯（Terry Williams），当年是在南方一所以白人为主的小型教会学校相识的。他们结婚十年之后才有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母亲在单位用她的娘家姓奈尔，但是在教会里大家都叫她威廉斯太太。威廉斯女士高高的个子，蜜铜色的皮肤上有一些雀斑，黑黑的头发打着波浪，是个积极快乐，充满活力的人。她从一所精英高校取得了文科硕士学位，并在一个大公司做高层管理人员。她的办公室在写字楼的一角，有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译者按：有窗的办公室是职位高的体现），还有一名私人秘书，她的工作职责包括监管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办事处。她发现自己很难在6：00准时下班，因为"那时西海岸那边的工作才刚刚热好身"。她知道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她会更投人地工作。虽然她力图把出差时闻限制在白天，但她每月还是至少会有一次必须在外面过夜。

亚历山大的父亲特里·威廉斯又高又瘦，身材笔挺，做派严肃。工作日中，他经常身着正式的深色西服套装，里面是一件熨烫工整的白色衬衫和一条稳健保守的领带。在全家出游或是等待亚历山大的活动开始时，他经常会聚精会神地读报纸，但他也会偶尔聊几句天，讲几句带有讽刺意味的笑话。他常说亚历克斯很"英俊"，还很亲热地拨拢他儿子的头发。威廉斯先生从一所名声很好的私立大学拿到法律博士学位（译者按：在西方，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要更精英化，是有地位的人上的学校）。他现在一家小型事务所作出庭辩护律师，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主要）处理医疗界玩忽职守的案件。他每月有两个星期要从早上5：00工作到午夜。另两个星期他则要工作到晚上6：00才能下班。

就像威廉斯先生说的，他家里根本不缺"物质享受"。他们夫妇俩的年收入加起来有20万美元。他们很少和孩子提钱的事，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对父母的任何一方说过有什么东西"太贵了"。他家宽敞舒适的房子在1995年时值15万美元，他们开的车是一辆新的米色雷克萨斯（凌志）。他们的儿子上的是私立学校。威廉斯家布置完美，纤尘不染，家具都很昂贵。在正式的餐厅里，地上铺着厚厚的东方地毯，地毯上摆着一张长长的木餐桌和高高的直靠背椅。旁边摆着一款配套的餐具柜。正式的客厅总是整洁优雅，虽然除了练钢琴之外就很少用到。全家人的大

部分时间都是在敞亮的厨房里度过的。他们有时也会在楼上一间装点成“乡村”风格的家庭活动室里坐一坐。那里有几张蓝白格子的凹背扶手靠椅和一张双人沙发，花环，几只木雕猫，一个大衣柜风格的电视柜，还有以非洲和非裔美国人为主题的油画。屋里还有电视。威廉斯先生偶尔会在这儿看上一场篮球比赛，有时候全家人会一起在这里看《考斯比一家》（The Cosby Show）或《星舰奇航记》（Star Trek）。

亚历山大是个又高又瘦的男孩子——是比他爸爸小一号的翻版——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风度翩翩。他活泼好动，充满好奇心。比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大人说话的时候，他就在厨房里一圈圈地跑，一边跑还一边把手伸到足球队服里，从腹部拱出一个包来。又有一次，他妈妈先让他下车，然后再把车停好，亚历克斯跳着上了台阶，又跳到半空中，想从玻璃窗外往家里看。他的语言也很调皮，常会主动开玩笑或是善意地和父母开玩笑。他妈妈经常强调让小孩子“接触”各种经历的重要性，她对亚历山大对生活的态度深感欣慰：

> 我得承认亚历山大是个让人快乐的孩子。他是老天赐给我的礼物。他是个特别有活力、特别有好奇心、有爱心、关心别人的人，嗯……他很外向，而且，嗯，真的很合群，他喜爱探险，喜欢读书，而且……喜欢做很多有趣的事。

亚历克斯参加了自己所在的私立学校办的课后班，学校离他妈妈的单位很近。[1]他妈妈常和他爸爸一起在傍晚6：00去接他回家。亚历克斯在学校很受同学的欢迎，是个“和谁都合得来的孩子”。他轻而易举地就能带着其他小朋友玩起来。他也是在校内和校外都很忙。有些工作日的晚上，尤其是期末的时候，他要到9：00之后才能回家。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星期中，亚历山大要参加钢琴课、大学唱诗班排练、主日学校，以及棒球和足球训练或比赛。他还经常参加与学校的话剧和音乐会相关的排练。冬天时他参加篮球和室内网球，夏天时他则要参加专门的体育夏令营。

协作培养

亚历克斯的父母完全支持他参加课外活动。和其他中产阶级的家长一样，他们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以配合儿子的需要。威廉斯夫妇把协作培养奉为他们的儿童教养策略。他们把亚历山大需要参加的活动看做他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外，协作培养还塑造了他们对语言的使用。事实上，商讨事务时大量使用语言，是在我们所观察的所有中产阶级家庭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模式，也是这一章的特别焦点。培养孩子的天赋和才能，是中产阶级家长所付出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历山大家，就像在其他中产阶级家庭中一样，总是能听到泉涌不息的说话声，静默只是打断话流的小插曲（这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氛围截然不同，在那些家庭中言语是不时打断静默的小插曲）。说话在知识和见地上培养了孩子的发展。中产阶级孩子从中学会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像在这一章的开头威廉斯女士鼓励亚历克斯提前

准备问医生问题时那样。讲道理也是中产阶级家庭严明纪律引导孩子的中流砥柱。最后，在家里注重使用说理还能带来广泛的受益。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对话能提升孩子的词汇量，预习或深化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并能帮孩子熟悉在课堂上及其他与成年人打交道的机关场景中经常会碰到的语言交流方式。[2]

然而，协作培养在这方面的益处又超乎于丰富学习内容。学校要求孩子们懂得如何以理服人，医生更愿意病人能够见多识广，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3] 由于中产阶级的孩子与成年人在面对面时把自己摆在了同等或平等的地位，他们常常会对周围的成年人作出评判。我们观察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家长，包括威廉斯夫妇，都对这些评判报以讽刺性的幽默而不是愤怒。总的来说，中产阶级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很特别，觉得自己的意见很重要，觉得成年人依照惯例就应该调整各种境遇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此，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一个利益所在就是传承超常的语言能力，让孩子能够向掌权的人提出特定的要求。这一章提供了一些实例，描述了亚历山大运用自己的说理技能库向成年人（家长和医生）提出要求从而获得了量身定做的收益。[4] 然而，同样是这些技能，也可能会造成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要跟家长据理力争，让家庭生活疲惫不堪。这些被家长大肆鼓励的技能，可能也肯定会导致孩子挑战或拒绝父母的权威。

在他们所有的日常商讨中，威廉斯女士在把握教育机会方面眼光很是敏锐。比如，就像我下面要表述的，虽然她在寻找丈夫的车时有点心烦，但她还是挤进了一次短小的数学课，其结果就是，亚历山大通过学习有了很强的语言能力。他能够在说理和磋商时运用丰富的词汇，从而达到具体的目标。这种用语言作为工具的能力是一种以社会地位为基础的重要利益。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中产阶级孩子，练习自己初生的语言技巧来“定做”某些境遇，并以此得到利益。

发展亚历山大的能力

威廉斯家的生活步调和节奏都是围绕亚历山大的日程安排建立的。亚历山大和他的父母都不认为他参加各种活动有什么问题。威廉斯先生和太太把儿子的活动看做是培养他才干和技能的方法。亚历山大认为这些活动很好玩，可以让他的生活不再单调乏味。他自己要求参加某些活动，还主动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来玩。虽然他参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并没有占据亚历山大的全部空闲时间。尽管如此，本章将明示，他的日程安排是由一系列的最后期限来确定的，这些日程表相互交织，充满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活动；而所有这些都是由成年人掌控的，孩子并不能做主。

日常生活的组织安排

亚历山大在工作日和周末都有很多活动。例如，周六早上很早，亚历山大就要到离家开车有二十分钟的地方去上钢琴课。

> [钢琴课] 8：15就开始。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是坚决反对周六早上看电视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嗯……要么就是周六早上得留在家里为看哪个频道而争论不休（笑），要么就出去做点有意义的事……这样8：15我们就能开始这一天，完成一些事情……现在周六早上都排满了。你知道，钢琴课，然后直接到唱诗班练两个小时。所以，他的日程安排得很紧。

威廉斯女士之所以坚决反对看电视，是因为她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了亚历山大茁壮成长所需要的教育上。她反对看电视的被动性，也反对“周六早上的大多数电视节目都对智力发展没有任何好处”这一事实。她觉得自己有义务把儿子带出家门去培养他的才能。

有时候亚历山大也会抱怨说：“我妈妈让我参加所有的活动！”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喜欢这些活动的。他说参加这些活动让他觉得很“特别”，而且要是没有这些活动的话，生活就会变得很“没劲”。他的时间感完全和这些活动交织在了一起，如果他的日程没有排满的话，他就会茫然无措。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可以从下面一段在全家从返校夜回来时的实地笔录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威廉斯女士第二天不得不因公出差（往返各要坐两个小时的火车），直到深夜才能回到家里。亚历山大因为第二天没有安排任何活动而一脸的不高兴。他想叫一个朋友来玩，但他妈妈回绝了他的要求。他一边抱怨一边大声地问他还有什么事可做。他妈妈简单明了地说：

> “你有钢琴和吉他。你会有一些空闲时间。（停顿）我想你这一晚能自娱自乐。”亚历山大没有回应，但是看起来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后面一路上他都很安静。

亚历山大的父母都相信，亚历山大参加的活动对他的发展很重要。他们认为这些活动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好处。在讨论亚历山大的钢琴课时，威廉斯先生提示说，由于学习了铃木教学法[5]，亚历山大已经能够识别五线谱了。他认为音乐训练很有益：

> 我不懂巴洛克的古典音乐，而他却懂得。这在他今后的人生中怎么不会有好处呢？我坚信这种丰富的经历能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好的公民，更好的丈夫和更好的父亲——肯定会是一个更好的学生。

威廉斯女士认为音乐帮她儿子建立了“自信心”和“镇定自若的能力”。在访谈和闲谈中，她经常强调“耳濡目染”这个观念。她解释说，她认为拓宽亚历山大的人生视野是自己的责任，就像路易丝和唐·塔林格尽力拓宽加勒特的视野一样。威廉斯女士把童年时代的活动看做孩子学习人生中重要技能的所在：

> 体育运动提供了学习如何竞争的大好机会。学习如何接受挫折。学习如何以高尚的姿态接受胜利。而且，体育还给了他学习领导技能和团队精神的机会。那些……体育运动的确提供了很多真实的很好的机会。

亚历山大的活动经常变换；随着新赛季的开始，一些活动逐渐结束而另一些活动又开始了。由于体育训练和比赛的日程安排要在赛季刚刚开始时才公布，提前作计划基本上不可能。仅就活动数量而言，有些活动就会不可避免地和其他活动有时间冲突。有些活动虽然是短期的，但每次却要花费极其多的时间。比如，亚历山大学校的剧团要求在演出前的一个星期排练三个晚上。最后，因为他父母再也无法调整自己的工作日程，时间方面的限制还会让亚历山大不得不退出一些活动。例如，威廉斯先生解释说，亚历山大的足球踢得很好，足以获得加入巡回赛队的资格，但是他们却无法给他注册，因为威廉斯先生不能太早提前下班送他到外州去参加比赛。

参加有组织的体育运动远远不止给了中产阶级孩子一个宣泄剩余精力的途径或是发展体能的机会。亚历克斯所在的地区有很多足球队，虽然队员都是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却是根据能力排名的。有“甲级”队，“乙级”队，还有明星队。孩子们的运动技巧经常在公开场合按两项水准接受测试——他们在任意一次比赛中的表现，和他们在某个特定球队的影响力。和调研中的其他中产阶级孩子一样，亚历山大看起来并不为在公共场合表现自己的能力而感到不自在——无论是踢球还是演奏莫扎特的曲子。实际上，他似乎很喜欢表演。根据一条实地笔录，在一次有二百多位观众的音乐汇报演出上表演了独奏之后，他看上去“泰然自若，甚是得意，意识到自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社会关系

威廉斯夫妇二人都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大家庭联系十分紧密。威廉斯女士的父亲是牧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她在南部一座中型城市中长大。八个兄弟姐妹都是大学毕业。威廉斯女士说，虽然她住得离家很远，但是感觉却很切近。她每天都和母亲通电话，每年去看父母三到四次。其中有两次她会带上亚历山大，让他看看姥姥姥爷。威廉斯先生是家中九个孩子里最年长的，他在南部一个小城市里长大。他母亲曾做过家政服务，后来又做过厨师，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父亲和他的继父（两人都已去世）都在文法学校受过（高中）教育并干过体力活。威廉斯先生和他母亲每周通话一次，每年去看她两次。他每月给她寄大约500美元，还帮一个侄女付大学学费。

因为几百英里之内亚历山大都没有表兄弟姐妹，通常他每日的休闲并不包括和表亲的孩子一起玩。他也不常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玩。和他住在同一条街上的这些大房子的主人大多是没有孩子的夫妇。亚历山大的大多数玩伴都是自己在学校的同学或是在参加有组织的活动时认识的同伴。他参加的绝大多数活动，像校内活动、教堂活动、足球比赛、唱诗班、钢琴课、棒球比赛和其他活动，都是按年龄（有时也按性别）组织的，因此，亚历山大基本上完全和与自己一样大小的孩子，通常是男孩子，相互交流。

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亚历克斯众多的活动让他本来就很忙的父母变得更加忙碌。他妈妈总是以一种幽雅得体又亲切和蔼的方式应对这些需求。威廉斯先生则有时会抱怨孩子的活动太耽误时间了。他通常会带张报纸，在学校汇演开始前一边等一边读报，他在去观看活动的路上在车的后座上读报（亚历山大坐在前排）；有时候在足球训练中他还在分类处理信件。这种夫妻之间的分歧在我们所观察的家长中是十分典型的，妈妈看起来总是比爸爸对孩子的活动显得更投入。通常妈妈们还会在辅助活动中比爸爸们更积极，比如，亚历山大的少年教会唱诗班有个“家长组”，就只有母亲们去参加。

威廉斯先生的工作时间很长，所以他周末常常会很疲劳。从一个预定的活动跑到另一个预定的活动让他很是厌倦。有一个星期天，在全家匆匆由教堂跑到棒球训练再跑到学校剧团的时候，他反思着这种在所谓休息日还要颠簸往返的嘲弄意味，说道：“周日下午的休闲日程，是吧，哈？”

除了让人感到疲惫不堪，亚历山大的活动还让他父母之间在劳动分工上产生了紧张感。他们两人分别在不同的访谈中谈到此事。威廉斯先生觉得在照顾亚历山大这方面他均等地分担了（50%的）劳动。他的夫人则报告说，在体力劳动上两人是六四开，而在劳心费神这方面则是85%对15%。威廉斯先生不认为亚历山大的活动给他夫人的事业带来了什么影响。对此她表示不同意。威廉斯女士说，她有意自觉地选择把儿子摆在“优先”的地位。虽然她很坚定地承认自己这个决定给了她无尽的回报，但是她也不太情愿地报告说，她的这个选择也要求自己在事业上作出“一些牺牲”。此外，在亚历山大的喜好应该在全家的社交空间里占多大比例这个问题上，威廉斯夫妇有时也有分歧。比如，七月的一个下午，一家人出去跑一些杂事。他们要带亚历山大去理发，给车加油，去食品杂货店购买一周的所需，然后晚餐叫中餐外卖。亚历山大有盘磁带（题为“在美国钓蛙鱼”），上面都是他喜欢听的歌。其中有一首叫“煮沸的秋葵和菠菜”，歌手唱道，他宁愿吃“鼻涕狃”。亚历克斯跟着磁带一起唱，亚历克斯、他妈妈和调研人员听到歌词都笑了。而威廉斯先生却没有笑，虽然他有一次也参与了对一首歌题目的讨论。后来，他明确地表示他听烦了，想把它关掉。他夫人则坚持要听，建议他说，“你会越听越喜欢的”。他没有再说话，只是躲到一旁去看报纸。

威廉斯夫妇还会定期在亚历山大的日程安排上产生分歧。在最后一次访谈中，威廉斯先生表达了他对亚历山大参加两个唱诗班的不悦。他似乎担心参加两个唱诗班会妨碍儿子正在发育中的阳刚之气。最终，亚历山大的确退出了一个唱诗班（而且马上注册了一个周五晚上的篮球队）。大体上，威廉斯先生看起来比威廉斯女士要显得更劳累更疲惫。和他夫人相比，他似乎从亚历山大的每项活动中都得到更少的愉悦感。尽管如此，他们二人都十分热衷于让亚历山大广泛地接触各种活动。威

廉斯夫妇都意识到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带亚历山大参加活动上了。然而他们却强调自己也保留了很多时间。他们评论说，全家也选择了不去参加某些活动（例如巡回足球队）。事实上，与调研中其他中产阶级孩子参加的活动相比，亚历山大的活动确实没有多少要求他们旅行的。例如，像加勒特·塔林格，全家常常要开（往返）九十分钟的车去参加足球比赛。

说呀说呀说：中产阶级家庭中语言运用的重要性

威廉斯一家人很轻松自如地分享欢笑、言谈和关爱。虽然我们听到过父母很严厉地和亚历山大说话，但却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对他大吼大叫，也从未见过他们使用体罚。相反，我们观察到，他们重复不断地、系统又果断地使用口头协商来指导亚历山大应对他生活中出现的挑战。就像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注意到的那样，中产阶级父母并不使用基于家庭地位（例如，作为家长的地位）的权威力，而是更情愿对孩子使用更人性化的商讨的交流方式。[6] 他们使用讲道理的方式来促成期望从孩子身上看到的行为，而且他们还经常会对孩子解释为什么要他们这么做。

更概括地说，威廉斯夫妇看来经常和亚历山大交谈，促进他发展说理和谈判的技巧。下面一段摘录描述了亚历山大在从夏令营回家的路上与妈妈的一段对话。这段摘录捕捉到了威廉斯女士经常问儿子的那些有的放矢的问题。

> 她一边开车一边问亚历克斯："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亚历克斯："还行。我们今天吃了热狗，但是里面都烤焦了！都黑了！"克里斯蒂娜："嗬，老天，你根本不该吃那些热狗的。"亚历克斯："倒也没有那么焦，只有一半是焦的。另一半还是好的。"克里斯蒂娜："噢，那还凑合。你们今天早上玩的是什么游戏呀？"亚历克斯："是个叫'你干吗呢？'的游戏。"克里斯蒂娜："怎么玩呢？"

在这次交谈中，威廉斯女士并不仅仅是在引亚历克斯讲出一些信息。她还给了他发展练习口头表达能力的机会，包括如何总结、突出重要的细节、澄清事实，以及展开信息。

这种对孩子活动所表现出的关注，经常导致在细小的家居琐事上也要反复商量。例如，同样是在那次回家的路上，亚历山大的妈妈试图调整晚饭的菜单以更适合儿子的口味。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母亲都像威廉斯女士这样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一个母亲总想和孩子商量。但说理和通融的模式通常都是很普遍的。与此相仿，虽然主动提出对食物的偏好或想要决定全家晚餐吃什么在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中很少见，但对中产阶级孩子来说却是经常如此。

有时候，以民主的形式养育孩子在威廉斯家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威廉斯先生在是否参加本次调研这件事上就没有在票数上胜出（二比一）。又有一次，威廉斯先生提议大家投票选择绕开塞车的最佳路线。但是，尤其是在健康和安全问题上，威廉斯夫妇更趋向于用指令取代讨

论和说理。在这些时候，他们会告诉亚历克斯他们要他怎么做，正如下面这段实地笔录描述的：

克里斯蒂娜给亚历克斯盛好饭，并把沙拉放进每个人的盘子里。她和亚历克斯争论着要不要吃青豆。亚历克斯："妈妈，我不想要那些东西。太难吃了！"克里斯蒂娜用一种锐利又生气的声音说道："亚历山大，我不会给你很多的，但是你得吃青豆。"特里在往自己的盘子里盛菜，并没有看着他们。亚历克斯吭唧着说："嗯，就只能给我四根，太难吃了。"克里斯蒂娜没有回答。她在他的盘子里放了六根青豆。

对威廉斯先生来说，做一个称职的运动员似乎与健康和安全同等重要。因此，在冬季篮球赛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对亚历克斯喊：

"亚历山大，盯住你的对手。""把手举高点儿，亚历克斯！""投篮！别站在那儿！""亚历克斯，放手上篮！"亚历山大是个水平中等偏下的球员。他看到父亲朝他喊话，变得更加紧张，动作也更不协调了。亚历克斯投球得了四分，挡了对方两个球。最后成绩是34比8。[7]

赛后他们一起捎另一个孩子回家，威廉斯先生给他们上了一课：

他一边说，一边不时扫视着后视镜。"丹尼，你和亚历山大一定得多上篮。我简直数不过来你们有多少次把球带到了篮下，却又丢给了别人。看上去简直就像你们不敢投篮一样。"

亚历克斯加入到谈话中，试图表明自己的观点。他爸爸并不接受他的观点。

亚历克斯自夸地打断他爸爸说："我打了两个篮板球。"特里回答说："要是你每次有机会上篮的时候你都把球投出去的话，你打的篮板球就会比这次多得多。"亚历克斯看上去很是失落，一路上坐在那里没有讲话。特里继续说道："像你老爸当初，我们的问题跟你们正好相反：所有的人都想成为球星，都想投球，你根本就拦不住。而你们几个却害怕投篮。"

然而，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截然不同的是，即使在威廉斯夫妇下达指令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会解释为什么会要求孩子这样做。在下面这个例子里，威廉斯女士正在提醒儿子要注意听老师讲课：

你们冲洗胶片的时候，我要求你对斯科特太太讲的话要听得特别仔细。那些化学试剂都非常危险。不要在教室里玩耍打闹。不然有可能会把那些东西溅到眼睛里。而且如果吞下去的话，会死掉的。

亚历克斯却认为妈妈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他决定忽略妈妈的指示，并教给她正确的东西：

亚历克斯纠正她说："斯科特太太告诉我们，我们不小心吞下去也不会死的。但是我们会生很严重的病，而且得洗胃。"克里斯蒂娜并没有继续和儿子争论下去。她只是重申自己的要求，让儿子一定小心。

很有可能因为此处涉及安全问题，所以威廉斯女士没有鼓励亚历克斯多

讲话。否则如果话题没有这么紧要的话，她是会给儿子商量的余地的。就此，她重申了自己的指令，而且，还着重要求亚历克斯一定照指令去做。

又有一次，当威廉斯一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每个人都对（反对）意见提出了一个理由：

> 特里低头看着亚历克斯边笑边说：“如果你不吃青菜的话，怎么能打得过弗里茨呢？”亚历克斯用叉子叉起一根青豆，摇着头说：“我才不和他打呢！”特里得意地笑道：“你要像其他小朋友那样任他欺负吗？”亚历克斯看看他的父亲又看看自己的盘子：“如果我没辙了才会和他打架，但我首先会告诉老师，把他停课审查。”
>
> 克里斯蒂娜面带微笑地看着亚历克斯：“这就对啦，宝贝儿。你不用动武。要解决冲突有很多更好的办法。如果有人骚扰你，你就告诉老师。”
>
> 特里看着亚历克斯，坚决地说：“总会有那么几次你来不及跑掉的，那时候你就不得不跟他打一架。到时候你就不得不站出来保护自己。”

总之，威廉斯夫妇和其他中产阶级家长都经常用语言来愉悦心情，用语言来谋求利益。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比如，一月的一个傍晚，亚历山大被一项作业难倒了，这个作业要求写出五个谜语。他和妈妈以及一位调研人员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威廉斯先生背对着大家，在洗碗池子旁边洗碗。他并没有转过身，只对亚历克斯说：“你干吗不到三楼去从那些书里翻出一本，看看那里有没有谜语呢？”

> 亚历克斯笑着[说]：“对呀，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我要到楼上去从那些书里抄一条。”特里手里拿着一个盘子，转过身，“那只是个玩笑——不是一个正当的建议。不能从书上抄。”他一边笑一边转回身面对洗碗池子。克里斯蒂娜看着亚历克斯说：“你知道吗，还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行为，叫做剽窃。”特里（没有转身）说：“人家有可能会以剽窃罪控告你呢。你知道吗？”亚历克斯：“那只是在抄袭的内容是有版权的时候。”他们几个都不约而同地开始谈论起来。[8]

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历克斯假装误解了他父亲的口授，把参考图书从而受到启发扭曲成了抄袭剽窃，高高兴兴地（虽然还是很温柔地）引父亲上钩。威廉斯先生老老实实地钻入了他的圈套。威廉斯女士通过向亚历山大引介一个新的词汇而重新塑造了这一轻松时刻。威廉斯先生又进一步把这个新词汇与一个法律后果联系起来。亚历克斯把他们两个的戏都给抢了。他展示出自己已经大体上熟悉“剽窃”这个概念，而且他还了解“版权”的概念。

威廉斯一家人还经常很轻易地把科技术语和医学术语混杂在日常闲谈中。当一名调研人员陪亚历克斯一起到足球场去并提到孩子的咳嗽声音很低沉时，亚历克斯评论说：“我对青草过敏，”然后他又用一个很专业的词汇补充说：“对，还有叶霉病菌。”两位家长还认为发展孩子初生的政治意识也十分重要。他们每星期天参加的非裔浸信教会包括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布道，例如国债、福利政策和扶贫项目。他们还在晚饭时和他讨论政治问题，包括国内的新闻动态，例如，南部非裔美国人教堂发生的破坏性火灾。

最后，我们观察到，亚历克斯和他的父母以及其他中产阶级家庭都运用说理和商讨的方式达到具体的目的。比如，中产阶级家长并不会给孩子下达命令或指示，而是会给孩子一些“选择”的余地来作出决定。不

过，这些家长会不加张扬地引导孩子到他们觉得更好的选择。例如，在选择快餐或暑假书目时，威廉斯女士会问亚历山大他想要什么，然后又会给出一两个自己认为最适合的选项。亚历山大常常感觉自己在作出自己的决定，而实际上他却已经接受了妈妈的建议。

总之，致力于协作培养的策略有时会让家长身心俱疲，然而这却并没有削减这种儿童教养方式对中产阶级父母的吸引力。对威廉斯夫妇来说，他们最优先考虑的就是，有准备有意识地作出努力，用他们相信能最大限度发展儿子人生潜力的方法来养育他。在这方面，他们和我们调研中的其他中产阶级家长一样，包括加勒特·塔林格的家长。然而，作为中产阶级黑人家长，他们认为自己还有一项同等重要的职责，那就是为亚历山大准备好那些能帮他成长为一名美国黑人男子所需的众多经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家庭教育的这个方面。

种族的角色

威廉斯夫妇都十分关注种族给亚历山大带来的影响。他们严密地监控他的经历。他们的行为和调研中其他非裔中产阶级家长十分相似。[9]威廉斯先生解释了他和他的夫人是如何指导儿子的：

> 我们试图做到的，就是教给亚历山大这个很令人遗憾的事实：种族是我国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是说，人们看到别人时总是最先看到他的肤色。但这并不能定义他是谁……亚历山大会成功的，尽管有种族歧视存在。而且我认为他在生活中也会成功。我是说，他是那样一个惊世骇俗、令人耳目一新的个体。嗯，他不断吸引着别人……他就是——他很轻松地就能交上朋友，我真为他高兴。

然而，威廉斯夫妇都坚决认为种族问题并不是人生失败的“借口”：

> 我们讨论种族如何影响我作为一名律师的生活，我们还讨论种族会如何影响他的生活。他从这些讨论中学到的道理就是，他永远不能用种族歧视作借口来为自己没有尽全力而开脱。

威廉斯女士评论说，有时种族问题会影响到他们对让亚历克斯参加哪项活动的讨论。在给儿子报名前，她会监控每项活动的种族比例。

> 我们一直都很谨慎，不让他在只有自己一个黑人孩子的情形下参加活动。我们一直对此都十分谨慎。那样不仅对他不公平，而且我们也一直都很小心，让他能够和一个小组的人都合得来……就说那些白人孩子的家长吧……嗯，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这么说——但我爸爸曾经说过——那些家长必须得有涵养。你知道，他们必须得接触过各种类型的人，而且还得以一种积极正面的方式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注意这里威廉斯女士关心的重点反映了两个不同的目标。她不愿让亚历山大在任何一个活动中是唯一的一个黑人孩子。在这方面她也好像很成功。我们观察到亚历山大参加的所有活动都是如此，钢琴、足球、吉他、唱诗班、棒球、篮球和学校话剧团——其中他是仅有的几个黑人孩

子中的一个，但从来不是唯一的一个。在学校里，他所在的年级约有10%的黑人。他的朋友里既有黑人孩子也有白人孩子。他家参加的浸会教堂中的所有成员都是中产阶级黑人。威廉斯女士的第二个目标是，同他儿子交往的白人都是有“涵养”的人，这一点比较难以评估。然而对威廉斯女士来说，这并不能减少其重要性。在一次访谈中，她讲述了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亚历山大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生日派对，威廉斯夫妇对那个孩子的家人并不熟悉。他因临时看管他的人罗斯而受到邀请。有时候，在罗斯看其他家的小孩时，亚历山大也会和她在一起。这些人家中的一个很小的孩子特别喜欢亚历克斯：

> 那个孩子真的特别喜欢亚历克斯……亚历山大被邀请参加，我想，肯定是他的两岁或三岁生日派对……我们都去了，就是，嗯……那孩子的祖父母也在那里……[在派对当中，]他祖父母一直在说，嗯，“那个孩子好黑啊。”（笑）[他祖父问，]“那是谁家的孩子啊？”唔，我倒还没有必要开口，因为罗斯先替我们鸣不平了。（笑）

这件事更加强了威廉斯女士的信念，她在监控亚历山大参加的活动时“需要特别谨慎”：

> 我们从来都没有过，嗯，像其他家长那样把孩子随便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就走人。我们总是和他一起参与，直到现在我们早上也是要进到学校里面的……去看看……你知道，不是每天，但是，你知道，就是时常进去看看情况到底怎样。

威廉斯夫妇对儿子在学校的经历大体上还是满意的，但是这个学年开始的时候，他们反对过班里（缺乏）种族平衡的现象。[10] 威廉斯先生汇报说：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一年亚历山大是班里唯一的黑人孩子——这可是个很糟糕的计划，因为五年级总共有两个班……其中一个班里有五个（轻声的笑）黑人孩子，而这个班里却只有一个。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我对此提出了极其强烈的反对。

威廉斯夫妇拥有能代表亚历克斯迅速采取行动的优势，因为他们两人都见多识广。他们虽然很赞同学校重视多元文化，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很警觉地密切注视着学校的课程和儿子在学校里的全部经历。这种管控和威廉斯女士小时候她父母对她的管控十分相似。她在南部一座中型城市长大，她上的小学是一所黑人专署学校。她父母的顾虑都集中在教学标准上：

> 他们经常到学校去。他们总是在场的……在教育方面，他们十分担心我们没有学到该学到的东西。我们的老师很出色。我只记得这些了。

九年级的时候，威廉斯女士进入了一所多族裔合校，她父母的忧虑转移了，而且也逐步增加了：

> 那时候，当学校都改成合校时，种族歧视是个更大的忧虑。他们不得不到学校里去查看，确定没有人拿刀子捅我们，或者揪我们的头发，你知道，那些事那时经

常发生。很多那种低劣的事情都发生过。

与此相比，在亚历山大的生活中，公然的种族歧视事件是很少见的，正如他妈妈所承认的这样：

那种状况一直很少很少。我是说，我都能屈指可数。我记得……亚历山大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有个白人小孩对亚历山大和其他黑人小孩说："你们这些人长大之后都只能做收垃圾的。"（她笑了笑）……亚历山大站在那里说："呃，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我爸爸是个律师。"（笑）所以，那个孩子话里暗含的意思并没有让他烦扰。

尽管威廉斯夫妇对种族问题的重要性都很敏感，但在教儿子多元文化的最好方法和最佳时间上，他们却不总是意见一致。威廉斯先生认为她太太采取的是"保护"方式，并对此略感失望。他更喜欢公开谈论种族问题。他努力"提醒"儿子，但他更希望能以一种不像现在那么"肤浅"的方式去做。威廉斯夫妇似乎还对改进种族关系和种族间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持有不同的观点。威廉斯女士是二人中更怀抱希望的一个。

和其他人相比，威廉斯女士更少会去用种族来"解读"一个场景[11]。下面一段对一个事件的描述就展示了这一点。在一个小型的个体五金店里，面对一次潜在的羞辱性的经历，威廉斯女士处理得平心静气，看上去毫无困窘不平之状，和我们派去的年轻非裔男性调研员会作出的反应截然不同：

（店里人很多，有十二三个人在排队）……克里斯蒂娜俯身在柜台旁，手里拿着一支笔，这时，[比她年长的女]收银员拦住了她。"我们已经不收个人支票了。你有信用卡吗？"我们后面有排队的人，还有更多的人从门外进来。（我以为克里斯蒂娜会"发火"的——搁我我一定会的。）

克里斯蒂娜仍然保持着平静……她看着那个女人的眼睛，用一种很自然的声音说："是的，我有信用卡，可是上次我来这里买东西的时候，我就是用个人支票付的。"那个女人也用很自然的声音说："是呀，因为是节假季节，所以我们想尽量限制收到支票的数量。"

我们能听到后面有人在清嗓子。克里斯蒂娜并没有在意。"妈妈，"（亚历克斯摇摇头说）"你不能用。你下了保证不用信用卡的。"克里斯蒂娜已经把支票本收了起来，正在掏着钱包，她从里面拿出一张信用卡来。亚历克斯："咱们去找爸爸吧。"克里斯蒂娜看着亚历克斯，笑了。她把信用卡重新放回卡包里，对售货员说："你能帮我留一下这个雪橇吗？"……等我们朝门口走去时，柜台后面的女人问道："你马上就回来吗？"克里斯蒂娜一边指着外面停着的车一边说："我只是到车里把我先生的信用卡拿来。"克里斯蒂娜微笑着走了出去……（我有点生克里斯蒂娜的气了。那个女人对她如此傲慢，她却没有反应。）

出门的时候，威廉斯女士和调研人员讨论了种族歧视的可能性，但却从未明确地使用"种族歧视"一词：

我们从店里走出来。我问克里斯蒂娜："你觉得刚才那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不收支票呢？"克里斯蒂娜看着街对面特里刚刚停车的地方，淡然地说："我并不那么想……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不想收个人支票。我有个朋友[他告诉我说]有人曾写了一万五千美元的空头支票给他。"亚历克斯："多少？一千五？"克里斯蒂娜环视四周，目光搜寻着特里，说："是一万五。比一千五多十倍。"[12]（在谈话中，威廉斯先生把车停到了店门口。亚历克斯拿到了父亲的一张信用卡。他、他妈妈和调研人员

一起回到店里，把钱付了。）[13]

正如调研人员很清楚地提到的，其他人都很有可能把收银员的行为看做一种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凌辱。[14]但是成廉斯女士却没有。同等重要的是，她还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来转移儿子的注意力。因此，亚历克斯就认为五金店里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他在买雪橇的过程中暂时耽误了一下。就像下面一节所示，威廉斯女士在儿子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像她对种族互动那样倾注了同样谨慎的关注。同样，威廉斯先生也在"发展亚历山大"中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虽然他并没有给予那么持续不变的保护。

形成中的优越信号

威廉斯夫妇和调研中的一些其他中产阶级家长一样，在与专业人员的互动中显得轻松又健谈。他们也希望亚历克斯能有同样的感觉，因此他们教他成为一名见多识广自信果断的客户。夏日一个炎热的午后，威廉斯女士把看医生当做一次机会来指导儿子。在开车去医生办公室的路上，调研人员听到威廉斯女士教亚历山大如何在常规检查中自信地面对医生：

> 我们驶入帕克巷的时候，（威廉斯女士）低声对亚历克斯（亚历山大的昵称）说："亚历山大，你得想想要问医生什么问题了。你什么都可以问他的。别不好意思，你真的什么都能问。"亚历克斯想了一分钟，然后说："我用了除臭剂之后腋下就出现了几个肿块。"（妈妈说：）"真的吗？你是说用了新的除臭剂之后？"亚历克斯："是呀。"[威廉斯女士：]"嗯，你应该问问医生。"

亚历克斯的母亲正在教导儿子，他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想法（例如，"别不好意思"、"你真的什么都能问"）。最重要的是，她在为他示范如何通过提前理清思路来准备去面对一个处在权威地位的人。在诊所看医生的时候，母亲和儿子都有机会去激活他们在车中谈话时明确的这些社会地位资源。

医生约有40岁上下，是个快活的白人男子。他走进检查室，宣布说，他将要从"一些常规的问题"开始。当他说到亚历山大的身高在第九十五个百分点时，亚历克斯打断了他。

> 亚历克斯：我在什么？
>
> 医生：这个的意思是说，在包括你在内的一百个男孩子中，你比九十五个小男子汉在，嗯，10岁的时候都要高。
>
> 亚历克斯：我还不到10岁。
>
> 医生：啊，他们作图时把你算成了10岁。你有9岁零10个月。他们通常选最接近的年龄来作图。

中断一个人的权威是优越感的表现。同时也显示了中产阶级教养孩子的优先事宜：打断别人讲话这一缺乏礼貌的行为被忽略了，父母更愿意鼓励孩子感到自己作为个体的重要，并肯定他们有权利对大人说出自己的

想法和主意。亚历山大更正医生时（“我还不到10岁”）的轻松随意，更进一步表明这个孩子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利这样做。最后一个信号是亚历克斯在电话里听医生教怎样对因眼伤而入院治疗的患儿进行急救之后，对医生发出的一个明确的指令。“可别动我眼皮！”亚历克斯只是半开玩笑地命令道。

当话锋转到亚历山大的饮食上时，与专业人士交流中这种自如感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威廉斯女士欣然承认，他们并不总是遵从营养方略：

医生：你吃水果和蔬菜吗？
亚历克斯：吃呀。
克里斯蒂娜（尖声地）：哟……，
医生：我看到不同意见了哦。（笑）
亚历克斯（提高了嗓门）：你每天午餐都给我吃香蕉什么的。而且昨天的晚餐我吃了卷心菜。
医生：你是每天至少会吃一到两种水果和一到两种蔬菜吗？
亚历克斯：是呀。
医生：刚刚够，是吧？
克里斯蒂娜：他大多数时候吃得还不错。
医生：好吧，我觉得还凑合。

这种诚实是一种资本形式，因为这样他们就给了医生确切的（而不是模棱两可、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信息。[15] 当威廉斯女士透漏自己对一种药物“放弃了”的时候，社会地位资源再一次被激活了。医生很和蔼愉快但又清楚明了地建议她要再坚持服用此药一段时间。医生在给威廉斯女士指出一个不同的方向时，把他的回答设计成自己在“赞成这个观点”，而没有直接命令她去执行一个必要的医学举措，从而承认了威廉斯女士拥有相对的权利。威廉斯女士也就接受了他对药效的解释，并表示愿意让儿子坚持服药到建议的时间段结束为止。

亚历克斯和他妈妈一样也在与医生的谈话间进行着这种交换互让。而且，像妈妈一样，亚历山大也努力去“用户化”自己和医生在一起的时间。当他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问题，问医生自己腋下的那个肿块的时候，他得到了医生全心的关注，也就得到了暗含的承认；这说明他的状况是个正当的话题，值得在检查中考虑到：

医生：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在做检查之前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亚历克斯：嗯……只有一个问题。我腋下长了一些肿块，就在这儿[指着腋下]。
医生：下面？
亚历克斯：对。
医生：好的，我需要在做细致检查的时候仔细看看。我会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再看看我能怎么治疗。那些肿块是疼还是痒？
亚历山丈：不疼也不痒，只是有这些肿块。
医生：好的，我会给你检查的。

在结束时，医生转向业历克斯的妈妈，问道：“您有什么问题或疑虑吗？”威廉斯女士回答说：“没有……他表现不错，很有进步。”[16] 这句话简洁地捕捉到了她对儿子的看法：儿子是一个进行得很好的项目。这

段对话还强调了威廉斯女士和医生之间相对平等的地位——谈话的语调暗示他们是同等的（有孩子作为合理合法的参与者），而不是一段权威人士和下属之间的交流。

在这次和医生的会面中，亚历克斯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了自己众多的语言技能。而且，在他记得问自己事先准备的问题时，他得到了医生的全面关注，从而把他选择的问题作为了焦点。这样，他就成功地转换了权力的平衡，把权力从医生那里转到了自己一边。这个转换进行得很平稳。亚历克斯习惯了被人尊重。他被看做是个很特别的人，一个值得得到成年人注意和关心的人。这些都是协作培养策略的关键特征。在检查中亚历山大并没有“炫耀”自己。他的表现和在自己父母面前大致是一样的——他同样轻松自如地说理、磋商、开玩笑。不过就像下一节所解释的，教孩子为自己设定“用户化”的情境（至少对家长来说）也有一定的缺点。中产阶级孩子有时会利用他们获得的技能技巧，去为自己设定父母的惩戒方略。

用语言来惩戒

我们发现，中产阶级孩子经常会利用他们的语言技能和父母争论。他们不会像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那样默默地遵循家长的指令，相反，中产阶级的孩子往往会讨价还价，会用说理来占小便宜。比如说，棒球赛结束后，威廉斯一家直接去参加学校汇演——亚历克斯要去表演独白。开车到学校的途中，一家人讨论起了演员在表演前不建议食用的食品。亚历克斯同意等话剧演完再吃三明治。当他妈妈让他别再吃炸土豆片时，他和妈妈做了个协定，让她允许自己再吃一点儿：

> 亚历克斯拿出一包土豆片。威廉斯女士说：“我敢打赌你决不会吃一片就罢休的。”亚历克斯一口吃了一片，然后开始把口袋拧上。但他还是改变了主意，又把口袋拧开。他又吃了五片，然后说：“你说对了，我没有办法只吃一片。”威廉斯女士说：“行了，亚历山大，你吃得差不多了。把口袋放到一边吧。”亚历克斯：“再吃最后一片？”威廉斯女士：“好吧，只一片。”于是他又吃了一片，然后把口袋给合上了。

当亚历克斯不同意父母的说法时，他经常会系统地反驳他们。有时他还会取胜：

> 亚历山大看着车窗外一片略显贫困的市井，评论说，过去的年代更有安全感。他妈妈开玩笑说，有恐龙的时代更危险。亚历山大被惹烦了，他说，人和恐龙并不生活在同一个地质年代，并进一步强调说以前更安全。他妈妈喉咙里发出带着模棱两可的声音。因此亚历克斯又坚持强调说：“过去就是更安全，在发明手枪之前！”他妈妈同意了他的观点。

当他们不愿做父母要他们做的事情时，中产阶级孩子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战略战术去违抗。在亚历山大打开了所有的生日礼物之后，他答应妈妈要求的方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打开了最后一件礼物，走到屋子的另一头，站在妈妈旁边。他妈妈提醒他，“你该说什么呀？”亚历克斯带着怨气向屋子里的每个人大喊：“谢谢你们！”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察觉到一丝疏远和厌倦（就像是在说，我妈妈非让我这么做）。

有时候，亚历山大仅仅用让自己不在现场就能和他的父母唱反调：

他妈妈把胳膊绕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去谢谢大家来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她放开了他。但是，即使有的孩子和家长已经开始道别了，亚历山大却上了楼。

一位[黑人]母亲悄悄和儿子咬了一下耳朵，一手搭在儿子肩膀上，把他带到威廉斯女士面前。男孩子看着威廉斯女士的眼睛，以一种单调又严肃的语气说：“谢谢您。”他妈妈在后面也说了句“谢谢”。威廉斯女士说：“哎呀，谢谢你们来参加派对哦！”接着，她说：“我把亚历山大叫下来。”她站在走廊里大声朝楼上喊，“亚历山大！”他没有下来。她又喊道：“亚历山大！下来说再见。人家都要走了。”亚历山大还是没有下来。她再一次喊道：“亚历山大！”与此同时，有两家人已经走了。

参加生日派对的有六个男孩（两个黑人，一个亚裔，三个白人）和一个（白人）女孩；他们下午开始在一条有拱廊的商业街玩电子游戏，晚餐是比萨饼，然后有蛋糕和冰激凌，回到家里后还赠送了礼物。时间拖得有点晚了。家长们都在那里等着派对结束，所以当最后一件礼物被打开以后，派对很快就结束了。在九十秒之内，七个孩子中已有六个跟着父母走了。在很多人道别的时候，亚历山大仍然待在楼上没下来。即便如此，他妈妈朝他喊的时候也只是为了提高嗓门让他听到，并不是因为她被激怒或是生气。事实上，虽然我们观察到所有的中产阶级家长都会在某个时候因失望而对孩子大声叫喊，但是我们并没有在威廉斯家看到类似的爆发。我们也从来没听到过夫妇俩中有任何一个威胁说要打亚历克斯。相反，他们全都把语言作为对孩子行为的管控机制。

而且，在其他家庭有可能会造成困难或要受到惩罚的问题，在威廉斯家都不会成为问题。比如说，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把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丢了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学年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丢了一本图书馆的书。深夜时分（从书店回来以后），威廉斯女士、调研人员和亚历山大一起去找那本不知去向的书。亚历山大在别人找书的时候转圈玩，甚至有时候还跳到他妈妈的背上。找了五分钟之后，威廉斯女士说：“我看我还是去买那本书吧。”然后就作罢了。她没有责骂亚历山大。同样，不尊重成年人的表现会在其他家庭遭到责罚，而在威廉斯家则只会引得亚历山大的父母发笑。威廉斯夫妇都完全忠实于协作培养的教育策略。他们看上去对亚历山大的综合发展十分欣喜，他们面对亚历山大用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技能来挑战他们的权威也感到泰然自若。对他们来说，“发展”亚历山大的收益远远大于代价。总体来讲，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强调用语言惩戒孩子的优劣平衡看起来并不稳定。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察看其中的一些缺陷。

代价与收益

在一个儿童必须接受学校教育的社会，在一个学校优先重视词汇量、知识量和说理能力的社会，像亚历山大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会积累很多收益，甚至会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训练里增益各种形式的“资本”。比如，当威廉斯女士把儿子的注意力转移到一篇杂志刊登的文章上时，他就会学到——然后再去分享——新的信息。

在去篮球比赛的路上，克里斯蒂娜从车座后的口袋里拿出一期《时代》杂志。她快速浏览了一遍，然后开始细读一篇关于恐龙绝迹理论的文章。她惊呼道：“亚历山大——看！一篇关于恐龙的文章。你[可以]写篇关于这篇文章的读书报告。”她把文章递给了他，他开始阅读。大约十分钟后，亚历山大把文章还给了她，并发起了一次关于地球有多大年龄的对话。然后他又开始谈论说，现在人们相信有一些恐龙是哺乳动物。

嵌入这种随意的信息收集和分享是一种重要的额外津贴。这种交流的一部分好处就是，孩子发现自己的看法会受到他人的尊重，他们的思想会被认为是有趣的和重要的。成年人往往会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对孩子用心倾听。

中产阶级孩子还会在放学后得到语法指导：

克里斯蒂娜问他：“你的老师对你说过要练习吗？你知道，你并没有怎么练习过。”亚历克斯：“我知道。他告诉我要一直练习。我听起来很糟糕。我（译者按：此处亚历克斯用了不正规的宾格）和汤姆在写作业的时间里一起练习来的。”克里斯蒂娜一边开车一边纠正亚历克斯。她并没有责骂他，只是很坚决地说：“是汤姆和我（主格），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接着就重复了妈妈的话：“汤姆和我在写作业的时间里一起练习来的。”

在中产阶级家长教给孩子的全部技能中，汇集证据来支持某种观点是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个律师的儿子，尤其是在和他父亲说话的时候，亚历克斯就得用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即使在琐碎小事上也是如此，如同下面这段从教堂回家路上的对话所示：

亚历克斯和特里热烈地讨论着究竟是哪一个变种特工（庞大的绿脸卡通人物）更强大。特里激励亚历克斯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提议其中某个变种特工比另一个更强大。特里经常提问说：“你的意思是什么？那件事发生在哪一集？你在哪里读到的？”他们强调组织论点和查阅文字资料。亚历克斯用[拿出来读]《奇侠变种特工的秘密》（Secrets of the Marvel X-Men）向爸爸证明金刚狼的利爪是他身上唯一用“钛合金”作成的部分。

亚历山大放声读书的时候，他的父母都在倾听。他们像课堂上辛勤工作的老师，记录并评论了他发音上出现的一个错误：

克里斯蒂娜说：“再回到开头读一遍。我觉得你读错了一个音。”亚历克斯重读了一遍，而且又把那个词读错了。克里斯蒂娜：“那个词读‘领’，就像是在‘领导’一词中那样。”特里：“这是个很有欺骗性的词。你得从上下文中才能看出它究竟怎么读。”

又有一次，也是在一个无伤大雅的情形下，威廉斯先生却还是激励

亚历克斯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注意到儿子这次喜欢的汽车和他上次所喜欢的不一样，就要让亚历克斯拿出理由来解释这个变化：

特里："这可和你上次说的不一样。你上次说喜欢米埃塔、奔驰、布加迪。你到底喜欢哪一款？"[17] 亚历克斯（提高了嗓门）："我没有那么说。那三款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克里斯蒂娜（抚慰地）："不用担心，宝贝儿。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改变主意。这是你天赋的权利。"亚历克斯看了一眼他爸爸，高兴地说："这儿可是美国。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就有权改变主意，这是上天赋予我的权利。"

在我们的实地记录中，中产阶级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这种唇枪舌剑十分常见。亚历山大和其他同龄同等社会地位的孩子显然还会很自如地给成年人提供信息和建议。比如，一名调研人员汇报了一件亚历克斯哄她滑旱冰的事："如果你能滑冰，你就能滑旱冰。"亚历克斯自信地向这个成年人保证。而且，也和其他中产阶级孩子一样，亚历克斯有时候会开玩笑地去命令父母做事。威廉斯先生叙述了某个傍晚发生的一件事，这天，他本人、威廉斯女士和一位调研人员去参加一次学校汇演。在看了一场由亚历山大从头到尾主唱的音乐剧之后，（一向认为音乐剧是种"荒谬至极"的娱乐形式的）威廉斯先生说，这场剧冗长无聊，看下来就好像四季都更迭轮回了一遍。他一边笑，一边告诉调研人员，在头天晚上的表演中，他企图"偷偷溜走"，但是亚历山大恰巧在门廊里，把他截了回去。在大家都离开教学楼的时候，威廉斯先生指着门附近的那块地方说，他儿子就是在那里逮到他的。

威廉斯先生（咯咯地笑着）：我出来后就是想从这里偷偷溜走，亚历山大看到了我，（指着观众席）说："回到那边去。"

威廉斯先生说，他后来真的回到了观众席，看完了整场表演。

在这种情况下，威廉斯先生明显觉得儿子的行为很好玩。然而，中产阶级家长强调使用语言和说理的方法有时也会带来不能让人接受的行为。例如，当父母让孩子遵守规定而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的时候，孩子会公开指出父母的自相矛盾之处。一个下午，威廉斯女士、亚历克斯和一名调研人员正在一起做杂事，他们偏离了便道，踩到了种花的泥土上，穿过停车场往商店走去。回到车里的时候，亚历山大在妈妈阻止他的时候和她争论了起来：

亚历克斯从花丛上面跳过，上了车。我和他妈妈走台阶。威廉斯女士说："亚历克斯，别从花上跳过去。"他说："为什么不行？我们来的时候就是从泥土上走过去的，"妈妈口气软弱地说："是的，但是你从花上面跳过去了。这两者是不同的。"

而且，协作培养还会带来家庭角色混乱，尤其是在孩子在家里有多大权力的问题上。比如，在很短的时间内，亚历山大的父母就可能会把给予他的权力进行剧烈的转换。有时候亚历山大被当做成年人对待：他们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在家庭决策中拥有"选举权"，他甚至还会命令家长做事。可是，在另一些时候，他又会被当做一个很小的孩子。下面这个全家在教堂等待礼拜时的一幕就是一个例子：

亚历山大靠着他爸爸。特里拥抱了一下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紧紧地抱着爸爸。[然后]特里把亚历克斯藏在了他的夹克衫里，一边哼唱着一边抱着他。[然后]克里斯蒂娜用……一种母性语言的声调问："亚历山大在哪儿呢？"克里斯蒂娜去捅仍然躲在爸爸夹克里的亚历克斯。（她问）"我的宝宝在哪里？亚历山大在哪里？"克里斯蒂娜……叫道："他在这儿呢！我看到我的宝宝了。"亚历山大在妈妈捅他的时候笑着。当祈祷的声音从圣殿的门里传出来时，亚历山大也从他父母的游戏中解放了出来。 [18]

亚历山大显然很喜欢这一刻的嬉戏。在其他场合，亚历山大及其他中产阶级孩子都会对家长把他们当做小孩子看待作出反抗。他们也会利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来宣称自己应该得到特权，当他们的要求被回绝时，他们还会缠着父母答应他们的要求。[[19]

小结

中产阶级孩子所占据的语言世界既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优势，也让他们付出了某些重大的代价。与我们观察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相比，亚历山大在更有效地参与社交活动，尤其是有成年人参与的社交活动这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威廉斯夫妇教养孩子的方式给了儿子巨大的词汇量（例如，天赋特权和抄袭剽窃）；给了他各种手段，用以在家里家外为自己定制各种境遇，来得到最佳利益，给他展现了更广阔的知识天地，让他能对自己喜欢的题目有进一步的了解（例如，恐龙和摄影试剂）；帮助他学会了用证据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例如，为什么他选的变种特工最强大）；还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技能技巧来捍卫自己的个人偏好（例如，再多吃一片土豆片）。

但是协作培养很费时间——特别多的时间。亚历克斯的父母为了儿子的各种活动，都把自己的业余时间按照活动的需求来分配。威廉斯夫妇还把很多时间和注意力都投入到和亚历克斯讲话上面。他们教他新单词，浏览杂志上的文章以便发现儿子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题，引他说出自己的观点，向他挑战并要他用事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还要指出他在自己知性立场上的矛盾之处。从亚历克斯的角度——他看上去似乎很乐意——来说，他也放弃了很多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参加成年人组织的活动。

亚历山大是个很机敏的小学生，能够吸收父母教他的所有知识。然而，他的社会地位给他带来的好处却远远不止来源予他父母的言行。亚历山大自己也开始贯彻刚刚学来的那些与社会地位挂钩的利益，从而拓展了自己的机会。具体来说，他已经内化了这种观念，认为让别人调整行为来配合他的偏好是正当而合理的，这个观念为他提供了尝试为自己量身定做社交互动的基础，包括那些有成年人参与的互动。

亚历山大是个非裔男孩子这一事实也对他的生活有重要的影响。他参加的教会全部由黑人组成，并且常常有机会和其他黑人孩子成为朋友。他父母对他的社交环境明察秋毫，正如威廉斯女士所说，他们尽力让儿子与"有教养的"人为伴。

对于如何在种族关系上训练孩子，虽然威廉斯夫妇存在着不同意

见，但是他们都承认种族和民族认同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和儿子的日常生活经历。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亚历山大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种族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竭尽全力保护儿子远离种族凌辱和其他形式的歧视。但是，种族并没有影响到亚历山大家和调研中其他家庭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同孩子进行广泛的说理、提问、对观点的探究和对回答的倾听。

这样的训练帮助亚历山大和其他中产阶级孩子发展了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参与意见，提出特别的要求，对他人进行评判，并给成年人提供建议。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注意并受到重视。承认这些优势和权利有历史的特定性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在美国的殖民时期，孩子的行为受到高度的限制；因此，与协作培养有关的策略在那时就不会给人任何在社会地位上的好处。这些教育策略在当今的美国却极其有效，其原因正好在于我们的社会格外褒奖的，就是具有说理和协商技能的人所作出的果断自信又有个性的行为。

[1] 就像我在附录一中作出的解释，亚历山大不在我们听课的学校里上学。相反，一个熟人查了她女儿所在私立学校的电话簿，并给了我两个有四年级学生的黑人家庭的地址。我给威廉斯家寄了一封信。在一系列的会面之后（我还遵从他们的意愿，给他们看了我之前写的一本书和我的个人简历），他们就同意参加调研了。因为招募方式不同，对这个家庭我们没有课堂观察和家长会的数据。

[2] 这并不是说家长和孩子对话就是学业成功的唯一途径。例如，据有力的证据所示，在移民家庭中这类语言上的培养十分有限，而其子女的学习成绩却都很好。尽管如此，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其子女的教育经历中，移民家庭源自何种社会地位背景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见Alejandro Portes和Dag MacLeod的文章“Educational Progress of Children ofImmigrants”）。此外，有些中产阶级孩子有学习障碍，他们的学习动力也有所不同，并且还会因为受到很多其他中介因素的影响而学习不好。因此，即使在家中接受了很多说理的训练，也不能保证孩子有好的成绩。这里的论点是，家长与孩子的对话可以提供一种关键性的优势。把家庭背景与阅读水平和能力测试成绩联系起来的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参见Betty Hart和Todd Risley，Meaningful Dillerences。

[3] 参见Betty Hart和Todd Risley的Meaningful Differences，及Shirley Brice Heath的Ways with Words。另外也可参见Jonathan B Imber的文章“Doctor No Longer Knows Best”。

[4] 当然，不是所有的成年人都会顺应这些特殊要求。孩子们也各有不同，一部分是在脾气上，一部分是在合群的程度上和大胆自信的程度上。

[5] 铃木教学法是劳动密集型的方法。从4岁开始，孩子们就要平均每天听一个小时的音乐。孩子和家长每天都要练习并参加每一堂课。

[6] Basil Bemstein，Class，Codes.and Control。

[7] 克里斯蒂娜评论说："两个都是年轻的男教练，我很喜欢这样，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孩子什么指导。你看那另一个教练，他一直在旁边对自己的队员说话。"特里听起来很生气地说："这些人就是不知道要用什么策略，即使你把方法甩在他们面前也没用。你看看他们——他们的队都输了，他们还坐在凳子上笑呢。"第二场结束时，很明显，亚历克斯的队是赢不了了。他的父母，尤其是特里，都大大地安静了下来。

[8] 实地调研人员对亚历克斯的知识量十分惊叹。他在实地笔录中写道："我完全出神了（在亚历克斯提到版权问题之后就不知道他们说到哪里了）。我对他能了解版权法印象极为深刻。"

[9] 另见Jennifer Hochscluld在Facing Up to the Amerrcan Dream一书中汇报的结果。

[10] 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观察已经结束了，亚历山大上了五年级。

[11] 对中产阶级黑人成年人如何处理公共场合下遇到的种族歧视的讨论，尤其可以参见JoeFeagin和Melvin P Sikes的Living with Racism。

[12] 注意，虽然威廉斯女士显然受到了干扰，但她自动把与儿子的互动转化成了一个教育性的瞬间，强调出1500美元和15000美元的区别。

[13] 威廉斯女士从来没有对实地调研人员提到过她为什么不想从她众多的信用卡中拿出一张来用。她很注意个人隐私。我们的很多次观察都是在家宅外面进行的，当时他们正在参加各种活动。我们观察的其他家庭都会主动而确切地说出他们在周末会做些什么，而威廉斯女士却更愿意说他们要"出去"或者某段时间对他们"不合适"。总体来说，威廉斯一家并没有像其他家庭那样经常主动提供信息。尽管我们的实地调研本身就是很冒昧的，但我们仍然尽量敏感地对待并遵从各家的意愿。对于与我们的研究兴趣关系不大的事情，我们并没有刨根问底。因此，这里的问题根源我们也不得而知。

[14] 我也常到同一家商店买东西并用个人支票付过钱。我是中年白人。一个年龄较大的女店员经常会很怀疑地看着我的支票，问我："你以前在这里使用过个人支票吗？"但是，她和其他店员从未拒绝过我的支票。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店里有不接受支票的牌子。

[15] 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主动向医务人员提供确切的信息。我们观察到，（主要是）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对医务人员有一种缄默式的反抗和挑衅。

[16] 不是每个医生都像这位一样如此邀请孩子参加到谈话当中来，但是，甚至在遇到不太开明的专业人士时，我们也观察到这位母亲和其他母亲都会积极主动地管控并干预孩子的经历。

[17] 在车展上，亚历克斯在告诉实地调研员他最喜欢的三款车时，选了不同的车。威廉斯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

[18] 实地调研人员注意到，"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但不像贫困家庭的那种有攻击性的爱"。然而，他却不赞同他们表达爱的方式："看到他们家庭和睦，我很高兴，但

是……他们的方式却并不适合孩子的发展阶段。父母总是走极端，不是把孩子当成大人，就是当成太小的小孩。”

[19] 很多心理学家都坚持说，这种家长与孩子角色的混淆对孩子是有害的。有关这方面的指控，可以参见Paul Kropp的I’ll be the Parent，You Be the Child和Dana Chidekel的Parents in Charge。

第七章 语言作为社交生活的渠道：哈罗德·麦卡利斯特

我问哈罗德："你的[五年级]老师怎么样啊？"哈罗德言辞激烈地说："她特别坏，还撒谎。"麦卡利斯特女士正在洗碗，她静静地听着，而后问："那个男老师叫什么名字？"哈罗德说："是林赛先生吗？"他妈妈说："不是，是另一个。"哈罗德说："特里恩先生。"麦卡利斯特女士笑了，接着说道："就是他，我喜欢他。"

远离喧嚣的街道，在距一个小商业区有几个街区之遥的地方，坐落着下里士满贫民住房建造计划（public housing project）。由于通往住房计划的路是个死胡同，加之住在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车，这里的往来车辆十分稀少。不小心误入这里的人也很少。所有的住户都是非裔美国人，周围临近的居民也大多如此（住房计划与城市有很长的一段接壤，那里住的也全都是黑人）。但是，旁边还有一个白人工人阶级居住区，步行就可以走到。这片住房计划被看做是一个危险地带，当地的商家，包括比萨饼店，都拒绝送货到这里来。

麦卡利斯特一家就住在这个住房项目里，他们的住所是由一排一排二、三层高的砖石单元楼组成的。在他们的那一边，这座方块形的棕色单元楼共有五个复式单元。因为楼里的每个房间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所以里面很黑。有时候住户们白天还得开灯。外面，每户都有一个用水泥和木栅栏围起的小院子。麦卡利斯特家的单元前面有一棵高大的落叶树；在炎热的夏天，树叶带来了好客的荫凉。楼与楼之间有宽阔的水泥人行道；晚上的时候每个单元的一角都有泛光灯倾泻下耀眼的灯光。很多地方地上都没有草，光秃秃的，上面散乱着废纸、包装和玻璃碴子。

住户们经常一起坐在草地长椅或前面的门阶上，喝啤酒、聊天、看孩子们嬉戏。窗户在夏天通常都是敞着的，以便楼内通风，也可以提供一个视角，让居民们俯瞰临近的地方。

麦卡利斯特一家的两层单元房中，第一层有一个开放型的会客区和一个厨房。客厅的家具很简朴，有两张青绿色的沙发，一张安乐椅，一个木支架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厨房里有一张桌子，离桌子不远处有一台洗衣机（没有烘干机）。蟑螂是恒久不变的难题，虽然已用过多次杀虫剂。因此，食物通常都不会放在外面。冰箱坏了。麦卡利斯特女士已经向房东抱怨过，虽然房东答应给她配置一个新的，但是在我们调研的三个星期里，新冰箱却迟迟未到。麦卡利斯特女士只好先凑合着把一部分食物放在隔壁的朋友拉蒂法家中，另一些则放在装有冰块的冷却箱里。

楼上有四间卧室。有两间可以放下一张双人床，另两间则只能放下单人床。每间屋子里都有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为了在修建时减少成本，房间里的壁橱都没有门。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一个房间的窗户上有一台窗式的空调，炎热的夏天里，楼里也会很热。家里有一个卫生间，三台电视机，其中一台在麦卡利斯特女士的卧室里。与亚历山大·威廉斯的妈妈不同，麦卡利斯特女士对看电视不加限制。事实上，她觉得电视很有用。就像她自己所说，"电视整个晚上都开着，因为我总是整晚地开

着电视。我就靠它伴我入睡。”虽然麦卡利斯特家以前曾经装过电话，但是因为预算有限，哈罗德四年级的大部分时间，家里都没有电话。麦卡利斯特女士从她妹妹拉维娜那里接学校的电话，她的邻居拉蒂法也帮她接收消息。

家庭

简·麦卡利斯特女士是麦卡利斯特家的一家之主。她有33岁，高高的个子，洪亮的声音，非常有幽默感。在我们的家访中，她通常都穿着当年在高中当运动员时的T恤衫和毛边超短裤。她现在靠公共救济，但是希望能再次找到工作。麦卡利斯特女士有四个孩子。哈罗德（10岁）和他妹妹亚历克西斯（9岁）一直和她住在一起。他们的哥哥伦尼（17岁）和姐姐洛里（16岁）主要住在麦卡利斯特女士的母亲家里，坐车到那里只要几分钟。伦尼和洛里平时经常过来，有时候，尤其是周末的时候，他们还会留下来过夜。

麦卡利斯特女士是位很有爱心的姨妈。她让两个侄子朗纳阔（11岁）和盖恩（9岁）住在自己家里。两个孩子的妈妈戴拉是麦卡利斯特女士的姐姐，她最近刚刚失去自己的寓所，寄住在这座住房项目里的一位朋友查梅恩家。麦卡利斯特女士得知两个孩子不喜欢他们妈妈的朋友而查梅恩也不欢迎他们后，就邀请他们住在她家。他们每周至少要来四天，在这里吃饭，洗澡，和哈罗德合睡一张床。他们的到来给本就紧张的食品预算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另一个客人是麦卡利斯特女士的双胞胎妹妹吉尔，她吸可卡因上了瘾。她并没有房门钥匙，但有时会从窗户偷着进来，睡在沙发上。吉尔有两个女儿，哈利玛（3岁）和莫尼克（十个月）。去年，在哈罗德上三年级的时候，吉尔和她的孩子住在麦卡利斯特女士家。后来，吉尔被指控犯有疏忽照顾子女罪，并被剥夺了照顾两个女孩的资格。简和吉尔的妹妹拉维娜收养了哈利玛和莫尼克（她住在离这里乘车约有十五分钟的一个小单元房里）。拉维娜的身体患有严重的残疾，但是在与她同宿的男友帮助下，她仍然能够设法抚养吉尔的孩子。麦卡利斯特女士经常去看望她妹妹拉维娜和她的两个侄女。但是，吉尔只能在他人在场监管的情况下才能去看望她的两个女儿，而她也并不常去看她们（例如，她错过了哈利玛的3岁生日派对）。

除了麦卡利斯特女士、孩子们和吉尔之外，麦卡利斯特家还包括麦卡利斯特女士的同居丈夫基思。基思是个长途卡车司机，经常一出车就是好几天不回家。他会在出车的间歇回到家里。他和孩子们打篮球，尤其是和哈罗德打球，但他并没有担任起一个家长的角色。最后，还有哈罗德和亚历克西斯的父亲汉克。汉克和哈罗德的妈妈虽然已经没有恋情了（他们从未结过婚），但他还是经常来看他们。他已经57岁了，比麦卡利斯特女士要年长很多（他的女儿比麦卡利斯特女士还要大）。汉克是个机修工。他下班后会随便来看看，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麦卡利斯特女士边笑边解释说：“汉克会躺在床上。我会前前后后地忙，而他只是

躺着。”

有些周末，哈罗德会乘车到城市的另一头去看汉克。汉克和母亲及两个兄弟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晚上留宿通常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哈罗德“就这么过来了”[1]。亚历克西斯不会和哈罗德一起去。但有时候汉克的女儿（与亚历克西斯同父异母）会过来带她出去玩。汉克定期贴济一家人，比如，周五晚上给大家买比萨饼。他有时候为了孩子还给麦卡利斯特女士钱，尤其是买衣服的钱。儿子作出的每个成绩都让他感到骄傲，他还会去参加哈罗德生活中的一些活动（例如，五年级毕业典礼）。但他并不照顾哈罗德每天的生活起居，也不管教他。

表3　麦卡利斯特一家人员纵览

成员	年龄	与孩子的关系	住所
简	33	母亲	麦卡利斯特家
伦尼	16	哥哥	祖母家，但经常在麦卡利斯特家留宿
洛里	14	姐姐	祖母家，但经常在麦卡利斯特家留宿
哈罗德	10	调研的目标儿童	麦卡利斯特家
亚历克西斯	8	妹妹	麦卡利斯特家
戴拉（朗纳阔和盖恩之母）	30多岁	哈罗德的姨母/简的姐姐	住在同一住房项目的一位朋友家
朗纳阔	11	表哥	麦卡利斯特家，有时和妈妈住在一起
盖恩	9	表弟	麦卡利斯特家，有时和妈妈住在一起
吉尔（哈利玛和莫尼克之母，被剥夺了监护权）	33	哈罗德的姨母/简的双胞胎妹妹	在被逐出之前住在麦卡利斯特家
汉克	56	父亲	在城市的另一头住（和母亲及兄弟一起），但是常来麦卡利斯特家
基思	30多岁	与简合法同居的丈夫	麦卡利斯特家，但经常因为开长途运输卡车而不在家

表3列出了所有住在麦卡利斯特家的人和经常来探访的人。通常都会有七个人在这里留宿，当基思和吉尔都在家的时候，会有九个人。[2]孩子们在不同的晚上会睡在不同的床上。有时候小孩子要靠大人帮忙才能得到一席睡觉的地方：

朗纳阔：嘿，简，我上不到床上。哈罗德正伸开了躺在那儿呢。
简：让哈罗德的屁股往一边挪挪。他都躺横了。把他往那边推推就行了。

与中产阶级家庭不同，在麦卡利斯特家的单元里，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私人空间的观念。

家里的经济十分困难。麦卡利斯特女士为哈罗德和亚历克西斯接受“儿童抚养家庭补助”，她还有一张供一家人看病的医疗抚恤卡。[3]

虽然她在使用食品券，但是家里的食品却时常短缺。孩子们吃东西之前总要先得到许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们自己拿起东西就随便吃。食物一旦拿出来，就会很快消失掉，因为有很多张嘴都在等着吃它们。比如，一个下午，哈罗德和亚历克西斯、朗纳阔和盖恩、邻居家3岁的孙子、我自己和麦卡利斯特女士一边聊天一边吃点心的时候，一大整盒撒盐饼干和一些果酱在三十分钟内就通通被狼吞虎咽般一扫而光。

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有可能有足够的食品。在吉尔女儿哈利玛的生日派对上，就有很多热狗、芥末酱、放了人造香料的果汁和奶酪。然而，大多数时候，食物总是很缺乏。比如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们只有两个烤比萨饼，但却必须由麦卡利斯特女士、哈罗德、亚历克西斯、洛里、汉克和吉尔这六个人来分享。当哈罗德想要第二块的时候，家人就让他去喝苏打水。又一天晚上，每个孩子晚餐都只能吃一个肉丸子、山药罐头和菠菜罐头，都不够再盛第二碗的了。

钱也总是不够。全家人都放弃了像看牙医、买时尚服装和做头发这样的事情，并共同分担其他东西，像交通费用。[4] 家里其他人出行的时候，麦卡利斯特女士的姐姐戴拉把自己的汽车月票借给他们，有时朋友会开车送他们出去。在孩子中间，对钱的希求及对钱能带来的物质资源的渴求，都很明显。一天早上，伦尼过来时手里拿着几张一美元的纸钞，在其他孩子眼前晃着，他们都叫闹起来。他们许愿时的那种渴望也是显而易见。在回答“如果你有一百万你拿它来做什么”时，亚历克西斯说：

> 呵，好家伙！我会给我的哥哥、妹妹、叔叔、姨妈、侄女、侄子、还有我姥爷、姥姥、妈妈、爸爸、还有我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主要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给他们所有人买衣服……和运动鞋……我还会买吃的东西，我会给妈妈买吃的，还会给我的哥哥们和妹妹们买生日礼物。

可是，哈罗德和亚历克西斯却不会非要妈妈或爸爸给他们买东西：

> 我们在[一家服装店]外面停下来，汉克很仔细[地看着]那里的衣服和价格……哈罗德也看着……哈罗德看起来很不想讲话的样子，几乎是有点儿警觉。他让爸爸决定到底要怎样。一路上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我能买X吗”或者“我能要Y吗”这样的话。我们走过了糖果、录像带、书籍杂志、运动衣、运动书包，他却从未讲过要任何东西。

就像这则实地笔录中所暗示的，在看到了那么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孩子时常要父母给他们买东西之后，哈罗德对自己的压抑让人感到十分不安。

但是哈罗德也并没有过着一穷二白的生活。麦卡利斯特女士坚决地履行着满足孩子基本需求的责任，同时，只要有可能，她都会给他们“额外的”东西。例如，调研人员注意到，有时候她会给孩子钱到住房项目附近的商店里去买一杯苏打水或是一包土豆片。麦卡利斯特女士认为自己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母亲。和亚历山大·威廉斯的母亲一样，她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和快乐。她努力在生活中为孩子们提供一种强大的积极的影响（与住房项目里其他吸毒成瘾的那些母亲不同），但是她眼中父母亲的角色职责与威廉斯女士的却又截然不同。在麦卡利斯特家，就像在其

他贫困和工人阶级家庭中一样，家长的关键性职责就在于在物质上照顾孩子、给孩子提供衣服和住所、教他们辨别善恶对错、给他们以安慰。在所有这一切中，语言扮演着重要又实用的角色。与威廉斯女士不同，麦卡利斯特女士并不会不断地试图丰富哈罗德的词汇量，不会去培养他的语言（或体育）天赋，也不会力图说服他如何如何去做。当哈罗德抱怨的时候，就像在本章的开头，他抱怨老师“撒谎”，他妈妈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提醒说他也有自己的确喜欢的老师；但是与威廉斯女士不同，她并没有让儿子把话题展开。麦卡利斯特女士经常给出简短而清晰的指令，同时她也要求得到快速而尊敬的顺从。哈罗德很少向大人给出的指令提出挑战，他也不会试图同父母理论或磋商。然而，虽然麦卡利斯特女士在孩子和成年人之间划出了分明的界限，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对哈罗德的活动严密管控。他和其他孩子都可以不经她批准就去自由地做游戏，看电视，跟朋友一起玩。在中产阶级孩子的世界里，各种活动常常会代替与亲戚来往的时间，相比之下，对麦卡利斯特一家来说，大家庭的网络联系则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养育子女方式的不同，尤其是在语言运用上的不同，在家庭内外都影响着孩子的生活。例如，亚历山大·威廉斯在看医生时表现出来形成中的优越感，就是通过他运用语言控制医生对他的看法来塑造发展的。亚历克斯在成年人面前应对特别自如（以至于他会去随便打断医生）。他去看过足够多次的医生（译者按：在美国，人们不只有病才看医生，更多的是为日常保健而看医生），因而对常规的检查十分熟悉；而且，由于他习惯了别人问他问题，也习惯了别人专注地倾听他的回答，他能很流畅地为他人提供信息。哈罗德为了参加圣经营地而到诊所里做体格检查的时候，情形却大不相同。对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的不信任，对医疗职业及其专用术语的不熟悉，这两点合在一起，让他妈妈一时语塞，也让他感到十分拘束。亚历山大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语言技能和对话技巧，哈罗德却都没有。他对别人的提问和深究都不熟悉，而且他也没有向有权威的人提出特殊要求的经验。其结果，就是一种形成中的局促感。哈罗德所受到的教养也有很多积极的方面——在同伴面前的轻松自如、在创作游戏和安排自己时间方面的足智多谋、他对待成年人抱有的尊敬态度、他和家人之间深深的亲情——但在社会机构的“真实世界”里面，它们几乎都被当成是毫无价值的。教育工作者、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雇员们和其他人士都接受（而且帮助再现）同一种意识形态，在很多其他的能力中，这种意识形态重视说理和协商的技巧、巨大的词汇量、言谈之间和与陌生人合作时的应对自如，以及时间管理能力——这些都是像亚历山大·威廉斯这样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品质。通过仔细审阅哈罗德生活的一些部分，尤其是语言的作用，这一章揭示出了，在不同之处渐渐被定义为不足之处的时候，这些机构制度上的偏好是如何演变成为制度化了的不平等的。

让哈罗德做“朴实的老好哈罗德”：成就自然成长

哈罗德·麦卡利斯特是调研的目标儿童，他在下里士满小学读四年级。他宽宽的肩膀，结实的体格，看上去很有派头，像个崭露头角的橄榄球运动员。下面是亚历克西斯对她哥哥的描述：

> 哈罗德就是朴实的老好哈罗德。他从来都不会改变。他总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做同一件事情。他听广播。他打篮球。他又听广播。他看电视。他睡觉。他看电视。他听广播，他看电视，他打篮球。他就是朴实的老好哈罗德。他从来不做任何有趣的事情。

在哈罗德看来，“一次又一次地做同样的事”很有趣。他喜欢体育运动，不管是哪一天，他都会很高兴地去打篮球（他尤其喜欢篮球）或是打橄榄球，他很严密地追看专业体育比赛。大多数下午，他都要么是在看电视，要么更有可能做的就是在外面打球。和他一起玩的小孩有时多有时少，但是和亚历山大·威廉斯不同，哈罗德总能找到和他一起玩的孩子。麦卡利斯特家周围一排排的单元楼里住着四十个小学年龄的孩子。有这么多孩子住在附近，哈罗德选择了只跟和自己同龄的孩子玩。事实上，他既和比自己大也和比自己小的孩子玩，还和自己的表兄弟一起玩（他们都年龄相仿）。

家庭纽带

与亚历山大·威廉斯和加勒特·塔林格不同，哈罗德很容易就能和自己的大家庭聚在一起。他的表兄弟朗纳阔和盖恩基本就住在他家，他的几个姨母都住得很近。但是家庭纽带并不仅仅是相聚方便。那个把哈罗德与他的表兄弟姐妹、他的几位姨母、他的祖母、他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亲戚连接起来的纽带，对哈罗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构成了他生活的环境。在任何一天，他都很可能会和朗纳阔睡一张床，和盖恩玩一个篮球。他会为他的姨母跑腿做事，他会自己坐车去找祖母或是父亲的亲戚。

像生日这样特别的日子，哈罗德都是和他的亲戚一起度过的。与中产阶级家庭不同，在麦卡利斯特家，派对所邀请的人并不是学校或课外活动中的朋友。大家庭中的成员们把他们的资源和能量汇总起来，充满热情地庆祝生日。到时候会有生日蛋糕和特别的食品，但礼物却不是生日派对的一部分。与此相似，圣诞节时会有圣诞树和圣诞食品，但却没有圣诞礼物。在这些和其他家庭活动中，当成年人一起娱乐聊天时，年长一些的孩子会主动与较小的孩子一起玩并照顾他们。

日常生活的组织安排

有组织的活动是亚历山大·威廉斯和加勒特·塔林格闲暇时间的支柱，但是这些活动在哈罗德的生活中却是根本就不存在。[5] 在闲暇时他可

以按自己的喜好安排时间。他喜欢同小朋友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抛橄榄球，他还组织篮球比赛，篮球筐就是住房项目街边电话竿上那个锈迹斑斑、没有球网的铁环。他们享受体育活动的一大障碍就是缺少器械。到处找球是哈罗德闲暇时间的一个常见部分。例如，六月一个湿热的下午，哈罗德、他表弟盖恩和一名调研人员在住房项目里转了约有一个小时，四处寻找篮球。下午晚些时候，在听完音乐和看过棒球卡后，哈罗德加入到盖恩和其他孩子当中打起了由益恩挑起的水仗。游戏十分热烈，充满了欢笑，孩子们还试图把隔壁的成年人也浇湿了（虽然大人并不愿意）。

哈罗德每日的活动让他有事可做，但是与亚历山大·威廉斯和加勒特·塔林格不同，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些活动而感到疲惫。缺乏成年人组织的活动让他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消遣方式，自由地为自己定下步调。他在体育运动上磨炼自己的技能，他在寻找器械和玩伴上足智多谋。他很擅长与比自己大得多或小得多的孩子打交道。但是哈罗德却没有得到那些因被成年人认可而为他生成优越感的技能。他也没有获得对工作相关常规的熟悉感知，而中产阶级孩子通过参与多种有组织活动对那些工作相关日常规则十分熟悉。

哈罗德在外面玩的时候，他的举止与他在家中的单元房里截然不同。在家里，他很安静，几乎是近于沉闷。他从不大声说话，从不到处乱蹦乱跳，只是偶尔说上几句简短的话，也不爱争论。在外面，尤其是在他运动的时候，那种在成年人面前常常表现出的恭敬和屈从就会让位给一个更加活泼、果断自信的自我。（在本章后面描述的篮球赛中，这种变化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有时候，如果情绪非常激动或气愤，哈罗德就会有些口吃。他妈妈解释说：

> 他已经上了好像有三年的会话训练课了，但他就是说话时不放慢速度。如果他肯放慢速度，然后再讲话——但是如果他在笑或哭的时候，你得等他平静下来才能听懂他究竟要说什么。

哈罗德经常笑，不怎么会哭。麦卡利斯特一家都非常非常地喜欢嬉戏，笑声和玩笑时常萦绕耳边。甚至在我们的研究已经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幽默感也很显而易见。调研人员问哈罗德他周六几点钟起床。当哈罗德说早上7：00的时候，调研人员回答说她会来得比7：00早一点儿，大概会6：30过来。朗纳阔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倒霉，他们比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还要糟糕！”他的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哈罗德的妈妈尤其滑稽风趣。她经常面无表情（即，没有感情色彩）地说出最可笑的话。比如，在团员野餐上，我到的时候已经来了大约200人了。麦卡利斯特女士提醒一个调研人员都有谁已经到了：

> 简：安妮特在这儿呢。
> 调研人员（环顾四周）：哪儿呢？
> 简：她是这儿唯一的一个白人，你还找不到她吗？（笑）

种族的角色

一天晚上我在麦卡利斯特女士家里留宿，10：00左右的时候，我和她走到另一个单元，把戴拉的汽车月票还给她。从人们看到我的表现可以看出，白人在住房项目里有多么少见。在路上，麦卡利斯特女士停下来和两个朋友聊天，他们都坐在一辆白色的旧卡车上喝酒。麦卡利斯特女士介绍我说："这是我的朋友安妮特。她要把我儿子写在她的书里。"后来，她对我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介绍我：

简：他们看到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一起走，他们会认为你吸毒。（我们两个人都笑了。）
简：我是当真的。他们会说，"要吗？"[要买毒品吗？]
调研人员：我白天四处走动的时候，他们以为我是公共事业部的人呢。
简：我跟你说了嘛。[6]

在住房项目外面，哈罗德的世界只多了那么一星半点的白人。周围城区里的种族隔离程度被认为是"超高"的，就像很多美国的城市一样。[7] 离哈罗德家仅有几分钟的商业区中，店主来自各种不同的种族。哈罗德常到玛丽亚的便利店给大人跑腿买东西（有时也会给自己买点零食），店里的员工包括白人、亚裔和一些非裔美国人。住房项目旁边有一个可以步行到达的白人工人阶级居民区，但是哈罗德并不会到那里去玩。麦卡利斯特女士汇报说，万圣节的晚上她和一个朋友带着孩子越过种族界限到那边去"要糖果"。他们每年都去同一些人家，"那几家人都认得我们"。有时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包括人们看到黑人孩子来了就把灯关掉表示不欢迎。麦卡利斯特女士抑制住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只说了句"那些家长都好愚蠢啊。"

在学校里，种族的平衡发生了转变。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大型市区的一部分，下里士满区的各个种族都杂居在一起：约有一半学生是白人，大多数老师也是白人。大多数行政人员，比如清扫院子的员工和自助餐厅的服务员，也都是白人。有些助理教员是黑人，大多数校车司机都是黑人。哈罗德三年级时的老师是位非裔女教师，今年是一位白人男教师。

麦卡利斯特女士告诉那位研究开始时与她做访谈的非裔调研人员说，她没有见过哈罗德的学校里有任何一个黑人孩子或白人孩子因为种族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虽然麦卡利斯特女士很清楚地意识到有些人"表现得很愚昧"，但是与威廉斯女士不同，她没有对种族给孩子人生带来的影响表达自己的忧虑。相反，她大体上强调了正确照顾孩子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什么都不为孩子做"的成年人表示了不满。

指导自然成长

与威廉斯女士一样，麦卡利斯特女士坚信家长应该照顾好孩子。与威廉斯女士不同，她根据自然成长来定义对孩子的照管。也就是说，她强调父母为孩子提供食物、住所、衣服和良好监督的重要性。麦卡利斯

特女士是她所在这部分住房项目的楼长。在她负责的众多事务当中，夏天时她要负责管理附近一个消防栓的“喷水帽”；炎热的夏天里，住房项目里的居民可以用它来喷水降温。只要不摘掉喷水帽，消防栓喷出的水就不会给来嬉戏的孩子造成危险。她对住房项目里其他家长如何使用消防栓十分不满，对那些家长处理其他与孩子有关的活动也很有意见：

> 他们在那边拿着五个消防栓玩。又吵又闹。昨天他们把三个的喷水帽都打开了，水特别冲……这些人什么都不为自己孩子做。他们[孩子们][早上]9：00就走了，下午4：00才回来，也不告诉家长他们上哪儿去了。（摇着头，很厌恶的样子。）

虽然麦卡利斯特女士并不主动去干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但她确实会达到她给自己确定的作为家长应承担的义务。因此，虽然去开家长会需要坐公交车，她还是会去的。同样，虽然她自己在医疗工作者面前并不是很自在，她仍然会带哈罗德到医生那里去体检，让他能够参加圣经营地。在资金很有限的情况下，她设法给自己的侄子和孩子买到足够的食品。她做晚饭。当孩子参加营地活动需要新衣服的时候，她安排哈罗德的父亲带他去买衣服。有时候，她会和孩子们“在一起待着”，看他们打篮球或者和他们开玩笑。

麦卡利斯特女士还强调说，她会和孩子一起做些特别的事情：“夏天我会带他们去野餐，把吃的东西放在小毯子上。”而且，

> 我们总是在情人节那天去[动物园]，因为在那天孩子们可以免费进去。我们大概每年去四、五次，也是在夏天。我喜欢周三晚上去，那时候那里的孩子比较少，还不错。

麦卡利斯特女士对照顾好孩子的承诺还体现在一个她不得不做的艰难决定上。她的双胞胎妹妹吉尔因吸毒而妨碍了自己照顾哈利玛和莫尼克的能力，在（调研开始前）和她经过长期的苦苦挣扎之后，麦卡利斯特女士给公共事业部打了电话，举报她妹妹疏忽照管儿童。对此她做了如下解释：

> 调研人员：谁给公共事业部打的电话？
>
> 简：我打的。我对这个厌烦透了。哈利玛的哮喘犯了，她却连续四个小时都没有回来。我真是厌烦透了。那天我给公共事业部打了六、七次电话。我厌烦了让我的孩子们看着他们。伦尼和洛里和哈罗德，还有亚利克西斯和朗纳阔。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犹豫了一下）应该有自己的童年。她却甩手一走了之。

孩子身体上的健康安全对麦卡利斯特女士来说也是至关重要。比如，万圣节的时候她带孩子们到各家去“不给糖就捣蛋”，她限定他们只能吃一小袋糖；他们也不许吃“玉米形糖……蘸了糖的饼干、橘子和苹果”。而且，就像本章后面提到的，她还教年龄较小的孩子要远离住房项目中那些“有问题的”成年人，并责骂十几岁的洛里不该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对几个调研人员她也同样抱着保护的姿态。她曾在偶然间对我说：

我对那个毒品贩子说："那个[调研人员]要来研究我儿子。我叫你别给他捣乱，否则我就跟你没完。" [8]

麦卡利斯特女士为自己获得了高中毕业文凭而感到骄傲，她把自己的期望传达给孩子们，要求他们每一年级都要升上去，不许留级。亚利克西斯说：

她说，如果你留级了，你整个夏天都得挨罚。我惊得眼睛都瞪大了，就像这样（示范了一下）。我都害怕给她看我的成绩单了。我那次自己没有看就给了她——她说："你没有及格。"我吓了一大跳。我说："给我看看！"然后我着了自己的成绩单，我说："我及格了。"

亚利克西斯还强调了她妈妈的品质：

我们家一点儿也不脏不乱。因为我妈妈，我是说，那次有个男的把酒瓶子扔到了马路上，那个瓶子滚呀滚呀，差点儿把一辆车的轮胎都扎破了。所以我妈妈让我把碎玻璃踢到马路牙子上。那个男的说："你看她，她正打扫呢。她把碎玻璃给打扫了。"因为我妈妈就是这么爱干净。

同样的，哈罗德看起来也为妈妈掌管消防栓的喷头而感到骄傲。总的来说，麦卡利斯特女士被自己的家人和邻居看做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和好公民。

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言词简短朴素

与我们观察的其他贫困和工人阶级家庭一样，麦卡利斯特家的生活并不会围绕着长篇大论的讨论而进行。这些家庭的谈话时间会有差异，但是总的来讲，要比中产阶级家庭少得多。 [9] 句子要更简短，用词也更朴素，一起商量的次数很少，任何一种像我们在塔林格和威廉斯家看到的那种文字游戏几乎都不存在。 [10] 这并不是说贫困和工人阶级家庭认为交谈不重要。麦卡利斯特一家也会谈论他们的亲戚朋友，讲笑话，评论电视节目——但是他们只是断断续续地说起这些。简短的话插入到令人舒服的沉默中。有时他们会完全绕过言词交流而使用肢体语言——点头、微笑和眼神交流。麦卡利斯特女士讲话时通常都是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她并不试图引导孩子们说话或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大多数场合中，孩子们都可以自由地讲出自己的想法，但她并不明确地鼓励他们这样做。总的效果就是，语言成为日常生活中一条实用的渠道，而不是一种培养说理能力的工具，或是一种探究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 [11]

在家里，孩子之间经常讨论钱的问题。他们看到报纸上的广告，评论各种物品的价格。他们谈论谁会给他们钱（比如，一个邻居在朗纳阔陪她到银行的取款机取出钱之后给了他五美元）。麦卡利斯特一家要对付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就让家里所有的人对物品的确切价格以及哪里能买到便宜货都十分敏感：

简递给哈罗德和亚利克西斯每人一袋焦糖玉米，他们很快就打开了。她责怪他们说："你们干嘛把袋子打开？"他们没有回答。不知怎的，他们说起焦糖玉米的价格来。简说，她是在坡上的加油站买的，那里正在降价——一美元两袋，平时都卖九十美分一袋。[12]

这种断断续续的谈话，仅仅是穿插在成年人的指令性话语之间。成年人告诉孩子要去做某些事（例如，洗澡、倒垃圾），而不要去做另一些事（例如，骂人、顶嘴）。麦卡利斯特女士用只有一个单词的指令来协调全家人使用唯一的一个卫生间。单元房里总是至少有四个孩子，平时常常会有七个，再加上麦卡利斯特女士和其他成年人。麦卡利斯特女士指着孩子说"卫生间"，并把毛巾递给他／她，她就是这样来叫孩子洗澡的。被指定的孩子无言地站起身，上卫生间去冲澡。

孩子们通常都会按照大人指令去做。即使成年人给了他们很费时间的任务，我们也没有看到过抱怨或抗议，比如，洛里被指定去给戴拉姨妈的朋友查梅恩4岁的女儿编辫子，她花了一个小时才把辫子辫好：

有人对洛里说："去[给泰内莎]梳个头，她要去野营。"洛里什么也没说，站起身，带着小女孩进了里面。她们走到电视旁边的沙发旁，洛里坐在沙发上，小姑娘坐在地上。[泰内莎]静静地坐了约有一个小时，歪着脑袋，洛里很仔细地给她辫了一头的小辫。

洛里无言的服从十分具有典型性。大体上，孩子们都是毫无意见地去做大人要他们做的事情。例如，一天晚饭时，哈罗德抱怨不爱吃菠菜后，他妈妈叫他还是要吃完：

妈妈（大声地）吼他，叫他吃菜："吃！把菠菜都吃光！"（没有回音，哈罗德在桌子边磨蹭着。）盖恩和朗纳阔还有亚利克西斯都吃完走了。我和哈罗德一起吃完，他把菠菜吃掉了。他把芋头都剩下了。

也许是因为他们都觉得孩子应该令行禁止，所以成年人常常并不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求孩子那么做，但是，对指令的解释也常常是和指令本身交织在一起的：

简和朗纳阔在我前面一点走着。我走在他俩中间，但是朗纳阔一直不时偏到我这边，挡在我前面。简责备他说："朗纳阔！走直了！别挡着她的路！"他笑了笑，往边上挪了挪，然后说，他的朋友们经常因为他走路不直而揍他。没过一会儿，他又偏到我前面了。这一次，简生气了，"朗纳阔！别再走偏了！"他看起来吓了一跳（他的眉毛随着瞪大的眼睛扬得老高，脸上露出一个不好意思的微笑）。

朗纳阔并不是有意不服从他的姨母——他只是注意力不集中。而有时候，违反成年人的指令则是比较故意的抉择。哈罗德态度坚决的时候，就会大声地讲出来。他会很简约但很清楚地提出反对意见。在威廉斯家要展开到几分钟或更长时间的讨论，在这里被很快提出并迅速得到解决，就如下面这个例子所示。在这个例子里，哈罗德、他的爸爸，还有我一起去为哈罗德买圣经营地所需的物品。

哈罗德从最底下的架子上拿起一条普通的蓝色[沙滩毛巾]。他举起毛巾。他爸爸

说："你想要一条普通的？"哈罗德点点头。他爸爸接过毛巾，放到购物篮里。接着他爸爸又沿着一条货架间道逛了下去……然后，拿起一套桃红色的[毛巾]看着，毛巾上有一只白缎的鸭子贴画。他说："这些都有[一套]，但是缺条大毛巾。"（麦卡利斯特先生似乎觉得这套更值。）

哈罗德很坚决地拒绝了那套桃红色的毛巾：

哈罗德走到那边看了一眼[那套毛巾]，然后坚决地摇了摇头。他说："都是女孩子的颜色。"他爸爸把桃红色毛巾举了起来，暗示哈罗德没有看对，而且应该买这套。他看了看毛巾又看了看哈罗德。他爸爸看上去是在（无声地）温和地抗议，但也在微笑着。哈罗德看起来可一点也没觉得很搞笑。他又摇了摇头，果断地说："女孩子的颜色。"他爸爸笑了……[但是]看上去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他在各处转了转，朝购物篮里看了看，然后又拿起了那条蓝色的毛巾。[他]打开蓝色毛巾，我伸出胳膊，表示要帮他，我们把蓝毛巾全打开了。约有1.5米长。哈罗德摇摇头说："太大了。

整个交流过程中，哈罗德说了不到十个词。他爸爸说得稍多一点，但是比起威廉斯夫妇引导亚历山大说出自己观点时会说的话，要远远少得多。

虽然哈罗德反对买那套桃红色的毛巾，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跟父亲争论。他只是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在这个家庭里只看到过一次孩子主动与大人争论的情况。引发争论的话题是食品，这也对当时孩子的坚持和成年人的忍耐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出门坐公交车到拉维娜家给3岁的小表妹过生日的时候，麦卡利斯特女士一边带着大家过马路一边对我们所有人嚷道："你们都得在拉维娜家吃得饱饱的，因为我们回来以后就不会再做饭了。"

晚上大约10：00的时候，全家人都回来了，坐在一起看电视上的篮球季后赛，并准备睡觉。在简的房间里，亚利克西斯背对着门坐在床的正中央，朗纳阔坐在床的一个边上，背靠着墙，两腿向前伸直。天气很热。空调没开。

麦卡利斯特女士宣布要在拉维娜家吃饱的时候，朗纳阔没有跟他们那拨人在一起，现在他来要吃的了。请注意，在他姨母认定他听到了去之前的忠告时，他并没有去纠正麦卡利斯特女士。相反，他只是声称自己不喜欢热狗——因此也不吃热狗：

朗纳阔：我能吃点东西吗？

简（吃惊地大声说）：一点吃的？我难道没跟你说要在拉维娜家吃得越饱越好吗？

朗纳阔：我是吃了但是[我不喜欢那些吃的]。

简：这儿没有吃的。我告诉你们了……

朗纳阔：我才不吃热狗呢！

简（生气地）：你说什么？

朗纳阔：我不喜欢热狗。（高声地替自己辩护）我不吃热狗。你问我妈妈。我不吃热狗。

简（十分生气地大声说）：那你妈妈应该在我们做那些该死的热狗之前就告诉我们。我现在告诉你，我是不会给你做饭的，知道了吗？[13]

朗纳阔暂时被亚利克西斯打断了。两人都（和麦卡利斯特女士一起）坐在单人床上：

朗纳阔（对亚利克西斯）：别挤我！我发誓，你一点儿地方都不给别人留。

麦卡利斯特女士相信她听到亚利克西斯骂脏字了。

简（用报纸在女儿腿上猛打了一下）：我要打你屁股了，听到没有？
亚利克西斯：妈妈，我没有那么说！
简：别跟我耍[滑头]。你能区分对错。现在我要在上边儿这儿[打]你这混蛋的头！

然后，哈罗德的妈妈做了件很少见的事，她问朗纳阔有什么烦心事。由于派对之后她（还有我和哈罗德）是坐公交车回家的，而朗纳阔和亚利克西斯还有其他人都是有人开车送回来的，她想知道是不是在车上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简：朗纳阔，在车上发生什么事儿了？车上到底怎么了？在拉维娜家里有什么事儿吗？
朗纳阔：（咕哝着）没事儿。
简：那你干嘛这种态度？
朗纳阔：她[亚利克西斯]总烦我。
简：朗纳阔，你让每个人都心烦，但是可没有人对你这么说话。
（短暂的沉默，电视上的篮球赛还在继续。）
简[对在场的每个人]：我是不是在出门之前跟你们说来着（要吃饱了）？
亚利克西斯：对。

按麦卡利斯特家的标准，这段交流有好几处都很不寻常。对话很长，又包括孩子向大人挑战（虽然是间接的），而且还记录下了哈罗德的妈妈有意地从一个小孩那里寻求信息。

在麦卡利斯特女士使用指令来保护和训练孩子的时候，依照中产阶级的标准来看，她的方式显得粗简无礼。比如，在她警告亚利克西斯和朗纳阔不要搭理住房项目中那些有问题的人时，她的言辞很简短很直接，但却并不是不友善：

简：谁？里普？里普是个酒鬼。我告诉过[你们]里普的事。（过了一会儿）他今天3：00前就喝醉了。
亚利克西斯：他开吉普车。他开车把杰罗姆送来了。
朗纳阔：他怎么你了？
亚利克西斯：他对我说脏话来的。
简：我来告诉你们里普是怎么回事吧。（嚷道）不要搭理他，好吗！他就是有问题。

无论是我们观察到的相对有限的言谈，还是麦卡利斯特女士总会嚷嚷或出语生硬，都不能说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络变得紧张了或是受到了妨碍。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在我们看来，麦卡利斯特家大人和孩子之间未曾说出的感情常常比像塔林格家这样话多的家庭更显而易见。下面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麦卡利斯特一家是多么擅长——又是多么习惯——无言的交流：

哈罗德左手拿着一个盛着热狗和土豆片的纸盘子，右手拿着一听苏打水。他试图用右手打开那听水，突然，他的手滑了一下，苏打水从罐里跳出来，[洒]到了他的

手上和凳子上。他妈妈就站在几尺之外，捕捉到了他的眼神。他们都笑了，笑他在打苏打水的时候手不协调地滑到了一边。那是一种友善温暖的笑，是在和气地取笑他的手扭成那样。然后他妈妈就把东西拿到了烤架上，哈罗德也把手上的水甩掉了。

麦卡利斯特家的每个人都喜欢开玩笑，尤其是麦卡利斯特女士，她似乎更是对任何有可能幽默一把的场合都很警觉。然而，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界限却仍然界定得十分清晰并保持得十分严谨。对年长的人要尊重比什么都重要。孩子们自觉地用尊称来称呼成年人，尤其是成年女性，比如说，拉法蒂小姐或简小姐。此外，麦卡利斯特女士还不允许孩子们骂脏话。[14]

讲圈内话：同龄人之间使用的语言

与在贫困（及工人阶级）成年人与孩子间充满指令的互动不同，同龄人之间使用的语言大都自由畅快。在很多情况下，当孩子们自己玩耍的时候，他们会互相用善意的玩笑来叫板，尤其是男孩子，都喜欢向别人吹牛。在篮球场上，哈罗德会一扫平时沉静的气质。他整个人——包括他的语言——看上去都转变了。哈罗德是个有才华的球员，他既有惊人的速度（对他这么一个块头壮的人来说），又有惊人的攻击性（相对于他在家里的表现来说）。

哈罗德判定贾拉德“二次”（二次运球）了。贾拉德一边把球抛给哈罗德一边抗议。（如果你判定对方二次运球，你就能得到球。）贾拉德（生气地）：“你这家伙，我没有二次——小气鬼，你这瞎了眼的臭大粪！”哈罗德停住拍球，走到贾拉德面前。哈罗德（嚷着）：“你就是二次了，嘿！就像这样。”（哈罗德开始运球，他旋转了一下，然后做了个假动作，然后做了一个很夸张的二次运球。）“我看到你这样了！”他也没有问其他孩子对此有什么看法，他们也什么都没有说。哈罗德得到了球，然后又抛到场内开始玩了。（通常如果有人犯规了，他们就会从头玩起。这一次却不同，哈罗德得到了球。）哈罗德被判犯规，“走步。”（他由于带球走步而犯了规。）哈罗德（抗议道）：“我走步？小气鬼，你疯了吗！看你能不能拿到球——我要再来一次。我可没有用骗术。”哈罗德把球留下了。没有人提出抗议。

与中产阶级的孩子相比，哈罗德和他的朋友们有更多的自由，不受成年人的限制。大人们经常都不在他们身边，而且当他们在场的时候，他们通常也不会干预孩子之间的互动。比如，这一点在调研人员描述哈罗德和他的（法定）继父时表现得十分清楚，一个下午，基思和哈罗德一起玩投篮：

哈罗德和基思都很放松。他俩都不是非得得到回弹不可，也不是特别想表现自己运球的技巧。哈罗德投中了不少球。基思却没有这么老练。

在这种随意的投篮继续进行的时候，约有十个少年加入进来，他们的年龄从7岁到15岁不等。

其他这些人一来（他们好像都是一起到的），球赛的步调就变了，变得更加炫耀技巧也更有竞争性。虽然并不是真正的比赛（没有人计分），却执行了明确的攻守策略。比如，哈罗德多次叫他的朋友们“来抢球啊”，这就起到了一个邀请竞争的作用……他们都[试图]防止哈罗德投球入篮。哈罗德打篮球极有才华。

哈罗德通过引入第二个挑战来提高游戏的竞争性：

哈罗德提出挑战：“过来呀，好让我打断你的脚踝。”[15] 这个挑战是对所有敢接受的人发出的，不论老小。那个[之前加入进来的]上了年纪的人，为了帮哈罗德找到接受挑战的人，大声叫着：“贾拉德——出来给我们显显身手。别让他把你的勇气都扫光了。”（注意这句话里的文化潜台词，他在暗示，一个人要想被大家接受就必须得强悍或是有男子气。）贾拉德回击说（同时对哈罗德摇旗示威——就是，挥起胳膊做击打状——通常会被理解为一个贬损的手势）：“哈罗德对我一点威力都没有。”他走到哈罗德跟前堵住了他（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势——直对着哈罗德，伸着胳膊蹲伏下来）。他的眼睛从哈罗德的眼睛上移到了球上。

随着逗秀的展开，球场上那些原本在用另一个球投篮的人们也都逐渐停了下来，过来看他俩打球。

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哈罗德和贾拉德身上。哈罗德兴奋起来，（用力地拍着球）企图威慑贾拉德。“你准备好让我打断你的脚踝了吗？看这个，你们都看着。”（每个人已经都在看着了。）

哈罗德一点预警都没有就直冲向了球篮。贾拉德朝球猛击。哈罗德逗惹他说：“你想让我把球给你送上门儿来吗，小牛犊儿？”[16] ……贾拉德在哪里击球，球都已经不在那里了……很显然，贾拉德根本不是哈罗德的对手。基思和另外那个年长的男子相视而笑。现在哈罗德在离球篮有1.2米的地方。他在两腿之间运着球，然后[驱球]在自己脖子上绕了一圈，身体又旋转了一圈，带球跑了两步，然后发力投球。他没有投中。

虽然哈罗德并没有投中，但他仍然得到了各种形式的赞扬和赏识。[17] 这些赞誉都洋溢在他们的微笑中，他们庆功的击掌上和各种评论上，比如说，“妈的——你看他有多棒！”和“贾拉德这个废物——这小子就不会打球。”……哈罗德（吹着牛）炫耀着：“就是！怎么样吧？你们这帮人都不是我的个儿！我把那小子给揍了——年轻人技术就是好！”

哈罗德技术的确是好——他除了运球、传球和投篮都很棒之外，还很擅长战略部署；他足智多谋又有创造力，他对比赛规则十分熟悉，他还知道什么时候去挑战、什么时候去嘲弄。总之，在球场上他很淡定很自信。在这里，他讲的话都很多很详细，加了很多华丽的润色。但是在他与老师和家长互动的时候，他的言谈交流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形式。再有，虽然他的这些才华在这个环境中十分重要，但却不像中产阶级孩子在有组织的活动中学到的技能那样，那么容易转化到教职人员、雇主或医护专业人士的世界中去。在球场外，在成年人面前，哈罗德又变回到了“朴朴实实的老好哈罗德”，不大强悍有力，更恭顺，也更安静。

管教用语：指令和威胁

不管大人给他们的指令是去洗澡、倒垃圾、给另一个孩子辫小辫、

还是吃青菜，贫困和工人阶级家庭中的孩子都常常会及时而沉默地去执行。这种沉默和执行也常常是他们对口头管教的反应，甚至是在言词管教中夹带着体罚的威胁时也是如此。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亚利克西斯受到姨母拉维娜的责骂。她并没有为自己辩驳。事实上，她只作出了一次直接回答——一个无言的点头——当她姨母看起来是要求她回答的时候。在整个这一段中，亚历克西斯站在拉维娜厨房里的桌子旁，她的双手放在一把木椅子上。拉维娜站在同一张桌子的另一端，她没有和亚利克西斯的妈妈商量，就对孩子进行了训问并下达了最后通牒。显然，她很生气，亚利克西斯感到很羞愧：

拉维娜：嘿，孩子，听说你今天在学校表现不好。

（朗纳阔说了点什么，嘲笑亚利克西斯犯错误了。）

拉维娜：闭嘴，朗纳阔。

拉维娜（又转向亚利克西斯）：到底怎么了？你显然有问题，你在课堂上到处蹦蹦跳跳，耍来耍去的，是吧？

（亚利克西斯没有抬头也没有回答。）

拉维娜：我们是不是早就讲过这个问题？

（亚利克西斯没有回答。）

拉维娜：你知道，亚利克西斯，行为表现很重要。如果你在学校表现不好，在小学就不好，那你长大后表现会怎样呢？在工作上会怎样？嗯？

（亚利克西斯没有回答。）

拉维娜（对着朗纳阔，然后又转向亚利克西斯）：我都和你们说了两个月了……你们总给我同样的老借口。你为什么不好好表现呢？

（房间里一片沉默。拉维娜盯着亚利克西斯。亚利克西斯盯着椅子出神。）

拉维娜（重复自己的话）：我真的真的不耐烦了。你为什么不好好表现呢？

（亚利克西斯还是没有说话。朗纳阔进来又出去了，在他的人工香料果汁里放了点糖。）

拉维娜：再有几天这个学年就结束了。别再让我听到你表现不好了，好吗？

（亚利克西斯点了点头。）

拉维娜：我真的不想打你的屁股。那可是我的最后一招儿。

在斥责中，就像在其他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中一样，大人讲话，孩子听着。和中产阶级孩子不同，这些孩子不会用探查口风、争辩和质问成年人这些手段来考验大人的极限。这种管教方式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就是，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的孩子往往没有发展出与中产阶级孩子同样多的语言技能。他们没有什么机会练习和成年人协商事务，没有人让他们作总结或提出自己的想法、观点和借口。不对成年人提出质疑的习惯也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孩子们也不太能学到新的词汇。

体罚

当拉维娜用威胁要“打”亚利克西斯来支持自己的指令时，她用了在我们看到的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成年人中常见的策略。麦卡利斯特女士也使用类似的行动方针，尤其是在孩子做的坏事让她生气时。就连16岁的洛里也不能幸免：

简生气了。（简走到洛里跟前，径直站在她面前。简生气地大声嚷着）：“你最好别再让我看到那些坏孩子的车停在坡下面，不然的话，我就朝上一拳（猛击）正中你的脑袋瓜，我说话算话。”

和她的姐妹拉维娜一样，麦卡利斯特女士把体罚看做对任何在她照料下的孩子采取的一种有益又恰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情况下，她会毫不犹豫地去管教她的侄子，就像这个团圆野餐上发生的一样：

盖恩坐在长凳上哭着。（因为音乐太响了）虽然我就站在他旁边，但却听不到他的哭声。但是我看到眼泪从他的脸蛋上一条条地流过。简走过的时候，她探身（到）朗纳阔坐的地方，攥着拳头朝朗纳阔胸脯上给了一拳，对他嚷道（我能听到她嚷）：“不要打盖恩！”

事实上，体罚在家中用得很勤，以至于孩子们对哪个大人更严厉会展开生动的讨论。一天晚饭的时候，孩子们围坐在桌边，麦卡利斯特女士在客厅里转悠着。开始时孩子们讨论的焦点是一位姨妈身着喇叭裤和木底鞋的照片，后来就演变成了对各种体罚的比较：

简说她不喜欢木底鞋，因为姥姥以前经常用鞋底“敲”她的脑瓜门儿，总会在上边留下个印儿。盖恩问谁更[凶]，是姥姥还是姥爷。这个问题引出了一场生动的讨论，描述了祖父母使用的各种打孩子的方法。盖恩和朗纳阔还有哈罗德和亚利克西斯都在交换意见并相互争论。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她从来不反对孩子或者为大人辩解。）孩子们谈到额头上和其他身体部位留下被打的痕迹。

就如同这个关于隔辈人如何责罚孩子的讨论所暗示的，体罚是孩子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常见的特征，麦卡利斯特女士也用武力对峙和以武力对峙来威胁的方法作为解决自己个人生活中各种严峻冲突的机制。一天傍晚——哈罗德离家去营地的头天晚上——她再也不能忍受自己的双胞胎妹妹吉尔了。她发现她妹妹把汉克给哈罗德买的衣服成包地卖掉。吉尔还把空调的插线给剪断了，所以空调现在也不制冷了。麦卡利斯特女士愤怒到了极点，公开指责了她妹妹。洛里、哈罗德、亚利克西斯和调研人员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场架，伦尼在半道才过来。实地笔录捕捉到了当时不断升级的紧张局面和缺乏克制的暴力：

（简和吉尔在楼下大吵大闹了约有十分钟）：
简：你这个臭婊子！你偷了哈罗德的衣服，是吧？
吉尔：你闭嘴，简。
简：在这儿除了你没有别人偷我孩子的衣服！我要揍扁你这蠢蛋的脑袋瓜！
吉尔：我他妈才没有偷你的东西呢！别他妈指责我！
简：……我讨厌死你他妈玩这种花招儿了。我要去找一根棍子，你最好给我滚远点儿，别等我把你揍扁了！
吉尔：没人敢他妈的赶我出门！

在这当中，亚利克西斯从卫生间里喊道，她需要卫生纸。麦卡利斯特女士出去到邻居家借了一卷卫生纸。她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根大木棒。

简：我现在就找到了一根木棒！你他妈听见没有？！

（吉尔没有回答。）
简（嚷着）：你他妈给我滚！……

简在找[哈罗德的衣服]时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洛里回头对我说（我听到洛里房间里的叫嚷声，慢慢从楼上走下来，现在正背靠着客厅里的扶栏站着）："她（吉尔）真的一点借口都没有。"她低着头说，看上去很难过，一副要哭的样子。亚利克西斯站在楼梯第二个台阶上对我说："她们老这样。就是有一点，她们让我很害怕。"[18] 她看上去很伤心。

住房项目的住户十分密集，这就让周围的邻居们都听到了她们在起冲突，一小群人在外面聚集起来。基思回家以后冲突更加激化。他和吉尔大声地（身体）扭打在了一起，但是这时候调研人员和孩子们都已经出了家门到篮球场上去了。他们过了一会儿才回去，按照麦卡利斯特女士的指令清扫了碎玻璃，并把损坏的家具挪到了街上。[19]

这一系列的事件对身陷其中的每个人来说都很痛苦。麦卡利斯特女士为调研人员看到了这场架而感到很尴尬。她知道这是一次令人恐惧的经历，并希望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20] 但是，几天后她向我解释说，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如果她想给孩子们一个"家"，而不只是一个"房子"，她就不能允许她妹妹留在这里。

我问她："她会搬走吗？"她坚决地说："她得搬走。"我说："你鼓了很大的勇气才做的这个决定。"她说："这是一处房子，但是它必须得是一个家。"

我说："她会到哪里去住呢？"她摇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她说："她在家的时候，孩子们都不愿回家。"她问我："你注意到这个了吗？"我慢慢地点了点头。她说："我得让这里成为一个家，而不只是一个住处。"

形成中的局促感

麦卡利斯特一家和其他贫困及工人阶级家庭一样，对在统治机构中处于权威地位的人，表现出警觉有时则是不信任的态度。这种处理方式造成了其家庭成员和公共机构代表人之间的互动与中产阶级家庭所经历的截然不同。

比如，在一次家长会上，麦卡利斯特女士（她高中毕业）看起来很屈从柔顺。她在家里的那种合群又外向的天性在这种场合下都隐没了。她弓着腰坐在椅子上，夹克衫的拉锁拉得严严实实。她很安静。当老师说哈罗德没有交作业时，麦卡利斯特女士显然大吃了一惊，但她却只说了句"他在家里做作业了"。她没有追问老师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替哈罗德说话。在她看来，管理教育她的儿子是老师的责任范畴，是他们的工作职责，而不是她的。因此，当孩子抱怨老师时，她并不询问详情。哈罗德形容他的新（五年级）老师"很坏"，引得他妈妈想起了另一个更招人喜欢的老师——但却并没有引出她任何其他的反响。

同样的，麦卡利斯特女士为了让儿子参加圣经营地而带他去诊所体检，他们在诊所的经历也和威廉斯一家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

里，通常很喧闹的麦卡利斯特女士也十分安静，说话声音很小，有时都很难听清她在讲什么。她回答医生的问题都很困难。有时她并不明白医生讲话的意思（例如，她问："破伤风针是什么？"），另一些时候，她的言辞又很含糊：

医生：他每天都吃些什么——鱼，肉，还是鸡蛋？
简（她的回答声音很低又很微弱）：是。
医生（试图做眼神交流，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妈妈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检查表）：黄色的蔬菜？
简（仍然没有眼神交流，朝下看着）：对。
医生：绿色的蔬菜？
简（看着医生）：不是总吃的。[21]
医生：不常吃。那水果和果汁呢？
简（声音很低，没有眼神交流，眼睛盯着医生在体检表上填写的潦草字迹）：嗯，嗯。
医生：他每天喝牛奶吗？
简（很唐突地忽然用很大的声音）：喝。
医生：麦片粥，面包，大米，土豆，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简（摇摇头，看着医生）：有，当然也吃。

哈罗德也很缄默。当医生问他："你在学校上几年级了？"他用很安静很低的声音说："四年级。"但是当话题转到体育运动的时候，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大一些。他变得自信又热情。哈罗德宣布说他在橄榄球赛中能打所有的位置，当医生对此表现出惊讶和难以置信的时候，哈罗德坚持说他可以。当医生想通过列举位置（"后卫？前锋？"）来澄清时，他打断了他，重复道："所有的位置。"

在诊所里麦卡利斯特女士也并不总是被动屈从的。比如，当医生到候诊室来喊他们的名字时，她招呼朗纳阔一起过来，而只是在招呼之后，才想起来问医生能否让她侄子也一起跟着。麦卡利斯特女士还要求医生检查哈罗德的听力和体重。她并不满足于单纯去地信任医生，遂让朗纳阔到走廊那边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测哈罗德的体重，并回来向她汇报测量的结果。

不过，麦卡利斯特女士与医生的互动却与威廉斯女士和医生的互动有着重要的区别。哈罗德和他妈妈看起来都没有亚历山大那么自在，亚历山大在家里就习惯了长篇大论的对话。和他们两个不同，亚历山大在回答问题和提出问题两方面都很轻松自如。哈罗德在家里习惯了对指令作出反应，所以他回答了医生提出的问题，但自己却没有问任何问题。与威廉斯女士不同，麦卡利斯特女士没有训练儿子在权威人士面前表现出自信，也没有帮儿子准备见到医生以后要说什么。最后，这两家人对医生怀有的信任度也不同。由于信任程度不同，加上他们透露给医生的信息也在数量和质量上有区别，就有可能给其中的一家带来不平等的受益；在当前这一历史时刻，专业人士确定的恰当的教子方法就包括培养孩子的果敢自信，被动服从则被唾弃，认为是不恰当的。[22]

讨论

哈罗德及其他贫困和工人阶级孩子的语言世界，既为他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优势，也让他们付出了一些代价。与我们观察的中产阶级孩子相比，哈罗德对家里的成年人更加尊重。在这种环境下，大人和孩子之间的界限分明。成年人觉得自己可以轻松自如地给孩子下达指令，孩子也会马上遵从照办。成年人下达的一些指令是以孩子对家中其他人的义务为中心（“别打盖恩”或者“给[她]辫野营去的小辫”）。[23]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比起我们在中产阶级家庭观察到的手足关系来，哈罗德对他妹妹（和他的表兄弟姐妹）要好得多。在全家聚会的时候，他主动照顾自己十六个月大的侄女。总之，大人和孩子讲话的时间不多；但就像在为去夏令营买毛巾那次一样，讲出来的字数虽然不多（“女孩子的颜色”），却并不影响个人清楚地传达自己的愿望。在哈罗德的生活中，指令的使用和默默遵从指令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在他和同龄人互动的时候，比如在“篮球场”上，哈罗德讲话的方式就和在家里时截然不同，他的语言复杂详尽又丰富多彩。然而，与我们在亚历山大·威廉斯家的语言互动相比，贫困和工人阶级家庭中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语言互动有着显著的差别。麦卡利斯特女士拥有孩子没有的优势，她不需每次都去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当的就可以对孩子下达指令。这就使得教养孩子不再那么累人。

另一个优势就是，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重要决定，哈罗德比中产阶级的孩子更有自治权。作为一个孩子，他掌控着自己闲暇时间的日程安排。他的篮球比赛都是即兴的，让他从中发展了重要的技能和才干。他很足智多谋。他看上去没有10岁的亚历山大那样疲累。而且，他还有重要的社交能力，包括他能巧妙自如地应付“在街上混的规矩”[24]。在他妈妈让孩子们一定要牢记“别搭理”那些人时，他也在自己从小受到的训练中强调了这些技能。而那些“不要去搭理”的人也包括哈罗德和亚利克西斯要应对的一些住在附近的酒鬼和毒品贩子。

尽管如此，在学校、医疗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场景的世界里，这些宝贵的技能却无法像亚历山大和其他中产阶级家庭中强调的说理能力那样被转化为同样的优势。和亚历山大·威廉斯相比，哈罗德并没有发展起巨大的词汇量，没有与日俱增的科学知识和政治见识，没有一套帮他去“用户化”家庭以外各种境遇的工具来让他最大限度地获利，也没有人教他如何运用证据为自己的论点来辩护。他对词汇的了解会在诸如学术能力测验这样的考试中显示出不足，说明语言能力没有在家中得到着重强调。他在学校里试图（用打架来）保护自己表兄弟的做法给他带来了停学的危险。他家人与人之间有很紧密的纽带，但他们在讲话时却不像塔林格家那样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在今后去求职的场景中，哈罗德一家的密切关系就有可能无法像训练孩子保持眼神交流的家庭那样能帮他把学到的技能转化成同等价值的优势。在这些方面，麦卡利斯特一家生活的内在价值观或者在家里使用指令性语言，并不与这些优势的缺乏相关联。事实上，我们可以论证，养育恭敬有礼、不抱怨、不激怒或纠缠父母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值得赞美的儿童教养目标。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论证，与亲戚之间深长而持久的纽带关系也十分重要。[25] 更确切地说，是公共机构运转的具体方式造成了把优势传送给中产阶级孩子这一结

果。在其自身的标准中，这些公共机构允许甚至是要求家长积极地参与到协作培养中来。同时通过这种方法，中产阶级经常会获得一种优势，就像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斯泰西·马歇尔的经历那样。

第三部分 家庭和教育机构

孩子们不会只在家庭的范围内生活。他们还会走出家门到社会中去。法律规定他们必须要上学，而学校也是他们生活中一个强大的机构。正如我在前面展示的那样，很多孩子的生活都是有组织的，充斥着成年人组办的各种活动；而另一些孩子的生活节奏则比较缓慢，他们和表兄弟姐妹在一起，看电视，或者在外面玩。当孩子们从家庭环境的雷达屏幕上移开时，家长对他们的爱与关注并不会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任何区别。就像下几章中将要描述的，工人阶级及贫困家庭的母亲会经常焦虑地注视着孩子的状况，因为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温迪·德赖弗都在学习阅读方面有困难。同样，马歇尔女士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女儿对校车司机“阿特”的抱怨上。

尽管如此，社会地位还是造成了父母（主要是母亲）在如何处理孩子对公共机构的抱怨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母亲往往都会采取干涉主义的方式，果断自信地对一些状况进行干涉。有时候家长的干涉会成功，有时候则不会。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直接教会了孩子怎样“不因为被拒绝就轻易放弃”，也教会了他们怎样给公共机构中掌权的人施加压力以敦促他们照顾到自己的需求。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往往会期待教育工作者及其他教职员工承担起领导的角色。其实，这种顺从并不是他们对自己生活中其他关键性服务人员所抱有的态度。比如，德赖弗女士认为自己是“急脾气”，并会对房东最新近的滑稽规定火冒三丈，但是在学校的场景下，她却要被动得多。由于学校是围绕着协作培养的系统而设计的，老师们也期待家长在孩子的学业中担负起领导的角色，因此像德赖弗女士这样顺从的家长，在培养孩子在学校教育中获得成功这方面就很有问题。

虽然如此，文化资源并不会自动地带来益处。虽然中产阶级白人母亲汉德隆女士在学业上尽力帮助女儿梅勒妮，但是在家里她的干预却很困难，在学校的效果也很值得怀疑。此外，超越个体的性格，放眼审视社会模式和社会结构也十分重要。尽管学校可谓是友善之地，但是，校方如果怀疑家长虐待孩子或是疏于照顾，就必须依法把家长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在这个角色中，学校又是政府的武器。就像我展示过的那样，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很少会把言词说理作为责罚孩子的一种形式。相反，很多人都会使用体罚。正如我将要在小比利·扬内利的个案中所展示的，在家中使用皮带来责罚孩子明显和学校所采取的责罚模式有冲突。加之小比利·扬内利的父母相信小比利一定要在操场上用武力来自卫，这也是和学校的规定相冲突的。结果，小比利的家长时而对抗挑

衅，时而恐惧害怕，时而又感到无能为力。当他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就鼓励小比利去打架，而且他们在觉得有必要时还会在家里用皮带抽小比利。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和其他工人阶级及贫困家庭都潜存着一种焦虑：“校方”会突然告发他们虐待孩子，并“来把我的孩子带走”。通过与学校官员的标准达成一致，协作培养作为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为中产阶级家长及其子女提供了重要的、却又是无形的受益；这些受益是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及其子女所无法获得的。

[1] 例如，父亲节的那个周末，哈罗德自己坐公交车到城那边去看他爸爸。在祖母的帮助下，他给父亲做了一顿早餐。

[2] 家里还有一只叫卢克的德国牧羊犬，拴在前院的一棵树下。它不能进到房子里。一家人来回经过的时候会过来抚摸它并和它说话。它是这个街区唯一的一条狗。

[3] 调研结束后，通过了一项重要的福利改革，更改了贫困家庭接受政府救济的条款。

[4] 其他研究人员也描述了贫困人群中类似的经济状况。参见Kathy Edin和Laura Lern，MakingEnds Meet，和Susan Holloway等人，Through My Own Eyes.

[5] 在一次访谈中，他妈妈说哈罗德想要参加一个运动队，但是她“在附近找不到”，也不会跑“那么远”（坐公交车要四十五分钟）送他到一个有运动队的社区里去。我们发现住房项目附近有一个橄榄球队，但是麦卡利斯特女士并不知道。而且参加费用也很昂贵。除了报名费之外，队员还要参加募捐，而且哈罗德来回训练和比赛时都还要有坐公交车的钱。

[6] 居民们都会长时间带着敌对情绪地盯着开车进入住房项目的白人（开车来本身就是外人的标志，因为住在救济房里的人很少能买得起车）。然而，这种敌对是依具体情况而定的。调研结束后，我参加了整个大家庭的团圆野餐，虽然在200多人的聚会上，我是唯一两个白人中的一个，却没有人盯着我看（也许是因为白人吸毒者和人力资源部的官员都不会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7] Douglas Massey、Nancy Denton.American Apartheid。

[8] 很明显，她只提到了那个男性黑人实地调研员，她并没有把我（中年白人女性）和另一个女性白人调研员包括在内。我认为，她觉得白人女性在住房项目中不会像年轻的黑人男性那样受到威胁。

[9] 在一项更精心设计的有关语言的调研中，Betty Hart和Todd Risley的Meaningful Differences(研究了42名儿童)发现，在3岁的时候，专业人士的孩子比接受救济的同龄孩子的家长每小时说的话还要多，也拥有更大的词汇量。

[10] 就像我在下面解释的，哈罗德在与同龄人交往的时候的确说话很多，语言里也加入了很多修饰成分。

[11] 有关语言运用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可以参见Basil Bernstein的经典著作，尤其是

Class，Codes，and Control。

[12] 与威廉斯女士不同，麦卡利斯特女士并没有把这一刻作为数学教学的“施教瞬间”。

[13] 我发现这段对话很痛苦，部分原因是朗纳阔实际上并没有听到麦卡利斯特女士宣布晚上不做饭了。我还发现自己很难接受让孩子饿着肚子睡觉这样的想法。然而，为了实地调研工作的连贯性，我什么也没说，也没有表达自己的担心。事实上，由于担心自己看起来是在就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而妄加评判，我也没有问麦卡利斯特女士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我猜想，除了土豆片和橘汁，家里已经没有吃的了，或者由于家里经济太过拮据，家里的食物还要留着以后再吃。

[14] 注意，在前面的那个例子里，麦卡利斯特女士因亚历克西斯骂脏字而吼了她，却在暗地里认可了女儿可以在家外说骂人的话（“别在这儿说”）。

[15] 实地调研员在笔录中解释了这个术语的意思：“打断某人的脚踝是一个进攻时的术语，用来指球运得有多么的低（即，在脚踝那么低的地方）。在这样低的高度，控球和运球特别困难。这个术语还指进攻一方的球员转换方向时的敏捷神速，这种打法会让防守一方的球员扭了脚。”实地调研员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篮球手，他还形容哈罗德打的球“[比我]棒多了”。

[16] 这个词经常发成“公牛”的音，在这里是用来嘲弄别人的，指很有威力的人。但是Elijah Anerdon在Code of the Street中说，它也可以用来表示“朋友”（第81页）。在我们的观察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哈罗德使用经典的“对骂”形式。参见Jaruce Hale-Benson的Black Children。

[17] 正如实地调研员在笔录中指出的，这个片断显示出，一个人在投篮时的形象和表现力常常比真的投中了球更重要。

[18] 实地调研员凯特琳写道：“我希望我给了她一个理解的眼神，我还伸出手臂拍了拍她的肩膀。”实地调研员（凯特琳）感到看她们打架很艰难，尤其是孩子们看上去很难过。

[19] 麦卡利斯特女士用一根棍子来威胁吉尔，但并没有真的打她。几天以后，我来访时，麦卡利斯特女士说，如果实地调研员没有在场的话，她就真的会打吉尔的。

[20] 第二天早上，另一位实地调研员很早就到了。他在实地笔录中记录下了麦卡利斯特女士的担忧。 简：（微笑着）我知道凯特琳认为我是个疯子。（我试图显得自己没有听到。）我和我妹妹昨天打了一架，我知道凯特琳受到了惊吓，但我不得不[把我妹妹]踢出家门，我对她的蠢行烦透了，她吸毒……我把[吉尔]所有的破东西都扔出门外了，凯特琳就像这样[简生硬直挺地站在那里，眼睛瞪得老大]。我感觉很不好，让她看到我这样做。（她又开始笑了。）我知道我吓倒她了。（简一边摇头一边微笑着说。）孩子们都在那儿看着。我试图示意孩子们带她离开这里。所以我告诉[他们]把门前的玻璃碴子什么的捡干净，凯特琳也开始捡了。我不得不告诉她：“不是说你啊，凯特琳！”

[21] 从家访一开始，实地调研员就没有看到过孩子们吃一次绿色或黄色的蔬菜。有罐装菠菜和山药的晚餐都是在这次体检之后出现的。

[22] Carol Heiner，Lisa Staffen，For the Sake of the Children。

[23] 在理论上，协作培养，尤其是对说理的强调，还是有可能培养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的。但是此中存在着相互抵消的力量。协作培养强调个性化的选择和课外活动，这些都把人们带出家门带到更广阔多元的场所中去。这也就减少了一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日程安排上的冲突也会增加。在家庭所做的决定中，孩子的意见也有价值，这就增加了冲突发生的次数，孩子们经常会因不得不坐等全家相聚而抱怨。他们更愿意和自己的朋友共度时光。而成就自然成长的策略则给孩子们以较少的个性化选择。

[24] Anderson，Code of the Street。

[25] 当麦卡利斯特女士别无选择，不得不让她上了毒瘾的妹妹离开时，家庭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尽管如此，麦卡利斯特女士的决定是建立在其家庭责任之上的。特别是，作为哈罗德和亚历克西斯的母亲，她有责任“给他们一个家，而不只是一所房子”，这个责任取代了她对自己双胞胎妹妹的责任。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无论黑人和白人，都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责任，尤其是因为大家庭的成员都住得很远。可以参看下一章关于中产阶级黑人女孩斯泰西•马歇尔的讨论，斯泰西和姐姐的关系很糟糕，和大家庭的关系也十分微弱。

第八章 存在于团体机构范围内的协作培养：斯泰西·马歇尔

> 忽然，体操课的第一天，斯泰西以前做的每一个动作，你知道，嗯……甚至，甚至连她在做一个技巧动作的时候，这个老师都会说“把你的脚转到这一边”或者……“你的手姿要这样摆。”没有一个动作是很棒很棒的，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动作是对的。她[蒂娜，体操老师]非得改变所有[斯泰西做的]动作不可。我有点儿怒不可遏……所以，我走到她面前说：“出了什么问题吗？”
>
> ——与马歇尔女士面谈的摘录

每个家庭都会与很多不同的公共机构发生互动。对中产阶级的母亲来说，家庭和公共机构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母亲们在这条界限的两边来回穿越，从中调解孩子的生活。当马歇尔女士，一位非裔中产阶级母亲，看到她10岁的女儿斯泰西在某私立体操班上课后有多么不愉快时，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进行干预。几乎是天衣无缝般的，女儿的问题就变成了妈妈的问题。马歇尔女士坚信，她作为母亲的职责就是确保斯泰西的活动能为她提供契机以拥有积极正面、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经历。和我们观察到的其他中产阶级母亲一样，马歇尔女士扮演着守护天使的角色，悬浮在孩子之上，密切监测着他们的生活，永远都做好了飞扑下去在公共机构场景下进行干预的准备，不论是教室，还是医生的诊室，还是日托营地。有时候，她的行为会让孩子们感到难为情，而在另一些时候，孩子们则会欢迎母亲作出的努力。

中产阶级父母代表孩子对公共机构进行干预，可以给自己带来双重受益。孩子与老师，医务人员及营地顾问之间的互动更加个人化，更符合他们的具体需求。同样重要的是，孩子们也开始指望得到这种个人化的待遇，并开始获得一套与公共机构互动的词汇和对公共机构的认识取向，这套词汇和取向都会在他们将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对他们有益。在马歇尔家，孩子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学习如何成功地应对家庭以外的世界，而且她们的妈妈也是一位超常强劲的楷模，能帮助她们学到今后与公共机构有效互动的技巧。这种模式也不是马歇尔家独有的。调研中的其他中产阶级母亲也都扮演了这种“守护天使”的角色。例如，调研中的中产阶级家长比其他家长更有可能要求某些老师来教自己的孩子（表C7，附录三）。[1]

马歇尔一家

洛丽（Lorrie）和朗尼·马歇尔（Lonny Marshall）两人都40多岁了，是12岁的弗恩和10岁的斯泰西（调研目标）的父母亲。两人在相识之前都曾结过一次婚，但那时他们都没有孩子。马歇尔女士又高又瘦又有魅力，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好几岁。她的棕色头发被拉得直直

的，只在下面边缘打着卷儿，她的肤色是淡棕色的。在家里，她经常穿一件熨平的开衿纽扣上衣、短裤和拖鞋。她说话的声音不大，很恬静。在谈话中，当马歇尔女士试图想起某件事情时，她会闭上眼睛想上几秒钟。她有大学文凭，同时还有数学方面的硕士学位。她大学时加入的（黑人）女生联谊会现在仍然还在她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她在电脑行业做全职，每周有一天在家里远距离工作，其余几天她都要（来回）开车50英里去上班。

马歇尔先生也是又高又瘦。他是家中的喜剧演员，经常开玩笑，让家里的气氛更加轻松。比如，和我见面五分钟后，他一边读着我简历上发表的文章，一边惊叹道："哎呀呀，我们真为你感到骄傲！"斯泰西和弗恩都特别喜欢他。和他夫人一样，马歇尔先生也有大学文凭，并且在大学时在他参加的男生联谊会里十分活跃。他现在是位公务员，晚上工作，每周经常要工作六天，但是不需要出差。他凌晨2：30出发去上班，下午回来较早。通常他一回家就先睡觉，有时他会在傍晚的时候才睡。马歇尔先生是个坚定的体育爱好者，傍晚时他大多是在看电视上的比赛。他是弗恩所在篮球队的教练，并和选手们一起到外州去参加比赛。斯泰西对篮球不感兴趣让他很是失望。

马歇尔夫妇都在南部长大。马歇尔女士父母的家离这里约有四个小时的车程。她每年去看望他们"三、四次"，但是每周都和他们通话。她有两个姐妹，每月和她们通话一次。姐妹三个尽量同时到父母家去看望他们。马歇尔先生的父亲20年前就去世了。他母亲曾经是位老师，她每年到儿子家里来两次；她儿子每年也会去看她两到三次。在弗恩和斯泰西的生活中，两边的祖父母看起来都没有那么重要。[2]

马歇尔家的两个女孩年龄相差十五个月。她们和父母一样，都是又高又瘦。弗恩热衷于打篮球。斯泰西更喜欢体操。调研人员是这样描述斯泰西的：

> 她有中度棕色的皮肤，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她的前额留有短短的刘海，其余所有的头发都向后系起一个紧紧的马尾巴。她上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衫，上面印着一只雌性的卡通袋獾，下身穿一条白色短裤。她笑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两个小酒窝。

就像马歇尔女士说的，她小女儿是个"有亲和力的人"，更像她能说的爸爸，而不像娴静的妈妈。斯泰西很有体操天赋，舞也跳得很好。在家里，她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待着，看电视，但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会很活泼。在她参加的夏令营里，她有一群一群的朋友常和她一起聊天嬉笑。

在家里，斯泰西没有那么兴高采烈。她和弗恩都很烦对方。她们两个经常吵架，一天总要吵上好几次。比如，一天下午，斯泰西用她房间里的分机接了电话。她对弗恩嚷道，电话是找她的。然后，斯泰西并没有挂上分机，而是在房间里偷听她姐姐的电话内容。弗恩愤怒极了，大步走进斯泰西的房间。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气急败坏地一把把电话线从墙上拔掉。斯泰西等了一会儿，然后又插上分机线开始偷听。这些紧张的场面经常重复出现。在一次九十分钟的车程中，斯泰西和弗恩又为一点小事就吵了起来，一开始俩人还是逗着玩的，但后来就真的生气了，又动手，又吐唾沫，又揪对方头发。一般情况下，马歇尔夫妇都会

把两个女孩之间的这些交锋看做是正常的姐妹对阵叫板。他们经常说些话来帮姐妹俩停战。他们也经常对孩子的行为只是相视而叹，或者在上面出现的情况下让她俩分坐不同的座位。然而也有很甜美可爱的瞬间：斯泰西用她过生日的钱给姐姐买巧克力吃，或者，当她向弗恩寻求时装方面的建议时，她对调研人员解释说："弗恩通常都知道什么看上去对劲。"

孩子和她们的父母（还有两只豚鼠"抓抓"和"小小"）住在一条静谧的环形街道上，道路两旁各有一排大房子，都是新建的两层郊外住宅，每座房子的市场价都大约有20万美金。马歇尔家的邻居们包括中产阶级的黑人及白人。他们的房子是米色的，前院有一小片草坪还有各种花卉，后院是一片大草坪（孩子们正在央求父母给她们装一个游泳池）。除了家中的两辆轿车（一辆豪华的沃尔沃和一辆黑豹的旅行轿车）以外，车道上还有一个篮球架。弗恩经常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在那儿打篮球，有时马歇尔先生也会加入进来。房子里有四间卧室，两个半卫生间（译者按：两个有淋浴设备的和一个没有的），一间陈放着钢琴挂着非洲艺术品的正式客厅，和一间融合了餐饮区和厨房的"综合大厅"。这个家庭活动区明亮而轻快，让人感觉十分舒服，里面有电视、导演椅和一张舒适的茶色灯芯绒长沙发。孩子们常把图书或随身听落在沙发上。一根体操平衡木静静地躺在地板上，人们穿过家庭活动室的时候都会跨过它。

两个女孩都有自己的卧室，每间卧室里都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电话，还有每个女孩收集的光碟、随身听、收音机和其他电动玩具。一部分也是由于马歇尔女士的工作，家里有一台电脑。虽然马歇尔一家年收入约为10万美金，但是家里面（尤其是马歇尔女士）仍然经常为钱而担心。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物价和电脑行业缺乏工作保障的谈话。马歇尔女士工作的公司近几年规模已经缩减了。她没有失去工作，但是她认识一些已经失去了工作的人。

马歇尔一家住在一个富裕的市郊，这里有各个种族居民，是一个过渡地区。这里临近市中心的边缘，一端与一大片全部住着中产阶级黑人的地区相连，另一边又与一个主要为白人的居住区接壤。斯泰西和弗恩在一所公立学校上学，该校所在的学区是公认的好学区；学区里的大多数家庭都是白人，但有25%的黑人，还零星点缀着一些亚裔和西班牙语裔的家庭。两个女孩（以及她们父母）日常生活中的种族平衡随着不同的场合而变化。在很多的互动中，所有的关键人物都是黑人。马歇尔女士解释说，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有很多特别亲密的朋友都是白人孩子，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种族间的屏障就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对弗恩来说，这个转折点发生在她念初中的时候，而对斯泰西来说，变化才刚刚开始。现在她们的社交生活就只包括住在小区里或开车几分钟远的非裔女孩。女孩们很多个周六都要去的美容小店里也都是黑人。全家都去的教堂也都是黑人。一家人还经常和马歇尔先生的一位密友交往，这位朋友就住在城市的黑人居住区。但是，全家生活中的一些重要而耗时的部分却又都是在以白人为主的场合中进行的，包括在零售店购物、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参加夏令营、在学校里的天才班上课。

一家人都很忙。他们忙碌的生活节奏与塔林格家和威廉斯家有些相

似。性别对孩子决定参加何种有组织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此类活动的绝对数量却不会因性别而改变。斯泰西在体操方面很活跃。弗恩在篮球方面活跃。两个孩子都参加主日学校，斯泰西在教会青年唱诗班里，每周五排练，每隔两个星期演出一次。两个孩子在教会里都是"少年引领员"。在学年中，弗恩要上钢琴课，斯泰西最近也开始上钢琴课了。暑假里，两个孩子都会参加一个又一个精心安排的夏令营（体操、篮球、马术）。妈妈则是所有这些活动的协调人。

与威廉斯夫妇一样，马歇尔夫妇也更愿意对孩子讲道理，而不是下达命令。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观察到他们在动作表情上表现出的失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对孩子叫嚷，也没有看到他们打孩子或者威胁要出手打人。相反，他们坚定地要帮助自己的孩子成长为独一无二又有独特才能的个体。即使在孩子们的行为有可能让别人觉得她们对大人没有礼貌的时候，马歇尔夫妇也不愿意压制斯泰西和弗恩的思想和行动。下面的例子描述了在密友家的一个片段，马歇尔女士和调研人员开车把两个孩子送到了朋友家里。朋友家20岁的儿子马克（在辈分上就像是斯泰西和弗恩的表兄）从加利福尼亚来小住，当天正在为他举行生日派对。

> 马克问大家教会的活动如何。两个女孩的回答并不怎么热情。汤姆（马克的爸爸）说："那我们吃点儿冰激凌蛋糕吧，你们想吃吗？"我和洛丽想就此撤离。[斯泰西正]坐在一张椅子上玩一种戏水用的可以喷出一股气流的玩具，其目的就是把所有的圆环都套在一根棒子上。斯泰西看起来好像很希望我们赶快走，因为她说："妈妈再见。"

主人鼓励斯泰西女士和调研人员留下来参加派对的时候，大家又闲聊着逗留了一会儿：

> 然后，斯泰西说："妈妈你赶紧走吧——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多待了。"就连弗恩都有点被她的话惊呆了——她让斯泰西闭嘴。汤姆一边跑去接正在响起的电话，一边很不赞同地看了一眼斯泰西。洛丽并没有替自己说话，只是叹了口气，看着马克说："马克，你能把她们带回加州吗？"每个人都笑了，斯泰西说："我要去加州——我能去迪斯尼乐园吗？" [3]

如果斯泰西的妈妈为她女儿的话感到难堪或沮丧，那她也没有表现出来。和工人阶级及贫困家庭中的家长不同，马歇尔夫妇都不愿对孩子下达命令，他们两人都不会仅仅因为其他成年人会感到不悦而不让两个孩子表达自己的感想。而且，在其他一些场合，马歇尔女士还会直接把与成年人互动的策略教给孩子们。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她还会努力改变其他成年人与斯泰西和弗恩互动的方式。

选择并量身定做孩子的业余活动

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家长都致力于根据孩子的特殊爱好为他们安排固定的有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经常只持续几个星期，很多都会随（赛）

季而变。而且，在暑假里，可供选择的活动和参加活动的时间都会陡然上升。了解活动内容安排、评估活动是否适合、在最后期限前报名、并协调接送孩子是件非常耗时的劳作。在大多数家庭里都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去做这项工作。即使母亲有全职工作也仍然如此。比如，马歇尔女士给两个女儿在很多不同的夏令营都报了名，并做了所有的协调工作和时间安排。弗恩和斯泰西的营地在市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报名时间，不同的报名表，入营前有不同的（体格）要求，不同的专长要求和不同的主管人士。虽然如果要他分担接送孩子的话，马歇尔先生也会去做，但是夫妇俩一致同意主要由马歇尔女士来照顾孩子们的生活和活动，以及弗恩或斯泰西对公共机构表达的任何不满。

马歇尔女士代表她女儿所做的努力并不罕见。对于公共机构，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母亲都会承担起类似的工作。例如，斯泰西是因为妈妈的努力才开始参加体操项目的，这一点就很具典型性。

> 她上三年级的时候，我找不到一个女童子军让她参加。她参加了四年巧克力糕队。弗恩在一个女童子军团队。而斯泰西还不到参加的年龄。所以我们就去了这个免费晚餐活动[笑]。所以，斯泰西……我想让她参加点什么，不至于没有事情做……我不想让她总坐在电视前面。

通过打听，她发现了一个镇区的体操班，斯泰西真的很喜欢去，而且很快就表现出了自己的天赋。当体操老师建议斯泰西进一步发展天赋时，马歇尔女士就开始寻找能提供更高一级训练的场所。斯泰西的妈妈并不满足于仅仅依赖于老师推荐的体操班，她还通过自己的关系网多方打探。

> 就从一些家长的话里，我开始听到了他们之间流传的内线秘诀，我听到很多人都说："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体操，那就要送他们去赖特体操学校。"

在这个例子里，马歇尔女士还只是为一个业余班收集信息，而在其他一些场合她确实在寻求解决孩子教育方面出现的问题（像斯泰西没有通过她学校里的天才班资格考试）。与调研中其他中产阶级家长一样，马歇尔女士"内线"的亲朋好友中充满了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律师、甚至是医生（表C8，附录三）。因此，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相比，中产阶级家长更容易通过非正式渠道从专业人员和专家那里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

然而，找到一个好的体操班、证实斯泰西的兴趣并帮她报名并不是马歇尔女士职责的终点。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家长给孩子自主权去在公共机构中摸爬滚打，而在马歇尔家，孩子生活中的大多数方面都要受到妈妈连续不断的仔细审查。

当马歇尔女士意识到出了问题时，她就会利用自己在工作中和职业上的经验技能，迅速采取行动。在迫使公共机构承认她女儿的个性化需求这方面，她表现出了极大的果敢与顽强，并在一些事情上获得了成效。斯泰西母亲这种先发制人的立场正折射出了她的信条，她认为，在感到女儿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她有义务出面干预。她所感到的这种责任在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体现出来。无论是斯泰西和弗恩的

业余活动，还是她们在学校或教会或诊所里的经历，她都一样勤勉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她处理斯泰西从镇区体操班过渡到赖特体操学校时的方法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清楚。

马歇尔女士描述说，斯泰西在体操俱乐部里的第一堂课困难重重：

> 那些女孩子并不热情。而且她们还只是……八九岁的小孩子。你知道，第一天晚上我们去上课的时候，她们并不欢迎她。她们看起来有点像是在互相眉来眼去地，要看看她，你知道，“你能做这个动作吗？你会做那个动作吗？”

更重要的是，马歇尔女士说，那个老师简单粗暴又求全挑剔，对斯泰西一点都不友好。马歇尔女士听不到里面在说些什么，但是她能透过窗户看到她们的互动。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她原来的老师并没有教她那些形容体操动作的行话，斯泰西不知道这些术语。这堂课结束后她走出教室时，斯泰西显然很沮丧。她妈妈作出的反应在中产阶级家长中很常见：她并没有提醒女儿她必须让自己去适应生活，没有提醒她要更加努力，也没有说妈妈帮不上什么忙。相反，马歇尔女士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老师蒂娜身上，认为她才是问题的根源。

> 我们在车里坐了一分钟，我说：“你看，斯泰丝”，我说。她说：“我，我”然后她就哭了。我说：“你在这儿等着。”那个老师，蒂娜，已经走到门口了。所以我就走过去对她说；“你看。”我说：“在课上出了什么问题吗？”她说：“噢……她会没事的。她只需要在某些方面再多努努力。”什么什么的。我说：“她现在真的很难过。她说你—你—你几乎[在]纠正她所有的动作。”[蒂娜]说：“嗯，她得——她得学会那些术语。”

马歇尔女士承认斯泰西对体操的专业术语和技术术语不熟悉。但她仍然继续为自己的女儿进行辩护。

> 我的确记得，我对她说，我说：“你瞧，有可能也并不都是学生的错。”你知道，我就这样点到为止。你知道，对我来说，有时候教学，教与学，是一件双向的事情。而且有时候老师必须得学会怎样，你知道，怎样满足学生的需要。她的风格，她直接使用的风格并没有去适应斯泰西的需要。

这里马歇尔女士是在维护因材施教的合理性。她把自己的开场白设定为一个问题（“在课上出了什么问题吗？”）。然而她的目的却是提醒老师，她给斯泰西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她现在真的很难过”）。虽然她的批评是间接含蓄的（“有可能也并不都是学生的错”），但是斯泰西女士清楚地解释出了她的意愿：她期望以后她女儿会得到与这次不同的待遇。在这一次的经历中，斯泰西并没有听到她妈妈说了些什么，但是她知道自己的愿望和感受已经通过一种她凭自己的力量无法达到的方式传达给了老师。

不仅如此，作为马歇尔家通常会执行的程序，斯泰西的妈妈进一步追踪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在第二天早上，她给体操学校打了电话并与学校的主人通了话。（在和斯泰西商量了之后）她要求把女儿转到高级初学班。但是那个班已经满员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很多学校斯泰西就不得不留在中级班了。但是这一次，学校的主人给这母女俩行了方便，给

高级初学班又分配了一个老师，这样斯泰西就能参加这个班了。因此，这一系列与公共机构发生的互动给斯泰西·马歇尔带来了重要的收益：她到了一个与她的技能和经验水平更相称的体操班，而且她通过观察母亲的言行学到了，她有理由要求公共机构照顾她个人的特殊需求。正如下一节所展现的，随着新体操课的不断展开，斯泰西也在不断地学习着与公共机构有效互动的艺术。

技能技巧的传输

马歇尔女士不断地为斯泰西作出榜样，并有意识地教女儿管控公共机构相关事务的策略。虽然斯泰西是否已经很好地吸收了妈妈的教导，是否学会了在公共机构中有效地应对处于当权地位的人，或者她以后能从这些教导中用到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童年时就接触到这样的言传身教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巨大的终身财富。[4]

重要的是要记住，仅仅因为协作培养的策略能带来如此多的收益，并不意味着这种教养孩子的形式就是“最好”的。每种养育孩子的方法都是有具体的历史条件的，而且也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协作培养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唯一正确的”养育孩子的方法。然而，它却是当代有权力的专业人士，比如儿童教育发展专家，所断言的最恰当最有益的儿童教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样的认可，它也就成了中产阶级赞成的方法。马歇尔女士继续和斯泰西的老师“保持联系”，不仅了解到了蒂娜对女儿的看法，还为老师提供了斯泰西对她在班里的经历作出的评估：

> 我已经对蒂娜讲过了……我在那儿就问过她：“斯泰西现在怎么样？”她说：“啊，挺好，挺好。”我说：“嗯，她有点担心，觉得她没有得到……她有点儿泄气了。”然后她[蒂娜]说：“噢，那她可不应该。”她说：“她会，她会明白的。”但是据斯泰西说，嗯，肯定是蒂娜在一次课后对她说的，嗯……你知道，“你——你肯定开始感觉不好了，因为，真的，你是唯一一个到现在还不明白的人。”（带有讽刺意味的笑。）

同样的，在她和斯泰西的谈话中，马歇尔女士也告诉女儿蒂娜都说了些什么，而且什么是老师应有的和不该有的言行。她认为蒂娜对斯泰西说的“你是唯一一个到现在还不明白的人”这句话“完全没有职业标准”。她还清楚地表明，对这句话要作出主动回应才是恰当的：

> 我说，就是——就是，我对斯泰西说——我说：“你看，你想让我替你说几句话吗？”所以，你知道，我……我的孩子知道（短促的笑），嗯，她们知道我会打电话的。她们知道我会出现的。嗯……但是我，我要让她自己决定她是否要我替她说话。然后她说：“算了，别说了，因为那样的话，她会在班里对我说‘你妈妈说了什么什么的’。”

最后这致命的一击很快就发生了。一天她爸爸接她从练操房回来，斯泰西一到家就宣布说：“她[蒂娜]说我懒。”这就导致了马歇尔女士和

斯泰西决定拒绝接受该俱乐部之精英体操队发出的入队邀请。通过这件事，马歇尔女士教给了斯泰西她有权利拒绝这样的邀请。而且，她还明确地训练斯泰西怎样去应对这个选择。马歇尔女士从自己的职业背景中汲取经验，建议斯泰西提前准备一个回答来向她的老师和同学解释她为什么不打算进精英队。

斯泰西去上下一次课之前，我说："如果她们问你为什么，你打算怎么回答她们呢？"她说："我说……"你知道，我说："你最好坐下来好好想一想。""因为"，我说，"她们有可能会问你。"当然了，她们真的问了。嗯……因为，我们讨论过了。我说，我说："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你说你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你知道。而且就点到这一层为止。

对斯泰西预先准备好了的答复，老师的反应更是增加了马歇尔女士的敌对情绪：

我记得斯泰西那天晚上下课出来，她——她哭着回到家里，说："你说对了。她的确问我了。"我说："那你怎么说的？"她说："我说我只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我说："那她们说什么？"她说："蒂娜只哼了一声'嗯'（用一种轻蔑傲慢的声音）。"你知道，就像那样。我当时心里就想，"嗬，我可真的觉得那种行为一点儿都不得体。"

马歇尔女士对蒂娜的非难十分恼火，因为她认为这些话对斯泰西有害。而且，她还觉得这个老师的话给她制造了更多的麻烦。

斯泰西是那种需要很多温暖柔情的孩子。她很容易把事情往坏处想。（叹气。）她会从班里出来，说："唉，蒂娜说了这个。"我会对自己说："嗯，这个有可能是个有点添油加醋的转述。"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她的确说了些东西。而且，显然那些话都是不该对孩子说的。还有一部分可能比较自私的原因，我[认为]，"啊，上帝啊，又有更多的事要做了。"你知道，做些提高孩子士气的事。

一部分原因是这些持续不断的问题，另一部分原因是从她家到赖特学校要开很长时间的车，斯泰西的妈妈决定开始寻找另一个体操班。我们开始观察她家的时候，她就正在寻找新体操班的过程中。她给县里的各种体操班打了很多电话，开车到两个班点去调查。参加了一个班的两次家长会，然后给斯泰西在那个她去开过会的班报了名，之后又退了出来（马歇尔女士和其他家长都十分愤怒，因为场地在开班之后开始维修，这不仅减小了训练场地，同时在家长们的眼里也对孩子们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并给其中一个班的主管打电话提意见。整个过程她都十分焦虑。比起家里其他任何人，体操的决策问题在马歇尔女士心里似乎都更重。她有份全职工作，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开车接送孩子，还成功地应对各种各样的复杂任务，即便如此，她仍然继续调查各种可能性，坚决要为斯泰西在体操方面找到最好的选择。

很多时候，斯泰西都陪着妈妈去寻找合适的体操班。因此，她学到了需要用什么标准来评估一个体操班，还发展了一套用以表达自己观点的特定词汇。比如，当斯泰西、她妈妈和调研人员带着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参观一个体操班时，斯泰西就参与到了一个有关跑道长度的谈话中来。虽然她只有10岁，但是她说话却很有权威感：

斯泰西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比现在省下1.8米……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剩下的地板拆掉……之后我们跳马时就会有一个更长的助跑跑道……"

几天后，在和体操班的教练见面时，斯泰西就可以很流利地描述自己的技能水平，而且是她，而不是她妈妈，对自己的技能进行的描述。因此，当教练和斯泰西的妈妈讨论适合她水平的班级时，斯泰西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参加了两个成年人之间的讨论。出了校门之后，她已经准备好给出自己的想法了：

我们一进到车里，洛丽就问斯泰西有什么想法。斯泰西说："挺好的。"她停了几秒钟，又说："如果我们周六来上课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能否可以使用整个场馆。"

马歇尔女士会给斯泰西在哪里报名做最后决定，但她显然很珍视斯泰西的意见。她鼓励斯泰西给出自己的评价，当斯泰西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她把女儿的意见看得很重要，如果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话。

提早并经常对学校进行干预

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长可能会与房东据理力争，但却会默默地接受任课教师作出的决断。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不同，马歇尔女士对许多公共机构中的所有代表人都采取同样从容果断的方式，只要这些公共机构影响到了她女儿的生活。例如，斯泰西和弗恩所在的学校有一个天才班，天才班专招精英尖子生，并为其提供丰富多彩又具有挑战性的课程。马歇尔女士认为把女儿送到天才班会给她们带来明显的优势，因此，当两个孩子刚好因2分之差而没有达到智商测验的分数线时（斯泰西得了128分，分数线是130分），她们的妈妈就及时采取了行动。[5]利用学校老师非正式的建议、家中丰富的经济资源和她自己强大的决心，马歇尔女士了解到了请求改变决定的方针路线并根据这些方针采取了行动。她安排两个女儿参加了一次私人测验（每个孩子200美元），把两个孩子都送入了天才班。

就像把斯泰西送到私立体操学校只是一系列长期干预中的第一步，把斯泰西送入天才班的情况同样如此。马歇尔女士仍然与天才班的顾问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监督校方为她女儿挑选的教师，并在数学老师没有（依照天才班的政策）通知她一次要使用计算器的重要考试正迫在眉睫时提起主诉。此外，她还时常提醒老师们要注意她女儿那种慢热、仔细又井然有序的学习风格。这些习惯经常使得斯泰西无法在分配给她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功课（例如，考试时她可能只能做完大约一半数学题）。斯泰西在正式的限时考试中就没有在不计时的时候考得好。马歇尔女士并没有催她女儿动作快点，也没有坚持让她学些新的策略来提高速度，相反，这位母亲想方设法让所有关键人士都了解到她女儿的特殊情况。她对他们的期望很明了，就是，一旦他们被告知了斯泰西的学习

风格，老师们就会调整他们对斯泰西的要求。

马歇尔女士相信她有权利也有责任对课堂教学施行干涉，很多中产阶级家长，尤其是母亲，都和她观点一致。我和我的助手们听课调研的斯旺小学是所中产阶级学校，以白人为主。这里的老师说，家长们经常闯进学校来抱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例如，三年级一个班的学生要在另一个班表演小品，在这当中时间安排起了冲突，所以有些孩子没能在同学们面前进行表演。这使得三个母亲在第二天一早就到学校来说她们的孩子是如何如何的失望，并质问校方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够表演而另一些孩子却没有得到机会。更广泛地说，斯望小学的学生家长会毫不犹豫地批评老师选择的作业项目、读书笔记、家庭作业的难易程度、或者教室里的座位安排。有些母亲比马歇尔女士的风格要大刀阔斧得多。比如说，卡普兰夫妇就掀起了一项（成功率比较有限的）请愿活动，要求学校把“就让我们鞠躬来崇拜神的恩德”这句歌词从多元文化假日节目中去掉。之后，卡普兰夫妇又给负责人写信，指控这首歌“违反了政教分离的法律规定”（唱诗班老师的反对被驳回了，这首歌最终也被去掉了；学区里还就此事重新学习了有关政策）。然而，尽管家长们的风格有所不同，他们使用的方法却是相同的：这些中产阶级家庭都使用了协作培养的模式，对孩子在公共机构中的经历进行密切的监控。

种族：恒常的忧虑，间歇性的干预

作为一位黑人母亲，马歇尔女士是在一座连游泳池都依种族而隔离开的小镇长大的，她从自己的经历中了解到，微妙的种族歧视总是无所不在。当她自己的孩子在公共机构中遇到困难时，孩子们有可能是遇到了缺乏种族敏感度或是种族歧视的人这种可能性，就会自然而然地隐隐浮现在马歇尔女士眼前：

> 这个总在我身上发生。部分原因是我在那里[南方]长大。我知道被，嗯……歧视的感觉。嗯……我知道那种微妙而又微妙的歧视仍然存在。任何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孩子身上，你知道……在某个运动队或者什么的，或是在教室里，我不得不有几分挣扎……嗯，到底这里有没有种族问题？我心里有一部分总认为是有的……有时候真的就是种族问题——在贴标签的方面——或是看人下菜式的分类上。你知道，嗯……当斯泰西[从赖特学校的教室里]出来的时候，她说：“哼，蒂娜都说了这些。”我不得不仔细倾听。我不得不怀疑，你知道，“她为什么说那些话呢？”

那么“仔细倾听”是否足够呢？某些情形是否需要更积极的干预呢？决定何去何从并不是件易事。因为种族歧视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在某个具体情况下把种族单独作为一个关键因素提出来会很困难。马歇尔女士对斯泰西在赖特学校的经历作出的反响十分复杂，夹杂着很多矛盾心理、事后对自己决定的怀疑和不安全感：

> [我觉得]……那是，那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态度。而且，嗯……她那样[蒂娜][对斯泰西说了那些话]是因为这是个黑人小孩。你知道……她说斯泰西不会有什么前途[不会成为明星队员]。但是……从我看到的其他资料里，剪报什么的，他们也有少数族裔的孩子是尖子生。所以，也并不是他们整个体操队都是白人[或是]我的孩子永远

不能进那个精英队。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的孩子有足够好，我——我觉得他们会的，我——我敢肯定他们会要她的。你知道，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赢得比赛。你知道，不论你是黑人、红人、黄人、绿人，只要你好，他们都会要你的。你知道，因为他们想要赢。

当弗恩感到篮球营地的孩子们都排斥她、对她不友好的时候（在大约一百个女孩中，她是唯一的一个黑人），马歇尔女士又一次犹豫了，思考着怎样回应会更好。

一天弗思回到家里，正和斯泰西谈论着这件事。她……我说："篮球营地怎么样啊？"她说"还好"，她说，"就是午饭时候不好。"我说："你和谁一起吃的？""我自己一个人吃的。"（马歇尔女士深深地叹了口气。）

弗恩认为这事和种族有关：

弗恩说："你知道。"我说："那你跟她们讲过话吗？"她说："是，我跟她们搭过话。"……显然，她们并没有不理她……她们谈到了谁比赛的时候得分了……而且，她们也一起打球了，但是到吃饭的时候——就变成她一个人独自吃饭……那里的职员[会员]也是孩子——高中生，同队的女孩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大人带头，像是，把弗恩放进一群一起吃饭的孩子里。我问她："你想让我替你说话吗？"她说，"不用。"部分原因是这只是个为期一周的活动。（弗恩的营地只有一个星期。）

马歇尔女士只在给弗恩报名前和教练有过一次很短暂的通话，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和他拉上关系"，所以也没有办法与他就这件事情"进行对话"。她考虑过，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和他谈了。[6]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通常是在一段时间警觉的详细审查之后，她的确会出面进行干预。她描述了孩子们和校车司机之间发生的一些风波：

去年弗恩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我。她说："阿特是个种族主义者。他让所有的黑人孩子都坐在车的后几排，而且他只对我们嚷……"等等、等等的。你知道，对这个，我又是很专心地倾听，而且我想，"嗯，她只是个孩子，你知道，是她有点过敏了，还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呢？"

弗恩到12岁的时候就几乎每天都在家里提起种族问题。与弗恩不同，斯泰西很少把事情理解或论述得充满种族色彩。但她也提到了阿特的问题：

今天斯泰西也开始坐校车了，她也开始告诉我同样的事情。她说："阿特，阿特总跟我们过不去。"她说："连我们要开窗他也不让。"

虽然她知道两个女儿的担忧，但是马歇尔女士并没有马上就开始干预，也没有把女儿的话告诉学校的工作人员。相反，她只是继续观察情况。

我从来都不会一把她们送到车站就离开。校车在这边路口的拐角处等着接她们。我总会坐在自己的车里并开始注视着她们。你知道，就是要看着孩子们都坐在车的什么部位。

除了限制孩子们坐车的位置之外，校车司机还在贯彻谁可以乘校车的政策时对每个孩子的要求不统一：

> 在政策上对不同的种族似乎也是有区别的。有一天，一个白人小男孩要把一个小朋友带回自己家，他并没有（家长写的）条子，但却让他上车了。而几天以后，一个黑人小姑娘要带自己的朋友回家，司机却不让她上车。

该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弗恩的社会教育课上，其他孩子——包括白人孩子——都附和了弗恩对阿特的观点，说："对，阿特的确做了这些。"白人孩子的确认帮助马歇尔女士克服了对指控阿特的犹豫不决。她给学区的管理办公室打了电话，并与运输服务部的主任通了话。他们告诉她："你知道，我们不会，我们是不会容忍这种行为的。"

马歇尔女士不仅仅了解这个问题的性质，同时也知道如何通过公共机构恰当地解决问题。

> 主任的解决方式和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应该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他说："那可是，"他说："如果你一开学就打电话了，我们可以在校车上安一个摄像头。"我说："我没有要求你们在校车上安摄像头，我就要你们让这个司机知道孩子们感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而且家长们，至少有一个家长，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他开始对我讲学校的校车是校区与车服公司契约而成的（这就意味着，从法律上讲，学区不能直接和司机对话）……我说："那样的话，你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给车服的主管打电话。"（着重号由作者所加[译者案：原文如此，但本版书中并未发现此段有任何着重号]。）

马歇尔女士打算在秋季学期还未开始时就给运输管理官员打电话，问出谁会来开校车。同时，在斯泰西和弗恩表达她们对阿特的不安时，她看起来很苦恼，不知道该对女儿说些什么，只是强调说，当她们在这个社会上前行的时候，她们不得不"把每个人都看成一个个体"，不要认为所有的白人都会像阿特那样。

协作培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对公共机构的监督

借用布迪厄的理论话语来说，黑人和白人的中产阶级家长，尤其是母亲，都会常规性地不断审视搜寻视野中的各种机会，来代表自己的孩子激活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7] 他们很精明地把自己的干预建筑在与公共机构（诸如学校和公立或私立休闲班）相一致的组织程序上，这样，家长就能为孩子获得重要的优势。这些受益要远远超出短期的目标，像进入"最好的"四年级老师教的班里，或是挤进"最好的"体操班。通过教他们的儿女怎样让公共机构满足自己个人化的需求，白人和黑人的中产阶级母亲就把那些有可能在孩子成人后都会极有价值的技能传递给了他们。这些优势是以阶级地位为基础的。正如后面几章里即将展示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与公共机构之间所打造的那种关系，与中产阶级家长打造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不同，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都是如此。

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种族的确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却不是在家长是否或如何干预孩子在公共机构中的生活这方面，而是在他们监督的是何种问题以及家长和孩子面临的潜在问题数量多少上。中产阶级的黑人家长——他们的孩子常常会在以白人为主的环境中度过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都会不断地去处理其他孩子及成年人的种族排斥行为或不得体的行为。马歇尔女士和其他非裔家长也都对白人可能会看低自己的孩子很警觉，不论是在体操还是在数学方面。这种警惕性就意味着黑人中产阶级家长，尤其是母亲，比白人中产阶级家长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因为他们担心种族平衡的问题及其他孩子的不得体行为，也因为他们还要对自己孩子的反响作出恰当的回应。有时候，家长和孩子都会遇到艰难和痛苦的情况，就像马歇尔家的孩子在坐校车时所面对的。一方面要承认孩子评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要尽力对一个人人平等、种族相融的社会存有希望，这是马歇尔女士和其他黑人中产阶级母亲共同面临的一个持续性的挑战。

当家长通过监督、批评和干预孩子在公共机构中的生活而致力于协作培养的时候，孩子就会获得重要的受益——或利润。要是没有妈妈的帮助，斯泰西就无法进入天才班学习；因为她妈妈的干预，她才可以进入为她而多加了师资力量的高级初学者体操班，由于她妈妈的仔细搜索，她才能在该地区最好的体操班和马术班上课。有个别时候斯泰西也并不感激妈妈的努力，但是大多数时候她的确很感谢妈妈为她铺平了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马歇尔女士看起来的确能让女儿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惬意。然而，在其他家庭中，干预和结果之间的这种积极正面的联系却并不总是会出现。下一章将要描述的汉德隆一家在家庭作业上经历的旷日持久的搏斗，就向我们揭示了中产阶级家长在致力于干预孩子的公共机构生涯时所面临的艰辛与困难。

[1] 对有关家长参与学校的类似结果，参见Elizabeth Useem的文章“Student Selection intoCourse Sequences in Mathematics”，Annette Lareau的Home Advantage，和美国教育部的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2001。另外也可参见John Diamond的文章“Beyond Soaal Class”。

[2] 夏天的时候，女孩子们到外祖母家住了一个星期，但是才住了几天，她们就给家里打电话，吵着要父母把她们接回去。她们觉得和这些年长的亲戚住在一起，生活极其受限制。

[3] 实地调研人员感到很震惊。她写道，斯泰西的话“[是]很不中听，会让很多孩子被父母抽嘴巴的”。

[4] 当然，家长帮孩子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也有可能让他们学到无助感和依赖感。

[5] 如附录一所解释的，斯泰西不在斯旺小学就读，因此处在不同的学区。斯旺小学天才班的分数线是125（加勒特•塔林格只差几分），而在斯泰西的学校，分数线为130。

[6] 当我问马歇尔女士她会对教练说什么时，她解释说，她会先拐弯抹角地对付这个问

题：我会说我很担心，我担心她午饭时感觉不是很自在。我很可能会问，我会说："都怎么样啊？"我会先说："一切都还好吗？"你知道，"你知道我女儿弗恩吗？我只是有点担心，因为她说，她，你知道，她自己一个人单独吃的饭。"或者，"我只是，我想让她拥有一段于身心都有益的经历，我只是想知道……"

[7] 用布迪厄的话来说就是，马歇尔一家在读取"场域"（对"场域"概念的讨论参见附录二）。

第九章 跑偏了的协作培养：梅勒妮·汉德隆

“有时我就想，要是孩子没有家庭作业的话，生活该会有多轻松啊。”

——汉德隆女士

在中产阶级中，孩子的业余活动常会深深地渗入家庭的中心，由此也为家中的矛盾冲突创造了机会。对汉德隆一家来说，孩子的家庭作业一直是全家和谐生活的最大威胁。几乎每次调研人员到汉德隆家访察时，因家庭作业而起的冲突都会发生或被提及。汉德隆女士那句要是没有家庭作业“生活该会有多轻松”的评论，很好地总结了这个问题给其家庭带来的巨大影响。

与塔林格、马歇尔和威廉斯家一样，汉德隆家也拥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他们处于很好的地位，能够干预自己孩子的公共机构生活。汉德隆夫妇使用的某些策略是协作培养中熟悉的组成部分。例如，同马歇尔女士十分相似，汉德隆女士也通过给女儿梅勒妮量身定做课堂经历来尽力保证她在学业上获得成功。和马歇尔女士不同的是，汉德隆女士只是间歇性地与学校保持联系，并只得到了一部分她需要学校做的调整。汉德隆夫妇在教育方法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们强调在自己家中开动资源。汉德隆女士在家庭作业方面不断地作出巨大的努力。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她都会花很长时间很多精力来帮助梅勒妮完成作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策略却没有产生积极效果，只是造成了母女之间的竞争，让两个人都在情感上十分疲累，而且也没有在公共机构中得到任何利益。

汉德隆一家

琼·汉德隆（June Handlon）已经步入中年，瘦瘦的，留着波浪形的红色头发，全身洋溢着一种轻松自如的气息。她的丈夫哈罗德（Harold）个子很高，很友善，脸上总带着孩子般的憨笑。虽然汉德隆先生热衷于高尔夫球，但他却超重大约45斤。他持有信贷与财务管理的硕士学位并在一家大型企业作信贷经理。汉德隆女士完成了两年的大专学历并在森林基督教长老会（Sylyan Presbyterian Church）当秘书。她每周工作30个小时。

汉德隆夫妇有三个孩子：哈里（Harry）上八年级；汤米（Tommy）在附近一所初中读六年级；还有梅勒妮（Melanie），我们调研的焦点，在邻近的小学读四年级。哈里又高又瘦，略长的棕色头发总是藏在那顶（朝后戴着）几乎永远也不会摘下去的棒球帽下面，他热爱乡村音乐、街道曲棍球、还有最最喜欢的赛车。相比之下，汤米更喜欢戏剧和表演。梅勒妮和两个哥哥都不同。在汉德隆家第一次访察的实地记录是这样描述梅勒妮的：

> 梅勒妮带着羞涩的微笑来开门。她年龄很小，个子约有1.3米。她有一头长长的金发……头上戴着一根细细的白色塑料发卡，把所有的头发都向后拢了过去。她的脸圆圆胖胖，脸蛋很丰满，这让她的眼睛显得小小的，像是眯成了一条缝。她穿着一件紫色的高领衫，下身穿着一条配套的紫色针织裤子。衣服很紧，显出了她圆圆的小肚皮。

在学校里，梅勒妮更多的时候经常是怕羞胆小的，并不怎么果断自信。她虽然并不特别受同学爱戴，但也不是个孤僻自闭的孩子。她经常因为小病而请假不上学，比如，嗓子疼、脚疼或者感冒（但在一次访谈中，梅勒妮向一个调研人员坦白说，有时她是为了避免上学而故意假装生病）。一位老师担心她被挡在了两个哥哥的“阴影”里。事实上，在吃饭的时候，往往都是她的两个哥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而她则得不到什么说话的机会。

尽管如此，她在某些时候也可以很外向、很可爱地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例如，一天，她在学校里学了用西班牙语来唱“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歌。当天下午，梅勒妮为自己的成就感到特别高兴，把这首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唱着。她在车里唱，还在写作业的时候唱。她一边吃晚饭一边唱。事实上，她整个傍晚都在唱这首歌。没有人欣赏梅勒妮最新学会的技能，但她的热情看起来并未因此而减退。她还喜欢和爸爸一起闹着玩儿，包括朝他的肚皮扔纸飞机。因此，虽然把她描述成羞涩十分贴切，但是梅勒妮能够也的确会随着环境的变换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在汉德隆家中，大多数家务，以及安排日程，协调家庭成员的活动和接送孩子参加活动和赴约，都是汉德隆女士的职责。尽管汉德隆先生的工作日程十分有规律（他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出门，晚上6：00回家），他却很少为孩子操劳。相反，他负责处理像为教会的庆典游行摄像和悬挂家里圣诞树上的彩灯这样的事务。

汉德隆一家的世界

汉德隆一家，尤其是梅勒妮，生活在一个全部是白人的圈子里。在梅勒妮的小学里，她所在的四年级约有60名学生，其中只有五名不是白人。同样的，在梅勒妮的女童子军和她家所在的教会中，白人也占了绝大多数。与汉德隆家全部为白人的社交世界结合在一起的，甚至是一个种族之间更加隔绝的自然环境。她家四间卧室的家宅（一座在20世纪40年代修建的二层砖石小楼，价值24.5万美元）就坐落在郊外一个纯白人的社区。

汉德隆家的年收入约在8.5万美元到9.5万美元之间，是很稳定的中产阶级，看起来他们对很多中产阶级的生活要素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电器（电视、立体音响、录像机、电子键盘），每个成年人都有一辆车。三个孩子都至少参加了一些成年人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的花销被轻易地说成是“很少”和无关紧要。汉德隆一家一点儿也不给人他们会“精打细算”的感觉。他们家里很乱但很舒服。在我们家访

的时候，汉德隆女士有点不好意思地道歉说：“我不擅长家务。”事实上，饭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优惠券、短袜、用过的杯子、一筐洗好了但还没有叠的衣服，以及一堆一堆的报纸。有时候在厨房里，还没洗的盘子在洗碗池里堆得老高，桌子上也有没洗过的盘子。在客厅里，装点圣诞树的时候，放装饰品的盒子半开着摊在地上一个多星期。不整洁到这种程度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是很少见的，但却并不会让汉德隆一家觉得心烦。

和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不同，汉德隆家的亲戚都住得很近。梅勒妮的父母都说自己与各自的大家庭在感情上十分亲近。他们说，他们每周都要至少串一次亲戚，而且还和他们一起度过重大的节日，包括每次感恩节都会有二十多个人到家里来。汉德隆一家与亲戚的往来比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要多得多，但是他们与亲戚联络的方式同工人阶级及贫困家庭的并不一样。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与表兄弟姐妹之间不拘礼节的玩耍和拜访并不只是一周一次或在特殊日子才有，与其相反，这些在他们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则是占主导地位的。

相互竞争的价值：有组织的活动和未组织起来的时间之重要性

与其他中产阶级孩子相比，梅勒妮并没有充斥着各种有组织的活动的“繁重”日程。然而，她放学后也绝不是无事可做。在十二月份，她会有好几个常常都会去的各种节假日活动。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参加一个教会的清晨礼拜、主日学校和青少年唱诗班的排练。每周一她有钢琴课，周四去女童子军。除了这些常设的活动以外，梅勒妮还在一个周一晚上参加特别女童军的“为无家可归者做饼干”节日活动，还有一个周二晚上的学校假日音乐表演。在她与正牙医生的预约和为教会的圣诞庆典做的五次排练之间，她还设法完成了圣诞购物。

梅勒妮也不会抱怨日程安排得太满，她父母也不认为她的活动太耗精力。实际上，汉德隆女士觉得三个孩子参加的活动都没有附近邻居家的孩子们的多。汉德隆夫妇都认为孩子应该有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未经组织的时间。汉德隆先生很明确地批评了家长们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过满”这一倾向。即便如此，夫妇俩还是都希望梅勒妮再参加一项活动——他们想让她在春季学期里加入游泳队。去年预选赛的时候，梅勒妮把参加资格推辞掉了。她父母总是会时不时地提起这件事，包括在圣诞节的时候。汉德隆夫妇认为梅勒妮参加游泳队在客观上确实会给她带来好处，显然，这种信念战胜了他们对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过满”的抵抗。找到平衡是件很难的事。中产阶级家长（特别是母亲）担心，如果他们的孩子不报名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孩子们在放学后和春假及暑假的时候就会没有玩伴。这种担心显然也给了汉德隆夫妇很大的压力。他们除了想给梅勒妮在游泳队报名之外，还想让她试试垒球。一个冬天的早上，在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梅勒妮的妈妈三次提到了垒球。虽然她每次都把打垒球说成是梅勒妮自己的决定，但她其实却是在力劝女儿参加并明确地说她担心梅勒妮不参加的话就会被“落下”。最

终，梅勒妮说：“好吧，我去打。”这样她妈妈才不再提这件事了。

汉德隆夫妇很积极地鼓励梅勒妮参加那些她自己并没有要求参加的活动，这样做的一个显著而非计划内的结果就是梅勒妮会迅速而频繁地抱怨说：“妈妈，我觉得这个真没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观察到，调研中其他看上去很忙碌的中产阶级孩子都会同样自称“没意思”，但我们却没有从相比之下“时间安排得不够满”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那里听到这样的言论。

培养学业有成：在学校进行干预

与其他中产阶级的母亲一样，汉德隆女士在监控、批评和干预梅勒妮的学校教育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她设法和梅勒妮的老师保持密切合作。例如，在学年刚开始的时候，梅勒妮生病了，她就带着梅勒妮到学校里露了很短的一个面，好让女儿和老师见个面。梅勒妮一好起来，汉德隆女士就询问落下的功课，向老师请教不明白的地方，并帮女儿跨进四年级的课程。

> 她有点儿懵了，因为其他孩子都已经学了很多东西，而且梅勒妮也不明白大家都在学什么。所以，我到学校去了，基本上，每天都去，跟老师谈话并请教问题。[1]

梅勒妮的小病总是绵绵不断，所以她妈妈的干预也没有停止过。为了不让梅勒妮落在后面，汉德隆女士要求老师让女儿提前把拼写单词表带回家。每次拿到新的单词表，她都复印下来并把每个词单独剪下来贴到索引卡上做成抽认卡。她和梅勒妮出去办事的时候就带上这些卡片，她们一边开车一边练习拼写。梅勒妮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排在垫底的位置。汉德隆夫妇曾为她雇了一个家庭教师，但是汉德隆女士担心这会给女儿一种“威胁感”，让上学成为一件“负面”的事情。她认为梅勒妮缺乏自信心，觉得“她需要一些能给她积极正面感觉的东西”。有一回在与老师交换意见时，她很明确地向梅勒妮的老师提出了这些观点。在一次家长会上，汉德隆女士特别把教社会教育课的老师提出来，说老师在评分时太过强调负面的东西：

> 她把社会教育的试卷带回家，试卷的最上面赫然写着个“N”（“需要改进”——这是最低分）。我看着试卷并数了数所有她答对的题目。我说：“梅勒妮，和上一次社会教育的考试相比，你这一次答对了18道题。”我说：“这比你上次答对的要多好多，所以你还是有进步的。”但是，单从试卷上的得分来看，她看不到自己的进步。那个分数只是很负面，一个“N”……所以，我正设法让她开始看到自己正面的优点。

汉德隆女士在家长会上说的话显示出，她认为自己有资格指出在她看来老师在教育梅勒妮时的失败之处。这种观点在中产阶级家长中很普遍，其中也包括那些在来回接送孩子上学的途中及其他活动中与汉德隆女士有交往的很多母亲们。汉德隆女士是当地女童子军的带队人，这也给了她很多非正式的机会，就小学里的常规活动和不寻常的事件交换信息。

[2] 汉德隆女士知道很多母亲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抱怨，而且很多母亲也都在忙着为自己的孩子寻求各种个人化的教育。

汉德隆女士深入到了一个由中产阶级母亲组成的社交网络中，这个社交网络塑造了她在对梅勒妮的教育问题上的权利感和责任感。 [3] 她和其他母亲看起来都很轻松自如地对孩子在校教育的各个方面提出意见，对每件事情都提出批判，从老师的教学风格到教室公告牌的内容。

伊克斯先生（梅勒妮的四年级社会教育老师）。我从家长们那里得到了[对他的]负面评价。他们不喜欢他的教学方法。他们不喜欢他的生硬态度。他们也不喜欢霍顿斯女士（梅勒妮三年级时的老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特别守旧，没有改变过或调整过自己的教学。她的课堂教学索然无味，没有一点闪光之处或是扣人心弦的地方。她的公告牌也不振奋人心，对让孩子为学习而兴奋一点帮助都没有。在学期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不喜欢霍顿斯女士]，但是梅勒妮总会在试卷上有很多答对了的问题，可是得到承认的却总是她哪道题答错了。

汉德隆女士的社交网络还为她提供了有关其他家长如何解决学校相关问题的信息，比如如何确保家庭作业能按时完成并正确无误。她在和其他母亲的谈话中发展了与教育工作者交流互动的策略。

[我们中有些母亲]在谈论即将召开的家长会，谈到了要提出哪几点，还有我们要谈些什么问题。我从家长当中听到的最大的忧虑就是作业太多了。孩子们每天晚上、每个周末都得做作业。无时无刻不在做。

尽管她相信梅勒妮的老师留了太多的作业，尽管她知道其他家长也有同样的反响，汉德隆女士却并没有向老师或学校的管理层人员直接提到有关作业数量的问题。相反，她设法自己帮助梅勒妮，每天下午都在家里和她一起温习功课。

培养学业有成：在家中进行干预

在与他们分别作的访谈中，汉德隆夫妇都把家庭作业看做是家里的主要问题。汉德隆女士说得直率又简洁：“我们最大的矛盾就是家庭作业。”她这样告诉提问者说。汉德隆先生把重点聚焦在孩子们作业的数量上。他估计说，梅勒妮“每天晚上要做两到三个小时[的作业]”。他是这样描述家里的常规活动的：

我们每天晚上就只做作业。他们放学回家，吃点零食，然后他们就开始做作业。然后他们就一直做，直到我都回家了他们还在做。作业也真的太多了。我觉得我在大学里都没有做过这么多的作业。

汉德隆女士在访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而且一天下午她还在随意之间与一位调研人员在小客车里等着接梅勒妮放学回家的时候，又提起了这件事，

[梅勒妮][星期天]和她爸爸一起做了四个小时的作业。从3：00做到了7：00。

我简直不敢相信老师周末还留这么多作业。他们就没有别的事要做吗？

汉德隆夫妇并不认为所有的家庭作业都是不好的，他们看起来都接受大多数中产阶级家长的观点，认为孩子要想学习好就必须做家庭作业。他们所反对的是作业的数量之多，他们的几个孩子都花大量的时间来做作业，他们自己也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辅导孩子做作业，还有作业本身也没有什么价值。这些因素，无论是单独存在还是合在一起，都导致了另一个难题，也就是家里恒常存在的紧张状态和矛盾冲突。家庭作业总会引发长时间痛苦的战斗。汉德隆女士和梅勒妮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想法，比如，汉德隆女士该对梅勒妮在家庭作业上提供多少帮助，在哪些方面提供帮助，怎样提供帮助。

梅勒妮争辩说，作业太难了，即使有人帮助也做不出来。她妈妈则认为梅勒妮需要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尤其是数学作业，汉德隆女士设法一步一步地带着梅勒妮解答每一道题。因此，即使在题目对梅勒妮并不具有挑战性的时候，母女俩还是要花很长时间来做作业。对于那些理解有困难的作业，她们有可能还会花更多的时间：母女双方都经受的一种全方位的挫败感经常是这些作业辅导时间的显著特点。

不足为奇，梅勒妮和她妈妈都不盼望着一起做作业。梅勒妮的第一道防线就是采取进攻，就像下面的摘录中所展示的那样。梅勒妮放学后一坐上家里的小客车，就马上提到了——同时也压低了——她有家庭作业这一事实：

汉德隆女士（用愉快的声音）：怎么样啊？
梅勒妮；还好。（停顿）我今天只有数学作业。
汉德隆女士：有多少道题？
梅勒妮：十道。嗯，也许有二十道吧。
汉德隆女士：那还不太多。只有数学作业吗？
梅勒妮：对。

但是，她妈妈还是不想就此放下这个话题。在进一步的探究中，她又问起了其他的科目。梅勒妮很不情愿地说出了其他几门课留的作业。她虽然吞吞吐吐地，但还是说了实话：

汉德隆女士：你没有社会教育课的作业？
梅勒妮：嗯，可能有一点儿吧。
汉德隆女士：那拼写作业呢？
梅勒妮：噢，对。我明天有个拼写测验。

一回到家里，梅勒妮就开始在写作业前不紧不慢地吃零食、休息。她要妈妈允许她听音乐。她很高兴地选了《胡桃夹子》并把立体声的音量调得很大。然后母女俩就坐在餐桌边上开始做起作业来。

梅勒妮：我做什么呢？

梅勒妮的妈妈大声地朗读了一遍题目说明，然后和梅勒妮一起做第一道题。

汉德隆女士：明白了吗？你把这个余数填在这个方块里。
梅勒妮：哦。

随着她们进行到第二道题，汉德隆女士继续手把手地帮助梅勒妮。

汉德隆女士：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52里有多少个7的倍数呢？嗯，5乘以7等于几呀？
梅勒妮：35。
汉德隆女士：对。所以，这个太小了。那么，7乘以6呢？7乘以7呢？
梅勒妮：42。49。
汉德隆女士：对。所以你把这个放在哪儿呢？还剩下多少呢？你得借位了。对。然后把余数填在下一个方块里。你怎么解这道题呢？

在做另一道题的时候，妈妈说题目看起来比较容易，梅勒妮拒绝了妈妈的说法：

汉德隆女士：这道题目比较容易。
梅勒妮：这些都好难啊。
汉德隆女士：这是5的倍数！你已经学会5的倍数了。
梅勒妮：我知道1的倍数、5的倍数和10的倍数。
汉德隆女士：那你就数一下5的倍数。（梅勒妮开始数。）
汉德隆女士：对。那答案是什么呢？（梅勒妮给出了一个回答。）
汉德隆女士：对。那你把它填在哪儿呢？（梅勒妮把答案写在了一个地方。汉德隆女士拿起铅笔，用橡皮的那头把梅勒妮写下的答案擦掉了。）
汉德隆女士：不是这儿。（梅勒妮又写在了另一个地方。）
汉德隆女士：对了。那现在余数是什么？（梅勒妮给出了一个答案。）
汉德隆女士：不对。余数是什么？（梅勒妮又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汉德隆女士：对，然后把它填在那里。然后再带着它去解下一道题，好。

梅勒妮和妈妈就这样做了十五分钟。然后她们之间的交流就开始崩溃了。从梅勒妮的角度看，这些题都太难了，她觉得自己做不出来。她不想做了。她的兴趣动摇了，她的回答也越来越不着边际。汉德隆女士很快就作出了反应。

梅勒妮：这个太难了。
汉德隆女士：梅勒妮，我觉得你把它想难了。你在学校里怎么做的呢？
梅勒妮：我们用了小立方体。
汉德隆女士：那你们怎么作出答案的呢？
梅勒妮：我们分成小组一起做的。
汉德隆女士：谁和你一组呢？
梅勒妮：艾米丽。但是我们是一起做的。
汉德隆女士（建议了一个新的方法）：如果用一分钱来做，会不会好一些？

梅勒妮点了点头，她妈妈就在抽屉和钱包里搜寻了一下，找到了一大把一分钱，放在了桌子上。梅勒妮开始把硬币在桌子上排成了相邻的两横行。她站起来向桌子的一边挪了挪，排着硬币。汉德隆女士绕过来站在她旁边，问："你干吗呢？"汉德隆女士并没有给梅勒妮解释的机会，就把她刚刚排好的硬币都打乱了。梅勒妮抗议说：

梅勒妮：不要！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汉德隆女士：那好，给我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梅勒妮把42个硬币排成了两个相邻的横排。然后她拿起硬币把每四个分成一组。她妈妈又一次插了进来。）

汉德隆女士：梅勒妮，给我解释一下你在做什么。（梅勒妮继续排着硬币，没有说话。然后她就停下了。）

汉德隆女士：然后怎么样呢？

梅勒妮：然后我就数有多少组。

汉德隆女士：但是你得用7来除。

梅勒妮：啊……

汉德隆女士：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明白你在做什么。（梅勒妮又重新排列了硬币，把每组中放7个。她自己解答了后面的两道题。当她在做一道需要用6去除27的题时，她妈妈又插了进来。汉德隆女士开始为梅勒妮把硬币分成6个一组。）

汉德隆女士：6乘以1等于多少？

梅勒妮：6。

汉德隆女士（又放下6个硬币）：6乘以2等于多少？

梅勒妮：12。

汉德隆女士（又放下6枚硬币）：6乘以3呢？

梅勒妮（数了数硬币）：18。

汉德隆女士（又放下6枚硬币）：那6乘以4呢？

梅勒妮（又数了数硬币）：24。

汉德隆女士：对。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梅勒妮：24。

汉德隆女士：不是，那只是你做乘法时的一个数，不是这道除法题的答案。

梅勒妮：4。

汉德隆女士：对了。那余数是什么呢？

梅勒妮：3。

汉德隆女士：对。

随着她们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下去，梅勒妮和她妈妈之间的紧张气氛也在不断上涨。梅勒妮变得越来越不安。她的脸涨得通红，而且虽然她并没有哭，但是她看上去像是眼泪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从她们开始做数学作业到现在四十五分钟都已经过去了。汉德隆女士建议她们都休息一下，“往圣诞树上挂几件饰品”。梅勒妮不想就休息一下，她想不做作业了，而是去烤饼干。她妈妈重复说要休息一下，梅勒妮也重复说她想烤饼干吃。汉德隆女士通过把一堆堆的硬币摆在桌上并提出诱导性的问题让女儿回答，打破了这个僵局。五分钟后，梅勒妮看起来高兴了一点儿。汉德隆女士站起来休息了不到一分钟，梅勒妮还在继续做题。她自己做出了最后两道题。

汉德隆女士：看，你能做出来的。你得多试一试。

梅勒妮：太难了。

汉德隆女士和梅勒妮在一起做作业对出现的紧张气氛和矛盾冲突让人感到十分疲惫和痛苦。由于梅勒妮的妈妈坚持梅勒妮必须要完成作业这个原则，并认为有些作业，尤其是数学作业，需要她的帮助才能完成，作业之战几乎每天下午都要重演。[4] 汉德隆女士认为有时候她和梅勒妮做题时的困难挣扎是由老师造成的。

有些老师教得就是不好。他们就不会解释东西。我觉得其中有些老师简直是在设局让孩子失败。有时候孩子把作业带回家，老师会把题目写得很模棱两可，读起来就是会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如果连我都没法读懂题目的要求，他们怎么能要求孩子们读懂呢？

据汉德隆女士说，老师不能恰当地布置好作业的要求，让梅勒妮有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不足为奇，老师们则把梅勒妮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归因于一个很不相同的根源。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危险性

在秋季学期，梅勒妮的数学和社会教育都得了最低分，她的任课老师内特尔斯女士似乎和汉德隆女士一样对梅勒妮的成绩感到很沮丧。内特尔斯女士在和梅勒妮的妈妈交流的时候始终非常友善和愉快。她很自愿地与汉德隆女士配合，提前准备出五个星期的拼写单词表让梅勒妮带回家。她看起来并不担心梅勒妮把单词表提前带回家会让她比其他同学更有优势，她也不抱怨为汉德隆女士做这些给她带来了多余的工作。汉德隆女士还要求内特尔斯女士给梅勒妮找一个家庭教师并带来数学题的题样，内特尔斯女士也都很乐意帮助她。另外，梅勒妮生病不能来上学的时候，内特尔斯女上还把资料整理成包，好让梅勒妮在家里学习。

既然内特尔斯女士和其他老师在学校里都很努力，汉德隆女士在家里也很努力，那么为什么梅勒妮还仍在继续痛苦地挣扎呢？汉德隆女士认为她女儿的作业太多了，而且老师们在强调梅勒妮犯的错误而不表扬她的进步时致命地降低了她的自信心，但是任课老师和辅导老师都坚决地拒绝了汉德隆女士作出的解释。据内特尔斯女士估计，孩子们在家里在30-45分钟内就可以做完她留的作业。加勒特·塔林格和梅勒妮同班，他常常（没有家长的帮助就能）在预计的时间内完成家庭作业。老师们也不认为梅勒妮每天在课堂上受到了“惊吓”或“压制”。内特尔斯女士同意梅勒妮的确在“挣扎”，而且她有可能有学习能力障碍，但她不同意汉德隆女士的观点，她说，梅勒妮并不像她母亲说的那样在课堂上很痛苦：

所有那些关于她在学校里学习不好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在这里看到她到底怎样——但是我在这里。而[梅勒妮]看起来很满意的样子。她看起来挺好的，几乎就像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很好啊！”

梅勒妮的老师们认为，在很多其他的事情当中，如果汉德隆女士可以更一贯地遵从大家都普遍遵守的学校规定，那么梅勒妮在学校里的经历就会更好一些。内特尔斯女士尤其对梅勒妮的习惯性迟到感到苦恼。在一次家长会上，她超乎寻常地向汉德隆女士抱怨着一点：

她来得太晚了。她通常都是来得最晚的一个。我的意思是，我都不再标她[因迟到太久而]缺席了……但是有的孩子来得很早，差十分9：00就到了，所以，如果她10：00才来，那别人就已经在她来之前二十分钟就开始上课了。所以，也许只是把

梅勒妮早点送到这儿来，都会对她很有帮助。

汉德隆女士还没有交上梅勒妮测试学习能力障碍所需的文件表格，内特尔斯女士对此也同样感到很沮丧。在家长会结束后，她对调研人员说了句话，表达了她对此事的失望：

> 我是说，我真的[对汉德隆女士]又是催促又是强调，让她[给梅勒妮]做测试，因为我认为她的确有很多学习方面的问题。我们绝对在大概一个月之前就把表格都给她了，而我上次去问的时候，那些表还是没有交上来。

这所小学里有一个驻守的阅读专家，她每周会帮助梅勒妮三次。令内特尔斯女士大为惊讶的是，汉德隆女士从来都没有去见过这位辅导老师。

> 大多数家长，如果他们的孩子接受阅读专家辅导的话，他们都会力争和专家见面交换意见的。我的意思是说，尼特总要跟很多家长见面的，因为她辅导的学生来自很多不同的年级——她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去见她的家长。我是说，[梅勒妮]都被她辅导了两年了。你难道就不想听到阅读专家的反馈吗？

内特尔斯女士很确定汉德隆女士知道女儿每周都接受阅读辅导，当梅勒妮缺席的时间不断增加时，她妈妈曾明确地询问过女儿要复习的阅读资料。在内特尔斯女士看来，安排与阅读专家见面是梅勒妮母亲的责任。而且，她觉得是汉德隆女士，而不是辅导老师，应该承担起要求会面的责任。

除了在某些方面没有达到老师们对她的期望之外，汉德隆女士也并没有总能在家庭和学校之间铸造紧密的联系，因为教育工作者把她的一些行动看做是受到误导或毫无意义。比如说，内特尔斯女士对开学第一天她带着生病的女儿来与新老师见面并不买账，只觉得她这么做很“奇怪”。而且老师还对致使梅勒妮多次缺席的那些病痛是否真的存在产生了质疑。

内特尔斯女士描述说，汉德隆女士是个“说不得”的人，总是把注意力贯注在现在和过去的老师中有谁没有充分支持梅勒妮的自信心上。老师认为，汉德隆女士的这些担忧让她无法注意到其他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比如让梅勒妮接受学习能力障碍测试）。在家长会之后，内特尔斯女士对调研人员说：“我觉得她就没有真的听进去。”内特尔斯女士暗示说，梅勒妮的大多数问题也许都能追溯到汉德隆女士对孩子过分保护的教育风格：

> 做妈妈的从第一天起就自始至终都为梅勒妮的拖延时间找各种借口。我是说，梅勒妮去年就因病缺席了三十多天。我觉得梅勒妮能到现在的程度就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我觉得她妈妈好像是在否认孩子过得不错。梅勒妮今年还挺好的。梅勒妮很快乐，我认为很多问题都是她妈妈带来的。

最后，梅勒妮的老师们并不了解汉德隆女士帮助女儿做作业的数量和频繁程度。他们不知道在梅勒妮和她妈妈应付作业的时候，汉德隆家餐厅里日复一日上演着的那些具有戏剧性的故事。[5]

汉德隆一家拥有稳固的中产阶级地位，并致力于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汉德隆先生有硕士学位并在工作中处于管理层次，他的夫人也是大专毕业。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了很多有组织的活动。当然了，有时候汉德隆女士也会发出指令，尤其是当她在帮梅勒妮做作业感到沮丧的时候。虽然在这一章里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并不繁复，但在大多数时候，两位家长都和亚历山大·威廉斯家一样会对孩子使用说理及商讨的方法。[6] 与马歇尔女士相似，汉德隆女士也十分了解学校的动向。汉德隆女士相信，她有权利干预女儿在外面的经历，而且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她对学校的工作有很多批评意见。尽管她拥有这些资源，汉德隆女士还是不能在她最关心的地方（即，评分和作业上）为梅勒妮取得明显的优势。不过，她的确在对梅勒妮教育经历中的某些具体元素进行用户化这方面取得了成功：内特尔斯女士同意给她拼写单词表，给梅勒妮的家庭教师准备材料，在梅勒妮经常因病缺席时把涵盖课程内容的资料抱送到她家。但是她为女儿取得的优势却比想象的要少。[7]

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意味着，在社会地位之特权的传输中，众多微妙的技能技巧都会被利用到。因此，在家长为激活文化资本所作努力的有效程度上就会出现各种重要的变异。像干预是否机敏、家长提出意见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掌权的人作出回应，以及孩子遇到的困难的特性，这些因素都会起到一些作用。在教育领域，至少有三个重要原因可以使得文化资源的使用不成功。首先，教育工作者有时并不知道中产阶级母亲会很顽强地遵守学校的政策规定。他们不能对自己毫不知情的行为给予特权。然而，孩子们不但知道家长作出的努力，还会为此感到十分压抑。尽管家长的干预是好意，但却会让孩子感到极不自在，从而降低了孩子努力学习的动力，而且也没有激发出他们的学习热情。因此，即使有些时候老师也许会认可家长的资本，孩子们自己也不会认可。其次，对于有帮助的行为是由什么组成的，教育工作者经常采用一种较为严苛的定义；家长那些处在定义范畴之外的行为会被忽视或被怀疑。因此，像反复不在学校的各种表格上签名或多次迟交的家长，就会被看做是严重的玩忽职守，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再次，即使在社会地位资源相当的家长中，也会有一些家长要比其他家长更能有效地激活利用这些资源。虽然斯泰西和梅勒妮的母亲都对自己的女儿同样投入，但是马歇尔女士看起来却比汉德隆女士要有更为长足的进展。

并不是只有汉德隆女士一个人试图帮助孩子学习，但是他们却无法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在这方面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也经常会有相似的经历，就像我将要在下一章中所展现的——我们先从温迪·德赖弗的经历开始。

[1] 事实上，汉德隆女士报告说：“第一个星期我不得不陪着她走进班里。如果我不走出去，她就不下车。”她说，梅勒妮并没有哭，但“我能看出来，她很害怕，她问

我：‘你能陪我一起进去吗？’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她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我只把她放在门外，她自己进去。”

[2] 我们秋天采访汉德隆女士时，她估计，前两个星期中她和其他母亲有八次在闲谈中聊到学校的事务。这些谈话大都很简短，都在梅勒妮的有组织的活动时间前后（例如，女童子军，开会，教会活动）或上学前或放学后发生。

[3] 注意，这些是以前就有的关系网，汉德隆女士并不需要新建这些关系。她选择参与，并从她听到的信息中抽取所需。

[4] 汉德隆女士并不帮助自己两个较大的儿子。哈里基本上不做作业，他成绩很差。他妈妈对此感到很沮丧，但她觉得应该让男孩子，尤其是哈里，自己吸取教训，懂得应该完成作业。

[5] 因为在家中的观察是保密的，我们没有把看到的东西告诉老师。

[6] 商议是常有的事，就像这个周六早上汤米决定要做点新鲜的果汁：汉德隆女士说，他可以用榨汁机。汤米说："我能用那个电动的吗？"汉德隆女士说："不行，用这个吧。"汤米说："为什么不让我用那个电动的呢？"汉德隆女士说："这个就在手边。"汤米说："我并不想争论，但是电动的那个已经拿出来了。"汉德隆女士说："嗯，那肯定有人用过那个了。那好吧，如果你答应用完了再把它冲干净，你就能用那个了。" 这段对话结束后，汉德隆女士听起来有点沮丧。

[7] 注意，与马歇尔女士相比，汉德隆女士并没有那么多与经济地位相关的资源。她没有受过那么多的教育，而且作为一个秘书，她也没有与管理层人员相同的权威。她丈夫有更多的地位资源，但他却并不参与管理梅勒妮的学业。因此，汉德隆女士不能有效激活地位资源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她自己占有相对有限的资源。而且，有些家庭的地位资源很丰富，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例如，精神健康问题或滥用药品的问题。我这里的观点是，阶级地位并不能确保优势的传输。

第十章 让教育工作者带路：温迪·德赖弗

我不想就这么莽撞行事，然后却发现自己做错了事情。（德赖弗女士）

这就是温迪的作业。她把“司机”一词[与她的姓氏“德赖弗”拼写相同]拼错了……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们两个调换位置[我是她的家长]的话，我会在[做老师的]头上猛敲一下的。

——温迪的四年级老师蒂尔先生在家长会上对她妈妈说

无论处在什么社会地位，家长都会密切关注孩子的教育。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与中产阶级的家长一样都渴望孩子能学业有成。然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却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就像温迪·德赖弗的母亲在上面那段引文里所说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经常害怕在与学校相关的事务中“做错了事情”。与中产阶级家长相比，他们大多更尊重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因此，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对学校的工作人员通常都是恭顺的，而不是苛求的，他们会到教育工作者那里去寻求指导，而不是去提出建议，他们会尽力保持学校和家庭的分离状态，而不是培养一种家校之间的相互联系交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温迪的四年级老师所暗示的，教育工作者往往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他们想要让这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的家长更加果敢自信。换言之，他们希望这些家长能够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协作培养当中来。

这种家长恭顺于教育工作者的模式，不是个别家长在个性上的特殊差别造成的。同样是这些家长，他们会默默地接受不同的老师对孩子作出的（有时候是相互矛盾的）评估，而在对有线电视公司、房东和当地的店主讲话时却是既强硬又直率。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有能力苛求其他的成年人。但他们却认为，在与学校和医务人员打交道时这种强硬的方式是不恰当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必备的词汇来对这些人提出挑战。而且，这些家长都把教育看做是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因而他们期望老师和学校职工承担起责任，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学到所有应该学到的东西。

最后，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对老师表现出的恭敬背后，还潜藏着一些抵制的成分。那些在家长会上默默点头的母亲回到家后，会在孩子仍然能听得见的地方公然指责老师不公平、不可信赖或心怀恶意。尤其是在责罚孩子方面，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更有可能认为学校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很多家长都鼓励孩子——直接违反学校纪律——去打那些袭扰他们的孩子，尤其是建议他们“在老师没有看着的时候”去报复那些欺负他们的人。这种抵抗的潜流还带有一些敌对的色彩。学校的职员被授权代表那些他们认为在家里受到虐待的孩子采取相应的行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对此十分愤恨。正如温迪·德赖弗的母亲所说，家长们真的害怕“那些人”会“来带走你的孩子”。按照教育工作者的要求去做就会减少他们受到国家官员干涉的危险，虽然老师的那些要求在家长们眼里都很荒谬。尽管如此，因为家长对孩子的教养策略与“校方”强调的协作培养有冲突，像温迪·德赖弗的父母这样的家长还是

会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公然批评，因为他们没有在孩子的学校教育中发挥更具领导性的作用。

德赖弗一家

我们调研的焦点儿童温迪·德赖弗（Wendy Driver）是个友好快乐的10岁女孩 [1] ，她在下里士满小学读四年级。她家住在一座租来的二层楼房里，家里还有哥哥威利（Willie）、与她同母异父的小妹妹瓦莱丽（Valerie）、她妈妈黛比（Debbie）、黛比的男友马赫·法伦（Mack Fallon，瓦莱丽的父亲），以及两只分别叫甜甜和怪兽的猫。

温迪很瘦，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她头上经常戴着一根彩色发卡，把她的金色长发朝后拢起。在亲戚和其他成年人到来或离开的时候，她都会自发地去拥抱他们，对调研人员也不例外，她会去亲两个月的瓦莱丽的额头，有时候（当妈妈不在屋里时）她还会把小宝宝叫醒了和她玩。在一次访谈中，温迪这样描述她自己：

> 我很和气。我不自大，我不贪心，而且我也不会为了买一样东西而花很多钱。如果我有钱的话，我要请我妈妈和[马赫]出去到饭馆吃晚餐……我喜欢玩芭比娃娃，[还有]和我表姐表妹打牌。我喜欢骑车和滑旱冰。我喜欢数学。

温迪对很小的乐事都会作出很热情的反响。一个春天的傍晚，当温迪看到一道闪电时，她兴奋地雀跃着说："咱们到外面去吧！咱们到外面去吧！"在房前门廊的庇护下，她激动地看着一道又一道的闪电在天上划过。

在学校里，温迪有时会是一个果敢自信的领导者。在课间休息和吃午饭的时候，她和她的女生朋友们（都是白人孩子）一起跑来跑去，追赶男孩子，并一起玩各种游戏。一天，我们观看了她组织其他女孩子攻击男卫生间的过程。她命令两个女孩从近处一边逼近（"我告诉你们快去！绕过去……"）去敲厕所的门，与此同时，她和另一个女孩从另一边推进，她们猫着腰，部分地隐藏着，咯咯地笑着。温迪在表达自己的很多观点时，看起来同样无拘无束，包括她对舞蹈老师奥利恩女士（Ms．Olean）的评估：

> 今年我和我表妹尼科尔（Nicole）一起跳舞。她也去舞蹈班。有时候奥利恩女士真的会很粗鲁。她总是冲人大喊大叫。就说昨天吧，我和我表妹正在跳舞，我们犯了点小错儿……她就又来了，"踮起脚尖！踮起脚尖！"而且她还说："做啊！"她真是个粗鲁的女人。

温迪的父母在她上学前班的时候分居了，两年以后他们就离了婚，德赖弗先生在温迪开始上二年级时的秋天突然去世。她妈妈在那一学年末的时候开始与法伦先生约会，大约一年以后，他们决定搬到一起住。[2] 温迪和她妈妈的男友关系很融洽。比如，她野营回来后说："马赫，我在旅途中去骑马了。"这时法伦先生逗她说："骑马？你确定你骑的不

是驴吗？”尽管如此，温迪还是一直想念她的父亲，晚上睡觉时她都会抱着她父亲几年前送给她的一个娃娃。

和温迪一样，12岁的威利也是个活泼好动，能说会道的孩子。他喜欢到表兄弟们家里去玩，喜欢骑车、看电视，还喜欢钓鱼和打猎。虽然他说法伦先生“对我们很好”并且“开车带我们去很多地方”，但是威利也和温迪一样思念自己的父亲。他和妈妈的男友经常起冲突。法伦先生批评威利的想法、他慢吞吞的动作，以及他生活中的其他行为。即便这样，他们之间还是有愉快的时候的，就像有一次，法伦先生和威利在客厅地板上专心致志地（除了因用力而发出的吭哧声之外，很安静地）摔跤时，家里其他人都很欣赏地在一旁观看。

威利经常不在家里玩（而是同他的表兄弟和朋友在一起），但是当他在家的时候，他看起来很乐意和温迪一起玩。这个夏天，德赖弗女士和法伦先生去上班时，温迪和威利整天都时不时地看看电视，一起伸展开四肢躺在客厅的地板上。他们俩自己做午餐，并遵守家里的规矩：如果不是预先约定好的，就不给任何人开门，除了妈妈的电话，什么电话都不接（他们使用事先设定好的暗号）。在电视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做游戏。当他们玩“强手大亨”的时候，威利无需要求就会给温迪读卡片上的说明，因为他知道妹妹在阅读方面有困难。温迪有时会给威利洗衣服（除了洗自己的衣服之外）。他们看起来很喜欢对方。他们很少吵架，就是吵也吵得不厉害，尤其是与塔林格兄弟和马歇尔姐妹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相比。比如，一天下午，温迪评论说，威利的女朋友把他给“甩了”。另一天，她朝楼下对威利喊他没有关自己房间的灯，当威利请她帮忙关灯时，她拒绝了（并要威利自己上来关）。

温迪和威利的妈妈德赖弗女士是位高挑而俊俏的女性，有一副大气的骨架子，她32岁，短短的金色头发，清爽的皮肤，未施脂粉，看起来外表健康，几乎有点儿男孩子气。她有好几处文身，包括一只脚踝处的一颗插了一支箭的心。她经常穿一条酸洗的牛仔裤，上身穿着运动衫或T恤衫，脚上穿着球鞋。德赖弗女士从高中一毕业就开始做秘书工作，已经做了14年了。她做全职，每年收入1.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她的职责包括接电话和用电脑做文秘工作。她说她“恨”自己的工作，如果她有钱过活的话，她就会辞职的。

德赖弗女士与温迪和威利的爸爸离婚之后，就带着孩子搬回自己父母家里，并在那里住了五年（直到德赖弗女士和法伦先生把财力集中在一起租了自己的房子）。由于德赖弗先生没有给她儿童抚养费 [3] ，而德赖弗女士又需要向父母缴一部分租金，她就在做秘书工作之外找了一份餐馆服务生的工作来补充开支。但是，在她怀孕之后，她不得不辞去了餐馆的工作；现在除了偶尔去做几班外，她并没有恢复服务生的工作。在闲暇时候，德赖弗女士喜欢看电视，尤其喜欢脱口秀和肥皂剧。她努力把瓦莱丽的睡觉时间调整到和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相一致。

法伦先生26岁。和德赖弗女士一样，他也很高，宽宽的肩膀，刺着文身。他已经开始谢顶，发迹正在迅速后退；不过，他的声音很是洪亮。高中毕业后，他就在一个残疾人疗养院做“男勤杂”，在那里，他做一些像为地板剥蜡和打蜡这样的活计。他穿着制服——棕色的裤子和配套的衬衫——去工作。他做这份（有工会的）工作已经八年了，年收入

约在2万美金左右（译者按：在美国，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有工会组织，有工会的地方工人的收入和权益就能得到较好的保证）。他每隔一周就要在周末也工作，很多节假日都不休息。

德赖弗女士和法伦先生的收入不够全家的生活费用。钱经常出现在谈话当中：物品的昂贵、需要省吃俭用或是采用其他策略来应付钱的问题、可用资金的短缺，这些都是每次实地访查中必谈的主题，经常在访谈的几个小时中多次提到。当温迪从学校回来宣布学校要组织一次旅行时，德赖弗女士往往会深深地叹上一口气。这些出游每次每个学生要交2美元，她认为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家因收入“太多”而超过了援助资格线，而两人的微薄收入又无法满足全家的生活所需；这让温迪的妈妈十分沮丧。

> 我到处去找各种组织帮我给孩子申请援助或是别的什么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苦恼——就好像，他们转过脸来对我说：“你挣的钱太多了。”我却想，“我怎么会挣钱太多的呢？”因为，就像是，我的钱刚好够让我没有资格申请。

家庭财政经常处于一种“总计为零”的状态。例如，温迪上三年级时，妈妈给她雇了一个家庭教师。为了应付这笔每周20美元的新开支，德赖弗女士只好走着上班；她没有钱付公交车票。法伦先生的车坏了时，他们也拖着不去修。校服、圣诞节礼物和主要的家用物品都不能一次付清。德赖弗女士和法伦先生都没有活期存款，他们用汇票来付款。德赖弗一家生活中的三个大家庭（德赖弗女士的父母、她前夫的家、法伦先生的家）都在经济上苦苦挣扎。德赖弗女士的父亲在退休前一直都做两份工作。尽管如此，与像麦卡利斯特或卡罗尔家那样的贫困家庭相比，德赖弗一家也有一些优势。食品很充足，孩子们去商店的时候可以要东西买。而且，温迪和威利每个人可以在圣诞节要（通常也都会得到）一样贵的东西（比如说一件100美元的夹克衫）。德赖弗女士把钱一点一点攒起来好用在家庭聚会上，温迪的圣餐礼节日活动包括一个为整个大家庭组织的自助餐，要花上1500美元。

德赖弗一家人的世界

就在实地观察开始的前几天，温迪和她的家人搬到了与他们以前住的房子仅隔几家的一座更小的三居室房子里。在这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市内工人阶级住宅区里，狭窄的街道两旁建着一排排就像德赖弗家那样的房子。一座座房子紧紧地挤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大座绵延不断的楼房。很多房子前面的门廊都刚好在人行道的边上；门廊都很小，只够放两把椅子。没有草地。很多家人，包括德赖弗家，都会在节假日装点自己的房子，比如在情人节、复活节和万圣节。[4] 与温迪和威利年龄相仿的孩子就住在这条街上，孩子们的表亲也住在这里。女孩子们一起步行去上学，放学后和周末也会在一起玩。

虽然德赖弗一家人的房子有三间卧室，要比很多其他工人阶级家庭的住房宽敞许多，但是整个楼下（由一个客厅区，一个小宝宝的游戏室

和一间厨房组成）都能统统装进中产阶级的马歇尔家的家庭活动室。租金是每月650美元。房子里面纤尘不染。温迪和威利都知道，他们一从学校回到家里就必须把书包放到楼上自己的卧室里，在客厅里他们每人只能用一个玻璃杯，而且他们都要做家务让房子保持干净整洁。一家人经常一起在客厅里看电视。小小的客厅很舒适：两个成年人有地方坐在双人沙发上，孩子们（和调研人员）可以坐在地上。墙上还挂着几张家人的照片。

温迪生活中的种族成分随着不同的环境而变化。在她的公立小学，有一半学生是黑人，有些老师和学校的关键性员工是非裔美国人。然而，在自由活动时间和课间休息的时候，温迪却几乎只和其他白人女孩一起玩。同样的，虽然离她家不远就有很大的一片地区（开车约十分钟）都住着非裔贫困美国人，但是她的大多数社交互动都只有白人。她所有的亲戚都是白人，所有住得最近的邻居都是白人，她参加的舞蹈班里所有的孩子都是白人，她的教会学习小组里也都是白人，几乎所有本地的商店店主和顾客都是白人，就连她常去的购物中心都是以白人顾客为主。德赖弗女士报告说，她的前夫有"偏见"，"憎恨黑人"，她一直在努力教育孩子们要更加开明，不要像他们的父亲那样。

重视家庭：亲戚关系的重要性

家庭对德赖弗一家的重要程度，怎样形容都不为过。孩子们的生活也是和他们的大家庭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两个孩子都有和他们同龄的表兄弟或表姐妹。温迪的两个最好的朋友就是她的表姐妹罗齐（Rosie）和丽贝卡（Rebecca），两人的家离这里都只隔着几家人。她的外祖父母住在步行就可到达的地方，她每天都去外祖父母家，而且很喜欢去。很显然，她喜欢自己的亲戚们。比如，复活节星期天的早上，她给外祖母打电话，给她唱"你是我的阳光"。外祖父经常在放学的时候去接她回家。正如德赖弗女士所说，外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都在放学后帮助看孩子：

> 我儿子跟他姥爷和曾姥爷还有曾姥姥一起到我妈妈的家里；温迪到她曾奶奶家，也只和我父母家就隔两个门儿，她就待在那里，直到我下班回来……她每天都去看他们。

温迪的妈妈解释说："我和我妈至少隔一天要通一次电话，如果不会更勤的话。就是看看我怎么样或者她在做什么。"德赖弗女士的母亲过50岁生日时，她给了她一个惊喜，雇了一名脱衣舞者为她跳舞，她母亲过60岁生日的时候，德赖弗女士为她办了一个派对，请了一位专业歌唱家来助兴。除了和父母保持频繁的联络之外，德赖弗女士还经常去看她的兄弟们（她是唯一的女儿）。她还常和一个表妹通话并见面，她描述说，这个表妹"就像亲妹妹一样"。

连同德赖弗女士的大家庭，一家人也时常提到温迪和威利父亲那边的亲戚，并经常去探望他们。两个孩子父亲的兄弟（"叔叔们"）、姐妹

和父母都参加温迪和威利的生日派对，并被请来参加所有其他主要的家庭活动。最后，法伦先生的家人是德赖弗家日常生活中新兴的一部分。法伦先生与父亲断绝了联系，但是他每天都和母亲通话。她经常来看他们，并愿意在需要的时候照顾自己的新孙子孙女。法伦先生也时常与自己的姐妹联系。其中一个妹妹萨拉（Sara）就住在街角，她和她的孩子们会经常来串门。他的另一个妹妹住在南卡罗莱纳州，法伦先生每周都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优惠券寄给她。

德赖弗一家人每天的谈话中密布着有关亲戚的话题、预期将至的亲戚活动、过去亲戚之间发生的事情，和大家庭里各个成员生活中的趣事。 [5] 温迪（上二年级时）的第一次圣餐礼派对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到。家庭成员们都可能会提及预期的家庭活动：温迪热切地盼望着她姑姑的婚礼，因为她要做小伴娘。到时候她会穿上一件很短的水红色低肩筒裙，还会做头发、染指甲，她一想到这些就特别兴奋。还有一个共同话题就是将要在夏天为瓦莱丽举行的浸洗式。德赖弗女士和法伦先生打算在附近一个供应饮食的大厅里举行浸礼，并计划邀请大约100位亲戚来共同庆祝。

在塔林格家，没有人觉得加勒特不去参加他表哥的毕业派对有什么关系，而在德赖弗一家就大不相同，因为家庭活动对他们来说极其重要。这一点也有不好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亲戚要举办这么多的派对和聚会，时间安排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人“感到受了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一天早上上学前吃早餐时的讨论中，法伦先生解释的那样：

> “那天有一个婚礼和一个初次圣餐。我表哥有个婚礼，我哥哥的孩子要举行初次圣餐……我们要去参加圣餐——这会伤害有些人的感情。”黛比补充说：“是呀，但是，是在一个亲哥哥和一个表哥之间做决定，所以……”（她没有再说下去，暗示调研人员会自动明白哪个活动更重要。）

鉴于德赖弗家和法伦家有如此众多的亲戚，他们与亲戚之间的来往又如此的频繁，有时候双方会在理解和交流上出现误会也就不足为奇。德赖弗女士和法伦先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温迪和威利亡父的兄弟（“叔叔们”）对孩子们尤其是对威利的负面影响。这些男性，以及德赖弗女士自己的兄弟们，都不是什么好样板，就像一个星期六早晨法伦先生对威利嚷着申明的：“你想像你那些叔叔们一样吗？连工作都没有？你想像他们一样吗？”威利的妈妈也很担心“叔叔们”带来的坏影响。她在看一个关于“光头党”（译者按：一个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青年黑社会恐怖团伙）的访谈节目时评论说：

> “这就是我将要面临的东西。威利现在13岁了。我不得不开始担心他会不会加入犯罪团伙。”我说：“你担心他会加入犯罪团伙吗？”黛比回答说：“嗯，他是个不动脑子就跟着做的人。他是个好孩子，但是他会跟着别人学。他的权叔们对他的影响很坏。比如在那个婚礼上，他最小的叔叔皮特叔叔（Uncle Petey）就告诉他，他可以喝啤酒。”（译者按：在美国，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可饮酒。）

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

因为德赖弗女士不会开车，她要靠法伦先生驾车带她完成各种家务杂事。温迪和威利通常都会陪妈妈出去办事。因此，全家人就以家庭为单位度过外出的时光，一起去商店买日用品和食品，一起到凯马特（Kmart，美国最大的日用品连锁零售商和全球最大的批发商之一）去（赊账）买上学穿的衣服，到购物中心（去闲逛），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到当地的亲戚家里去串门。法伦先生周末上班时，全家的生活节奏就完全改变了。然而，德赖弗女士和孩子们还是能够步行去当地的店铺购物，以及步行去参加温迪的舞蹈课和宗教课程。

大体上，孩子们都能控制自己生活的节奏。与卡蒂·布林德尔和哈罗德·麦卡利斯特一样，温迪和威利·德赖弗跟自己的表兄弟姐妹及附近的朋友一起玩，看电视、做游戏、帮助家长做家务，还陪大人一起去跑腿办事。就像其他工人阶级家庭一样，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清楚明确的界限。比如，当成年人之间有事要谈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温迪和威利到屋子外面去，孩子们也不会抗议，只会站起来走出去。最后，在家长允许这两个孩子做什么上存在着重要的性别差异。德赖弗女士会限制女儿的自由：

> 威利可以出去玩。他去朋友家玩，而且他自己去各种地方。但是温迪在外面玩的话——如果我喊她，她必须[能]听得见我。否则就算了。我甚至不让她自己走到离这里有一个半街区的商店去。我不愿意让她自己走一个半街区。[6]

同样，她只要求温迪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与我们观察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相比，温迪超乎寻常的忙[7]。每星期她都有一次舞蹈课，一次天主教宗教课程（基督教义团会）和学校的唱诗班训练。但是，和中产阶级的孩子不同，温迪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为了培养才能或发展社交能力或是扩大朋友圈子。当我们问德赖弗女士她希望温迪从舞蹈课里学到什么的时候，她只是说：

> 优雅的气质。我想还有记住她的舞步。她不能靠任何人帮忙而必须记住那些舞步，她把舞步都背了下来。

当问到基督教义团会的课程时，温迪的妈妈并不像亚历山大·威廉斯的妈妈那样去强调这些课程对孩子智力的激励。她让温迪参加宗教课程的目的是希望女儿将来能做一位教母并且“有宗教信仰”。她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 这样她就做了所有的圣礼。虽然我没有那么多钱送她去天主教会的学校，但是至少她能有一个宗教信仰。她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做到这一点。

当像塔林格和威廉斯这样的中产阶级家长在谈及让孩子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会带来的好处时，他们都会绘声绘色地给出详尽的回答。与这些中产阶级的家长相比，德赖弗女士的回答十分简短。她希望让温迪参加这些课外活动可以防止女儿“在街上乱跑学坏”；而在她表达这个希望的时候，言辞也较以往更加生动有活力。德赖弗女士小的时候，她也曾想

要“和朋友一起[玩]，在街角和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样结伴玩闹”，但是她的父母对她要求很“严格”：

我父母不相信我那样能混出好儿来……我的兄弟们可以到处跑，我却不能……所以我别无选择。我要么就待在家里，要么就参加一些活动。所以我选择了参加活动来让自己有事做，让自己忙起来，这样我也就有了点儿社交生活。

虽然德赖弗小时候认为家长让她参加的那些课程都是“浪费时间”，但是女儿温迪表现得却更加积极乐观。她喜欢舞蹈课（“我喜欢跳舞。跳舞很开心……你可以学到所有这些新的东西”），喜欢唱诗班，但把宗教课程贬为“没劲”。然而，她并不向妈妈或法伦先生抱怨其中的任何活动。她的业余活动对她来说并不特别重要；这些活动并不支配她或家里其他人的生活。成年人一般也根本不会谈到温迪的业余课程，她会不时地提到这些活动，但并不会没完没了地讲。相反，与其他聊天的主题（通常是过去和将来家里的活动）相比，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就“退居二线”了。

指令性语言：语言作为一种实用性的工具

与麦卡利斯特家类似，在教养孩子的方法上，德赖弗女士和法伦先生都相当能发号施令，甚至会相当独裁主义。他们告诉孩子该如何去做。和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不同，温迪和威利很少和大人争辩，如果不是从来没有过的话。

温迪问她妈妈：“我能贴这张贴画吗？行吗？”德赖弗女士说：“咱们不能往上贴贴画。”温迪没有说话。

黛比和马赫坐在厨房里对威利说：“到客厅去。”威利没有说话也没有反对，就走进了客厅。他打开了电视。

法伦先生，尤其是在他累了或是被激怒的时候，大多会嚷着发出指令。有时候，威利也许会“挑衅一下”，但是通常在一次抗议之后，他就会沉默下去[8]：

瓦莱丽坐在幼儿椅上，威利问能不能抱她。黛比说：“不行。”威利（用一种发牢骚的声调）说：“为什么不行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抱她啊？”黛比反驳说：“你自己有孩子的时候就行了。”威利不说话了。

威利有时也会让大人很恼火，但是他使用的方法和亚历山大·威廉斯完全不同。威利并不设法和德赖弗女士或法伦先生讲道理，或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错了。相反，他会修改自己的要求，把它变成一种稍有不同的形式：

威利想出去玩。马赫说：“不行。”电话响了，威利跑去接电话。就在威利拿起电话之前，马赫重复说：“你不能出去玩。”威利接起电话：“喂？”然后说：“稍等一下。”他用手盖住话筒，说：“马赫？”马赫开始发脾气了。他大叫着要求说：“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威利说：“别急。”马赫压低了声音问：“干吗？”威利

问："他能过来在门廊上和我待会儿吗？"马赫看起来要气炸了，"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了，不许请客人来玩！你不准出去。"

总之，德赖弗女士和法伦先生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有实用的必要性，而不是生活中固有的趣味性维度。两个成年人都不会激励孩子去展开一个话题。像威廉斯夫妇那样的中产阶级家长经常会有意识地鼓励亚历山大发展自己的语言能力，相比之下，温迪和威利生活中的成年人并不会在孩子碰巧提到一些新信息时跟踪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比如，当温迪（逐个）问她的家人他们是否知道不赦之罪是什么的时候，她妈妈说："你来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你去参加了宗教课程。"温迪解释这个名词的时候，她妈妈和法伦先生都看着她，但却没有人认可她的答案。他们等她说完了就接着开始看电视。

在公共机构中采取的干预

温迪的妈妈并不像亚历山大·威廉斯的妈妈那样去培养自己孩子的语言能力。她不会设法去引温迪说话，或是跟踪讨论如"不赦之罪"这样的新信息。但是，和威廉斯女士一样，德赖弗女士特别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且就像汉德隆女士那样，她也想帮女儿取得好成绩。德赖弗女士密切关注温迪的学校教育。与梅勒妮的妈妈不同，她不会忘记该填的表格。温迪从学校带回家来的每一份表格她都会马上签字，还会提醒女儿要记得交给老师。

黛比提醒温迪："明天别忘了把那些表格带回学校。"她向我解释说："他们又在测试她了。所以我得签字同意。"当我问她什么时候测试时，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他们考完后会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测试结果，他们还会给我们一份书面报告。"

让温迪"参加测试"是为了确定出她为什么会读写困难并在凡与语言相关的活动中都有困难。她妈妈很欢迎这些官方的努力，但她自己并没有要求学校去测试。我们观察到的中产阶级母亲都会向老师详细询问孩子在课堂表现上的每一个方面，还会不懈地询问校外的信息和各种测试评估；与这些中产阶级家长不同，德赖弗女士只是很模糊地了解到女儿有学习障碍，并且看起来还很满足于当前的模糊认识。这种态度与斯泰西·马歇尔的妈妈所持有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马歇尔女士在与调研人员讨论斯泰西在课堂上的经历时，常常会详细地描述她女儿在学习上的实力和弱点。德赖弗女士从来就没有提到过女儿在数学上已经达到了四年级水平，但是在阅读上却比她自己所在的年级要低三年。她的描述十分含糊不清：

她学习有点困难……他们给她安排了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来看看她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她在阅读上有问题，但是他们还没弄清楚问题究竟在哪里，所以他们安排了各种各样的特殊教育老师还有测试什么的。她去上特殊教育课程，我想，大概是每天上两堂……我并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是阅读课。她读写在纸上的文字特别

困难。但是——她记忆力很好。但并不是什么都能记住。简直就像是她脑子里有个难解的谜。而且我们已经试过了，嗯，他们试过了很多东西。他们就是还没有弄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温迪的老师们都赞扬她妈妈“支持”温迪的教育，还说她“特别有爱心”，但是他们也都对德赖弗女士没有在温迪的教育中起到更积极干预的作用感到失望，尤其是她女儿的学习障碍问题确实非常大。然而，从德赖弗女士的角度来说，积极支持学校教育就意味着听从老师说的每一个建议。

他们有什么建议我都会去做的。他们建议我带她去着眼科医生，我做了。他们给她检查了眼睛，然后告诉我她的眼睛没有毛病。

同样的，她会监督温迪做作业并支持她在阅读方面作出的努力。

我们听她读书。我们帮她做作业。这样，比起在我父母那里，她能在我们的小家里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我们都在给她更多的帮助，看起来还是有效的。加上学校的两堂[特殊教育]课，而不是像去年只有一堂课，她也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她慢慢能摆脱现在的问题。

但是，对于温迪的学习障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德赖弗女士显然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解，这也许是因为她不熟悉教育工作者用来形容她女儿的需求的那种专业术语（例如，有限的“视识词汇量”、不发达的“语言艺术技能”）。也许还有，她对学校员工的信任也让她更容易把“详细的工作”留给他们去做：“莫顿女士真的很棒。她帮我们一起做各种测试什么的。”德赖弗女士依靠学校员工的专业技能，他们对情况进行评估后再与她分享信息。

我想他们到现在还只是想在学校范围内帮助她。等他们没法找出原因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我们送到别的地方去作检查了……

温迪的妈妈并没有惊慌失措，因为“校方”告诉她不要为温迪的成绩担心：

她的成绩单——只要不是阅读和拼写就都还不错——她的阅读和拼写基本都是不及格。他们一直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她已经在上特殊教育的课程了。但是除了这些，她的成绩都挺好的。我也没有听到她有纪律方面的问题。

德赖弗女士想要让女儿的问题得到最好的解决，但是除了大量依赖温迪的老师之外，她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个目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有可以帮助阅读有问题的孩子，这个呀那个呀的，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我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等等，那些地方只是要把你弄去然后你就得交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我对我妈妈说：“算了，我还是等第一张成绩单到了，然后到学校去和老师谈谈吧。”

如果德赖弗女士知道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们在庞大的学区中试图确

定并解决孩子的学习障碍要经过多少繁文缛节，那她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相信老师的专业技能了。一位老师在非正式谈话中解释说：“[学区的管理层人员]不愿看到学习障碍的报告。”要想把一个学生送入全天候的特殊教育，老师们必须提出两套不同的干预计划（每个计划都必须与校长、顾问和孩子的母亲会谈商榷），每套计划都必须要在测试开始前实施60天方可转入测试阶段。整个学年才有180天；因此至少三分之一个学年就这样溜走了，才能到达特殊教育推举阶段的最后一步。在实际操作中，测试和安置到合适的班级不可能在同一学年发生，即使这个过程是在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在开学第一天就马上开始。温迪的文件表格是在三年级春季学期开始的，但是她的“讼案”却被疏漏掉了；推举的过程不得不在四年级的时候重新开始。温迪在四年级接受的唯一的特殊帮助就是阅读辅导老师。如果她在一个较小学区中的某所小学上学，就像是加勒特·塔林格的学校，或是像亚历山大·威廉斯就读的那种私立学校，学校的教育资源就会更多，资金也更雄厚，官僚机构也不会那么庞大，那么温迪也许早已得到了更多更有效的关注。

然而，下里士满的教育人员并不怎么强调体制上的差异对温迪长期以来的阅读问题有多么重要的影响。相反，他们常常强调家长应该起到关键作用。在家长会上，温迪的四年级老师蒂尔先生对温迪不会阅读却升到了四年级十分愤怒。他催促德赖弗女士对他本人和其他学校员工更加严格要求，告诉德赖弗女士说：“如果我们两个调换位置的话——我会在[做老师的]头上猛敲一下的。”

在这里，蒂尔先生是在建议德赖弗女士要用协作培养的方法来对待她女儿的教育。她应该积极地监控、批评、甚至纠缠教育工作者，而不仅仅是跟从专业人士的建议。他把温迪现在之所以面临困境的大部分责任都从这些专家决策人员的身上转移到了她的妈妈身上，暗示说，如果德赖弗女士从一开始就采取协作培养的方式，温迪的阅读缺陷就根本不会“被允许”持续下去。

当德赖弗女士问蒂尔先生她该怎么做才能帮助温迪的时候，蒂尔先生强调，父母应该在孩子语言技能的发展中起到领导性的作用。

> 我会首先让温迪对阅读产生兴趣。到图书馆去，找到她喜欢的东西，读给她听，就是让她——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把精力投入到那上面。这样再看你能带她走多远。因为我认为温迪是能够学会怎么阅读的。

学校的阅读辅导老师约翰逊先生（Mr.Johnson）也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如果在校外给温迪以适当的鼓励，她“就可能学会阅读”。他还在家长出资进行的各种干预中加入了家长校外辅导班这一条。

> 要是我的话，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校外寻求帮助。校外的帮助可以是——我也许会让她进一个类似于辅导班那样的地方。救世军那边就有这样的班。基督教青年会也有同样的阅读班……[我会]试着去读一个故事，然后看看她能从中学到一些词，设法让她增长一些视识词汇量。

虽然他们都同意温迪可以学会阅读，并且家长努力在孩子发展阅读技能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但是蒂尔先生和约翰逊先生在温迪阅读问题

的根本原因上却存在着分歧，在学校能给予温迪的最有效应对措施上他们也不能达成一致。约翰逊先生对温迪的数学成绩能达到四年级标准感到十分惊讶。他相信温迪对阅读有“恐惧症”，而且还有可能与其他学习障碍混杂在一起。在他看来，阅读问题的所在就是情感问题（一种“斯泰西”）。约翰逊先生计划在五年级的干预中重复阅读预备期的基本步骤（一个一般会在学前班开始并继续到一年级时的过程），并以此来“设法提高她的视识词汇量和其中一些语言艺术技能”。

蒂尔先生和格林先生（Ms . Green，温迪的三年级老师）则对温迪的阅读问题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并没有诊断温迪有“恐惧症”，相反，他们认为温迪可能有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与约翰逊先生不同，蒂尔先生觉得温迪应该上全天候的特殊教育。他还相信温迪应该重新读一遍四年级。从二年级起，每一位放过温迪的任课老师都认为温迪有学习障碍，或者她需要得到额外的帮助。但是，正如蒂尔先生所说，出于某种原因，温迪“被疏漏掉了”：

> 我认为温迪被疏漏掉了……我坚信，如果温迪是个黑人小姑娘，她就会已经被送去接受特殊教育了。一个四年级的孩子还不能读一本一年级的书，这里就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温迪那么可爱那么甜美。她对每个人都报以微笑，我认为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们就这么让她一直这样下去真的是对她伤害太大了。

在某种程度上，德赖弗女士也意识到了学校并没有对温迪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比如，在春季学期的家长会结束之后，她意识到老师们在温迪是否应重读四年级这一点上存在着分歧。

> 我在见过[蒂尔先生]之后去见了约翰逊先生。他说温迪还不错，而且她不需要留级。他说的跟上次一样——他说，温迪不会留级，因为她又在上特殊教育课了。他说，她只是阅读和拼写不及格，但是她的数学和社会教育课成绩都不错，所以他不能让她留级。但是另一个老师（她没有提到蒂尔先生的名字）说她必须留级。他们俩说的完全相反。

当我们问到，凭她自己的“直觉”，她觉得温迪是否应该升到五年级时，德赖弗女士说：“我觉得她应该留级。”但是，她似乎已经准备去接受“校方”认为对温迪最有益的决定。与马歇尔女士不同，德赖弗女士没有给教育工组者打无数个电话，没有追查在最近开的会上发生了什么，也没有发表她自己对今后应采取何种措施的见解。在面对截然相反的信息时，温迪的妈妈感到既困惑又惊恐，她怕自己如果擅自采取干预措施的话就会给这个过程带来更多的差错，从而延误温迪受到最好的教育。[9]

德赖弗女士看起来十分愿意遵从教育工作者作出的决定，即使他们的决定与她自己的“直觉”相矛盾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她对温迪的教育不关心的表现。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们都欣然地描述她是一位“有爱心的”、“支持女儿教育的”、“关心孩子的”家长。调研人员观察到，她有两个星期每天都很密切地注意着“文件表格”是否到了，学校应该让温迪把测试签署表带回家的，但是那些表却一直都没有来。但是，她没有打电话给学校索取这些表格，而是更愿意接着等下去。

德赖弗女士的方式也不能说明她个性柔顺懦弱。她说自己是“急性

子”，而且显然她也确实可以果敢自信。对像有线电视这样的商业公司还有她的房东，她会毫不犹豫地为了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而提出任何要求。当有线电视的代理人没有如约来到她家时，她不断地给公司打电话并最终要求与他们的主管通话。当他们租住的房子里的暖气开始漏水的时候，她会给房东打电话。当房东让她先把暖气关掉等待他安排人去修时，她拒绝关掉暖气。她向房东指出，她一个人在家里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很小的孩子，并坚持让他迅速赶来把暖气修好。

当她在别的场合发现房东并没有能力胜任管道维修，德赖弗女士决定自己出面干预：

> 我问水龙头怎么了。黛比看起来生气极了。她从厨房的桌子旁边站起来，走到洗碗池那儿，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水压一点儿都没有！看看这个！龙头都开到最大了。”水虽然会不断地流下来，但是却没有直冲下来；看起来水压大约只有应有的一半。她说：“我要给一个管工打电话，让他帮我修好，然后再让房东好好地从我的租金里减去我请管工垫的钱。”

这种果断自信的表现在德赖弗女士与教育工作者的互动中几乎是荡然无存。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有关威利而不是温迪的。在学校的春季音乐会上，威利是一群黑人孩子中仅有的几个白人孩子之一，他在表演当中热晕了，一下子坐在了地上。没有一个老师上前帮他。坐在观众席上的德赖弗女士站起来，从拥挤的礼堂里挣扎着走到她身旁去扶他。她对此极端愤怒。尽管如此，虽然她（带着明显的气愤）多次向亲戚们讲述这件事，但她却没有对任何一个老师或学校的人提到过一个字。总之，与中产阶级家长不同，德赖弗女士只把自己对学校的看法留在心里，而不会说出来。

因此，德赖弗女士对教育工作者的顺从并不是由于她个性畏缩或是她缺乏做母亲的能力。那些温迪的妈妈默默接受了的事情，搁在斯泰西·马歇尔和梅勒妮·汉德隆的妈妈身上都会穷追不舍下去；要了解温迪的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做，更有效的方法就是要聚焦在社会地位上，既要从社会地位是如何塑造世界观这方面，又要从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经济和教育资源这方面进行分析。与中产阶级母亲所理解的自己在教育子女中的作用相比，德赖弗女士的理解包含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责任。她只对学校发出的联络作出回应——比如学校邀请她参加一年两次的家长会——但她不会主动与学校联络。她把温迪在学校的生活看成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一个她作为家长只会偶尔造访的领域。她并没有像马歇尔女士那样去挑战学校对女儿的安置。她没有像汉德隆女士那样向其他家长询问孩子们在班里的每日生活。她也没有给温迪的老师打电话或是到学校来讨论家庭作业。德赖弗女士预期老师会教好学生，而女儿也会学到知识，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都不需要她这个做母亲的提供任何帮助。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她认为温迪会告诉她的，或者，学校会和她联系的。

这种看待家长和学校之间互动的方式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对温迪来说，学校就真的成了她自己的世界。比如，与梅勒妮·汉德隆不同，温迪就不会在家里重温在学校里经历的失败。实际上，因为她妈妈不主动和学校联络，温迪也就有机会自己管理自己的受教育过程中的某些方

面。如果她选择不告诉妈妈某个问题，德赖弗女士就不大可能从其他地方听到这个问题。事实上，四年级春季的学期里，温迪和她的阅读辅导老师约翰逊先生发生了争执（“因为他一直对我吼。他一直对其他孩子也吼，我被他吓着了”）。她有两个星期干脆就没去上特殊教育的阅读课。她谁也没有告诉。[10] 德赖弗女士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段插曲（在约翰逊先生告诉她的时候）。对与学校相关的很多重要问题她都不知道，因为她的关键报告人是温迪，而不是学校的教员，甚至也不是其他家长。学校是温迪的天下。

与德赖弗女士的社会地位相关的教育资源和经济资源也影响了她同老师和其他学校职员之间的交流方式。德赖弗女士只有高中学历，做的是低级别的文秘工作；马歇尔女士则获得了研究生学历和一份管理层的工作。德赖弗的学历和工作并没有使她具备与马歇尔女士等量的信息，她甚至得不到马歇尔女士所拥有的信息来源。马歇尔女士流利地掌握了教育工作者使用的行话（例如，约翰逊先生指的“社会情感障碍”），而且她还知道学校必须允许斯泰西在校外接受独立测试来觉得她是否符合天才班的标准。而在另一方面，德赖弗女士却不愿跨过、甚至不愿补充学校的课程安排。她担心花钱请私立老师来提高女儿的阅读技巧只会让她浪费资源而起不到任何效果。她也没有马歇尔女士所掌握的那些教育专业术语。实际上，关于温迪学习障碍的性质，下里士满小学教职员工之间一直争执不休，而德赖弗女士似乎对这些错综复杂的争论理解起来确实有很严重的困难（她抱怨说，她“看不懂”学校定时送来的关于温迪学习进展的报告）。

德赖弗女士对专业人员经常使用的术语的确在理解上有困难，这一点在下面一段在牙医诊所发生的事情中表现得很明显。孩子们的牙医马克斯大夫给温迪和威利做了半年常规检查后，走进诊室与德赖弗女士讨论结果。

> 马克斯大夫说威利的“恒齿”上有两个洞。她对黛比说：“他得刷牙，尤其要刷后面的牙。”温迪有“蛀牙”我把X光片给你看看。”马克斯大夫打开片子台后面的灯。她指着片子说：“这里和这里，看到了吗？”黛比看了看X光片，点了点头。“蛀牙在她的乳牙上，你好像没有什么选择，因为留着它们的话可能会把她的恒齿也带坏了。”黛比插话说：“你想把它们拔掉？”马克斯大夫说：“对。它们已经松动了。我们可以把拔牙和补牙安排在同一天。”黛比看起来并没有为这些蛀牙感到不安。

德赖弗女士为温迪和威利做了预约，然后到候诊室去面对孩子们的各种问题：

> 黛比对威利说：“你牙上有两个洞，必须得补。”她对温迪说：“你必须得拔两颗牙。”温迪问：“我牙上有洞吗？”黛比说：“没有。”温迪很兴奋，说：“太好啦！”然后她得意洋洋地对威利说：“你有两个洞，我没有。”[11]

德赖弗女士没有给“蛀牙”和“牙洞”画等号。后面的十天里，德赖弗一家多次谈到温迪要拔的那几颗牙。温迪听说她不能把拔下来的牙放在枕头下面等牙齿仙女来取，感到很失望。此外，大家还给出了很多种说法来解释为什么温迪的牙必须得拔掉。法伦先生说，她口腔里需要更多的地方。在拔牙之后，大夫让温迪把她的两颗牙带回家。那两颗牙上都

有大大的黑色斑点。据我们所知，家里没有人明白温迪的牙上也有洞。

就我们的观察来说，对专业人士喜欢用的术语不能完全理解或者理解错误是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家长大多会遵从或者至少是默默接受教师和医务人员等专业人士的声明，不懂专业术语也是其中的众多原因之一。除了对学校官员和任课老师使用的专业术语感到不安之外，大多数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还相信干预孩子每日在课堂上的经历是不恰当的。他们期待老师去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并认为如果出了问题，学校会和他们联系，而不是他们跟学校联系。尽管如此，这些家长在与学校的代表人的交往中表现出来的恭顺，却经常会潜藏着敌意和反抗。

恭顺：掩饰起来的敌意？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时常不能与教育工作者苟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对孩子的责罚方式，尤其是在体罚是否明智这一点上（下一章将会更加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学校强调要用语言商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这些家长中的很多人则认为这种方式至多是被误导了的。温迪的妈妈也不例外。在五年级的秋季学期，当温迪受到班里一个男生的困扰时，德赖弗女士（和法伦先生）建议她自己出手保护自己：

> 当我问她温迪的新老师怎么样时，黛比说："她看起来挺好的。"马赫说："班里有个男生总揪她的头发，他坐在她后面。"黛比重复说："是，班里有个男孩子一直揪她的头发。"黛比说："我对她说，给他一拳。"马赫详细补充说："对，在老师没看着的时候给他一拳。这样就解决问题了。" [12]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不信任任课老师和学校职员的判断，却又不去公然对他们提出挑战，这其中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学校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是国家的官方代表。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如果学校官员有任何理由怀疑学生在家里面临着任何危险，他们就能采取措施把孩子从家中暂时接出来。这就使得校方代表人拥有凌驾于家长之上的巨大权力；家长理所当然会对这样不均衡的权力产生深切的愤恨和极度的惧怕。

一天晚上，在我们的常规访察结束之后，德赖弗女士告诉我他们之前曾带温迪去了医院。 [13] 德赖弗女士并不认为这点痛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她觉得自己非得让一位医生给温迪检查一下不可：

> 每次学校送信到家里来，我都担心，如果我有什么事没有做，他们就会告发我们，然后人服部[人力服务部]就会过来把我的孩子们带走。所以，虽然我知道她没有什么大毛病，我还是把她带到医院让他们告诉我她没有什么大毛病。马赫点头："他们说是手腕使用过度。"

德赖弗女士解释说：

> 他们给你送来那张大大的卡片，虽然我是他们的妈妈，但是我觉得学校——如果你有什么事没有做的话，他们就会告你。他们会来这里把你的孩子带走。

去医院看病的那次德赖弗女士有保险，但费用还是很贵，而且也很麻烦：

> 那一次就花了410美元。我5：00回到家里，而且——（马赫打断她说）“我们不得不把我妈妈接来。”——黛比解释说：“我们不得不把他妈接来帮着看瓦莱丽。”然后她接着说：“我们带她到了医院，然后我们就等啊等啊。”马赫回忆说：“我说：‘如果她的手腕没折的话，我也要给她掰折了。”黛比重复说：“花了410美元就是为了让他们告诉我我已经知道了的事情。”

更糟的是，“校方”还有一个傲慢专横的权威，他们的错误率和他们的正确率几乎是一半一半。凭德赖弗女士的经验，学校里的护士不仅会夸大并不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认识不到真正的紧急情况。比如，威利在学校撞伤了，护士说“没关系”，还说她觉得威利只需要贴一点儿医用胶布就可以了。但是威利的眼睛上方有一大道很深的伤口，需要缝28针才行。对德赖弗女士来说，结论再明显不过了：学校里的护士根本就信不过。他们对不值一提的小事大惊小怪，但是在重大的事情上却并不会准确地传达问题的严重性。温迪的妈妈把两所学校里的护士都看成一个整体，虽然这些护士照顾的是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孩子；在这一点上，温迪的妈妈也表现出了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特有的一种普遍倾向，他们把众多的权威人士都不加区分地融合成一个群体。因此，任课老师、辅导老师、图书管理员和校长通常都被称作“校方”。

德赖弗女士相信温迪的手没有什么问题，但她却不得不带她到医院去检查；因此她对这件事也很愤恨。然而，去看医生是她唯一可以抵挡那些有权威的专业人士的方法，他们手握权力却可能会发出武断无常但又真真实实的胁迫。与“他们”可能会来“把我们的孩子带走”这样巨大的危险相比较，去医院看手腕带来的不便和花掉的费用只是很小的代价。其他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并同样有对学校官员的不信任感。

讨论

据我们观察，温迪·德赖弗（和她哥哥）的日常生活与泰雷克·泰勒、卡蒂·布林德尔和哈罗德·麦卡利斯特日常生活的模式基本相同。德赖弗家的孩子有很多闲暇时间与表亲的孩子在一起玩，看电视，帮家里做家务，并常去看望祖父祖母。他们的生活中有严格的指令塑造着他们的行为，但他们也有很多自主权来决定自己的业余生活。总的来说，家中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看起来就是成就自然成长。唯一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温迪的妈妈为她报名参加了三个有组织的活动。但是，这一举措看起来并不是她妈妈想要让她接触一系列的人生体验，而是一种保护她不到大街上乱跑学坏的方法。虽然温迪喜欢三个活动中的两个，但是这些活动都没有支配她的全部业余时间，也没有改变她家生活的节奏。

在某些方面，温迪在学校的经历有些极端化，因为即使在像下里士

满这样全国排名常处于最底部四分之一的学校，大多数学生在三年级的时候也都掌握了阅读技巧。然而在其他方面，像她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同其他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一样，德赖弗女士相信她为温迪能在学校里成绩优良而竭尽了全力。但是，温迪的老师们对家长对孩子的支持却有不同的定义。教育工作者提倡的是一种协作培养。他们渴望一个理想化了的世界，在那里家长们都积极参与并在监控孩子的学校教育上起到领导作用，同时他们也希望家长们不要像卡普兰家为反对音乐老师为学校节日选的歌那样大肆干预。像蒂尔先生等一些老师则不希望家长只是一味地恭顺或容易激动过敏。他们追求的教育方式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混合物，一方面家长要积极参与并有意识地负起责任来指导孩子在学校的经历；另一方面家长又要彬彬有礼，温顺服从，并支持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家长的恭顺只能出现在一种情况下，那就是，只要一产生不同意见，家长就得马上遵从教育工作者的智慧。

虽然下里士满小学的教职员工没有承认（而且也许并未意识到）社会地位在塑造他们理想中家长应如何与学校互动时所起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愿望却聚合成了对协作培养的强制命令。蒂尔先生期待德赖弗女士在他的“头上猛敲一下”并希望她更积极地去引导温迪的教育，而这也就预设了一套这些只上过高中的工人阶级母亲所没有的教育和社交技能。比如，要想做到像马歇尔女士那样，温迪的妈妈就得对她女儿学习能力问题的本质进行广泛的讨论。这也就要求她要熟悉并熟练地使用各种术语，例如“听觉理解能力”、“语言艺术能力”和“（阅读中的）解码技能”，这些行话都远比“蛀牙”要专业要复杂得多，而德赖弗女士连蛀牙的真正含义都不清楚。而且，就算她强化扩大了词汇量，她也还必须有这个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协调老师之间相互矛盾的各种观点。在一个充满不定性的境遇里，面对着一些对最佳行动方案互不同意的专家，德赖弗女士对自己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认为自己才是为温迪决定最佳方案的人选，她必须要抛弃对犯错误的担心，并愿意认定自己的干预措施与仅仅把教育温迪的任务留给学校教员一样有价值，甚至比那样做更有价值。

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对有线电视公司和她的房东，德赖弗女士恰恰表现出了这样的自信。她找到对方行为中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方，并坚持不懈地完成自己的目标。她强烈要求那些供应商对她作出回应。但是，她却被学校教职工的专业技能与权威吓倒了，面对教育工作者她并没有作出类似的要求。例如，她没有（在温迪三年级时）给学校施加压力让他们更快地审阅温迪的情况，没有（在四年级时）敦促学校把温迪安排到全日制的特殊教育班，也没有（在四年级结束时）坚持让温迪留级。相反，她只是一味地担心着、焦虑着、等待着并盼望知道“校方”下一步会做什么。

[1] 访察开始的时候，温迪9岁，在调研的过程中，她长到了10岁。

[2] 当我们刚开始在家中进行观察的时候，德赖弗女士和法伦先生及孩子们刚刚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一年。他们最终结婚了（那时瓦莱丽约有2岁）。

[3] 他们的父亲去世时，温迪和威利符合社会救济的资格，现在他们正在接受救济。

[4] 对芝加哥地区类似居住区的讨论，参见Maria Kafalas，Workrng-Class Heroes。

[5] 实地调研人员说，在德赖弗家一次典型的两个小时的访问中，他们会听到一家人不止20次谈到亲戚。

[6] 我们在所有的家庭中都观察到，无论处在什么社会地位，人们对男、女孩子关注的重点都会有所不同。一家人对温迪的外貌要远远比对威利的更关注。成年人，还有温迪自己，都一次又一次地把焦点放在她的衣着、发型和鞋子的号码上，他们都聚焦在把她创造成一个现在和未来都美丽的人上。

[7] 威利表达了自己对冰球队的兴趣，但是器材费和活动收费加在一起实在是惊人的昂贵。德赖弗女士希望能有一种课外班，“能让孩子们就这么去参加而不收费”。

[8] 在调研结束时的一次访谈中，德赖弗步士抱怨说威利在我们来访时的表现与平时不一样，常会“挤对人”，还“非让人顺着他不可”。然而，她注意到，他也开始在其他场合试验大人的底线了。

[9] 最后，老师们建议温迪重读四年级，校长也同意了他们的决定。但在学期的最后一天，蒂尔先生听说学区里一位高职官员不允许她留级（蒂尔先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相反，温迪在五年级的时候加入了下里士满小学的一个强化特殊教育班，班里只有13个学生。蒂尔先生的情绪也平复了，因为他觉得温迪“可以得到她需要的注意了”。

[10] 约翰逊先生的解释与此不同。他说：“我们出了点小问题。我对她嚷了一次，她就不来了……我给她布置了一项作业，她来上课的时候告诉我，她妈妈不会做这项作业。”作业是为黑人历史月布置的，内容是把名字和职业相配对。约翰逊先生认为温迪只是在为自己没有完成作业找借口：“我是说，这简直没有道理。所以，我有点儿烦了，我告诉她：‘你不能说，你妈妈完成了高中的学业，[她]却不会做这个。’我是说，你没做就说没做……如果你没有做，你就是没有做。比起告诉我是你妈妈的问题来，我更能接受你说你就是没有做——所以，这就让她生气了。”她的任课老师蒂尔先生（他与约翰逊先生关系不好）以为约翰逊先生的日程安排变了，而温迪在今后的某一天还会再重新开始。

[11] 我在实地笔录中写道：“我对此哑然失色。”尽管如此，由于调研的主要目的是尽量了解各个家庭是如何与公共机构进行互动的，我并没有纠正她。

[12] 法伦先生的家里有几个人相信打架可以解决问题。比如，一天下午，他的姐姐萨尔在从学校里接回温迪的时候，听温迪抱怨说她班里有个孩子欺负她，就对温迪说：“你应该学会怎么打架！”

[13] 这次我们没有去观察。总的来说，跟着别人去看医生是很难的，除非他们提前很久就已经同医生做了预约，常规健康检查和夏令营的体检也是如此。

第十一章 遭皮带毒打，又害怕“上学”：小比利·扬内利

那天的那个治疗师……他说，嗯，你知道我作为一名治疗师，一个为国家工作的人，什么什么的，如果我发现你打孩子，那我就不得不告发你。

现在我对比利感觉正经历着不同的阶段。我想做一个从来不打孩子的家长等等的，但是比利有时候太不像话了，也许他偶尔也需要挨一顿打。

——扬内利女士

我们国家的开国元勋们小的时候，孩子们经常被体罚。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儿童教养理念提出了与孩子讲道理的重要性并建议给孩子“恰当的选择”。与较早的历史时期相比，专制独裁的儿童教养方法，尤其是体罚，已经不再为人们所钟爱。

对专业标准在遵守程度上的变化则是有规律有系统的，而并非是杂乱无章的。比起对孩子用言语相虐的家长来（例如，一位母亲对孩子说：“我再也不想做你的妈妈了。”），用皮带抽打孩子的家长更容易被认定是虐待孩子的家长。学校作为国家的臂膀，会有选择性地推行儿童教养标准。这就对各家庭成员在这些公共机构中的安适程度、信任感和体验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在一个工人阶级白人住宅区里布满了狭窄的街道和狭小的住房，在那里，“小比利”（Little Billy）和他父母（并未结婚）住在一起。他们住在城里的一座有两个卧室的砖砌房子里。前门离马路边缘只有几步远，一进门马上就进到了一间小客厅。客厅里最主要的家具就是一个巨大的电视，特大号的屏幕占去了整面墙的大部分，电视总是开着的。放入了单人沙发、躺椅、双人沙发和咖啡桌之后，空间利用率已经达到了最高值。再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两个人同时穿过屋子。房子（两间卧室、一个卫生间、一间小客厅、一个餐厅、一个厨房和一个装修好的地下室）有一个小院子，夏天的时候，被家人称作“大比利”的扬内利先生会在那里种西红柿。客厅及整个房子都打扫得一尘不染。当调研人员赞叹房子的整洁时，扬内利女士回答说：“啊，这个房子太小了，如果在椅子上乱放一件衣服或一双鞋的话，就乱了。”小比利的父母最近才买的这座房子并进行了装修。全部装修都是扬内利先生自己在晚上和周末做的。

琳达·扬内利（Linda Yanelli）36岁，但看上去却要显得更加年轻些，部分原因是她在家里经常穿剪边短裤和棉布T恤衫；她光着脚，棕色的头发朝后扎成一个马尾巴。扬内利女士在市郊给人打扫房子（没有编制在册），每小时12美元。她的工作很辛苦。她和同事们四人一组，乘雇主的车挨家挨户地打扫，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午饭时间。比如，每星期四，因为她的小组在一天里要打扫九家房子，她在晚上6：00之前回不了家。扬内利先生（Mr. Yaneili）快40岁了，瘦瘦的，话也不多，因为他是一名房屋油漆工，他经常穿着洒满油漆斑点的裤子和上衣。[1]从14岁起他就开始工作，现在他真的特别讨厌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在他换了工作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老板又苛求又贪婪。他早上要起很早出去工作，下午4：30回家。但他很喜欢和儿子在一起，并且很积极地开车

带儿子去参加棒球赛，帮助教练做事，还会严厉批评小比利让他好好挥棒击球（他会嚷道："挥棒子啊！"还一边伤心地摇头一边说："他害怕球过来。"）。扬内利先生还和小比利一起打牌。从房子里走过的时候，扬内利先生会很亲热地用力抚摸小比利的头顶，叫他"傻小子"（一个他最喜欢的绰号）。然而，与传统的劳动分工相一致，他并不参与对小比利日常生活的照顾及在学校的教育："那是她的事。"扬内利女士还有一个21岁的儿子，名叫曼尼（Manny），他是扬内利女士和前夫的孩子，（虽然他有很多时间都在他女朋友家里住，但是）他在家里工作和住宿。当他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当他不工作的时候，扬内利先生和曼尼就可能会发生冲突。

扬内利家的两位家长都没有读完高中。他们两个都没有健康保险，生病要花的大量费用经常让他们感到十分焦虑。[2] 当他们病得很严重的时候，他们就去医院看急诊，而这往往要花好几百美元，然后他们再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账单付清。钱总是很紧，虽然远远没有几年前扬内利女士接受社会援助时那么紧。现在，她为他俩拥有一张信用卡而感到非常骄傲。但是，他们还没有活期存款，所有的账单都是通过银行汇票来支付的。他们两人都喜欢"耍钱"并经常小赌一把，他们还为当地橄榄球队下注。有时他们也会"撞上"点儿运气，家里餐厅的家具就是他们赌赢了250美元后买的。

扬内利先生和扬内利女士都来自经济拮据的家庭。比如，扬内利女士家经常搬家。在她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她妈妈（小比利的外祖母）在扬内利女士两岁时再婚。她管继父叫"爸爸"，她继父在一家工厂工作但却从来没有学会读书写字。她的生父在她13岁时就死了，据说是在一家监狱里自杀身亡的。扬内利女士怀疑这是否是真的：

> 他曾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系。他总来看我们。他一直是位好父亲。在他33岁的时候，他在监狱里上吊身亡。当时人们有很多争论——是警察把他害死的吗？那时候那些警察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但是他永远不会自杀的。他不是那种人。他临死前的头一天才刚刚买了一艘小艇。

扬内利女士是个爱焦虑的人。在一个让人终生挥之不去的事件中，她一位好友的3岁女儿死于脑瘤。有很多年，因为害怕将会发生不测，扬内利女士都限制小比利的活动，甚至在他爸爸在场的时候也是如此（例如，禁止他们到当地的河边去钓鱼）。她觉得自己因为怕失去儿子而对他太宠爱纵容了。她怀疑这就是小比利在学校有行为问题的根源。

> 我知道他现在有很多问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多动症。我是说，我年复一年试图找到他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们对他很好。我一度曾觉得这就是他问题的原因所在，我们对他太好了。就像是他身上有一条坏孩子筋。你为他做得越多，你越是爱他——他这根坏孩子筋就，我解释不清楚。但是……我们爱死他了。他是个让人开心的孩子。他喜欢体育运动……他打棒球。他想要打冰球。你看，我是那样一种妈妈——我觉得是我做错了什么。

10岁的小比利矮胖敦实，经常穿下沿垂到裤裆以下的长T恤衫。虽然如此，他剪得短短的金发和右耳垂上挂着的钮状耳环还是让他看上去有种很时尚的感觉。当我们问他喜欢老师蒂尔先生哪一点时，他解释

说，上学很辛苦：

没什么。啊，我喜欢他让我们有额外的课间休息。我们一起散步……他是个很有趣的老师。我们学他编出来的歌，像“地图饶舌歌”。你开心的时候就能学好多东西。我们教室里有很多动物。嗯，我们有个其大无比的鱼缸，里面有九条鱼，三只仓鼠……（蒂尔先生）用很大的词儿……他用像“从技术上说”和“障碍”这样的词。他有时会用很巨大的词。

但他也有不喜欢蒂尔先生的时候：

嗯，他生气的时候……他会揪人家的头发或耳朵或者用手指头弹人家的脑袋，可是这些都很疼。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叫唤，“哎哟！”

问他蒂尔先生会怎么形容他时，他报告说：

他会说，我很聪明。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听见他说的。他会说我总能做好作业。他会说我是个好孩子，我一直保持较好的学习成绩。

但是小比利也知道自己的名声不好：

他会说——很多人觉得我总惹麻烦。他会把我形容成一个整天惹麻烦的孩子，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会说——他认为我在家里父母的教育有问题。

他也知道他父母和“学校”之间关系紧张，说他妈妈很“恨”校长。

小比利的家在一个全部都是白人的住宅区，但是他家离一个黑人住宅区与本区之间的分界街只有几个街区。他所在的下里士满小学在学生和教职工中各个种族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他的三年级老师格林女士就是非裔美国人，学校的顾问富兰克林女士（Ms. Franklin）也是非裔，但他的四年级老师蒂尔先生还有校长则是白人。在家里，他大都和白人孩子（包括白人女孩）一起玩，虽然有时候他班上的一个住在附近的黑人孩子会步行到他家来看看他想不想一起玩。他爸爸从小最好的一个朋友米奇（Mitchell）是黑人。米奇每周都会来串好几趟门。他们经常去的店铺绝大多数都是白人的，小比利的棒球队也是如此。

同泰雷克·泰勒、卡蒂·布林德尔及其他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一样，小比利每天的生活大都是围绕着和附近邻家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度过的，这里住着很多小孩。夏天的时候他唯一一个有组织的活动就是棒球，晚上的训练和周末的比赛让全家都觉得极其的忙。他很喜欢参加棒球。

我喜欢接球。我喜欢起来击球，因为我就觉得像是，有时候我觉得很紧张，比如如果投手特别快的话……我怕我会击不到球，砰砰砰，我就打到外场了。

但是，大多数时候，小比利都在大街上和住在附近的孩子一起玩，看电视（包括周六下午的烹饪节目），或者和他妈妈一起坐车去办杂事。与泰雷克·泰勒一样，比起加勒特·塔林格和亚历山大·威廉斯来，小比利有更多没有安排任何事情的闲暇时间。此外，小比利的家长都与自己的亲

戚联系很紧密，小比利的叔叔几乎每天都会来串门，扬内利女士每天都和她妈妈通话。

> 我的兄弟们每天都给我打电话，“你干吗呢？”“没干什么呀”，“回见了啊……”我们家人每天都通话。我的另一个兄弟，只要他一觉得我没事做，就会给我打电话，就是问问你干吗呢、你今天早上在学校表现如何呀？我们全家每天都全方位地联络。

和家人在一起，“总有人在那里看着他们，不管他们的生活如何，总有人关心他们。这个很重要。”

尽管如此，扬内利一家并不是和所有的亲戚都来往密切。扬内利先生正和他弟弟查理（Charlie）一起工作，忽然他看到了另一个兄弟雷（Ray）。雷是个吸毒成瘾的人，当时正推着辆手推车像个老头子一样往前走。扬内利先生给查理五美元让他交给雷，但是他没有自己走到他面前去。

小比利在学校里经常得“良”，但是老师认为他行为表现上有问题。他妈妈说他是班里的小丑。他经常在学校惹麻烦，比如，扔石头，在别的孩子要坐下时把椅子撤走，和其他孩子打架，以及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犯纪律”的形式。蒂尔先生是这样描述他的：

> 他是个疯疯癫癫的捣蛋鬼。不好意思，但他的确就是这样……你知道一个捣蛋鬼是什么样儿的。他朝你对眼儿。他把舌头伸出来，发出怪里怪气的声音。

蒂尔先生还为小比利不能和同学们和睦相处而困扰。学校的心理顾问富兰克林女士也同意：

> 小比利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很有潜力。[但是]他那张嘴总把他卷入很多麻烦。很多时候他对其他孩子说的话都会把人家给惹恼了。他会说其他孩子妈妈的坏话……他知道怎么让其他孩子生气并给予反击……我真的觉得他的很多行为举止都不是这么大的孩子该做的……[那些行为]都是比他小得多的孩子才会有的……6岁，或7岁还差不多。

因为他在学校的表现问题，老师们都强烈建议小比利每周去看学校的心理顾问。老师们还建议他们全家都去看心理医生，小比利的爸爸对此感到极其愤慨。他妈妈觉得她很有可能最后还是会默许去参加家庭心理治疗的，就像她同意小比利在学校接受心理辅导一样。她说：“我觉得他们在强迫我，我真的这么觉得。”学校的心理顾问富兰克林女士知道她不是很愿意：

> 他妈妈很抵触让小比利参加群组心理治疗……我们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说服她同意小比利来这里。我想，就像很多家长一样，她认为同意孩子去参加心理治疗就是在说你的孩子有精神病。我们并不是这么说的。

扬内利女士在很多方面都是按照学校的标准去做的。例如，小比利的父母认为学习好这一点很重要。他妈妈监督他做作业并要确认他都做完了。为秋季学期买衣服的时候，她也很仔细地遵守规定。妈妈每次都去开家长会，甚至还会在为一些事情担忧的时候主动与学校联系过。然

而有时候，两个家长也会蔑视学校的规章。比如，小比利的父母鼓励他直接违反学校的规定，在操场上以武力保卫自己。在小比利四年级时，听烦了小比利说班上另一个白人男孩一直在揍他，扬内利先生和小比利的叔叔就教他如何打架，还让他第二天到学校去“把事情了结掉”。当小比利被停学的时候，他父母仍然为他出手的事感到骄傲，虽然打人直接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扬内利女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给了下里士满小学心理顾问富兰克林女士，富兰克林女士十分愤怒，她回忆说：

> 我觉得他们给了孩子错误的信息……他们教他这种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我对她也这样说了。那样做真的把错误的信息教给了孩子……我试图向她解释，虽然我理解他们是想让他保护自己，但是这种行为——打架——是违反学校规定的。如果他遇到了问题，这里有人可以帮助他。出于同样的原因，小比利也必须为自己把其他孩子惹急了而负责。

富兰克林女士虽然注意到“这种态度并不是扬内利女士独有的”，但她觉得“允许孩子打架”就给了他“在任何小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可以大打出手的特许”。她还反对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扬内利先生并不参与对小比利的照顾（这是一种几十年前的行为模式）。她觉得小比利家在这方面也有欠缺：“我的确觉得他父亲[不参与照顾孩子]对小比利一点帮助都没有。首先，我认为父母应该一起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我觉得这一点又给了小比利错误的信息。”

看来，这些家长和学校关系上的差异在家庭生活中——换言之，即家中的儿童教养方式和学校制定的标准之间的一致程度与隔阂程度——总会有规律地浮现出来。就像温迪·德赖弗的家长那样，在与学校的互动中，工人阶级家长（例如扬内利家）经受了一种隔阂感和不信任感，一种被排斥和处境危险的感觉。虽然他们俩在面对其他服务行业人员的时候都很放松，很健谈，也很友好，包括扬内利女士每周六去取银行汇票和彩券时遇到的人、餐馆里的服务人员和前台的招待员，但是他们两人都对学校不信任。事实上，扬内利女士“恨学校”并经常感觉受到了校方的欺凌。

> 今天早上我从他的书包里发现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我要杀了你，因为你没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而且，嗯，X你妈，你死定了，还有，你妈是这个什么东西，你爸是那个什么东西，你姥姥是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发抖。我简直不能等到九点钟了。我就说，我的天啊，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我知道小比利总在找麻烦，但是，当轮到其他孩子欺负他的时候，就没人管了。我准备好了去学校和心理顾问说这件事，说，对，我的确努力了，因为我努力了，我太生气了于是我就到那边说，你该拿那些孩子怎么办呢？他们做了这个。但是老师们说，那些孩子对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小比利先招的他们。所以他们的回答总是什么都是小比利的错。

马歇尔女士甚至是汉德隆女士都觉得她们与学校的互动还是比较有效的；与她们相比，扬内利女士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力量，完全失败了：

> 调研访谈人：那你对他们那种回答有什么感受？
>
> 扬内利女士：我恨学校。我恨它。我试图把他送到天主教学校去。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她的小男孩也有同样的问题，她送他去了天主教学校，那孩子的整个生活都变了样。但是，小比利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他们说他们没有名额了。所以，我每

天都为这孩子摸爬滚打，想把他教育好。这就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这样。我在上班的时候还会想，他在学校里怎么样了？嗯，我明天能做点什么让事情变得好一些？简直是没有尽头。

扬内利女士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比较低，正如她在与小比利的四年级老师蒂尔先生开完家长会后所说的：

我想问他为什么要揪小比利的头发。为什么他拿起小比利的书扔到教室的另一头，还说："你做得太慢了。"……我没有能够讲出我想讲的东西……我不太专业。我没法讲出我想讲出的话。就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员，也并不是（压低了声音）就意味着他们就那么精明。[3]

扬内利先生也有和她一样的挫败感，他的观点是，"他们"不会再公平地对待小比利了，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他是个问题学生。即使扬内利先生和女士是根据协作培养的逻辑把小比利养大的，小比利也可能会在家在校都有各种问题。但与像马歇尔女士这样的中产阶级家长相比，他们使用的教养策略给他们与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更大的隔阂、不信任和困难。扬内利女士不觉得她在家长会上有那些可以"讲出"她想讲的东西的"词汇"。相反，她感到毫无力量，十分局促。

担心会被告发

有时候，当家中使用的体罚手段可能会受到校方的干预时，这种对学校普遍存在的局促感就会爆发成一次危机。在家庭生活中，扬内利夫妇会下达指令："比利别做这个"或者"比利别闹了"。他们经常不告诉小比利为什么。即便在他们的确给出理由的时候，他们作出的解释也比塔林格夫妇要短得多。例如，两位家长都没有让小比利讲出实情并鼓励他自己考虑好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影响。相反，家长会很简短地陈述理由（如果他们会给出一个理由的话）。当小比利把她激怒的时候，扬内利女士（实际上所有的责惩都是她执行的）觉得用皮带打他很有效果。这种儿童教养的基本策略——指令和体罚——与专业人士所提倡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比如，五月上旬的一个星期三，扬内利女士为了家庭作业和儿子吵了起来。晚上8：00的时候他还在很缓慢地做作业（电视还开着），虽然他很早就开始写了。

妈妈：比利，赶快把作业做完吧。都快8：00了。我要把电视关了。你做到第几题了？你几点钟开始做的作业？

比利：5：00。

妈妈：如果你是5：00钟开始做的，你6：00就该做完了。

妈妈：比利，回答我。告诉我你做到第几题了。（她听起来生气了。）

过了一会儿，小比利把作业做完了，然后开始和妈妈还有调研人员一起玩拼字游戏。这个游戏变成了一轮新冲突的源泉：

妈妈：你拼完了这一轮就得去洗澡了。

比利：我们正玩拼字游戏呢。

妈妈：你得去洗澡了。洗完之后你可以再接着玩。（妈妈说话声音很大，听起来很生气。）

比利做完作业之后就和妈妈及调研人员一起玩拼字游戏。游戏还没有结束，扬内利女士就让比利去洗澡。比利对她不予理睬。在多次叫比利去洗澡他都不听之后，他妈妈拿出了一条皮带。

妈妈：比利，洗澡。我不管[你]是哭还是喊。

比利：我们还没有玩完[拼字游戏]呢。

妈妈：你玩完了。下次早点做完作业（就有时间玩了）。

（比利还是坐着不动。）

妈妈：快点！你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呢。（比利没有动窝。）

妈妈走进另一间屋子，拿出了一条棕色的皮带。她在比利的腿上抽了两下……小比利坐在大比利和[调研人员]之间。大比利和[他]朋友汤姆看着小比利挨打。她说："赶紧起来。要不我明天就没办法叫醒你。赶紧起来。"小比利站起来跑上了台阶。

在这段较长的互动中的确有讲道理的元素，扬内利女士解释了为什么她要让比利做那些事情。但是，其基本过程却强调了一系列的指令语（例如，"比利洗澡""你玩完了"）。最重要的是，当妈妈觉得儿子没有听话的时候，她发现体罚是一个有价值的办法。虽然扬内利先生只是看着他们而没有参加，但在这些互动中他也支持这个方法。事实上，有时候比利做事磨蹭时，他爸爸就会自顾自地说："他该挨顿打了！"在与扬内利女士的访谈中，她说她使用皮带的频率和理由变化很大，她估计上两个星期她每周都要用一次。我们在他家访察的时候，依当天的情况而定，有时候会提到用皮带，但是我们观察到她用皮带打儿子或是威胁用皮带的次数，至少每星期有一次。 [4] 在一些工人阶级家庭，什么行为要挨打规定得要更清楚一些。再有一点也很重要，调研中的另一些工人阶级家庭并不使用拳头或皮带。因此，一个阶级之内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是这种责罚孩子的方法，我们并没有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观察到。[5]

再回到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观点上，学校有选择性地把某些文化上的惯常行为（惯行）确定为正统的行为，而另一些惯行，比如说打孩子，虽然几乎在其他各个时期都是无处不在的，却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一个家庭坚持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的惯行，而不采用协作培养，那么他们在与学校的互动中就会承担重要的后果。扬内利一家就很强烈地感觉到学校是对他们具有威胁性的力量。换言之，当他们面对学校的权威时，不使用详细的说理来教育孩子（一种文化惯行）就被转化成了缺乏教育资源与方法。他们对此感到焦虑、无能为力并且害怕。

例如，比利的妈妈担心学校会向州政府告发她。因为比利的在校表现问题，老师们都很明确地坚持让比利去看经常到学校来的心理治疗师。然而，比利的妈妈一见到心理治疗师，他就像本章开头时那段话里那样警告她说，如果发现她虐待孩子，他就必须依法把她交给政府官员。扬内利女士自然会觉得受到了威胁，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她觉得"比利有时候太不像话了，也许他偶尔也需要挨一顿打"。

> 我对心理治疗师说：你知道，我们有时会在[杂货店]里面，比利会趴在地上从货架间甬道的一头滑到另一头，我就会揪着他的头发拽着他走过甬道。这个是虐待儿童吗？……如果比利坐在课堂上说他妈妈揪他的头发，我是否就会听到有人说我虐待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我猜我只能走着瞧了。但是有时候我的确也拿着皮带追他到楼上。我的确这样做过。

家长对比利需要什么的想法和学校的儿童教养标准之间的这种冲突在家里制造了很多小危机。比如，五月的一天，（在正式访察结束之后）我到她家去随便看看，我发现扬内利女士正深感郁闷。她之前刚打过比利，当时比利抬起胳膊去挡妈妈抽下来的皮带，结果他的前臂上被皮带抽过的地方留下了三道特别红的血印。他妈妈简直要疯掉了，因为“他不得不带着这三道血印上学”，她对此十分不安，一边抽烟一边在厨房里来回走动，试图想出该怎么做。[6]

简言之，扬内利女士不使用讲道理的方式而是使用皮带来责罚孩子，这就让她容易受到权威的抨击，因为她进入了一个推崇说理的“领域”（学校）。如果她生活在上个世纪，用皮带打孩子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教育方法却会带来一种潜在的灾难性的风险：他儿子可以给老师看他胳膊上的血印；她有可能会因虐待儿童而被捕，而且他儿子还有可能被暂时或长期放在寄养处。不管这一系列事件会不会真的发生，扬内利女士都担心学校会采取什么行动。

因此，在教育领域里，不同的家庭背景会带来不同水平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家庭因没有足够的资本而遭到的损失，就现形为一种连绵不断的灾难将至的胁迫感。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这一关系断层十分重要。这一断层减小了他们对学校的信任感和自在感，而据其他社科工作者论说，这些感觉又在家庭和学校间能够形成有效高产的关系上起着关键作用。[7]

评估

像马歇尔、威廉斯和塔林格这样的中产阶级家长（包括比较富有的中产阶级家长），在与学校官员的互动中都经常洋溢着自信。他们看起来对学校并不持有同样的恐惧感。在与中产阶级家长的任何一次观察或访谈中，从来就没有人像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那样重复提到权威人士有可能会“来把我的孩子带走”。比如，在加勒特的一次州际足球赛后，回到家，塔林格女士说，她和另一些家长让孩子们在一家旅店里看录像，并给了他们一部手机，然后就自己到几个街区以外的餐馆去吃饭了。她微笑着用一种轻松的口气说：“可别去告发我们哦！”总的来说，加勒特妈妈的言谈举止和小比利妈妈的有很大的不同。她并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件事，而是把它当玩笑讲给了我。更切入正题地说，中产阶级家长从来没有显得他们担心学校会对他们做什么。他们并不把自己摆在脆弱的位置上，而类似的事件却会让小比利的家长特别担惊受怕，因此，使用讲道理说服孩子的策略给他们带来了无形的优势：这使得他们能够

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技能库同步。这也就使得他们在学校官员面前能够做到轻松自如。

总之，这些儿童教养标准都是由专业人员制定出来并编入学校制度的。换言之，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发布了恰当的儿童教养标准，并警告我们什么样的教育方法是不正确的。[8] 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采用了这些标准。而且，无论好坏，学校是政府的臂膀，并因此必须依法报告那些他们相信是虐待儿童或疏漏照顾的事件。由于小孩子必须接受学校教育，所有的家庭都无法避免与学校打交道，或者间接避免政府官员的审视。在这样的环境中，中产阶级家庭——因为他们更有可能采用专业人士制定的标准——看上去就是在享受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所没有的这些大多是无形的优势。

[1] 他在“账外”工作了很多年，但最近又换了工作，工资被削减了，这样他就可以交税，并可达到政府救济的标准。

[2] 但是，急诊室里的一个职员告诉扬内利女士，有一个州政府办的项目可以给孩子提供医疗保险，因此，比利就得到了一张医疗保险卡。

[3] 这次家长会在秋季举行，在我采访了扬内利女士之后，但又在请她参加家庭观察之前。在这次家长会上，蒂尔先生很直率地告诉她，他认为比利有心理问题。（蒂尔先生为人并不圆通，他还对比利在一次外出中从泥泞的山坡上滚下来表达了失望，并在会上说：“就连那些又胖又蠢的孩子都能正常地从坡上走下来。”）会后，扬内利女士感到十分沮丧。她从我给她的同意书上看到我的电话号码，并在当晚给我打电话讨论这件事。她觉得比利的成绩单很优秀。她不明白蒂尔先生为什么不和她讨论比利的成绩，反而声称比利有心理问题。这次谈话和很多其他谈话中很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尽管扬内利女士清楚地察觉到老师的做法不恰当，但她却觉得自己无力影响这个局面。而且，她还责怪自己没有能力。就像她那天晚上说的，“我自己想，‘你为什么让校方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呢？’”

[4] 鉴于中产阶级主导力量强调讲道理的方法，指出这种方法并非没有弊端是很重要的。当中产阶级父母试图和一个任性乖戾又大吵大闹的5岁孩子讲道理时，其结果可能并不成功。

[5] 其他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更有可能使用体罚，尤其是对他们的儿子。参见Ronald L Simons等人的文章“Intergenetational Transmissions of Harsh Parenting”。

[6] 据我们所知，第二天下里士满小学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7] 参见Joyce Epstein的著作及James Coleman的著作在这一点上的论述。

[8] 参见Jacques Donzelot，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第十二章 社会地位的力量和局限性

五年级结束的时候，孩子们战战兢兢又激动万分地期待着升入当地的初中，与“大孩子们”为伍的蜕变。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都分别为这一人生的转折点安排了毕业典礼，典礼都在炎热明媚的六月举行。在下里士满小学，大家对毕业典礼的热情十分高涨，尤其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很多家长来到学校时都带着一束束的鲜花和用亮闪闪的银色气球扎成的圆环，上面还写着像“祝贺毕业生！”这样的词句。母亲们，尤其是非裔美国母亲，都穿着坚挺洁净的浅色套装和常在婚礼上、教堂里和特殊场合穿的服装。女孩子们，包括温迪·德赖弗和塔拉·卡罗尔，都穿着镶着花边的裙子。比利·扬内利穿着正式的短上衣，宽松西裤，白衬衫，还打着领带。哈罗德·麦卡利斯特没有穿得那么正式，但他也同样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印花正装衬衫和正式皮鞋。学校给每个女孩子一条黄色康乃馨的手链，每个男孩子一支插在扣眼上的花。在“食堂大厅”里，父母们、祖父母们、孩子们和他们的哥哥姐姐们都坐在学生椅子上，一起读着毕业生名单，闲聊着，笑着。随着一曲和声不太整齐的“威风凛凛”，孩子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排着队走了进来：两队孩子从礼堂两个相对的侧边同时开始行进（一步一停、一步一停）。有的男孩子，包括哈罗德·麦卡利斯特，在游行开始的时候在脸上画了表情油彩画。当哈罗德听到家人为他叫好的时候，他咧开嘴笑了一下，然后又故意作出很不经意的样子。

简、洛里和亚历克西斯看到哈罗德走进来的时候都笑了，她们说：“嘿，哈罗德！加油！”有人低声吹了一声口哨。另一个人说：“看上去很精神啊，哈尔。”哈罗德朝家人咧嘴一笑，而在他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则试图显得很酷很不经意的样子，就好像这些大惊小怪的举动对他来说并不怎么重要。

很多孩子看起来都兴高采烈的，在列队走进来的时候对自己的家人开怀一笑。在毕业典礼上，当他们的孩子得到特殊嘉奖时，有些下里士满小学的家长会爆发出阵阵欢呼，他们喊着“太好啦！”“好！”或是孩子的名字。有的家长则是站起来给自己的孩子鼓掌。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欢乐的时刻，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对学校的不信任感。有几个孩子因为纪律问题被禁止参加毕业典礼，很多家长都在抱着不赞成的态度讨论着这件事。比利·扬内利的父母正骄傲地坐在观众席上（他们都从单位请了假）。虽然扬内利先生告诉我“我喜欢这所学校”（尤其是和小比利即将要升入的学校相比），但是他的不安也是显而易见。

大比利·扬内利在典礼的过程中说了很多……贬损的……话，要么就是对自己说的，要么就是替[扬内利女士]说的——扬内利女士坐在他旁边，大部分时候都不理他。一次，一位男老师走上台去的时候，大比利说：“他特傻帽儿。多蠢的人啊。”在典礼开始的时候，校长正调试着麦克风，准备说话，大比利假装模仿她：“好啦，所有的人都被停学了。”

斯旺小学的庆祝活动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很多斯旺小学的孩子，包括加勒特·塔林格和梅勒妮·汉德隆，都微笑着，看起来很高兴，但是他们并没有迸发出热烈的兴奋感。那些穿得比较正式的斯旺小学家长们也只是穿着上班时穿的衣服（即，套装、西装裙和短上衣——一种“职业装”而非盛装出席的那种装扮）。斯旺的男孩子们看上去都干净整洁但却很随意：很多男孩都穿着球衣，有些穿着纽扣汗衫，只有几个人系了领带。女孩子们穿着类似考究的礼拜天教堂着装——没有什么花边，但是很漂亮很优雅。老师们颁发的奖项从全勤奖到数学特殊成就奖都有。当他们的孩子得到嘉奖时，斯旺小学的家长们都温文尔雅地表达了他们的自豪感，他们简短而礼貌地鼓了掌，拍了照，并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在斯旺小学，孩子们的未来也与下里士满小学有很大不同：

> 斯旺小学的学生们看起来更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下里士满小学则对孩子们将要在人生中面临的危险和困难更为警觉。斯旺小学的赞歌唱的都是未来有多么的光明，孩子们会打开多少扇希望之门，这一切都是多么的激动人心。而下里士满小学的前两支歌都是有关抗争绝望，嫉妒、痛苦和困难的，以及第二天早上起来准备好东山再起，再次奋斗，还有世界上有多少孩子都生活在苦难之中。一位男老师还警告孩子们，下一年在中学里，当别人辱骂他们的时候，“要把手放在兜里”，不要动手。他们强调一些好的行为（克制自己，“做个好公民”，避免打架，尊重他人），而不是像斯旺小学那样强调学业有成。

当然了，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也是不同的。例如，扬内利夫妇都只上到十年级。他们希望儿子小比利能上州立大学，但是并不那么确定。中产阶级家长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孩子能上大学。中产阶级孩子，包括斯泰西·马歇尔，经常叽叽喳喳地谈论他们长大后要上哪所大学。塔林格一家到处去比赛足球的时候就已经参观了好几所常春藤大学的校园。亚历山大·威廉斯的父母正在帮助他的一个表姐付学费，让她在一所私立精英大学读书。因此，对中产阶级孩子来说，重要的是他们要上哪所大学，而不是能否上大学。在这两种对未来截然不同的憧憬中，五年级末的小学毕业典礼也就成了不同的转折点。

社会地位的力量

在美国，人们对社会阶级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很多美国人都相信，美国在根本上是个开放型的国家。他们认为认识美国社会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看成很多个体的集合。他们相信辛苦的工作，付出努力，并且有才干的人更容易走上坡路。换句话说，很多美国人都相信美国梦。在这种观点看来，儿童应该拥有大致平等的人生机会。而人生机会不同的程度都可以追溯到每个人对成功的渴望、拥有的天赋和勤勉努力的程度不同上。这种看法否定了另一种看法，即，家长的社会地位系统性地影响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和取得的成果。相反，成果被看做是更多地掌握在个人的手中。

在一个有所不同但又是相关的支脉上，有些社科学者承认系统性不

平等的存在，包括，例如，家长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职业声望的差异、收入及儿童教养方法上的差异。然而，这些学者却都把社会内部的差异看做是一种渐变等级。为了解释不同的人取得的不同成果，他们认为，审视像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或者某个城市的家庭收入范围这样的线索会有帮助。这些不同的线索相互交织成纷繁复杂又往往令人迷惑的模式。对不平等抱有这种看法的学者，大都把焦点聚集在了各种具体模式之间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上（例如，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孩子的词汇量，或者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家长对孩子学校教育的参与度）。这些社会科学家都明说暗指地拒绝接受那种认为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可以确认的直接差别的观点。他们不相信贯穿全社会而确实存在着的各种差异能够聚合成以社会地位的形式出现的可辨认的模式。

在这本书里，我向这两种观点都提出了挑战。我并不把社会看做是一群个体的集合，相反，我强调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在塑造其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追随一个已经稳固确立的欧洲传统，我拒绝接受那种把美国家庭解释成细微等级的分析。我认为类别分析的方法更有价值——可以用类析法把各个家庭按贫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这样的社会类别分成组。我认为，这些类别有助于研究家庭成员的行为，其效力不只体现在某一个方面，更是体现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家庭的日常行事与其社会地位紧密结合在一起。接受这个观点的社会科学家也在类别的数量和种类上存在着分歧，例如，是否应该设定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及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尽管如此，他们都同意，人们在举止上可观察到的不同点是可以在不扰乱日常生活复杂性的同时，成功地被分成有意义的类别的。我自己的看法是，选择出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并将其按社会地位来区分，这完全是了解美国人家庭生活现实一个更好的方法。我还相信，出生在何种社会地位对塑造日常生活常规十分重要，即使在家庭成员都没有明显意识到各种社会地位的存在时，也是如此。

因此，我强调了社会地位的力量是如何与孩子及其家长日常生活的结构和节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地位影响了家庭生活的几个关键方面：时间安排、语言的使用和亲族纽带。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母亲们可能都会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反映出类似“无微不至照管孩子”的理念，但是她们的具体行为却截然不同。 [1] 为此，我描述了几对作为儿童教养之“文化逻辑”的信念和行为。当孩子和家长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机构的世界里，他们发现这些文化惯行并没有被赋予同等的价值。由于在家中的文化技能库和公共机构采用的那些标准有很高的相似度，中产阶级孩子及其家长拥有很多优势，虽然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如何受益的。在下一小节里，我将对家庭生活中不大受社会地位影响的区域给予认可。然后，我将转而突出那些社会地位起到重要作用的方面，并重点讨论各个阶级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差异，以及如何去减少或消除这些差异。

社会地位的局限性

在我们观察的这些家庭里，其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并没有随社会地

位而出现有规律的差异。每个家庭都有欢笑的一刻，有情感相通的瞬间，也有静谧自在的时候。[2] 哈罗德·麦卡里斯特差点儿没拿住热狗但最终还是很笨拙地抓住了它，那时他和妈妈一起都笑了。棒球赛之后，威廉斯先生拨弄着亚历山大的头发，并叫他“俊小伙儿”。汉德隆女士在圣诞夜游行后紧紧地拥抱着女儿的肩膀，而梅勒妮也高兴得眉开眼笑。一个夏日的下午，扬内利先生和小比利一起盘着腿坐在人行道边打牌。这些息息相通的瞬间对于处在各个社会地位上的孩子和家长们来说，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即便这些瞬间在语言，活动内容和特征上都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显现出了不同的形式。

我们观察的所有家庭都遵循着一些仪式性的惯行：他们最喜欢吃的饭，他们必看的电视节目，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玩具或游戏，他们盼望的全家出游日和其他一些共同的经历。各家仪式性惯行的内容（尤其会随着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些经历，而这些经历本身也给家庭成员带来了一种归属感。而且在所有的社会地位中，孩子日常生活的一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重复各种仪式上：起床，铺床，洗澡，穿衣，梳头，刷牙，吃早餐，找课本和卷子，等着成年人准备好接送他们。这些时刻都点缀在几小时、几天和几周的家务中，在冗长乏味的事务中，在平凡的任务中，在紧张的气氛中。这一点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真实的，不论是什么社会地位的家庭。也没有哪一个家庭可以豁免于人生悲剧的发生：各个社会地位的家庭中都有人因为交通事故或者自杀而过早地离开人世。在各个社会地位上的家庭中，孩子和家长都有各种各样的性情：有些人很羞涩很安静，有些人很外向很健谈。有些人很有幽默感，而有些人却没有。日常生活的组织安排和整洁程度也不随社会地位而有规律地变化。有些人家中干净整洁，有些人家里却乱成一团。有些最脏最乱的就是一些中产阶级的家庭，他们的入口通道堪称整洁的楷模，但是他们的居住空间，尤其是楼上，却到处都很零乱。尽管像前面的章节里所详述的那样，各个家庭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差异，但是在每个家庭中，几次访问之后，我和研究助理们都发现周围的环境很正常，很舒适，也很安全。换言之，它们都让人觉得是来到家里了。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尽管来自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在一些重要方面有共同之处，但社会地位却给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常规带来了重大的差异。黑人和白人中产阶级父母都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在这些家庭里，家长对孩子的天赋、见地和技能进行积极培养和评估。他们给孩子安排各种活动。他们跟孩子讲道理。他们盘旋在孩子周围，并且在外面会毫不犹豫地为了孩子而干预各种事务。他们有的放矢又坚持不懈地努力去激发孩子的发展，去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长认为孩子的发展应当是自然展开的，只要给他们提供抚慰、食物和其他基本抚养条件就可以了。我把这种教养儿童的文化逻辑称作成就自然成长。和协作培养

一样，这种方式也需要家长付出持久的努力，把战胜生活中强大的挑战来维持孩子的自然成长看做是一种成就再合适不过了。依照自然成长的方式教养孩子的家长，通常在组织孩子生活的时候，会让他们在家里和附近的地方与同龄人和兄弟姐妹及表亲一起玩。因此，孩子们对自己的业余时间有更多的自主权，也有更多的机会自发地去玩耍。他们对自己在家庭以外的生活也更负责任。与在中产阶级家庭中不同，成年人组织的活动并不多见。与中产阶级家庭没完没了地把努力集中在说理和磋商中不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里没有那么多的言辞（包括较少的抱怨和纠缠）。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界限十分分明，家长大都不会为了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而说话，语言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指令性的语言很普遍。在他们与公共机构打交道时，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把责任移交给了专业人士；当他们确实试图进行干预时，这些家长感到他们没有自己希望的那么有能力、有效力。虽然工人阶级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之间有很重要的差别，尤其是在生活的稳定性方面，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上他们却没有太大的差别。相反，在本项调研中，这一儿童教养上的文化差异出现在中产阶级和其他所有人之间。

不论处在什么社会地位上的人，他们的儿童教养惯行看起来都很自然。就像呼吸一样，儿童教养方法通常都是自动而且无意识的。家长们很少会意识到他们正在用某种具体方式引导孩子。[3] 例如，汉德隆和塔林格家的孩子都有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表亲住在离家开车不到二十分钟的地方。然而，他们只在特别的日子才会见面，不像德赖弗和麦卡利斯特家的孩子，一个星期要和自己的表亲见上好几次。虽然塔林格夫妇都很坚定地忠实于协作培养的策略，但是他们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的方法。虽然他们两位家长都提到，当他们看到亚历山大很有求知欲的时候，都感到特别的欣慰，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亚历山大的这个特点和他们自己所广泛使用的说理教育联系起来。他们也没有去分析思考自己为什么不使用指令性语言。大部分时候亚历山大都和同龄人在一起，而不是和自己的表亲一起玩（部分原因是他们都住得很远），这一点也没有成为他父母思考或讨论的主题。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部分当然也的确反映出了有意识地选择和深思熟虑之后采取的行动，包括威廉斯女士对看电视的极力反对和父母二人对增进儿子音乐才能的投入。时间不够用也是经常讨论的话题。然而，即便是在这方面，讨论的主题也是集中在生活细节上（例如，为了去参加学校的话剧而放弃一场棒球赛），而不是在教养孩子的整体方法上。

同样的，在使用成就自然成长的家庭中，经济都极为拮据，他们几乎总是在谈论着有关钱的话题。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相信自然成长而不是协作培养，这种对自然成长的笃信还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意味。麦卡利斯特女士强调了自己作为一位母亲的实力。她为孩子的衣食而奔波，照顾他们，带他们去野餐，密切注意着他们，所以，与住在周围的母亲们相比，包括那些吸毒成瘾的母亲，她很赞许自己所做的一切。她并不把自己和世界上那些塔林格女士或威廉斯女士们相比较。

种族和阶级的交叉点

在《种族很重要》（Race Matters）一书中，科内尔·韦斯特（Cornell West）教授报告了一件让他深感沮丧的事情：他要为自己新著的出版去照一张头像照，在马路上叫出租车的时候，竟然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他等了又等，有十辆空的出租车从他身边驶过，却（通常在他的视野内）停下来去接那些不是黑人的乘客。盛怒之下，他放弃了叫出租车，而改乘地铁，结果没有赶上预约时间。[4] 韦斯特教授和其他中产阶级的非裔美国人常会提起让他们感到愤怒的事情：他们在与陌生人的互动中无法标示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些情况下，种族就占了社会地位的上风。[5]

这次调研中的中产阶级黑人父亲们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一位父亲报告说，一天傍晚，在一个高档购物区，他正健步走向一台自动取款机，一个白人妇女看到他后紧紧抓住了自己的钱包，一脸惊惧。而且，就像我在前面所展示的，中产阶级非裔孩子的父母都十分警觉地关注着种族问题的迹象。一个一年级孩子亚历山大（一个律师的儿子）说，他长大后只能做一个扫垃圾的，在篮球营地，弗恩·马歇尔是一百个女孩子中唯一一个黑人孩子，她在上午的篮球活动中过得很开心，但在午餐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很难融入那些叽叽喳喳的白人女孩当中（如果她是白人的话，就会容易得多），在这些时候，他们父母的担忧就得到了证实。虽然他们自己很艰难地在白人的世界里前行，但是家长们却会尽量避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某个活动中唯一一个黑人小孩。此外，家长们还会尽力帮孩子发展一种正面的自我形象，一种明确包含自己种族认同的自我形象。因此，他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参加像全是黑人的浸会教堂这样的活动。

基于这些证据，如果暗示种族问题在孩子们的生活中不重要，必然是一个错误。不过，种族的影响并没有我原先料想的那么强大。本书所聚焦的领域是：孩子们如何度过闲余时光，家长们使用语言及惩戒孩子的方式，家庭社交网络的性质，干预公共机构的策略——根据这些焦点，白人和黑人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采用了十分相似而且经常是一模一样的惯行。[6]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种族在他们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也有可能会增加。[7] 大多数非裔美国人都不会和其他种族和民族的人恋爱或结婚。对于黑人房产所有者来说，住房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现象，无论他们处在什么社会地位。[8] 非裔美国人在与白人的人际交往中也更容易遇到种族主义的态度，尤其是在工作场合。然而，在上小学四年级时，种族对孩子生活的影响还没有社会地位那么重大。[9] 随着父母围绕孩子的课外活动来安排自己的时间，中产阶级的黑人和白人孩子得到了极多的个性化的关注。这种对孩子活动的优先考虑深刻地影响了家长的业余时间。在这些情况下，各个种族之间少有差别或者根本没有差别。威廉斯先生要为一次庭审做准备，在他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工作到午夜之后，他还把星期天都花在开车送亚历山大参加各种活动上，他们先去参加棒球训练，然后赶快回家冲澡更衣，再奔向学校的话剧表演。塔林格先生坐飞机横穿了整个国家，眼睛都熬红了，只眯了一小觉就去上班了，而后又要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带孩子去参加足球训练，他很盼望训练赶紧结束，好让他回到家好好睡上一觉。

同样，也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不论黑人孩子还是白人孩子，他们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争吵打架，还和自己的父母犟嘴。这些行为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是根本不能容忍的，不论黑人还是白人。[10] 在本项调研中，在孩子们日常生活行为中反映出来的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上，最大的差异仍然是中产阶级孩子（包括更富有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之间的差别。作为一个中产阶级黑人男孩，亚历山大·威廉斯与白人中产阶级男孩加勒特·塔林格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相比之下，他与像泰雷克·泰勒和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这样没有那么有特权的黑人男孩却没有什么共同点。

为什么这很重要？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都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固有的优势（和负担）。然而，这些儿童教养惯行却被重要的社会机构赋予了不同的社会价值。有迹象表明，有一些家庭的文化惯行，尤其是那些与协作培养相关的儿童教养惯行，给孩子带来了其他文化惯行所不能带来的优势。

在日常生活的节奏方面，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中产阶级孩子学会了发扬和珍视自己的个性。家长允许他们参加各种各样令人羡慕的活动：体操，足球，夏令营，等等。这些活动既可提高他们的技能，还可像塔林格先生说的那样，教他们成为比父母当年还要好的运动员。在运动场上，他们学会了胜不骄败不馁。也像威廉斯先生说的那样，中产阶级孩子学会了区别巴洛克式音乐和古典音乐。他们学会了表演。他们学会了表现自己。但是这种培养也是有代价的。全家的时间安排都被打乱了。一家人晚餐的时间都很难安排在一起。像斯宾塞和萨姆·塔林格的弟弟们还要在运动场里花上很长时间很沉闷地等着哥哥，并且要坐在车里从一个活动地点跑到另一个活动地点。尽管总有静谧的间歇，家庭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都十分狂乱。家长们，尤其是母亲，必须调解好各种相互冲突的优先事宜，同时处理各种活动的时限，这些时限远比做饭或帮孩子洗漱睡觉的时限要紧迫得多。孩子课外活动的支配地位能让家庭付出很大的代价。有时候，中产阶级家庭中的每个人——包括十来岁的孩子——都看上去疲惫不堪。因此，这种儿童教养方法既带来了强大的优势，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他们经历的儿童教养文化逻辑中，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也得到了优势，并且同样付出了代价。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学会了自娱自乐。他们在外面玩，自己发明各种游戏，就像泰雷克·泰勒和他的朋友们那样。他们从来都不抱怨没意思。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还似乎有无限的精力。他们没有疲累的时候，不像我们看到的中产阶级同龄孩子那样。有些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渴望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卡蒂·布林德尔想参加芭蕾舞队，哈罗德·麦卡利斯特想参加橄榄球队。当经济状况、无人接送、活动项目有限等因素合在一起，妨碍或限制他们参加时，他们也都会感到很失望。很多孩子也会深刻地了解自己家庭经济的拮据和家政预算余地的有限。家里的生活宅间很小，经常没有多少隐私可谈。

电视几乎总是开着的，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中产阶级孩子一样，现在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没有任何节制。因此，和中产阶级家庭相比，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成员在共有的空间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事实上，家族成员之间的纽带十分坚固，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还和他们的表亲及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建立了很紧密的联系。

在家庭内部，这两种儿童教养方法都有自己明确的长处和短处。然而，当我们在家庭以外考察公共机构的动态时，与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的生活相比，中产阶级孩子生活中不平等的优势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在很多至关重要的方面，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员看起来相当有舒适感和优越感，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成员则显得局促和不自在。比如，当他们和医生进行交流的时候，哈罗德和他妈妈都没有亚历山大和他的妈妈那样轻松自如。亚历山大在家里就习惯了大量的交谈，面对医生的时候，他能很轻松地主动提问。哈罗德在家里习惯了对指令作出反应，所以他主要是回答医生提出的问题，而不是提出自己的问题。当亚历克西斯兴致勃勃地和医生分享有关她身上胎记的信息时，与威廉斯女士不同，麦卡利斯特女士却觉得她女儿的行为很不恰当。威廉斯女士不仅允许亚历山大站在凳子上上蹿下跳地表达自己的热情，她还直接训练儿子要自信大胆并为看医生做好准备。哈罗德很内向。他没有像亚历山大和其他中产阶级孩子那样，表现出逐渐生成中的优越感。他母亲显然是需要掩盖他吃的食品种类，哈罗德吸收了这个信息，看起来很是谨小慎微，表现出了一种逐渐形成中的局促感。

这种行为模式也出现在他们在学校里与他人的交往中。有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与教育工作者之间有着很热情很友好的关系。但总的来说，与中产阶级母亲相比，本项调研中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对学校都更疏远或者更有隔阂。在家里，麦卡利斯特女士会相当果断自信，但是在学校里她却很是克制服从。家长会并没有使麦卡利斯特女士更加了解她儿子在校受教育的经历。[11]

其他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在家长会上也显得很困惑，很害怕，很顺从。因为女儿温迪上四年级了还不能阅读，又反抗老师的干预，德赖弗女士都快急疯了，她说："我不想就这么莽撞行事，然后却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当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确实试图干预孩子的教育经历时，他们又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同诸如在周六早上卖给她彩票的人那样的服务人员打交道时，比利·扬内利的母亲看上去很放松很健谈。但是一旦面对"学校"，她看起来就十分焦虑。她感到自己受到了欺凌，并感到无能为力。

有的时候，家长们鼓励孩子在表面上遵从学校的官方规定，同时又怂恿他们反抗学校的权威。扬内利夫妇虽然十分清楚学校禁止打架斗殴，但他们却直接训练儿子去打来滋扰他的孩子。同样，当温迪·德赖弗抱怨说一个小男孩总缠着她，还揪她的马尾巴，老师对她说不要理那孩子，她妈妈却建议她"给他一拳"。德赖弗女士的男友还在一旁加了一句："在老师没看着的时候打他。"[12]

在像我们这样的历史时期，专业人士赞同果断自信，而把被动服从摒弃为不恰当的教子方式[[13]；而不对等的信任程度，加上揭示出来的

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同，就能产生不平等的利润。中产阶级孩子及其家长所作出的努力，经常（但不总是）会增加他们的受益或利润。亚历山大·威廉斯成功地让医生严肃地对待他对自己身体的担忧。即使她们并没有合格，马歇尔家的孩子最终还是进了天才班。

总的来说，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家庭生活中的各种日常仪式性惯行并没有平等地得到相同的合法地位。比起使用指令性语言来，家长和孩子（甚至是两岁的孩子）讲道理在教育上被认为更有价值。专业人员认为把时间花在踢足球或打棒球上比花在看电视上更有价值。而且，不同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在广大的社会范围里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使用的成就自然成长的策略相比，中产阶级的协作培养策略看起来更有资本变成社会利润。亚历山大·威廉斯的词汇量在家中，在晚上，在他和父母一边斗嘴一边谈论着剽窃和版权以及变种特工的时候不断增长。哈罗德·麦卡利斯特、比利·扬内利和温迪·德赖弗则学会了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如何在没有成年人指导的时候做游戏，以及怎样在长长的闲余时间有事可做而不感到无聊。虽然这些都是重要的生活技能，但是这些却不能像亚历山大·威廉斯的经历一样，为孩子们赢得标准化考试的高分。

这些中产阶级孩子潜在的优势和工人阶级及穷人的孩子潜在的代价都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在调研结束的时候，这些孩子还都在上小学。尽管如此，在孩子们小时候就已经有了标志这些隐藏优势的重要征兆。中产阶级孩子与他们生活中的成年人有广泛的互动经历，他们和这些成年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单纯，由官僚机构来管控，又比较表面化。当孩子们花八个星期踢足球、打棒球、打篮球和参加其他活动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很多成年人，会和作为教练、助理教练、车辆合用处司机等等的成年人交流互动。这种与相对陌生的人发生的接触，与和表亲、姑姑和叔叔的接触有质的不同，这种接触为孩子们提供了与工作相关的技能。比如，当加勒特和一个陌生人握手并与他（或她）进行眼神交流时，他正以一种毫不费力的方式，为自己长大成人后的求职面试做准备（求职专家都强调用好眼神交流的重要性）。在麦卡利斯特家，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感情很深厚而温暖，但他们说话的时候通常都不去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这种训练在求职面试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成为不利因素。在医疗保健和体操等各种不同的情境下，中产阶级孩子从小就学会了大胆自信，学会了提出苛刻的要求。就像斯泰西·马歇尔那样，他们要求公共机构对他们作出响应并照顾到他们的个人需求。相比之下，当家长告诉温迪·德赖弗（在老师没看着的时候）去打那个缠着她的孩子时，当比利·扬内利的家长让他违反校纪去出拳自卫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学到该如何让官僚机构为他们说话办事。相反，他们从中学到了失望沮丧和无能为力。

原因何在？寻求解释 [14]

正如我即刻将要讨论的，当今有些评论家谴责孩子生活中“日程安排得太满”，他们渴望让孩子得到像过去那种有很多闲散时间的生活，到处

充满着不拘形式的游戏。但这只是一种浪漫化了的对过去家庭生活的期盼。虽然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童年生活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孩子都对家庭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殖民时代，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就要从父母家里搬出去到一个熟练的手艺人那里去当学徒。随着国家的逐步工业化，孩子们小巧“敏捷的手指头”在工厂里变得很有用处。[15] 在家庭农场里，孩子们也曾是一笔经济资产。据192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北达科他州孩子们帮大人放牛并为筑围栏挖坑。他们每天还负责其他各种劳作，正如下面这段描述的一个9岁男孩要干的杂活所示：“早上要生火，给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拖地，打柴挑水，此外，在走两英里去上学之前，他要帮助喂牲畜（5匹马12头牛），还要劈柴，晚上要做些家务杂事，还要洗碗。”[16] 孩子们，尤其是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还曾帮助打零活的母亲完成她们的活计，比如，洗衣服，还有“针线活，刺绣，扎花和系标签”；大多数哥哥姐姐也都会去照顾弟弟妹妹。孩子们有一些时间自由活动休闲，但这样的时候很有限。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说，在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伴随着这些惯行的是，人们相信孩子努力工作对孩子十分重要。如果说有什么不好的话，那就是，如果孩子们在“有用的营生”方面得不到特别的训练，他们长大后就有可能成为“乞丐或小偷”。[17] 儿童图书或杂志上的故事都强调“苦干、责任和纪律的美德”；从这些故事中，泽利泽注意到，“标准的反角……就是懒惰的孩子”。[18] 然而，在1920之后的岁月里，随着《童工法》的实施，人们开始把孩子看做是“在经济上毫无用处，在感情上却是无价之宝”，由此儿童对经济的贡献也就急剧地减小了。[19]

因此，虽然一部权威性的儿童业余活动史还有待出炉，但是看起来，给孩子很长时间自由玩耍在历史上却只有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期。在二战之后，白人和黑人家长都允许孩子在放学后、在各种活动当中和在周末的时候，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玩。除了去教堂做礼拜之外，那时孩子们参加仅有的几个有组织活动（例如，音乐课和童子军）的年龄也要比现在的孩子大。“孩子课外活动的制度化”和协作培养的崛起，一般来说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20] 现在的家长并没有把他们在自己家庭出身当中学到的东西传输给孩子。我们教研中的88家中，孩子的父母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出生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小时候有排得满满的课外活动日程。相反，本项调研中的中产阶级家长，有可能是全国的中产阶级家长，看起来都是在成就自然成长的儿童教养逻辑下长大的。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尤其是在儿童课余休闲的制度化和强调对子女要“无微不至地照管”这两方面。为了理解这一转变，评论家们常会指向现代生活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与日俱增的“运作合理化”的影响。[21] 这种观点被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称作“社会的麦当劳化”，即，日常生活的日益标准化，其重点在于强调效率、可预测性、管控和可计算性上。[22] 瑞泽尔发现这些来自快餐世界的原则已经被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所采纳了，包括“儿童运动娱乐”、“健身俱乐部”、“幼儿托管”、“美国宿营地”、“玩具反斗城”及其他商店。[[23] 家庭生活也变得

越来越合乎经济原则：

> 不但为公立学校、法庭、社会公益服务员、园艺师、管家、幼儿园、律师、医生、电视、冷冻食品、比萨外卖、批量生产的衣服和一次性的纸尿裤所侵入，更为至关重要的是，还被这些公共机构、人员和产品背后的意识形态所侵入。所有这些都带来了……这种逻辑……它是非个人的、竞争性的、契约性的、商品化了的、高效率高利润的、利已主义的人际关系。[24]

忙碌的富人家长可以雇私人司机带孩子去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在购物商场的“学习中心”雇教员帮孩子做作业提高学习成绩，也能雇私人代购员购买并包装节日礼物。举办生日派对的各种服务（例如，麦当劳的包间，在科技馆过夜，或是一个专业的派对协调人）也是家庭生活日益符合经济原则的标志。

儿童休闲的运作合理化就表现在不断增殖的有组织的活动上，这些活动有固定的日程安排，在一定的具体时间内提供一定数量的体验，并处在成年人的管控之下。孩子的课余时间从自发游戏转变成有组织的活动并不意味着一家人在休闲的时候不再享受快乐。很多人都觉得在一起度过像足球和棒球比赛这样的时光让他们特别愉快。问题的关键在于，与不久以前相比，家庭生活的一些领域变得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具有可预测性，也越来越规章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包括家长担心孩子无人看管而在附近街道上玩耍会很不安全，更多的人出去工作（造成有大人在家的时候越来越少），以及能找到邻家玩伴的机会减小。由于出生率下降和市郊化效应，尤其是住房面积增加和住房密度减小[25]，孩子们越来越不容易在自家附近找到玩伴。

家长在家里更强调讲道理，尤其是将其作为一种责罚形式；在公共机构中讲道理也是家长进行干预的手段，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运作合理化的形式，尤其是那种在文献中常见的“科学教子”。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要分析协作培养的兴起，就要抓住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制造业高薪职位的减少和不受欢迎的服务行业职位的增多。这种结构重组使得现在的孩子在成人之后很有可能在生活水平上会比他们的家长要低。这就意味着“好工作”会减少而“坏工作”会增加，竞争也会更激烈。而且，由于要得到那些受欢迎的工作孩子们就必须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很多中产阶级家长都会急切地渴望孩子获得好的学习成绩。公共机构的把关者，例如主管大学招生的官员，都赞同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因此，很多家长都认为，孩子参加的活动不仅仅只是有趣可爱的娱乐消遣。这些活动还为孩子在这种筛选过程中提供了潜在的优势。

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是促成一种新型儿童教养标准在中产阶级中兴起的原因。正如海斯（Hays）所示，这种新型的标准以多种方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26] 专业人士都积极支持家长通过自己主动担当起对孩子的培养，来增进孩子的创造力和课业之外的才干，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并提升孩子的在校表现。成就自然成长这种比较老式的儿童教养逻辑则很少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儿童教养的文化技能库就发生了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是真实的，那么儿童教养策略的使用为什么会出现阶级差异呢？为什么大家没有用同样的方法来教

养自己的孩子呢？

资源所扮演的角色

家长的经济资源造成了本书中所讨论的儿童教养上的阶级差异。孩子参加的活动都很昂贵。中产阶级家长很不屑地认为25美元的报名费“无关紧要”，“很合适”，或“微不足道”，而对所有贫困家庭和很多工人阶级家庭来说，这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报名费也只是参加一项活动最初最表面的一小点费用。很多活动还要求有特殊的服装。斯泰西·马歇尔需要练体操用的紧身连衣裤以及热身训练时穿的运动套装。她在往返于体育馆和家里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挎包，在家里还有一个平衡木。参加比赛需要特殊付费。在全家从一个活动跑到另一个活动时，孩子们紧张的日程安排也增加了在外吃饭的次数。不在本地的比赛还带来了特殊的报名费及旅店和餐馆的账单。赛季结束时往往会有特别活动、宴会和送给教练的礼物。此外还有各种各样隐形的花销，例如，汽车维修和汽油。1994年，塔林格家预算加勒特的活动每年要花掉4000美元（包括以上列出的所有因素，汽车维修除外），这个数字也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27] 因此，除了要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来支付课程和活动的花销之外，家里还要有其他优势，比如靠得住的私家车和有弹性的工作时间，以便接送孩子去参加活动。这些资源都很不均衡地集中在了中产阶级家庭。

教育资源上的差异也很重要。中产阶级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更高，也有更大的词汇量和更多的知识。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促进了协作培养，尤其表现在干预家庭以外的公共机构方面。如同我前面所展示的，贫困和工人阶级的家长在理解专业人员士用的关键性术语上有困难，比如，“破伤风针”或“蛀牙”。中产阶级家长的教育背景也给了他们批评教育工作者和干预学校事物的信心。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来说，教育工作者高于他们，处在社会的上层。对中产阶级家长来说，教育员工与他们平级或者比他们还低。此外，研究表明，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相比，中产阶级家长大都对儿童教养标准的变化更为敏感。这有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家长大都更能根据专业人士的建议调整自己的做法。[28]

其他学者也指出，家长的职业和工作条件，尤其是工作的复杂性，对其儿童教养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29] 在本项调研中，不仅有迹象表明家长的工作很重要，而且还表明成年时代的经历本身就影响着人们如何构想童年时代的生活。中产阶级家长没有严重的经济困难，因而经常会把经历专注在工作生活的快乐和困苦上。[30] 他们大都认为在童年时应该有机会玩耍，但是也要有机会发展宝贵的天赋和才能，以便今后在成年时能实现自我。比如，塔林格先生在为加勒特评估体育运动的价值时认为参加这些活动对他将来的工作有帮助，因为踢足球教给他儿子要“顽强”和“勇于竞争”。同样，威廉斯女士还提到了亚历山大学会了与队友合作的价值。中产阶级家长都十分清楚20世纪结束时中产阶级及全国范围内出现的“财富滑坡”问题。他们担心自己和孩子的经济前景。

[31] 这种前途未卜的状况让他们感到，为了拓宽孩子将来的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孩子的能力十分重要。

塑造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所持观点的经历和忧虑与中产阶级家长的截然不同。对工人阶级家庭来说，是工作的衰减和经济匮乏的压力塑造了他们成人期的经历，影响了他们对童年的构想。对贫困家庭来说，是依赖政府救济和资源严重匮乏影响了他们对成人期和童年的看法。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更担心生活的基本问题：怎样挨过食品短缺，尽管没有可靠的交通工具但还是要带孩子去看医生，买衣服，并设法弄到其他生活必需品。当他们回想自己的童年时，这些成年人都承认他们经历过困苦的时期，但也都记得一些较好的时候，那时没有他们现在面临的各种担忧。很多人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得快乐惬意。他们的孩子成年后会有足够的时间去面对生活的重担。总之，家长对成年期和童年的构想似乎是与他们的亲身经历紧密相连的。因此，影响家长教子策略的因素也不仅仅局限在受教育程度上，而是还包括成年人在工作上和经济上的经历。

事实上，之所以中产阶级家长采用协作培养的策略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则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的方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生经历和各种资源的相互交织；这些资源包括家长的经历资源、工作状况和教育背景。尽管如此，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不能决定他们采用哪种儿童教养惯行。行动者的执行权和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个体在扮演其社会结构地位、上演人生种种结局的时候 [32] ，是有“相对自主性”的；紧记这一点十分重要。

除了经济和社会资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不同社会地位的儿童教养惯行。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情节：如果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在资源上与中产阶级家庭平起平坐，他们教养子女的文化逻辑也会随之改变吗？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这里有没有相对独立于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文化态度和信条在影响着家长的教子惯行呢？遗憾的是，本项调研的规模和范围都无法让我们就此作出明确的回答。另一方面，一些贫困和工人阶级的家长报告说他们想让孩子参加更多有组织的活动，表示他们相信倾听孩子需要的重要性，并感到作为家长自己在孩子学校教育中的积极参与十分重要。在这些家庭里，家长的教子惯行看起来是直接受到了资源匮乏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在其他家庭里，家长并没有把孩子参加各种活动看得特别重要。例如，泰勒女士“祈求”泰雷克再也不要想打橄榄球了；她并不认为这项运动对泰雷克有任何帮助。

其他家长表现得则更加模棱两可。比如，在与这些家长做访谈时，我和研究助理（用我们观察这12家的部分数据）描述了两个孩子的真实日常安排。其中一个日程安排很像亚历山大·威廉斯的：限量看电视，必读的书目，以及很多有组织的活动，包括钢琴课（那个例子中的孩子不喜欢上钢琴课，但家长却不允许他放弃，这两样都不符合亚历山大的实际情况）。有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认为这个故事情节很不吸引他们。 [33] 一位贫困的白人母亲抱怨说：

我认为他，我认为，嗯，我认为他想要更多玩的时间。我认为，他大半时间都并不喜欢做那些事情（轻声地笑）。我认为他的父母太严格了。而且他过得根本不

像个孩子（笑）。

此外，即使是那些说这样的日程安排等孩子长大后会“在工作上”得到回报的家长，也都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就像下面这些评论（每个都摘自不同的录音访谈）所示：

> “我认为这孩子过得很惨。”
> “他肯定累坏了。”
> “除非你想在钢琴方面让他成为大钢琴家利贝拉切（Liberace）……我认为这简直就是浪费钱……我认为他有点儿把自己的生活打断了。他没有参加任何能交上好朋友的活动。”

因此，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家长的教子信条是繁复混杂的：一些人希望孩子能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另一些人则不希望。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迹象表明，如果家长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能得到改善的话，他们的文化惯行也会随之改变。调研中有很多中产阶级孩子的家长正在走上坡路。孩子的父母是中产阶级，但祖父母却是贫民或工人阶级。在有些个案中，孩子的祖父母反对与协作培养有关的儿童教养惯行。对孩子为参加有组织的活动而制定的忙乱日程，他们感到十分困惑，对孩子父母采用讲道理的方法而不是直接下达指令，他们感到特别恼火，对孩子母亲在学校教育方面的密切参与，他们感到非常敬畏。由于个案数量有限，我们不能把结论扩大化，但的确有证据表明，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是塑造儿童教养惯行的关键。随着家长自己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他们在教养子女上的文化信条和惯行也产生了变化。解开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与孩子所作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在本项调研的范围之内。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要怎么做才好呢？

《公民权利的代价》（The Ptice of Crtrzenship）是历史学家迈克尔·卡茨（Michael Katz）的一部很有思想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卡茨展示出，美国人近年来的社会福利观念已经变得过分狭隘。[34] 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向穷人提供官方援助上，但却忽略了另外两个重要的社会分配形式：社会保险计划和税务政策。然而在规模和范围上，社会保险计划，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都会缩小贫困家庭需要支付的款额。而且，这些计划都很有效地在老年人中减少了穷人需支付保险金的百分比。州政府也很有可能会采取类似的措施来减少美国家庭之间的不平等。要减少本书中所描述的社会不平等，州政府的干预很可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例如，一种与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类似的儿童津贴就很有可能会有效地削减贫困儿童并减小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上的差距。[35] 正如大卫·卡伦（David Karen）指出的，为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增织一张“安全网”会很有帮助：

> 任何能为穷人（和工人阶级）提供安全网的措施都会增加……儿童的资源，并因此使得他们有可能去参加现在还无法参加的各种活动。他们被排斥在这些活动之外，不仅因为他们没有钱参加，还因为家长没有时间接送他们。如果家长有了更多的时间（比如，工作时间减少了），孩子们有可能会去参加更多的活动。在这样的目的下，我会支持像全民医疗保健，州政府出资的日托、（和）落实最低工资这样的条款。[36]

此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增加娱乐经费也会有所帮助，因为，我在对斯旺小学和下里士满小学周围娱乐项目负责人的采访中清楚地发现，镇区变得越富有，他们能提供的娱乐活动也就变得愈加丰富。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课外活动和交通运输的优惠券（例如，音乐课、美术课、运动项目和特别夏令营）。一个问题是，各住宅区在社会地位上都较为单一化。如果能把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合并到中产阶级的居住区，他们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设施。然而，更难做到的是，出台支持财富再分配的政治决策。相反，如同其习惯势力，美国人更有可能仍然把精力放在更多孤立的解决方法上。但是，由于问题依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如此。下面我将讨论一些可能性。

放慢速度：为中产阶级家庭做的政策性建议

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忙乱的日程安排在媒体报道中日趋增多。因此，一种社会运动潮流正在逐渐形成，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家长开始抵制如此安排孩子的生活。包括像《过分忙碌的孩子》（The Over-Scheduled Child）这样的书籍坚持说，孩子们的日程安排已经失控了：

> 星期二早上6：45分，7岁的贝琳达还在睡觉。学校上午9：00才开始上课，而她妈妈通常也会让她睡到7：30。但是星期二却不行。贝琳达星期二有钢琴课。她要在钢琴课后直接赶往学校，到下午3：00才放学。然后，临时来看管贝琳达的人开车把她送到从4：00上到6：00的体操课上。虽然星期二最忙，但是一周中其他几天也都排得满满的，有教会学校和唱诗班、芭蕾舞和（贝琳达最喜欢的）马术。“一天下来她就很累了”，她妈妈难过地说……“我也不知道这样（忙）到底好不好。但是我想给她我不曾有过的那些优势。”[37]

作者们对这种日程安排十分恼火：

> 我感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已经紊乱了，但是我们却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为孩子做得太多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应该少做点儿——……我们每次……回[转]过来……就会看到又有一些人在我们该为孩子茁壮成长而做的事情上多加了点东西。[38]

抵制在不断地蔓延。在集体层面，像以明尼苏达韦扎塔为基地的“家庭生活第一”这样的基层组织正在给教练和其他有组织活动的成年领导人施压，确保全家在一起的时间获得优先权（例如，通过不在星期天安排活动，或不惩罚因和全家人一起出去度假而错过活动的孩子）。新泽西州的里奇伍德镇区宣布全社区成立（自愿参加的）“家庭之夜”，并在这

一晚安排取消孩子的有组织活动（和家庭作业），这个社区也因此而获得了全国的关注。这些初生的运动都明确承认孩子过满的日程安排十分荒谬，承认家庭生活被狂乱的“超级过度日程”所奴役。[39] 在谴责过度安排孩子日程的同时，专业人士号召家长给孩子更多随意玩耍的时间。[40] 在个人层面，他们鼓动家长对孩子参加的活动要严明限度，有些家长很骄傲地在自己的网站上宣布，他们要求孩子一次只能参加一项活动。

一个关于家长如何监督和干预公共机构的系统性审评还没有出现。事实上，很多专业人士都积极主动地培训并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对于家长广泛对孩子使用讲道理的方法有多少价值，人们的怀疑也正在不断增加。专业人士和媒体对家长与孩子之间界限模糊所带来的问题也作出了很多相应的反应。以《家长是主管：为您和您的孩子制定健康而充满爱的界限》和《我是家长，你是孩子》为题，专业人士发出了家长需要给孩子提供指令的信号。这些书都向我们提出了警告，讲述了一些无礼、讨厌又不领情的孩子的故事，这些孩子拒绝对客人讲礼貌，认为作孩子的可以决定是否与家人一起吃晚餐，还能在接到了礼物之后不对送礼的人表示感谢。作者们把这些孩子形容得极其失控，渴望成年人的干涉[原文如此，虽然译者认为此处“干涉（intervention）”应作“关注（attention）”]，因此他们号召家长要“制定界限并作出决断”。这些专家提供的解决方法大都提倡个人去采取行动：鼓励每位家长去找回自身固有的力量来自己做主；给孩子明确的指令；顶住诱惑，不去寻求孩子的赞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产阶级家长的这个新议程，不论是以集体形式还是以个体形式表达出来的，汇总起来就是又回到了成就自然成长策略的许多要素上。对负担过重和疲惫不堪的家长来说，在核心政策上建议他们限定界限：减少孩子参加活动的数量，安排全家在一起的时间，优先考虑家庭活动而不是孩子的课外活动，并在总体上把群体的需要放在个人需要之上。

遵从权威的标准：为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作出的建议

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来说，在核心政策上建议他们要在公共机构的场景中为孩子获取更多的优势。有些课程强调给孩子读书的重要性，增加词汇量，并防止“暑假退步”（summer setback，暑假退步指的是，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在假期里大都会学习退步，而中产阶级孩子的学业却在假期里大有长进）。[41] 在此，重要的是要记住公共机构的标准永远都是在不断变化的（看字读音教学法这一年很“流行”，下一年就换作了整体语言教学法，电脑先是得到了推广，而后又遭遇了挑战）。为孩子提供遵从权威标准所需的资源固然可能有帮助，但是这样做也并没有对基于阶级地位之上的儿童教养方法其本身固有的问题去进行仔细审视。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帮助专业人士学会如何对文化惯行的不同更加敏感，如何“语码转换”，在互动中因人而异，还是有可能做到的，进而，

他们也可能能够教孩子们如何在家庭和公共机构之间进行“语码转换”。一种很有前途的发展项目就是为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提供那些中产阶级孩子在家里能得到的协作培养的成功计划。这样的例子包括高中的深度干预，以及学校和家庭教师通过“我有一个梦想”的慈善事业承担起中产阶级家长（和他们雇的家庭教师）通常会扮演的角色。这些课程项目提高了孩子的学习成绩，减少了停学、纪律问题和少女妊娠的出现频率，还增加了大学的入学率。很多项目还把高中毕业率翻了一番。[42]其他干预措施也产生了同样的正面效用。[43]例如，在有些课程中，高中老师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大学校园游，提醒他们关键性的截止日期，帮助他们填好大学申请表。像这样的课程项目，以及像“大哥哥，大姐姐”这样比较传统的项目，都改善了孩子的在校经历。[44]总之，与给中产阶级家长的建议不同，在政策上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的建议不涉及忙乱的日程安排或需要家长去进行更多的管控。相反，这些建议都集中在为孩子获得在公共机构中的优势上，鼓励家长更多地使用说理的方法来提高孩子的词汇量，并在孩子的学校教育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

个人经历和社会结构

通常家中有新的成员出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家里人会在日历上圈出与即将出生的侄女、侄子、女儿或孙子有关的各种日子，在出生前会举行像宝宝送礼会这样的庆祝活动，为宝宝的到来庆祝并赠送礼物，到医院去做检查并详细谈论宝宝会长得像谁，以及有像洗礼仪式或在各个教派的教堂里举行“献堂典礼”这样正式的祝福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庆祝新生命带来的希望。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开的。在同一个家庭中，每个兄弟姐妹都有不同的脾气和喜好以及不同的基因排列。弗恩·马歇尔每周花一小时又一小时的时间打篮球，斯泰西则痴迷于体操，加勒特·塔林格个性很沉静，斯宾塞却总是说个没完没了，他爸爸假装很绝望地说：“你简直无法让他闭嘴。”梅勒妮·汉德隆的哥哥又高又瘦，梅勒妮却又矮又结实。甚至同一个家庭中的不同成员都有着不同的教子经历。家庭结构会随着时间变化，家长的生活状况和教子方式也会随之变化。兄弟姐妹们各自作出不同的选择，也各自得到不同的人生结局，这当中的变异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每个人生命中的独特性格，以及每个个体带给家庭的独特天赋，都不应该蒙住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在制造不平等的过程中，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十分重要。社会群体成员身份构成了人生的各种机遇。每个家庭都会欢庆新生儿降生，而有机会获得至关重要又为人普遍追求的目标，对于所有这些新生儿来说并不是平等的——例如，在像学术能力测验这样的标准化考试中拿高分，从大学里顺利毕业，拥有专业性强的工作和持续受到雇用。我们丝毫也不能主宰自己能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而我们出生的家庭却相当重要。其中部分原因在

于，公共机构系统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更多还是建立在某些文化模式之上，而对另一些文化模式则少予采用。事实上，在社会上走上坡路和走下坡路的都大有人在。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有些人，尤其是某些移民群体，克服了人们预想的种种困难，生活越来越好。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但它又是确实存在的。在这个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承认的社会地位系统中，卡蒂·布林德尔、温迪·德赖弗和泰雷克·泰勒在生活中的很多重要元素上有相同点，就像加勒特·塔林格、亚历山大·威廉斯和斯泰西·马歇尔在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也有共同点一样。这就意味着有时候阶级地位比种族更重要。这也暗示了，虽然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男孩和女孩在生活中有重要的性别差异，但是他们也有重要的共同之处。[45]

美国人大都不会接受自己生活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中这一观念。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是中产阶级。当有人问起社会分歧时，很多人都很愿意谈论种族的影响，但是社会地位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会系统性地谈论的事情。[46] 现在也不像早些年那样，人们已不再就消除贫困或缩小不平等的社会差距等观点展开广泛的讨论。

在公共机构的标准中审视社会地位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言词来理解不平等的现象。它强调了公共机构的标准是如何给了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大的优势，同时也突出了家中的文化惯行在家庭以外是如何以不平等的方式来获取酬劳的。这一关注焦点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削弱中产阶级对自己在道德水准上比穷人和工人阶级要高尚的主观臆断。而一套建立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地位上的词汇也要远远胜过一套道德说教的词汇，因为后者是根据个人的生活状况来从道德上加以指责并把最苛严的批评留给了那些“不劳而获的穷人”。[47] 这样做也比只依据种族类别进行研究要更精准。一个人所在家庭的社会地位对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成败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我们的社会系统所制造并维持的不平等却因其无形而不予承认。如果我们扩大宣讲社会地位的重要性，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就会变得更好。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开始更有系统性地认可我们当中的阶级区分。

[1] 参见Sharon Hays，The Cultural Contradktions of Motherhood。

[2] 一些科研人员主张，快乐并不受年龄、性别、种族或富有程度的影响。参见David G Meyers和Ed Diener的文章“Whois Happy？”

[3] 中产阶级家长自己也意识到了他们的生活有多么忙乱，他们经常说没时间。一些家长也说，他们小时候的生活十分不同，并没有像现在自己的孩子这样参加这么多有组织的活动。但是，中产阶级家长看起来却没有特别意识到他们强调跟孩子讲道理，尤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公共机构的干预。再有，他们自己及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也都没有特别意识到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家长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儿童教养方法。相反，家长们都认为自己教养孩子的方法来得很自然。

[4] Cornell West，Race Matters。

[5] 参见Jennifer Hochschild，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l Ellis Cose，The Range of a PrivilegedCLass， Beverly Daniel Tatum，Why Are the Black Kids Sitting Together in the Cafeteria？；Elizabeth Higginbotham，Too Much to Ask.

[6] 在本项调研中的某些环境里也出现了社会语言学用语方面的差异（包括白人特有的词汇）。在这个问题上更广泛的讨论，参见Mary Patillo-McCoy，Black Picket Fences和DouglasMassey、Nancy Denton，American Apartheid。我也没有研究一个种族单一隔绝的学校。在对此众多的论述中，参见Eric A Hanushek等人的文章“New Evidence about Brown v．Board ofEducaLion”。

[7] 参见Ellis Cose，The Range of a Privdeged Class和Mary Waters，Black Identities。

[8] Douglas Massey、Nancy Denton，Amencan Apartherd。

[9] 本项调研的结果与其他研究相吻合，都显示了儿童在年龄相对较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种族的存在。事实上，女孩子们在操场上经常只与同种族的孩子一起玩（男孩子反而更容易与其他种族的孩子一起玩）。因此，本项调研提出，孩子生活中确实受到了种族力量的影响，但是这些（还）没有像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那样成为组织他们生活的重要特征。关于种族在学龄前儿童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参见Debra Van Ausdale和Joe R．Feagan的文章“Using Racial and Ethruc Concepts”。

[10] 大多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长都自己报告说他们跟孩子讲道理。由于全社会都强调讲道理在更大的文化技能库中的重要作用，处于各种社会地位的家长都可能会说他们跟孩子讲道理，这一点也不足为怪。事实上，对于很多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来说，体罚是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时的“最后一招”。然而，研究表明，母亲受的教育越多，就越容易强调讲道理。在众多著述中，参见Cheryl Blueston和Catherine S Tanus-LeMonda的文章“Correlates of Parenting Styles in Predominantly Working.and Middle-Classs African American Mothers”。

[11] 当然，有些中产阶级家长在家长会上也显得略带焦虑。但总的来说，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相比，中产阶级家长讲的话更多，他们对教育工作者提出更多的问题，包括更多批评性的和尖锐的问题。

[12]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经常违抗并测试学校的规章，但是他们似乎并不会像我在中产阶级家长中看到的那样去努力让教育工作者迁就迎合他们个人的偏好。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经常会对成年人的提议作出反应，或者有时候还会央求教师们重复以前的经历，比如，读某个故事，看一场电影，或到机房去。在这些互动中，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界限比在中产阶级孩子中的更加严格分明。

[13] Carol Heimer、Liza Staffen，For the Sake of the Children。

[14] 我在此的讨论必须是推测性的。各个社会地位的家长都认为其儿童教养方式中的关键方面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让他们清楚地说出自己行为背后的理论基础还是有困难的。

[15] 在南方，1870-1900年间，纺织作坊里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10-13岁的孩子。参见Vivana Zelizer，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尤其是第二章。

[16] 引自Zelizer，Pricing the Priceless Cluld，第78页。

[17] 同上，第67页。

[18] 同上，第59页。

[19] 同上，第97页。

[20] 参见William Corsaro，Sociology of Chrldhood。

[21] 如Dandall Collins所说，韦伯给运作合理化赋予了多种意义。我此处指的意义是“在韦伯比较各种不同的公共机构时浮现出来的。官僚机构被描述成一种合理化的管理运作形式，而不是在世袭制度下看到的那种不合理的运作元素……这里的关键性[条件]似乎是可预见性和规律性……其中一种强大的含意就是，合理性是建立在成文的规定之上的，并因此被记录在书面文件当中”。参见Randall Collms，Max Weber；A Skeleton Key，第63-78页。

[22] 瑞泽尔也讨论了效率的重要性。参见George Ritzer，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23] Ritzer，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rety，第3页。

[24] Hays，The CuLNral Contradrctions of Motherhood，第11页。

[25] 对安全问题的讨论，参见Mark Warr和CMstopher G Ellison的文章“Rethinking SoaalReactions to Crime”，以及Joel Best的Threatened Children。在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变化方面，参见Rosanna Hertz和Nancy L Marshall的Working Families，以及人口普查方面的调研。在与孩子共度时光方面，参见Suanne Bianchi的文章“Maternal Employment and Time with Children”。关于城市化问题，参见Kenneth T Kackson，Crabgrass Frontier。

[26] Hays，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27] 2002年，给孩子报名参加一项体育活动就会花费5000美元之多。冰球的预算包括1OO美元的冰刀（通常需要每两年更换一次），60美元的手套和每年2700美元的队费。参见David M.Halbfinger的文章“Our Town：AHockey Parent's Life”。

[28] 对这一点的讨论参见Urie Bronfenbrenner的经典文章“Socialization and Social Clas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29] 参见Melvin Kohn在这一点上的广泛论述，尤其是他(和Carmi Schooler)合著的Work and Personality。

[30] 中产阶级家庭在生活中并非没有各种问题。此处的论点是，中产阶级家庭有更多

种多样的职业经历，他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培训，这也使得他们能够找到报酬更丰厚的工作。

[31] Katherine Newman，Declining Fortunes和Donald L.Barlett、James B.Steel，America： WhatWent Wrong？

[32] Eric Olin Wright，ahss，Crisrs，and the State，第一章。

[33] 我们采访的中产阶级家长也并不都赞同这里描述的情节。很多人认为，如果孩子不喜欢弹钢琴，家长强迫孩子参加就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不同，他们很多人都强调让孩子“接触一下”的重要性。

[34] Michael Katz，The Price of Citizenship。

[35] 参见Lawrence Mishel等人，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第289页。

[36] David Karen在2002年6月7日给作者的一封信。参见Jody Heymann，The Widemng Gap。

[37] Alvin Rosenfeld、Nicole Wise，The Over-Scheduled Child，第1-2页。

[38] 同上。

[39] 参见Maria Newman的文章“Time Out！（for Overextended Families）：ATown Takesa Rare Break from the Frenzy of Hyperscheduling”。

[40] 例如：“就像在牢笼里长大的野生动物从未能够发展自己捕猎的天性那样，孩子如果在其发展创造力的阶段失去了自己创造游戏来自娱自乐的机会，他们就很有可能会变得要依靠别人才能找到令他们快乐的娱乐方式。”Dana Chidekel，Parerus in Charge，第94-95页。

[41] 参见Doris Entw：istle和Karl Alexander就此论题的著述，包括Entwistlc、Alexander、Olsen，Children，Schools，and Inequalrty。

[42] 对其中一个补习班的详细描述，参见Dale Mezzacappa在《费城调查报》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包括“Then Years of Learning，Living，Loving”。总的来说，补习班对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最为有效（与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相比），对年轻男生比对女生更有效。

[43] 例如，在以芝加哥为基地的“我有一个梦想”补习班中，与控制组35%的毕业率相比，补习组中有72%的学员从高中毕了业。在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市，相比于控制组的33%来说，补习组1993年有60%的学生高中毕业。这些干预措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与“说我能行”补习班的六年级相对比）。内部数据总结及独立调研员的评估调查，参见“我有一个梦想基金会”的网站http：//www.ihad.org（信息取自2002年12月12日）。

[44] 在众多的论述中，参见Hugh Mehan等人，Constructirtg School Success，公有/私有企业对和大哥哥/大姐姐补习班所做的评估，以及Joseph Tierney等人的文章“Makinga Difference”。

[45] 如Bame Thorne在Gender Play中所记载的，性别的重要性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会有所不同。正如她所提出的，我们观察到孩子们把自己按性别分成了同性别的小组，就像哈罗德•麦卡利斯特、泰雷克•泰勒、温迪•德赖弗和杰茜卡•欧文在自己邻居的玩伴中按性别分成了非正式的小组。但是如果年龄相仿的孩子很少，那么像比利•扬内利和加勒特•塔林格这样的男孩子也会和女孩子一起玩；卡蒂•布林德尔会既和女孩子一起玩，也和男孩子一起玩。此外，孩子们，尤其是卡尔•格里利，还会花很多时间和弟弟妹妹一起玩。对童年时期性别角色社会化养成的综述，参见Eleanor Maccoby，The Two Sexes。

[46] 参见David Halle.Americas Working Man。

[47] 参见Michael B.Katz，The Underserving Poor。

附录一 研究方法：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

到人们家里进行观察，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家庭成员的互动是非常少见的。很多人对研究过程都特别好奇。由于篇幅关系，本书无法提供详细的描述，但是我将在这篇附录中描写一些在调研中出现的困难和进退两难的局面。

取样

虽然对家庭的观察组成了本书的核心，但它却只是一次多维性调研的一个方面；这次调研还包括了在小学里听课做观察和对很多家长进行访谈。项目最早的阶段在1990年就展开了，当时我（在一位非裔本科女生的帮助下）对劳伦斯威尔（假名）一所公立小学三年级的31位家长进行了访谈；劳伦斯威尔是中西部一个小型大学社区（人口有2.5万人）。其余53个孩子都是从东北部一座大都市里的小学中选取的。我决定把调研的焦点放在三年级孩子身上，是因为我想要选年龄足够小的孩子，这样他们的家长就仍然会在很多方面深层次地参与管理他们的生活（并因此向他们传输社会地位的影响），同时他们的年龄又足以给他们一些掌控自己业余时间的自由。我还希望能抓住机会，在同龄人的影响开始对他们的生活起决定性作用之前观察这些孩子。起初我曾希望能对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都做访谈，结果发现平时很能说的孩子，一旦面对录音机就会一言不发，所以就作罢了。[1]

之所以决定包括白人和非裔两组儿童，并且用家长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相结合的方法来定义社会地位，是根据我在劳伦斯威尔遇到的现实经验而形成的。虽然我最初的计划是去研究不同社会地位的白人，但是学校里的学生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而且，近几年那里还出现了黑人家长联合抵制学区无视黑人儿童需求的抗议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研究家长的参与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却把黑人家长排斥在外，是毫无道理的。附录三的表C1显示了全部取样（88个儿童）以种族为参数的分配情况。

在取样规模小的情况下测度社会地位

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测量“不平等”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分歧。有些人采取分级渐进的方法：根据不平等的关键性元素——特别是职业声誉、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他们把个体或家庭按等级分成一个相对连贯的层级。但是，各种职业之间的差别很大，尤其是在员工享

受的自主权上、在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保住工作的程度上、在工作的清洁度上，以及在工作的声誉上。我把这些差异看做是非分级渐进的。

在如何界定各个阶级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即，是否要使用马克思和韦伯的界定方法）。[2] 然而，不论使用谁的方法，大多数当前流行的建构方法都运用了大量的阶级类别以得到细致入微的经济地位差别。在这次调研中，我不可能模拟这样的界定方法。由于我的目的是要展现一幅透彻而真实的家庭生活画卷，我只能分析很少的几个家庭。事实上，由于取样少，又由于我的愿望是要跨性别跨种族来比较孩子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以区分细致为特点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方法，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合理的。

起初，根据我观察的市镇所代表的人口分布，我定位在两个阶级类别上。由于从整体人口来看，自己做老板或自己经营某个工作的人并不多见，我决定把目光集中在那些是一般职员而并非是老板或自己开业的家长。这样，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去在这个参差各异的群体中再做区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者们提出了各种标准，但是工作场合的权威力和“文凭屏障”是两个最普遍使用的标准。前者需要把那些拥有监督管理权威的人与没有这些权威的人区别开。后者需要把要求雇员受过严格教育的工作与那些不要求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区分开，基于这些考虑，加上对在实际操作中可行方法的实用性评估，我把阶级划分定位在了一个很宽泛的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区分上。我原计划与每个有工作的成年人进行讨论，并让他们提供自己工作的详细情况、他们所在单位的类型（如果有的话）和他们在单位的职位，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把调研中的家庭分别分配到这两大类中。如果一个家庭里两个人都有全职工作，并且两人的工作处于不同的地位类型，我就会把这个家庭分配到较高的社会地位类别（即“中产阶级”），无论家中哪个人的工作起决定作用。

当我了解到劳伦斯威尔的几所学校中有很多孩子家里都在接受政府救济的时候，就对这个计划进行了修改。如果忽略了这些家庭，调研的范围就会被无根据地任意缩小。因此，我又加入了一组没有工作的贫困家庭——这些家庭在传统上都是被排斥在各社会地位组别之外的。最终，我研究了三个类别：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归入标准见表C1）。

这些社会地位的类别中隐藏着重要的内部差异。威廉斯家（黑人）和塔林格家（白人）都是高收入家庭（即，年收入在17.5万美元以上）。在我这些为数不多的取样中，中产阶级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别虽然是真实的，却没有造成他们在儿童教养方法上的差别（包括更富有的家庭）。而且，也没有其他数据显示出引人注目的阶级内部差异。因此，使用“中产阶级”这一个术语看起来就可以很合理地涵盖各种不同富有程度的中产阶级家庭。

在一条略有不同的脉络上，表C3清楚地显示了，这些社会地位的差异是与不同的家庭结构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分布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同样存在。[3] 因此，我们观察的中产阶级黑人和白人孩子都与他们的亲生父母住在一起。虽然一些贫困儿童也与他们的父亲保持着联系，但是在我们的密切观察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黑人或白人贫困儿童的父亲和他们一起住在家里。工人阶级家庭界于这两者之间。这种分布模式令

人怀疑：协作培养是否会以父母是否离异而定呢？本项调研的范围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满意的答复。尽管如此，仍有迹象表明，虽然家庭结构可能会影响到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但却不会起决定性作用。例如，在31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取样中，就有三个单亲家庭。这三个单亲家庭很明显是使用了协作培养的文化逻辑。然而，这三位家长也的确在访谈中抱怨说，一个人教养孩子确实力不从心，因此他们也没有能够像自己希望的那样给孩子在很多有组织的活动上报名。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也表明，双亲家庭的孩子参加的有组织的活动比单亲家庭的孩子要更多。[4]

学校的选定

在理想化的世界里，我会去寻找具备各种种族和社会地位的学校和住宅区。当然了，在现实生活中，美国儿童却是住在种族趋向于单一化的地方，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社会地位也比较单一；他们所在的学校也是同样的单一化。最终，我选择了种族多样但社会地位单一的学校[5]。在选好了达到我的基本要求的学校之后，我用自己的非官方网络与相关学区的管理层人员见了面[6]。这些管理层的官员从我提供的名单上选出了最终参加调研的学校，他们还代表我向相关的校长做了序幕性的介绍。对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的详细描述（本书中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来自这两个学校）见第二章。

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6月，我每周至少到下里士满小学的一个三年级教室观察两次（经常是更多次）。1994年4月，我开始在斯旺小学的一个三年级教室做同样的观察。一名研究助理每周都到斯旺小学去，在9月到12月间观察现在已经是四年级的这些学生。此外，孩子们上四年级的时候，我有时还会回到每个学校去看他们；我和我的助手们在他们五年级的时候参加了毕业典礼。

下里士满的三年级老师格林女士慷慨地欢迎我到她的班里，并协助我和我的黑人本科女助理融入她的班级里。在教室里，我有时只是在一旁观察，但有时我也会在美工课和电脑课程上帮一下忙，并在孩子们从学校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搭一把手。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我都带来了吃的东西，包括情人节那天带饼干到班里。[7] 我开始对学生有了很好的了解，我到学校去时女孩子们会拥抱我。一旦和孩子们建立起温暖和睦的关系，下一步就是与家长做访谈。

根据任课老师对孩子们的了解，我把他们按种族和阶级分组，并每隔“n”个名字选择了一个孩子。我给他们的家长写了一封信（学校给了我孩子们的地址），在信中解释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孩子们如何度过课余时光的书，而且还会在书中更普遍地考察家长是如何帮助孩子度过每一天的。我在三年级结束时（下里士满小学）和四年级的秋季学期（斯旺小学）把这些访谈邀请信发了出去。[8] 然后我给所有的家长都打了电话，和他们谈了我的项目，并与他们定下了访谈的时间。

在这两个观察点中，只有一位母亲马上拒绝了参加访谈（有一些父亲最终谢绝了邀请）。此外，有三四个家长起初同意参加，后来则因为

时间安排上的困难而没能接受访谈。总的来说，同意参加的家长所占比例为90%。然而，我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取样。虽然这些家庭在种族上都很多样化，但是这两个学校还是没有足够多的中产阶级黑人孩子和贫困的白人孩子。我通过在斯旺加入三年级学生扩大了取样范围，并用广告传单和非官方的关系网招募了更多的人。 [9] 大部分与家长的访谈都是在1993和1994年之间做的，但是有一些到了1997年才完成。我们还额外对60位教育工作者及其他与儿童工作相关的成年人也进行了采访。例如，几所学校（包括劳伦斯威尔）里的三年级和四年级老师都接受了采访，还有其他的学校职工（即，阅读专家、音乐和美术老师、学校的护士、校车司机和执勤老师），以及孩子们业余活动的很多提供者。只要有可能，这些访谈的焦点都是参加我们调研的这些孩子。（附录C的表C9提供了调研的时间流程总览。）

招募参加调研的家庭

听课和采访家长对在家访阶段进入到家庭中是至关重要的。下里士满区格林女士的三年级班里就出了12名儿童中的7位：布林德尔、泰勒、欧文、德赖弗、卡罗尔、扬内利和麦卡利斯特。斯旺区的四年级班里又出了2名：塔林格和汉德隆。选取这些家庭是一个有意识的、复杂的运算过程。采访的阶段帮助我们确定了某种类型的经历和家庭特征（尤其是有组织的活动的数量，亲戚纽带的强度，家—校之间关系的深度），这些特征就作为了每种社会地位的显著特征。我想让大多数我们访察的家庭都能尽可能地在这些特征上有代表性。我们力图避免选择那些或是在学校超常活跃或是在与老师的互动中超常沉闷的家长。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我们还进一步把人选限制在了那些双亲家庭上。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每个类别里，我和我的助理们只能从三到四个家庭中去选。 [10]

在为访察阶段作出最后选择当中，我想要平衡一下取样中的性别、种族和社会地位。我还想要去看孩子们共有的关键性特征，尽管他们都来自不同的种族和社会地位。例如，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但是一些孩子都一样会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到附近的亲戚家串门，或是参加有组织的活动。总之，为了减少未知因素与孩子的行为差异相关联的机会（比如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参与程度），我和研究小组试图在选取目标儿童的时候进行“混合匹配”。

我还寻找了“异常个案”。尤其是，我特别想包括一个没有参加任何有组织的活动的中产阶级孩子。从我们采访的家庭中我没有找到一个这样的家庭，斯旺小学的老师们也想不出一个可能存在的候选人。在儿童教养策略和家庭住址方面，我寻找异常个案的努力更加成功，比如，有的家庭有很多中产阶级的特征，却住在工人阶级或贫困的住宅区。有两个家庭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对比。欧文家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也是种族混血的家庭（白人母亲，黑人父亲），他们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把他们置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但他们却住在工人阶级住宅区。他们的

儿童教养策略以成就自然成长为主，但我们也观察到了协作培养的迹象。格里利家是另一个异常个案。格里利女士是一位白人单身母亲，她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现在和自己的非裔男友住在一起。她出了一个吸毒的问题，并曾一度严重到让她暂时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在调研期间，格里利一家正生活在贫困线下，住在一个白人工人阶级住宅区里。尽管她在童年时代享有特权，但是格里利女士的大多数儿童教养策略都反映了她当前的社会地位：她遵循着成就自然成长的方案。这两个异常个案提示我们，社会地位可能比住宅区更有影响力，但是只有大量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本才能为解开这些重要的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我和研究助理们最初拟定的名单中，12个家庭里有9个家庭同意参加：两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全部四个工人阶级家庭，以及四个贫困家庭中的三个。[11] 黑人中产阶级家庭这个分类还是空缺的。我在斯旺小学邀请的母亲因隐私问题而谢绝了。虽然我不愿在斯旺和下里士满以外再招募人选，但是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我转向了一个多种族的私立学校，一个熟人的孩子在那里上学。在那里，我联系到了威廉斯一家。到1995年春，我只缺一个白人贫困男孩和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女孩了。为了找到那个男孩，我又回到了下里士满学区。在那里，一位社会福利处的主管（我是从公共电话簿上找到的）把我引荐给了格里利一家。[12] 为找到黑人中产阶级女孩，我调动了各种各样非正式联系人，然后才找到了一个愿意参加并符合我最关注的标准的家庭。女孩的名字叫斯泰西·马歇尔，她的年龄虽然合适（10岁），但是她已经上完了五年级，在秋季学期时就要上六年级了（到时候她就11岁了）。我觉得在孩子的年级上而不是她家的种族和社会地位上伸缩性强一点会比较好，所以我就招募了马歇尔一家。[13] 因此，最后的家庭取样包括从下里士满和斯旺来的9家，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3家。鉴于在别人家里做观察是一件很打扰他人的事情，我对总体上能有63%的回应率感到十分满意（我邀请了19家，得到了12家）。

我发觉招募家庭的过程压力特别大。很多人都怀疑我能否真的进入别人家里去实地观察。他们告诉我，家庭——尤其是从学校选的家庭，而不是朋友的朋友——是从来都不会同意参加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招募方式都是先送出一封信然后再打电话追踪一下。在打电话之前，我会在地板上来回焦虑地踱步，我的心也会怦怦直跳。即使在我清除了第一道障碍之后，我还会觉得第一次见面签书面应允书以及安排家访都很可怕。但在和每个家庭的谈话中，我都会尽力表现得积极向上，舒服自在，并心情愉快。我强调说，不像电视节目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家庭生活是很有难度的，照顾孩子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我解释说，我和研究助理们都习惯了大声嚷嚷和乱七八糟的房间。我还强调，我想描画出一幅真实的家庭生活图景，我还讲了自己长大成人的经历和与兄弟姐妹打架的事情。

当然了，不管我的话多么的有说服力，有些家庭还是没有参加。有些在拒绝我的时候解释道："我们家并不完美。"那些确实同意参加的人经常对我们说（我们在采访中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想"帮助我们"，而且我们出了350美元来弥补家访给他们带来的不便，这也使参加调研显得更有吸引力。[14] 我相信，这笔钱对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

家庭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两个接受政府援助的家庭就拒绝参加。我个人估计，尤其是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孩子们是我的强大同盟。在采访阶段，我相信，孩子们熟悉我并似乎很喜欢我，这对获得他们家长的合作有极大的帮助。[15] 此外，在我们请他们参加家访观察之前，家长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来了解我们。招募家长参加采访然后再进行访谈的过程使我们有了很多次的接触，包括在访谈前一天的晚上打电话确认。访谈时间要持续90-120分钟，几乎所有的访谈都是在参加调研家庭的家里。我们带了从糕点铺新烤的酥皮馅饼作为对他们的答谢，在访谈结束后再寄给他们一张手书的感谢短柬。由于我们对两位家长是分别采访的，所以我们在与孩子的父亲做访谈时又重复了整个过程。[16]

有可能是这样的：在那些同意被观察的家庭中，母亲们都对自己的角色有超常的安全感，没有吸毒的问题，通常也不担心会因为自己“坏”或“虐待”了孩子而有可能被“交给”政府。虽然有些家庭（尤其是布林德尔一家）比别的家庭有更多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属于我们在这些学校观察到的各种家庭的范围之内。尽管如此，由于并非随机取样，这些结果并不能推广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

调研人员

虽然我更愿意自己做所有的实地调研和访谈，但这是不可能的。我需要有人帮助。第一年的时候，有四个学生帮我做调研——三个白人女生和一个非裔女生。这些学生和我一起采访了调研中的88位家长并对超过半数的家庭进行了观察：布林德尔、卡罗尔、德赖弗、汉德隆、欧文、塔林格和扬内利。在学年末，当这些学生走了以后，我雇用了两个研究生，一个非裔男生和一个白人女生。1994年夏，他们观察了泰勒、麦卡利斯特和威廉斯家。1995年夏，有四名研究生帮我做调研：一个来自人类学系的非裔女生，两个来自社会学系的白人女生（其中一个头一年夏天在此做过助研），一个来自心理学系的白人男生。这些研究助理观察了格里利和马歇尔家，并完成了对威廉斯家的观察（见表C9）。

作为人种学研究公认的真理，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我决定研究这个课题的原因上和我们眼界所能看到的东西上。在调研期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孩子。坦率地说，我自己做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动力就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我希望能更好地了解家庭内部的运作。我小时候很渴望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我父母不同寻常的、甚至是古怪的性格让我适应了多变的家庭生活。[17] 虽然我对世上存在着正常家庭的幻想已经从此淡去，但是我童年时代的经历却塑造了现在的这项研究。我父母在他们的每个孩子身上培养出了一种对读书的热爱、一种幽默感、一种不墨守成规的灵气和一种坚持不懈的人格。没有这些品质，我就不可能这样顽强地坚持下去，努力为我的自然主义观察招募参加的家庭。然而，最重要的童年馈赠就是，我不会因为在那些孩子家里会听到大声叫嚷、能看到酗酒、情感动荡和体罚惩

戒而感到不舒服。我发现，这种对多种多样的家庭互动都感到舒适自如的性格对这项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同样，对研究助理们来说，个人经历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例如，这些学生小时候家里对他们的惩戒方法就影响了他们对什么事情值得记录的看法，这些也从关于他们的实地笔录中反映了出来。有些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实地调研员对某些家长威胁要“打”孩子而感到难过。一个在工人阶级家庭长大的实地调研员对此就没有感到惊讶，但是他却对中产阶级孩子在每天与家长的互动中有多么的不尊重父母而感到震惊。和一个吭吭叽叽闹个不停的中产阶级4岁孩子在一起坐二十分钟车就让这位助研头都痛了，而且还让他感到很厌恶（“我真想踢他妈妈的屁股，因为她就这么让这孩子闹下去……到底谁是家长啊？”）。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调研人员找到了他们“最喜欢的”家庭，有些家庭也发现了他们“最喜欢的”调研人员。

然而，总的来说，不同调研人员记录下来的实地笔录还是很相似的。我相信，这是因为有些事请对研究小组里的所有人来说都很“鲜明”。而我在调研人员之间达成理智整体性这方面也是有意特别严格要求的。每个星期全组都要开会，正在家访观察的小队，每个人每周也都要再开会。在很多次实地访察之后，我都会和研究助理们在电话上谈很长时间来讨论他们当时应该把什么信息写入实地笔录。

实地调研员们都觉得这项研究很不同寻常而且也（通常都）很有趣。和我一样，他们喜欢了解那些家庭。而在实地进行观察又总是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需要真实可信，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持中立。有时候一些小策略是有帮助的。比如，在家访有婴儿的人家时（布林德尔、德赖弗、麦卡利斯特和扬内利），我通常都会请求他们让我抱孩子。我本身喜欢抱着婴儿，这样做也可以帮助我融入情景中。其他实地调研员喜欢和孩子们一起打篮球或谈论音乐。尽管如此，实地调研的某些方面又确实需要我们抑制自己的想法和喜好。例如，我没有表达自己对一些家长的政治观点所感到的愤怒，我还假装喜欢他们给我吃的所有食品，甚至是我极其不喜欢吃的东西。研究助理们也同样严格地监控自己的言行。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实地调研让我们心力憔悴。一个研究生是这样总结实地观察有多么令人疲累的：

> “我记得有一天真的是糟糕极了。那天我上午去了麦卡利斯特家，下午去了塔林格家。我的头痛得很厉害，有很多天都精神恍惚，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对阶级的看法有多么矛盾……每一天，在同样一个世界上都生活着穷人和过得很舒服的人，他们互相忽略（或是不去看对方），他们有着如此天壤之别的不同经历。但是我们通常却不去看这些东西。”[18]

家访

所有在家中的观察都是1994-1995年之间进行的。我们学会了去仪式化自己进入（和离开）这些家庭的方法。通常，在每个家庭同意参加之前，我们都要在电话上和他们谈好几次并同他们见一次面。然后我们

会安排时间再和他们聚在一起签应允书并安排家访时间。为了那次签应允书的会面，我和两个研究助理会到他们家里去。我们会随身带上两个日历（一个给我们自己；一个是冰箱贴，给同意的家庭）和一个从糕点铺里烤好的蛋糕。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会制定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家访时间表（每次家访需要2-3个小时），还要决定调研组中的哪个成员会在几点钟来家访。在安排家访时间时，我们力图安排不同的时间段，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各种不同的日常事件，比如，上学前的准备，下午或傍晚做作业的时间，晚饭，周六早上的活动，去教堂（如果有的话），到亲戚家串门，看医生，家庭派对，有组织的活动，以及其他杂事。[19] 此外，我们还试图和每个家庭都安排在家里过上一夜。一个典型的家访方案可能会从孩子放学到家后实地调研员来到家里开始，然后在家里待到晚饭后，再离开。另一些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人可能会在早上6：30就到他们家里，去看看为孩子准备上学的时候都会发生些什么，或者我们会到学校里去见孩子，去观察他们下午和傍晚都做些什么。我们经常带着录音机，尤其是在家庭成员都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存在之后。

所有的家庭都觉得我们要求观察他们是件很奇怪的事。塔林格先生总结了大多数人的看法。在实地调研员说研究项目很“不寻常”之后，他就跟着说：

> “对呀，我知道啊。真的是很不寻常。唯一比同意被观察的人还奇怪的人就是想观察别人的人！”

前几次家访大家都很尴尬。没有人知道该做些什么（包括我们自己）。不需诧异，家庭成员们都觉得需要先和我们有所交往，尤其是我们刚进家门的头几分钟。他们问我们路上是否顺利，并几乎总是给我们饮料喝。而孩子们通常都有要做或想做的事。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地板上坐下来和他们一起看电视，或者到外面去打球。在家长和孩子们出去办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跟着他们一起坐在车里到处转。就这样家庭成员慢慢习惯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发现紧张的气氛松弛了下来，尤其是在第三天，到第十天的时候就更加放松了。孩子们都还小，所以时间相对一长，他们就无法保持“在客人面前的礼貌”了。我们感到，在我们家访的过程中，家庭生活的节奏又返回了常态。而且，本项研究的关键目的就在于比较各种不同的家庭是如何组织日常生活的。即便有些家庭比其他家庭更加放松，也没有任何特别的证据表明这同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种族有什么系统性的关联。

孩子们看起来都喜欢我们去家访，但是他们的热情程度还是因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的孩子看到我们时真的是很兴奋。在家里有成年人对他们关注得如此密切是件不寻常的事。任何一次家访结束时，孩子们通常都会恳求我们再多待一会儿，尤其是女孩子更是如此。正如欧文家的女儿在调研的最后一次访谈中解释的，“家里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真的挺好的”。小比利·扬内利说，家里来了调研人员让他“感觉很好”。当我们问哈罗德·麦卡利斯特的时候，他羞涩地笑着说他“很喜欢”调研人员到他家里。相反，中产阶级孩子对这种关注则早已厌烦——他们太习惯成年人对他们的密切关注了。[20]

对所有的孩子来说，家访运行得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它变成了日常例行之后。总的来说，为了和孩子们“一起待着”而重复不断的拜访就是很好的方法，去看他们的体育活动也很不错，和他们一起去教堂是件容易的事，与全家人一起出游也是如此。不太寻常的事情（例如，看医生、在家里过夜）就比较困难，因为这些更加打扰他们的生活。

在头几个家庭那里得到的经验教我们要制定一个最后撤离的策略。离开考察地就像进入的时候一样不容易。我们把比萨饼派对定为致谢告别的方法。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吃比萨饼是件很稀罕的事情，孩子们很盼望这个派对。他们看起来真的感受到了我们的谢意。对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这个派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的家长经常给他们买比萨饼，其中一位父亲把当地一家比萨饼店的电话号码都背了下来），他们看起来也没有感受到我们的谢意。

即使在调研已经正式结束之后，我们也仍与这些家庭保持着联系。对大多数家庭，我们做了几次“扫尾性的”访问，尤其是看医生和特殊的表演会。在项目结束后的一两年里，我还到很多家庭里短暂地拜访过（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邀请我和研究助理们“随时”来玩）。我现在还和这些家庭有联系（虽然我没有把本书的手稿给他们看，但是我会在正式出版后把书送给他们的），从孩子们上四年级开始，我每年都寄圣诞卡给他们，卡里还夹着一张五美元。等孩子们长成青年人之后，我计划再次与他们做访谈。

两难境地

把调研中在研究方法上出现的两难境地汇集起来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在这里我将把困难的重点放在各个家庭对研究项目的理解程度上和观察与干预之间的对峙上。

理解我们

我们把与孩子讨论本科研项目的任务全权交给了家长。在一个戏中戏里，协作培养的理念和成就自然成长的理念似乎成了引导家长对孩子作出解释的指南针。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这个项目被介绍成了发展孩子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丰富课余生活的活动，与上钢琴课或踢足球没有什么不同。中产阶级家长允许甚至是鼓励孩子在决定是否参加的时候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里，家长并没有听取孩子的意见，他们只是告诉孩子说，全家都要参加调研。有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提前告诉孩子，直到我和研究助理们到家里去安排观察日程的时候他们才通知自己的孩子。比如，当我们出现在麦卡里斯特家门口的时候，哈罗德的妈妈之前已经签好了应允书，但并没有告诉儿子我们要来，她是这样对儿子解释我们的研究的：

> 她说：“一个人明天要来采访你。你必须得在家。别让他白等你了！”哈罗德没有问任何问题。

我和研究助理们都注意到了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对科研项目的基本使命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理解——也很担心这一点在道义上又暗示着什么。很多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对我们是什么人要来做什么都只有一些断章取义的了解。例如，我刚刚结束采访温迪·德赖弗的妈妈时，一边收拾好录音机一边说，我得走了，因为我要去讲课。她看起来特别惊讶，瞪大了眼睛提高了嗓门问："你也教书？你教几年级呀？"德赖弗女士知道我在天普大学工作，也签了很多封应允书，每一封应允书上都写着我是一个"副教授"。但是，她显然对我的工作根本没有一点儿概念。而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家长却能问我非常具体的问题。他们自己也上过大学，读过与这本书类似的书籍，他们问我在天普大学都教什么课，有些人还向我询问附近其他学校的情况。因此，我们虽然已经和各个家庭都就此项目讨论过很多次，但许多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对调研的理解还是很有限的；其他人种学家也发现了这个现象。[21]

干预的问题

当我们所看到的情形与我们自己对正确教育孩子的定义发生冲突时，问题就出现了。我们调研团队中的每个人给正确的教育方法下的定义都不同（就如前面提到过的）。很多人都知道教养孩子的惯行是有历史性的，相信只认为中产阶级的方法才有价值是错误的，但是在理智上相信这些是一回事，与那些做法不同的家长在同一个空间共存则是另一回事（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知道车祸和心脏病随时随处都在发生，但亲眼目睹发生的过程则会感觉大不相同）。让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作为项目的领导者，我既要指导研究助理，又要给他们必要的自主权，让他们自己决定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什么在伦理道德上是正确的。这些两难境地给调研工作带来了恒常的压力。在我看来，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轻松的对策。我经常感到自己"夹在石头缝里"进退两难。

我坚定不移地要求自己和研究助理们在接近这些家庭的时候都要心怀莫大的尊敬。我的看法是，那是他们的家，而且在抚养孩子上，家长都是竭尽全力的。我或者我课题组里的任何人想要改变他们都是不能接受的。我认为这是道德问题，是铺在我们科研项目下面的"基石"。

还有两个因素塑造了我在干预家庭生活上的立场。我想让家庭成员信任我和研究助理们，想让他们在我们面前感到自在。批评指责对建立和睦的关系是没有帮助的。如果说有作用的话，也只能是对良好关系的形成造成威胁。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干预来改变家庭本来的动态还会危害调研的根本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看到各个家庭在自然的常规状态下的一举一动。让一个实地调研员直接坐在客厅中间并不怎么"自然"，但我的确不想再多打扰他们。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要以把调研对家庭互动本然状态的影响减少到最小为目标。

我凭经验得来的方法就是，除非有流血事件或是严重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否则我们就只是和他们"一起待着"而不进行任何干涉；我也教育研究助理们一定要遵循这个方法。我还加上了另一条忠告：每位研究助理都不要做任何让他们感到不自在的事情。当他们在实地进行调研时，他们才是最终的决策者。

这种对尊重所有家庭及其日常行为的严格承诺并没有让观察变得很轻松。例如，当看到兄弟姐妹间充满憎恨的敌对状态时，一个实地调研员写道："抵制住诱惑，不去干预也不去[把孩子]按回到座位上，真是难

以置信的艰难。”有时候看到家长那种对待孩子的方式也会让人十分痛苦。大体上讲，这样的时候还是很稀少的，但是在布林德尔家，这种艰难的时刻却几乎是连续不断。全家人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我很快就清楚了，我得亲自到他家去访察，而不能让研究助理来做这件事。[22]

但是，有三次因为时间安排上的冲突，另一个实地调研员不得不到卡蒂·布林德尔家里去。即使在一段很短的访问中（放学后，从下午1：45到4：20），调研人员看到的互动都让她感到情绪十分低落：卡蒂很熟练有方地在自己脑袋上击打；她姑姑叙述了——她同意我们发表这段——自己小时候被父亲用皮带打到流血。家访之后，实地调研员总结了她的感受：

> 我讨厌去那里。我非常讨厌去那里，因为我觉得自己永远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比如，当玛丽告诉我她想怎样打卡蒂时，我只是点了点头。我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卡蒂打自己的头，看着梅尔梅尔把手指头捅进插销，看着西西对卡蒂叫嚷。啊！！！

幸运的是，我们在布林德尔家观察到的这些家庭互动是参加研究的家庭中的一个例外。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家访都比较轻松，甚至就连布林德尔家也有很多轻松快乐的时刻。通常，我们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会有很多乐趣，我们打篮球和壁球，看电视，开车出去逛，或是躺在地板上聊天。也许是造化弄人吧，我们开始观察的第一家就是布林德尔家。对之后的所有家庭的观察都要容易得多，如果我和研究助理们没有一开始就面临那么大的挑战，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会那么容易。

从数据到成书

结束了对这些家庭的访察之后，我们的知性之旅并没有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旅程才刚刚开始。[23] 因为这次调研的劳动强度（以及我个人生活的一些变化），我在活跃的实地调研之后进入了一段平静的反思期。慢慢地，我开始分析数据，主要是对家访的实地笔录反复研读（每个家庭都有一部按时间顺序排好的笔录档案）。那些与这88位孩子家长的访谈记录，我把家长们的回答都进行了编码，并把这些信息都输入了一个分析定性研究的软件。[24] 而对那12个接受观察的家庭，则继续使用老式的方法：我熟读了实地笔录，通读了各种文献，与人讨论，再反复多次地读笔录。我力图把数据中的只言片语联系起来形成思想，当论点成型了以后，我又去寻找驳斥它的证据。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起先是想用分析性的方法组织每个章节，把所有的家庭在一个总的主题上进行比较。但是最终，我跟从了阿利·霍克希尔德《第二轮班》的写作方式，决定通过给每个家庭一个专署章节来生动地再现他们的家庭生活。[25] 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是因为自己对孩子们如何度过一天的时间感兴趣，也对家庭和公共机构之间互动的性质感兴趣——这些主题在书中都繁荣绽放了。其他意外的主题也显现了出来：尤其是语言的作

用，亲族纽带的相对重要性，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的类比，以及社会地位在日常生活中的局限性。

有时候，人们会让我说出一个我在调研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告诉他们，在我和这些家庭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之后，我发现所有的家庭都给我一种安全感，我觉得他们都很正常，虽然他们之间有很多不同。此外，他们都让我很受震动，家长们在生活中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和辛劳，孩子们在他们日常例行的生活中经历了那么多的快乐和挫折，还有，所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要面临那样大的挑战。与哈罗德·麦卡利斯特相比，加勒特·塔林格的物质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加勒特有一些自己觉得在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却让他感到特别的失望，虽然哈罗德的家庭在经济上很困难，但是哈罗德生活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优势，加勒特却没有。没有一个孩子或成年人的人生道路是平坦的：每个人都有痛苦和失落，也有喜悦和酬劳。尽管如此，有些人的人生道路却没有另一些人那样坎坷崎岖。阶级地位很重要，在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如此。

[1] 回想起来，调研过程中没有与孩子们作访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在家访观察阶段，我的确与孩子们进行了“撤离前的访谈”。

[2] 参见Erik Olin Wright的著作，尤其是他在John Hall编纂的合集Reworkmg Class中的文章，以及Robert Erickson和John Goldthorpe的著作，包括The Constant Plux。在不认为缩减Goldthorpe和Wright之间差别的情况下（前者无疑坚持了后者要在其模型中保留资产阶级的想法），可以说，他们两人在区分不同类别的雇员时都使用了相似的标准（技能或证书和权威）。我感谢Elliot Weininger在这个讨论中的帮助。

[3] 参见Frances Foldscheider和Linda Waite，New Famdies，No Families？

[4] 参见Elliot Weininger和Annette Lareau的文章“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Organued Activitiesand the Gender Dynamics of the‘Time Bind’”。

[5] Douglas Massey、Nancy Denton，American Apartheid.

[6] 虽然我仍然觉得这个选择是合理的，但是它也有缺点。与住在贫困和工人阶级居住区相比，如果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住在中产阶级居住区，就很难了解到他们是否会采用中产阶级教养子女的文化逻辑。而这个问题又与深度实地调研所要求的少量取样复合在了一起。

[7] 此外，我还给学校捐了1OO美元。在下里士满小学，这份援款被拨给了格林女士，在斯旺小学，捐款拨给了家长协会。

[8] 我首先是从下里士满小学开始的，但我在两所学校使用的取样方法和招募访谈都是一样的。在两个调研场所中寄给家长的信件略有不同；例如，对下里士满小学的家长，我在书信中还夹了一张他们孩子在三年级时的照片（拍照人是我）。

[9] 十家贫困家庭是从救济办公室和其他社区项目中招募的。我每次采访这些参与者的

时候都付给他们25美元，其他那些家庭我都没有付钱。

[10] 我们抵制住了诱惑，并没有只邀请那些在访谈阶段和我们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家庭参加，虽然我们感到他们很有可能会同意的。我们坚守了自己的原则，优先招募了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家庭。

[11] 接受救济的家庭中，一个白人工人阶级家庭和两个贫困黑人家庭拒绝了我们的邀请。那个白人家庭的母亲解释说："我们家并不完美。"其中一个黑人家庭反对我查阅救济记录的要求，并因此拒绝了参加调研。（之后，我就放弃了这个要求。）另一个黑人家庭虽然当时同意了，但是过了两天又决定退出了。家中母亲的日程安排经常变换，并且家里还可能出现了吸毒状况。

[12] 在某些方面，格里利一家并不是典型的贫困家庭。比如，他们拥有一辆轿车。尽管如此，他们满足了我的基本标准（他们接受了各种形式的政府救济，包括医疗保障），所以就加入了调研。虽然他们也住在下里士满附近，但是他们住在学区界线的另一边，所以他们的儿子就上了另一所学校。

[13] 但是，结果发现这个决定很有问题。差一个年级就会有很重大的差别，斯泰西看起来更小，和我们观察的其他孩子相比，更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14] 费用（现款）一次交齐，通常都是在最后，到三个星期的深度实地访察完成的时候付清的。除了弥补给这些家庭带来的不便之外，这笔钱还包括补偿一些相关的开支，比如，给实地调研员吃的晚餐等。依他们的收入水平而定，这笔钱对不同的家庭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

[15] 我在课堂上和孩子们成为朋友的一个缺点，就是一些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长以为我与学区之间是有关联的。我担心这会加大他们的不信任感。除了向家长担保所有的信息都严格保密之外，我还一次又一次地澄清事实，告诉他们我在大学里工作，和学区之间毫无关系。

[16] 对采访父亲所遇问题的讨论，参见Annette Lareau的文章"My Wife Can Tell Me Who Iknow"。

[17] 我父母的婚姻虽然恩爱但却是吵吵闹闹的，有很多高声叫嚷。他们还有其他一些怪癖。我父亲做了很多年的家庭教师，但是有些年份他并没有工作。这就让我做教师的母亲成了全家（有四个孩子）唯一的经济支柱。我们家还有其他地方也让人觉得很不一样：我父母都是无神论者，我母亲骂人时像个水手那么粗鲁，我父亲的车总是不断地坏掉，他也总是试图要修好它。

[18] 我在自己的日志里也记录下了类似的感觉，"……一天去两个观察点真是太多了；让你疲惫不堪，你的笔录也翻了一番，面对[缺乏]安全保障的家庭和富庶的家庭之间的反差，你的头都晕了……[但是为了保持调研的对比特性]，你不得不总是要一天去两个点（或者实际上是三个点）……"

[19] 我们没有能够观察每个孩子的每个这样的事件。对于四家中产阶级孩子（塔林

格、威廉斯、马歇尔和汉德隆）中的每一个，我们都观察了一次看医生或牙医的过程。我们还观察了四家工人阶级孩子中的三个（德赖弗、泰勒和扬内利，没有观察欧文），以及四家穷人孩子中的两个（格里利和麦卡利斯特，没有卡罗尔和布林德尔）。因此，在12个孩子中我们有9个孩子的保健访察数据。所有这些都有录音记录。在12个家庭中我们有9家的家长会实录（不包括格里利、马歇尔和威廉斯家）。这些也都有录音记录。在家过夜的记录，我们也有12家中的9家（卡罗尔、泰勒和威廉斯家除外）。

[20] 亚历山大•威廉斯是个例外。虽然他有上层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是可以看出，参加调研显然使他很兴奋，他也很乐于和实地调研员在一起。

[21] 在众多作者中，参见Guadalupe Valdes，Con Respeto。

[22] 我相信，作为主要调研员，任何在研究生看来在感情上极为困难的情况，我都有责任挑起这个重担。

[23] 我在撰写本书时发现知识版权问题很棘手。我曾鼓励研究助理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这些数据，而且我自己也在学术会议上介绍了用部分数据写的文章。但我发现写出一本书的手稿才是最困难的，让合作者参与写书看起来就是把自己推入了一场灾难。我还感到，虽然收集数据至关重要，但它只是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做了在劳伦斯威尔的实地调研，写了基金申请，还组织并管理了整个项目。最终，我决定（在本书的开头）公开认可研究助理的作用并在私下里向他们再次表示感谢，而不是邀请他们一起合写这本书。

[24] 软件为Open Market公司的Folio Views for Windows 4.2。

[25] 参见Arlie Hochschild，The Second Shrft。

附录二 理论：理解布迪厄的著作

布迪厄的著作为研究社会阶级地位的冲击力提供了一个语境。他的模型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冲突、变化和系统性的不平等上，并突出了结构和执行者 [1] 之间关系的流动性。布迪厄认为，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通过不同的社交活动适应了不同的社会生活。 [2] 这种适应社会生活的经历为儿童及以后的成人提供了一种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什么对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他把这种感觉叫做惯习）。这些背景性的经历也塑造了个体所拥有资源（资本）的数量和形式，这些资本由个体继承而来，并在个体面对社交世界中各种形式的公共机构（场域）时得以利用。 [3]

布迪厄总是很注重“权力”，尤其是有权势群体对稀有资源的支配。他所感兴趣的，不仅是个体有怎样的权利去定义什么才能构成受到高度尊重的活动，而且还有为什么一些特定的社会惯行比起另一些来会更受尊重。事实上，布迪厄看到了在这个社会结构的中心存在着的统治支配与不平等。他的著作提出，研究个体使用何种策略保持或改进自己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特权的传输都“没有得到承认”。人们都倾向于把自己周围的社会组织形式看做是合理的。身份、特权和其他类似的社会酬劳，都是人们通过所谓的努力“挣得的”；也就是说，人们把这些东西想成是通过自己的智力、天赋和其他在战略上显现出来的技能而获得的。布迪厄在展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获得和使用文化资本时，清楚地解释了个体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像勤勉或智力这样的个人特征起作用的结果。尤其是他认为，因社会地位而拥有特权的人在很多方面占优势，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经历本身有内在的价值。相反，因为有特权的家庭用来教养孩子的标准与占统治地位的公共机构所（随意）推举的标准之间有着密切的兼容性，人们在家里受到的文化训练在这些公共机构中就获得了不平等的价值。

为了让这本书更加容易读懂，我并没有在正文中加入布迪厄的术语。尽管如此，本书对布迪厄更宽泛的理论模式还是一次比较直来直去的经验性应用，虽然也许只是部分应用。例如，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Social Crrrique on the Judgement of Taste）和其他著作中，布迪厄显然是想要把惯习定义成一套内化了的在很多社会领域里都起作用的特质意向。 [4] 布迪厄在讨论惯习时囊括了人们对食品、家具、音乐、化妆、书籍和电影的偏好。相比之下，本书的焦点要狭窄得多，它主要研究的是孩子们在业余活动中的时间分配，家中使用的语言和成年人对孩子在公共机构的生活进行的干预。尽管如此，可以说，把本书中讨论的这些元素放到一起去看，它们的确构成了一套孩子们学到的特质意向，即惯习。书中讨论的几个家庭，其惯习的两个方面就是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5]

布迪厄还把目光指向了在行动者和公共机构之间的互动中出现的细微的阶级差别。他注意到，人们都拥有大量的资源、社交网络和文化训

练，而且他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情景下都会使用所有这些资源。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特有的敏感度，使得他的理论比其他社会不平等理论（如，贫困文化模型）都要更具说服力。[6]

布迪厄使用了一套（艰涩的）专有词汇来构建自己的模型。其核心概念就是上面提到的：惯习、场域和资本。惯习（habitus）概念强调的是个体通常在家中学到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套对文化、社会和自己未来的特质意向。布迪厄提出，惯习的不同给个体以不同的文化技能、社会关系、教育行为和其他文化资源；这些不同的资源随着个体步入社会，又可以被转化成不同形式的价值（即，资本）。在以后的人生中，也有可能采用新的惯习，但是这些新近习得的特质意向与童年时学到的那些相比则缺乏那种舒适（自然）的感觉。

场域（field）概念至关重要。它包含了如市场和社会制度等术语中同样能捕捉到的那种动力。但是，正如大卫·斯沃茨（David Swartz）指出的，布迪厄还从场域的思想中去寻求一种更宽广的东西："布迪厄……认为'场域'的意象要高于'制度'的意象，其原因有二：首先，他想要强调社会生活的矛盾性，而制度的概念则暗示着一种一致性，其次，他想要建立这样一个概念，它可以涵盖那些较为模糊的社会领域，其日常行事只被微弱地制度化，其界限也不是很明确。"[7]

布迪厄认为，在一些关键区域，社会空间是分层而置的——一些群体会被排斥在外，另一些则会被包括进来（还有一些则会把自己排除出去）。他用一个纸牌游戏做类比：游戏中有个场域，它既提供了"游戏规则"又提供了有各种不同资本存在的社会空间。布迪厄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出的牌和打牌者技能的交点上。[8] 他强调，游戏的本性是任意的，赢家的位置也是有限的。例如，他决不会建议说，更多的家长通过采取某种行动就可以提高孩子在校学习的成功率。相反，他会指出，社会中的精英位置是有限的。因此，任何一种要把精英们的做法传播给所有社会成员的努力，都会导致那些做法失去原有的价值从而为一种不同的选拔机制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模型就暗示着，不平等是社会群体间存在的一个恒久的特性。然而，在任何一次具体的互动中，布迪厄又强调，其结果是不确定的。使用的策略有可能不会带来好处。此外，他还解释说，拥有相似资源的个体也可能在资本的使用技巧上有差别。

总的来说，布迪厄的研究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性不平等的动态模型，它使得调研人员能够捕捉到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瞬间"。要了解这些瞬间的特性，调研人员就需要去审视资本所处的环境，去审视个体为激活自己的资本而付出的努力，审视他们激活资本时所使用的技能技巧，和公共机构对被激活的资本所作出的反应。遗憾的是，布迪厄的研究并没有对拥有资本和激活资本的区别给予足够的关注。[9] 他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在机构中做"把关者"和决策者的人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例如，在本书的一些事例中，我曾试图展示出家长是如何在家里传输不同的惯习，我展示了这些惯习又是如何在与具体公共机构的交锋中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发挥作用，以及文化资本是如何（依其激活方式而）产生（或无法产生）教育利润的。马歇尔女士在家里教会了女儿一套特质意向，包括一种向有权威的成年人提出挑战的特质意向。当斯泰西没有被选入天才班时，马歇尔女士就运用了这种特质意向

（惯习）并激活了她的文化资本。通过精明地激活文化资本，马歇尔女士为女儿带来了利润，包括进入天才班（而天才班丰富的课程就有可能帮她提高考试成绩，以及在今后分班的时候得到更好的安排）。马歇尔女士能获得这些成果，就是因为她有这样的特质意向和干预她女儿日常生活中各种公共机构的能力。

总而言之，这些家长和公共机构中关键行动者之间的这些互动瞬间都是社会阶层形成过程的生命线，需要我们在今后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布迪厄并没有用经验性的数据来展现个体是如何在与公共机构互动的瞬间使用以阶级为基础的文化资本的。家长在用户化他们与公共机构的这种互动时，其能力看起来也是参差不齐。同样，在说服专业人士按他们的意愿行事时，他们的能力也是不均衡的。

总之，我们需要了解来自占据主导地位阶级的家长是如何通过关键性的社交场合来帮助自己的孩子进步的，他们这些帮助孩子的方法作为个体可能并不重要，但是当这些方法累积起来时就会变得十分重要。这本书正是为此作出的一个努力。

[1] 对此的精湛总结和分析，参见David Swartz，Culture and Power。也见布迪厄的文章“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和著作Outhne of theTheory of Practice与Distinction，以及布迪厄和华康德（Wacquant）合著的An Iinvitatr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arlis Buchmann的著作The Scnpt of Life也对布迪厄的模式有清晰的总结（见第31-38页）。

[2] 布迪厄，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Prachce。

[3] Rogers Brubaker，Rethinking Classrcal Theory；Craig Calhoun等人，Bourdreu：Critical Perspectrves。

[4] 他写道：惯习“是一个概括的、可换位的意向，它超越了直接学到的东西的局限性，执行着一个系统性的、普遍适用的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在学习环境中有着固有的必要性”。引自布迪厄的《区隔》第170页。另见《区隔》第172-173页。

[5] 当布迪厄讨论惯习时，就像在《区隔》中，他经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消费和品位上，而不仅仅是在儿童教养策略上。但他也很清楚地表明，他认为一种惯习中各种迥异的元素之间存在共有的普遍原则。因此，例如，对食品的选择和对儿童教养方式的选择就不会是毫无联系的。换言之，惯习是连接在各种范围内存在的这些意向的法则。此外，布迪厄还谈到了各个社会阶级之间存在着的不同惯习。每个个体的惯习通常都没有特别强大的独特性，相反，惯习是有阶级性的，但在这一阶级类别中又有变化。 他写道：同一阶级中每个成员个人的惯习都是以同族关系联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在同质性之内的多元性，它反映了以社会生产状况为特质的同质性之中存在着多元性。每个个体的意向系统都是其他个体意向系统在结构上的变异，在其阶级和运动轨迹内表达自己地位的独特性。“个人”风格，那枚给同一惯习的所有产物都打上特殊烙印的图章，无论在惯常行为上还是在工作中，都不过只是某个时期或阶级之风格的一个变差。（The Logic of Practice，第60页）

[6] 社会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都倾向于把焦点集中在布迪厄模式的某些元素上，尤其

是“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布迪厄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场域”，虽然捕捉到了这些标准，却一直被忽略掉了。因此，经验主义的研究中就常常缺少布迪厄模式提供的“双重视觉”——这种双重视觉同时聚焦在通过研究场域和个体惯行而获得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结构上。

[7] Swarts，Culture and Power，第120页。

[8] 布迪厄的文章“婚姻策略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策略(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和著作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Practrce。

[9] 参见Annette Lareau、Erin McNamara Horvat合著的文章“Moments of Soaallnclusion and Exdusion”。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起始章

第一章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第二章 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

第一部分 组织日常生活

第三章 协作培养的忙碌节拍：加勒特·塔林格
第四章 孩子的节拍：泰雷克·泰勒
第五章 孩子的玩耍是孩子的事情：卡蒂·布林德尔

第二部分 语言的运用

第六章 发展孩子的能力：亚历山大·威廉斯
第七章 语言作为社交生活的渠道：哈罗德·麦卡利斯特

第三部分 家庭和教育机构

第八章 存在于团体机构范围内的协作培养：斯泰西·马歇尔
第九章 跑偏了的协作培养：梅勒妮·汉德隆
第十章 让教育工作者带路：温迪·德赖弗
第十一章 遭皮带毒打，又害怕“上学”：小比利·扬内利
第十二章 社会地位的力量和局限性
附录一 研究方法：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
附录二 理论：理解布迪厄的著作